文革回憶錄叢書

寫給歷史的交代

——原重慶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自述

陽增泰 回憶
何 蜀 整理、註釋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回憶錄叢書

寫給歷史的交代

——原重慶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自述

陽增泰 回憶
何 蜀 整理、註釋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責任編輯：蕭　風
封面設計：胡　冬

圖書在版編目數據
寫給歷史的交代——原重慶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自述 / 陽增泰 回憶　何 蜀 整理、註釋 - 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11
ISBN 978-988-13680-3-4
Ⅰ①寫…Ⅱ①陽…Ⅲ①文革 - 回憶 - 重慶

文革回憶錄叢書
寫給歷史的交代
——原重慶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自述
陽增泰 回憶　何 蜀 整理、註釋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出版 · 發行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8 5333
網　址：http://www.cccpress.com
Email： info@cccpress.com
sales@cccpress.com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字　數：264 千字
開　本：880×1230　1/32
印　張：12.5
定價：HK$ 70 元

激情與苦難幷存的歷史，斷不會默然無痕

——陽增泰回憶錄序

陳益南

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極重要的一條歷史軌迹，便是“造反派”群體的產生、崛起及消亡。

文革中的造反運動，是當時社會特有的一段激情與苦難幷存的歷史。

但是，由于官方對文革歷史的蓄意屏蔽，以及對文革造反派群體的妖魔化宣傳，因而，即便在文革結束已三十八年之際，仍然是很多的人、特別是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對文革造反派的認識，不是停留在被曲解的宣傳中，離歷史的真相很遠；就是對其不甚了了、只有歷史的若干空白。

然而，文革中的造反運動，畢竟不是幾個人的舞臺表演，不是少數人的自娛游戲。相反，被捲入其中的中國人，是數以千千萬萬計！造反的活動時間，也不是一天兩天，而是少則二、三年，多則整整十載春秋，與文革大戲同步幷行。

因此，即便文革中的造反派們早已被攆下了歷史舞臺，幷早已被打入到政治賤民的行列，但是，誰要想完全曲解與屏蔽那千千萬萬造反派的歷史真相，則是絕不可能辦到的。而任何對文革造反歷史的掩蓋塵封與無端抹黑，都注定只會是拙劣的徒勞。

之所以有這樣的自信，至少現在已有着一個强力的證據支持。那就是近十多年來，在全國各地，不少原文革造反運動的參加者，均開始在陸陸續續撰寫幷在境外出版了他們的回憶錄。由此，從

各種各樣的視角，大量詳細地展示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動軌迹與畫面、以及他們參加造反的心路歷程；用他們書寫的無數文字，回放了當年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歷史。

甚至，在有的省（例如湖北），原文革造反派的回憶錄著作，這些年來已經出版了十幾部，撰寫者來自種種不同行業，有着不同身份，其中還包括了曾經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仍健在的基層幹部。

《寫給歷史的交代——原重慶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自述》，也是一部很有份量的記叙文革造反歷史的作品。它是由重慶市原造反派頭頭陽增泰回憶、經文革史學者何蜀整理的個人回憶錄。

相比其他的文革造反記錄性著作，陽增泰的回憶錄，有着三個不凡的特點：

其一，該回憶錄使用了大量當年陽增泰撰寫并保存下來的原始筆記資料，而并非完全靠今天的記憶來叙說諸多往事。其中披露的某次造反派頭頭的會議記錄，更是有着原汁原味的語境，使今人及後人，均得以相當清楚地窺察到造反派們當年有過的心思。

其二，陽增泰用很大篇幅，叙述了一個其他文革造反回憶性著作很少涉及的內容，那就是文革中的群衆組織是如何進行派別之間武鬥的。陽增泰詳盡地講述了他參加指揮文革中重慶市多次武鬥活動的經歷，其中包括他如何組織與指揮大規模的專業武鬥兵團、搶奪軍工廠的槍械武器、自行架設通訊電臺、組建水面“艦隊”、用坦克進攻對立派別等種種武鬥場景，以及個別“槍殺俘虜”的血腥事件。而這類歷史回放的文字，對于後人認識與研究文革中的“全面內戰”，無疑會有很大的實證幫助。

其三，陽增泰的回憶錄，還有一個難得之處。由于重慶“八一五”派與當時主流的造反派有着一定的差別，是屬于造反派的一種“另類”。因而，解讀“八一五”，便可以幫助人們認識到，文革中造反組織的類別，也存在着很大的複雜性，而并非只有一個模式。

現在，很多人對文革造反派的認知，簡直是一塌糊塗。例如，

他們一說到造反派，經常便是將文革中所有戴紅袖章的人，都胡亂混同都視爲造反派（許多影視與文學作品均是如此描寫），而根本不知造反派是因何而產生。而很多對造反派歷史有一定瞭解的人，則也往往搞不懂：那些明明都是受到過“走資派”（當權的領導幹部）壓迫的造反派，爲何却又互相之間會發生你死我活的爭鬥?

陽增泰所在的重慶“八一五”派,是重慶市最早的造反派組織。但是，後來在 1967 年的所謂“二月逆流”大環境及一些問題陰差陽錯的影響下，致使他們與另外一些更激進的造反派發生了嚴重對立。結果，他們便被對立的造反派宣布爲“新保守派”，甚至還曾被全國其他地方的主流造反派陣營視爲“新老保”，被貼上了“新保守派”的歷史性標簽。

但是，在實際中，重慶“八一五”派究竟是什麼性質呢?

陽增泰的回憶錄，用大量的事實展示，使讀者能得以明白，重慶“八一五”派，的確仍是一個造反派組織，而不是依附官方并獲得官方青睞的保守派組織。

區別判斷文革中的一個人或一個組織是不是造反派，可以有兩個衡量標準：

第一，不是看他或他的組織旗號，有沒有貼着“造反有理”的標簽，而是須看看這個人或這個組織奮起造反的原因，是不是源于當時或文革前受到了地方與單位黨政官方的錯誤打擊與迫害? 這個人或這個組織的造反活動，矛頭的指向，是不是始終直指“走資派”（當時的地方黨政官僚）?

第二，文革結束後，這個人或這個組織，是不是受到了嚴厲的指責、追究與整肅?

凡是真正屬于造反派的人或組織，其政治結局，無一不是被打入地獄、列入另册!

而那些也曾高喊過“造反有理”的“紅八月”型紅衛兵,因其“造反”的主要矛頭并不是地方上的黨政官僚，而是批鬥學校的老師及個別領導、打殺社會上的所謂“黑五類”草民。所以，文革後，他們的罪錯不僅不予追究，而且，還統統被作爲接班人，快速得

到重用、提拔，先後成爲了高級黨政官員。

今天,“紅八月”型的紅衛兵們,都不認爲當年他們是造反派。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所以，有些人將“紅八月”型的紅衛兵，也視爲造反派，這顯然是思維的糊塗。

還有一個事實，也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像重慶“八一五”派一樣，在 1967 年 2 月至 8 月間，同樣是站在“擁軍”(獲得了地方解放軍支持)陣營、而全國聞名的武漢“百萬雄師”，在文革結束後，這個保守派組織，立即受到了官方的褒揚與肯定，其頭頭均得以升官，政途青雲，其主要頭頭還被任命爲省級高官。

然而，重慶“八一五”派在文革後，則被官方明確定性爲造反派組織,其頭頭與骨幹均受到了“另册”的待遇,被審查、關押、判刑。

陽增泰本人，其造反，是因爲憤于廠領導的處事不公；其政治結局，則是文革後被關了兩年多大牢。顯然，他個人的文革經歷及結局，就是所有積極的文革造反派之縮影。

重慶“八一五”派與陽增泰，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間，曾做過堅定的“擁軍派”。但是，在文革後，却幷未由此而得以幸免于灾難。因爲,畢竟“八一五”是以對重慶市委的造反而崛起,除了發生派別的內戰之外，其鬥爭的矛頭始終是指向大西南的各級黨政官僚機關。因此，文革中的重慶，不僅“反到底”是造反組織，與其對立直至與其進行武鬥對決的“八一五”派，也同樣是造反派!

陽增泰的回憶錄，撥開複雜的迷霧，清清楚楚地展示了這一點。

陽增泰的回憶錄也證明了一件事：文革歷史，因其複雜曲折的特點，若沒有當事人的親身解說，很多問題（例如上述造反派也有不同類別的複雜情況)，後人僅憑存留的那些表面上均張揚着“時代主旋律”的資料，對事情的本質，是很難真正弄清楚搞明白的。

因而，像陽增泰這樣的當年文革造反派風雲人物，歷史落在他們身上最重要的一件任務，就是能留下種種即時與回憶的記錄，將文革造反運動的種種親歷歷史，予以回放、留存！正如何蜀在《整理後記》中所說："對這樣的當年風雲人物來說，最有價值的，是他們親歷過的那段歷史，而不是他們對那段歷史的思考和認識。只要他們能把那段歷史如實寫下來，就是對後人最好的交待。"

至于文革造反歷史的是是非非，自有時間予以證明，也自有後人會作出聰明的解讀。

因此，如有這樣一大批文革造反回憶錄著作的問世，便能使任何或屏蔽、或妖魔化文革造反歷史真相的企圖，消解爲泡影。從而，使得年輕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人，永遠不會再被片面的宣傳所迷惑、所誤導，而有機會審視一個真正、全面的文革歷史。

2014 年 6 月 11 日

記住，并記錄下來

——序陽增泰《寫給歷史的交代》

周孜仁

47年前的1967年春天,就是那個全民大瘋狂的所謂奪權歲月,重慶中山四路32號大院門前的標牌由“中國共産黨重慶市委員會”變成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也即當時兩派群衆組織因之鬧得不可開交的“革聯會”。昔日達官貴人被掃地出門，來自草根的亂世英雄昂然入主，開始在陌生辦公室非常自豪却手忙脚亂地管理這個大城市。這個所謂的“新生紅色政權”注定是短命的，因爲將這些草莽英雄偶然推上社會頂峰的造反浪潮，本身就是最高領袖在翻雲覆雨。更何况這個機構背後，還必須有最高領袖親自指揮的槍杆子作爲後盾。領袖的好惡和軍隊的喜怒决定着這個政權的命運。

總之，事情就這樣開始了。

作爲初入政治幼兒園的大學生，當時我也走進了這個陌生大院，開始一種全新的日子。這樣，我就得以認識了“新生紅色政權”中這個名叫陽增泰的人物。我做文宣，負責編輯“革聯會”的機關報《山城戰報》，而他作爲重慶産業工人團體最具有代表性的行業：軍工企業的領袖，參與主管全市的工業生産。可惜，事情不足半年，重慶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演變成了“武化大革命”，演變成了真刀真槍的兩派內戰。陽增泰的身份理所當然讓他成了“八一五派”軍事行動的總司令。作爲重慶市“最高權力機構”的革聯會已不復存在，僅僅成了一個派別的聯絡部罷了。我離開

32 號大院，重新回到了重慶大學校園。革聯會數月，我和陽增泰沒有直接交道，但同處一院，低頭不見抬頭見。此後，熱熱鬧鬧的重慶文革舞臺，只聽陽司令傳聞不斷，而他定格在我心中的印象，仍舊是在 32 號大院裏常常見到的那個敦實、豁達、穩重、不苟言笑的小夥子。

我和陽，還有許許多多的所謂“戰友”，都是帶着神聖的信念參與那場悲喜劇的，只是由于學生的特殊位置和不同感悟，荒唐政治游戲讓我們感覺心灰意冷的時間，比他要早一些。我走了雲南，下决心默然邊山野地，靜觀雲舒雲捲，最後老死蓬蒿——雖然在事實上，重慶文革的陰影總是如影隨形，躲之不去，命運注定要我繼續接受屬于我自己的苦難和悲劇。意外的是，整整 47 年之後，我才得知，當年同樣走進過革聯會大院、叱咤風雲于重慶大武鬥的總司令陽增泰，文革後期也决心離開了帶給他生命高峰體驗、也帶給他無數是非糾葛的重慶，去了川西山地。他也曾想從頭再來，重歸一種平靜的日子，可惜，文革陰影同樣也如影隨形，躲之不去，以至于後來還遭遇了牢獄之灾。而最後，終得以于工廠機器的喧囂聲中蹉跎生命，直到晚歲暮年，老之既至。

大體相似的命運，讓我閱讀陽先生這本回憶錄，直如老友重逢，西窗話舊，雖有些沉重，却更多是苦澀的親切和真誠的欣慰。

這本書最爲難得的，是作者爲我們留存了大量蒙難時期的原始書面記錄和準確記憶。這些原始文本，很多是作者被收審時的書面交代材料，這些材料和作者的記憶一樣，是讓人蒙羞并難堪的。文革十年之中相當長的時段，陽先生的記憶都并非“過五關斬六將”，風光無限，恰恰相反，而是在不斷“敗走麥城”。他并沒有因爲這些經歷的不堪回首而將它們忘記、删除，甚至徹底銷毀，而是非常完整地保存下來，并最後得以整理成書。這證明了什麽？證明陽先生雖九死而不悔，晚歲暮年，對于自己的艱難人生依舊倍加珍惜，對于社會和歷史，始終秉持着神聖的責任。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過一句話：“人民和强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可以把這句話改一下，就是：尊重歷史和踐踏歷史的鬥爭，實際上，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粉

碎“四人幫”不久，記得我們黨的領導人曾多次說過，不能讓文革這樣的浩劫重演，發誓不再搞政治運動。可惜，文革過去幾十年，對于這一給中國人留下刻骨銘心記憶的灾難性事件，至今還是學術界、出版界的雷區畏途。故此，許多事件的親歷者，或因往事的不堪回首，或因爲害怕招惹麻煩，或留戀于放置于前的奶酪，不約而同，選擇了不談不憶、一忘了之的無奈與超然；更可悲，也更可怕的，是個別人或親歷過那段歷史的、或壓根兒就沒有經歷過的，爲某種現實一己之利，跟風而上，對那場帶來巨大民族灾難的事件，以及製造這場灾難的人，至今還不可理喻地懷念有加，大加鼓噪。這些人也搞文革研究，也搞文革史料“搶救”“搜集”，可惜恰恰因爲偏見和無知，他們整理的所謂史料，只能是東拉西扯、混淆視聽、誤導他人的有害文化垃圾。法西斯主義誕生故地的德意志民族，敢于正視歷史，痛悔罪愆，贏得了全世界的認同和重新尊敬；而日本軍國主義者罔顧事實，拒絕承認歷史錯誤，參拜供奉侵略戰爭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至今遭到世人的鄙夷和譴責，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對于文革曾經的群衆領袖和蒙難者，陽增泰選擇了記住，并且記錄下來。其對歷史的正義感、責任感和勇氣，對于當下，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中華民族歷來有記錄書面歷史的傳統，使得一代代人能够以史爲鑒，明得失，辨善惡，識真僞。這些書面的記錄構成了中華文明堅强的精神韌帶，使得這個多灾多難的民族雖久歷劫難，飽受外辱，却終究無法摧毁。當然，過去由于書寫的不普及和官方的壟斷，文字記錄的歷史多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某人、某事，必須蒙最高統治者發話“宣付國史館立傳”，方可由御用文人操刀，記入繁簡冗篇。幸好，我們曾有過司馬遷、班固這些偉大的史家努力，要不，中華民族的書面歷史很可能會很殘缺，很不完整。

必須承認，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如文化大革命這樣給整整幾代人留下刻骨銘心、甚至生命和鮮血記憶的大事變，目前用文字記錄者，還很少很少。值得欣慰的是：重慶這個很有血性的城市，她的文革親歷者們，敢于衝破籬藩，直抒心臆，將自己真實的見聞、認識和感悟訴諸筆端。其間，除有何蜀、韓平藻、陳曉

文、曾鍾……這些學者寫出關于重慶文革的專著和研究、考證文章外，更有衆多的親歷者，爲歷史貢獻了自己或全面或片段，或已出版或尚待出版的個人回憶，如反到底派領袖李木森、重慶大學著名的“尸長”鄭志勝、莫名其妙當上了市革委委員的黃榮華、重大八一五勤務員黃順義、“智擒李井泉”的挺進隊長鄭全體……最讓我感動的是黃榮華，晚年的“女委員”一邊學電腦，一邊便開始寫作。我讀過她的原稿，幾十萬言的洋洋大著，不少標點、漢字錄入有誤，其寫作狀態之頑强艱難，可見一斑。重慶文革研究者之衆、自述親歷者之多，在全國當屬少有，作爲在重慶度過人生最爲重要、最爲美好也最爲殘忍階段、并以半個重慶人自詡的我，當向這些朋友表示深深的敬意，并爲他們而驕傲。

我在完成出版了我的第三部長篇回憶錄之時，曾在自己的電腦上敲了一段感想。本文結尾，茲抄錄于後，供陽增泰先生和各位朋友共勉：

我自豪于我經歷的那些痛苦。正因爲這個，我有資格在歷史的審判庭上，得以站上證人席，面對我們的孩子們，爲那一段荒唐的時代作證。

2014 年 6 月于昆明

目　錄

陳益南序：激情與苦難幷存的歷史，斷不會默然無痕…… 1
周孜仁序：記住，幷記錄下來…… 6

前　言…… 1
第一章 生活教會我正直爲人 …… 4
生在“天府之國”窮苦農家…… 4
跪求母親給路費考中學…… 7
提前進廠苦學技術…… 9
不讓我當兵就在廠裏安了家…… 13
當上了生產調度員…… 15
給弱勢者幫忙惹火燒身…… 17
被罰農場勞動…… 20
通知回廠得到甄別…… 25
敢說話的性子改不了…… 26
第二章 在造反奪權的日子裏 …… 29
不讓我參加工人糾察隊…… 29
帶頭造反成立群衆組織…… 31
組建全市國防系統的八一兵團…… 34
與廠裏保守派的一次較量…… 37
朝陽廠的假奪權與真奪權…… 38
奪權風暴中當上革聯會常委…… 40
參與處理羅廣斌之死…… 44
主持批鬥李井泉…… 47
我在革聯會做的幾件事…… 51

在“砸爛”聲中挨打…… 53
堅持保革聯會不動搖…… 55
“紅五條”的二、三條讓我們想不通 …… 60
在市革籌工業生產指揮部…… 62
第三章 一步步走進“全面內戰”…… 65
下令停產增援武鬥…… 65
熊代富被抓…… 66
建立革聯會武衛司令部…… 69
首次出動八一兵團野戰部隊…… 72
差點當了送上門的俘虜…… 74
聲勢浩大的抬尸游行…… 76
成立革聯會作戰司令部…… 79
八一兵團的戰爭準備…… 83
一次提走 72 萬發子彈 …… 85
分發重機槍…… 88
搶糧解決吃飯問題…… 89
第四章“武衛”戰場亂像…… 93
組織攻打工業校…… 93
私怨加派性引出的一樁冤案…… 98
中學生拿槍對準我們…… 100
現代戰爭需要有電臺聯絡…… 101
混亂的楊家坪戰場…… 104
周家瑜叫我準備電臺上前綫…… 106
在工學院前綫指揮部險些中彈…… 109
郭一民的態度讓我火冒三丈…… 113
“八八海戰”與朱榮龍之死 …… 114
攻占嘉陵廠…… 116
有人槍殺了女俘虜…… 120
第五章 我這個“總司令”…… 123
我們的武鬥方案被否決…… 123
到江華廠拖炮…… 126

革聯會撤離後抄走我的“罪證” …… 128
在潘家坪前綫險些中彈…… 130
再到江華廠動員裝炮彈…… 132
建立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部…… 133
胡胖子差點被槍斃…… 137
警司首長罵我光長腦袋不長腦髓…… 140
找江津長風廠要機槍…… 142
我批給江津 1000 套冬衣的來歷 …… 144
好不容易搞到手的機槍被迫上交…… 146
第六章 兩派內戰中的本派內鬥 …… 150
想要我答應清除“內奸” …… 150
從“輪船會議”到批判“申平路綫” …… 151
向中央調查組彙報的風波…… 156
我被作爲“叛徒”調查…… 158
八一兵團總部改選鬧劇…… 159
回老家一趟惹風波…… 161
我和申平爲什麽沒有去中央學習班…… 162
第七章 最後的武鬥高潮 …… 165
張國華親自給我傳達“三一五”指示…… 165
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鬧劇…… 168
方文正主持“打天下” …… 171
我拒絕與專縣組織“脫鈎” …… 174
天寶要警司把我抓起來…… 177
給長壽八一五派出主意…… 179
在江陵廠慶功會上發酒瘋…… 180
工總部北碚全委會…… 182
警備區首長嚴厲批評八一五派…… 194
工總部常委的分工與內鬥…… 198
到合川參加專縣問題串聯會…… 199
“原來是白面書生”…… 203
兩支手槍…… 204

我提出工總部帶頭“倒旗”受到指責…… 205
第八章 看不見的戰場 …… 208
小李的情報…… 208
反到底頭頭塞給我一張字條…… 211
我給警司寫信要求明確結論…… 213
反到底派想拉我的希望落空…… 214
郝處長說出有人寫我黑報告的秘密…… 216
第九章 漫長的學習班生涯 …… 221
追查電臺問題的“九二三”學習班…… 221
到灌縣參加省革委學習班…… 229
被安排參加 1970 年的中央學習班 …… 233
中央領導對四川班的指示…… 236
嚴格紀律規定中的“五一”慶祝活動…… 244
鄧副司令員作動員…… 246
聯繫武鬥問題批劉、張…… 250
我在中央學習班的一個“嚴重政治錯誤” …… 252
吳法憲、邱會作接見學習班領導小組…… 254
在重慶大作“鬥私批修”宣講…… 259
第十章 隨時代大潮沉浮 …… 263
無權無勢的大忙人…… 263
難以割斷的派性感情…… 265
“補臺”風波 …… 268
幾經反復終于決心調走…… 276
在新廠開創新局面…… 280
時局動蕩引起思想動蕩…… 282
從受表揚變成受清查…… 288
牢獄之災…… 291
我被“泡”在牢裏了…… 294
權大還是法大? …… 297
無人理睬的申訴…… 298
評職稱與“一刀切”退休…… 302

最後說點題外的話…… 304
何　蜀：整理後記…… 307

附　錄…… 312
中共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意見…… 312
駐軍首長在重大八一五形勢辯論會上的講話…… 314
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
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中央首長接見
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五十軍、五十四
軍領導時的講話…… 322
中央首長接見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四川班全體學員的講話…… 334
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委、成都軍區
赴京學習班全體同志的重要講話…… 346

前 言

我出生于1936年,成都西部的郫縣,家鄉解放那年我剛13歲。我可以說是生在舊社會，長在新中國，是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

人生“三十而立”。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我剛三十歲。是一個受中國共産黨教育培養十多年的熱血青年。懷着對黨對毛主席赤誠的感恩心情，一心聽黨的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投身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中，我的經歷充滿了戲劇性和複雜性。

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開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結束，整整十年。但對我陽增泰來說，我本來以爲在1970年從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結束，在重慶各地作“鬥私批修”巡迴宣講後回到廠裏上班，就結束了。可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全國開展的“揭批查”運動，又把我再次捲進了文革漩渦，清查，交代，批鬥，逮捕、關押審查……1980年底我才得到解脫。算起來，我用了十四年，才真正走完了文化大革命之路。

雖然我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但我畢竟在那場文化大革命中被時代潮流推到了前臺，當了造反派群衆組織的頭頭——從廠裏的頭頭，到重慶市軍工系統八一兵團的頭頭，再到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的常委、重慶市八一五派的“文攻武衛總司令”、重慶市八一五工總部的“一號勤務員”。特別是親自參與謀劃和指揮了聞名全國的重慶大武鬥。

由于我從讀書以後就養成了記筆記的習慣，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對許多經歷都作了記錄，特別是從1968年以後的一次次清查中，我在各種學習班所作的發言，所寫的一次次檢查交代材料，

我都留下了底稿，這些都爲我在晚年回憶那些年代的經歷留下了寶貴的參考。有許多具體事情，如果沒有當時的文字記錄，是根本無法再回想起來的。

1993 年退休後，閑下來，有時回首往事，總感到不系統地寫下來可惜了。但由于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欠缺，分析能力有限，退休之前又一直從事的是技術性的工作，退休之後也缺乏能力去思考和總結歷史問題，遲遲沒有下决心動筆。

2011 年，重慶一位有心研究文革歷史的韓平藻先生，經我的老朋友宋君强和周家瑜的介紹，到成都來找到了我，向我正式提出希望我寫回憶錄的建議，并爲我做了一次口述錄製。同時，他又給我介紹了重慶的另一位文革研究者何蜀，送了我一本何蜀幫助整理的原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李木森的回憶錄《親歷重慶大武鬥》，希望我也能像李木森這樣寫出自己的文革回憶錄。沒過多久，韓平藻又不辭辛苦來到成都，給我拿來了何蜀根據我的口述和上次交給韓平藻帶去的幾份當年有關武鬥問題的交代材料整理出的文字，供我在寫回憶錄時參考。

這樣，我終于翻出了過去一直積壓着無心整理的一些資料，開始用心回憶那些幾十年前的往事，提筆寫起了我的回憶錄，把我一生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親身經歷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實寫下來，爲有心研究的專家、學者和愛好者提供原始素材。

韓平藻與何蜀他們不但促成我寫回憶錄，還給我提供資料和相關信息，告訴我哪些人已經出版回憶錄，哪些人正在撰寫回憶錄。何蜀先生在幫我整理書稿中，爲了力求時間、地點、人物、場景的準確無誤，反復向我提出問題，啓發我回憶，幫我查找資料，訪問一些知情人員，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特別是由他增加的註釋部分，對閱讀理解回憶錄正文，瞭解歷史的真實面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是在他的認真、求實精神的影響、鼓勵下，我才順利完成了這部回憶錄。

2013 年 3 月 5 日，重慶市政協學習及文史委員會副主任楊力率政協文史委與重慶市圖書館的口述錄製小組來到成都，找我錄製了文革親歷的口述。這次我也很高興地與參加這一口述錄製工

作的何蜀先生見了面。我們又對回憶錄寫作中的一些具體內容進行了商討，以後又在電話裏進行了一些意見交流。初稿整理完成後，我又作了一次全面的審訂和修改補充。在此，我衷心向支持我寫作的朋友們表示感謝！

如果有讀者覺得這個回憶錄中還帶有當年的“派性”味道，或者覺得我在回憶某些事情時還缺乏足够的反思或懺悔意識，我只好請求原諒和理解。這就是我真實的思想水平或思想局限吧。但是我可以保證，我絕對沒有編造假話。

過去我寫過很多有關文革歷史的交代材料，那都是在一次次運動中被要求寫的。而這一次所寫的回憶錄，是我自覺自願寫的，算是我寫給歷史的交代。

不知我的這個回憶錄，能不能作爲今後建立重慶文革博物館的一塊磚？

第一章 生活教會我正直爲人

生在“天府之國”窮苦農家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其實，真正的“天府之國”是指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特別是分布在川西平原的上五縣：溫(溫江)、郫（郫縣)、崇（崇慶)、新（新繁)、灌（灌縣)。自古以來民間就有個說法：金溫江，銀郫縣，叫花子出在雙流縣，討口都吃大米飯。

郫縣是川西平原上的一朵花，又叫鵑城。在我兒時的印象中，縣城不大也不小，分東南西北四道門，城門用鐵皮包楠木板製成，非常牢固。高高厚厚的城墻（高 30 米，厚 10 米）圍着縣城，四角都修有炮樓。城墻外還有護城河，進出城都要經過護城河上的石板橋。四門都有各四個壯丁守衛。

郫縣到成都 23 公里，到灌縣（現名都江堰市）33 公里，由一條成灌公路貫通。在我少年時代，那裏公路上跑的主要還是馬車，也有汽車，但很少。如果出郫縣東門到成都，也可走一條小路，除步行外，還可坐“鷄公車”，那是一種當地常見的人力推動的木製獨輪車。

郫縣有一個古老祠院——望叢祠，據說祠中埋着古代蜀國的兩位帝王——望帝和叢帝。那裏松柏參天，群鳥爭鳴。每年端午節，遠近百姓都要去朝拜，農曆五月初五朝望叢祠，成了家鄉的法定日子。到時候，人們還要組織秧歌對唱，加上各種小販，比趕場還熱鬧。《郫縣志》裏對此有“游人如蟻”的記載。

我家就在郫縣南街城外今家巷，離望叢祠僅一公里之遙，那裏就成了我們兒時經常去玩的樂園。

我父親陽吉廷（號顏生）是個菜農，他出生于壬辰年冬月

十一，(1892 年 12 月 27 日)，歿于辛酉年（1981 年 3 月)。

由于爺爺陽昌運抽鴉片烟，把家敗了，父親從小生活艱苦，常常是吃一頓找一頓，吃了上頓愁下頓。務農到二十歲，父親爲了改善窘迫的生活，去拜師學手藝——泥水匠，爲人蓋草房，還邊工作邊種菜地。種菜週期短，收益快。爲了離城近，菜好賣，又爲求得種上租金少的菜地，父親幾經輾轉，從郫縣高土橋搬家到官柏樹，又從官柏樹搬家到今家巷，租得地主邱少群一畝二分菜地，一年交租二擔四斗米。這樣父親才算落下脚安了個家。父親就這樣一邊做泥水，一邊種菜，勉强能養家糊口。

三十年代中期，父親的四弟陽春廷（原在二十四軍任武打教練）從內江退伍，帶妻子回來，我父親把菜地分一半給他種，租金也各交一半。直到解放。

我母親劉氏，生于壬子年（1912)，歿于辛丑年（1961)，她自幼喪母，其父劉長盛家貧如洗，無子，唯一的女兒也難養活，遂通過熟人介紹，過門給我父親當童養媳。直到共産黨執政後，我母親被群衆推選爲居民小組長，才正式取名劉茂如。

我母親小我父親二十歲。十二歲同房。以後又生孩子多，家庭貧苦，常年起早貪黑，坐月子時也要熬夜做綉花鞋、綉珠珠帽賣錢，貼補家用。生了孩子，未滿月，就要下地幹活，背着奶娃娃挑糞水澆菜園，還要賣奶水求生。辛苦勞累却吃不飽飯，經常是吃了上頓無下頓……這樣長期勞累加上營養不良，我母親落下一病，特別是哮喘病最嚴重。每天早晨都喘得起不了床。人有病，肝火重，母親對兒女脾氣就不大好，孩子們都有點怕她發火，但又很孝敬她，即使受到她的打罵也不會怨她，因爲知道是母親給了自己生命。等到孩子們長大成人，可以讓母親享清福了，她老人家却過早地走了。但是她那些勤儉持家，勤勞刻苦，熱心爲群衆辦事的美德和事迹，永遠銘記在下一代人的心中，成爲我們子女們的精神財富。

我的父母親，人窮生育富，生了十一個子女。那些年代既不懂節育的道理也又沒有節育的手段，再窮也得生，千辛萬苦把一個個兒女養大，也難免不因病夭折，到最後只剩下四子三女。到

現在還剩下三子（陽增泰，陽增福，陽增良）三女（陽玉瓊，陽玉華，陽增群）。

我于 1936 年 6 月 23 日，農曆丙子年五月初五生。在我前頭已經有一個姐姐陽玉瓊，一個哥哥陽增明，我家依男孩排名，所以我算老二。

我父親陽吉廷（號顏生）是文盲，家中除了么爺陽昌沛識字外，其他人都是一字不識。我大哥陽增明（1960 年病故）幼時讀《三字經》，用手指沾口水認字，把書都翻爛了幾本，進展不大。父親就選中我來讀書，么爺爺也認爲我可以培養，當我五、六歲時，家裏以每學期一斗米的代價，送我到城外南門與西門之間的王家大院，在那裏的私塾發蒙讀“人之初”，目的是讓我學會寫字，今後好寫袱子（祭祖時在包好的紙錢面上寫好祭奠各位祖宗先人的名號）。

我讀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後，因家境實在困難，只好輟學，跟着家裏務農，在菜園裏拔草，拾肥，施肥，有時到場街上去賣白麻糖、香烟，有時到烟棧行捆烟當小工，到地主邱少群家看守麻地，到豆瓣廠去選胡豆、擇海椒……總之，只要能掙錢的我都幹。

當時社會上流通的貨幣是銅元、銀元，金元券鬧危機時就用大米，一合，一升，一鬥，進行交換。我掙到的銅元，回家全部交給母親，自己不留一個，老人家非常放心。

我大約十歲左右的時候，跟么爹去烟棧行捆烟當小工。那裏有人欺生，對我吆喝說：“哪裏來的娃娃？各人滾出去！”我么爹聽到了，走過來說：“你算老幾啊？這是我的侄兒！”那些人趕緊說“對不起”，作個鬼臉溜走了。我的么爹是練武的人，他的師傅姓尹，住在西門上，他也收了一些徒弟，當時在郫縣有點名氣，能鎮住一些欺軟怕硬的傢伙。

捆烟當小工相當辛苦，一早就要出門，到茶館裏等齊，領頭的人一吼，大家就到烟棧行去，各自埋頭幹，一直幹到下午。早飯沒吃，中午飯也沒吃，我餓得前胸貼後背，清口水直流，只好跑到井邊去喝幾口井水，把肚子都脹圓了，接着又幹。這時有賣

油糕的在外面吆喝，我看見別人有去賒帳吃的，我沒錢還帳，也只有忍着。直到下午收工回到茶館，分得幾個銅板，才高高興興回家交給母親，這才吃上一頓飯。

跪求母親給路費考中學

建國後,我家成份定爲貧農。我十三歲入學讀“解放書”——不交學費錢。1950 年上半年，我到郫縣公園初小讀畢業班，老師安排我參加全縣小學生語文比賽，題目是《給媽媽寫一封信》，我得了第二名，得到一支毛筆和一捲紙的獎品。

1950 年下半期，我考上郫縣慶合鄉完小讀高小一年級，這時我已十四歲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提起撮箕到城墻內撿猪狗屎（種菜需要的肥料），回家後趕快煮早飯，等大家吃過後，我把碗筷都洗好收拾了才去上學。這時往往學校已經上過第二堂課了。但是到了期末考試,全班二十多個同學,只有我一個人升級。

1951 年開學時，老師對我說，只有你一個人升級，學校不可能爲你一個人開個高小二班，要麽你繼續讀高一吧? 我說不行，我都這麽大了。老師說那你跳一級去讀高小三可不可以? 我說可以。這樣我就跳級讀了高小三年級，與後來成爲我終身伴侶的蕭華勛同班了。

我跳了級，功課仍然趕得上，從來不會補考。同學們還選我當了學生會的勞動委員。因爲從小在家裏跟着大人做事，父親是泥水匠，我也學到一些本領。學校教室的墻壁壞了，學生會就動員家在農村的同學，哪家有毛竹的，帶些竹子來，我帶領大家劃竹子，編篾墻，糊泥灰……墻壁修復得光光生生的，老師同學看了都很贊賞。

1952 年春，我和慶合完小的四個同學一起去成都報考石室中學。那天半夜，那三個同學相約來我家叫我一起出發。我到母親床前跪求她給我一點錢，說我要到成都去考中學。一直跪到快五更了，母親才給了我七千元（那時鈔票面額大，相當于現在的七角錢）。

我們四個同學一道出東門走小路到成都。到了成都，我和一個姓徐的同學一起住到他的親戚家，然後到石室中學去報名，參加考試，等候發榜……前後一個星期。這麽幾天，七角錢怎麽用？我每天只買一個鍋盔餅子吃，喝白開水。

最後發榜時，只有我一人考上了。

母親聽說我考上了石室中學，非常高興，想法給我縫了一套衣服，這可是第一次。因爲我從小穿的衣服都是大人穿舊了的衣服改的，直接量體裁衣專門做新衣服，這真正是第一回。

我捨不得穿，想等到開學時再穿。一天早上我在厨房煮飯時，穿了大哥的衣服。大哥從茶館回來，看見我穿了他的衣服，從灶脚下把我拉到院壩裏痛打了一頓，嘴裏還忿忿地罵：“我都沒有讀到書，像你這麽大時早跟爸爸去學泥水匠了，現在反要我掙錢給你讀書。誰叫你穿我的衣服？……”我當然不服，就同他扭打起來。我們的打鬧聲驚醒了多病的母親，她從床上爬起來，拿上耙耙頭，二話不說就向我打來。我當然不服，一邊躲一邊同他們論理，大吵一頓。

待我冷靜下來一想，我掙不到錢，還要去讀書，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母親當然要順着大哥啊！我把大哥的衣服脫下來還給了他。

到開學的時候，我那十七歲就出嫁了的姐姐又給我送來十雙草鞋，供我上學時穿用。

我到石室中學上學一個月後，下月的伙食費就沒有了。助學金什麽時候能發下來，誰也不知道。同學中遇到這樣情況的人不止我一個。大家碰到一起，商量下個月吃飯怎麽辦。我說，不交伙食費不編桌，就不分菜，我們只打飯，只喝湯也可以過。大家覺得對，打算就這樣對付一下。

誰知當天晚上老師就給我們講了一件新鮮事：小天竺那邊有個新學校，是接收解放前美國人辦的孤兒院辦的西南成都機電工業學校，五年制，五年畢業出來就可達到中專水平。這個學校是供給制，吃穿都由國家供給。因他們招收的學生年齡偏小，都是些十一二歲的，便想到我們學校對換一些年齡大點的學生過去。

老師說，已經決定了調一些同學去讀那個學校，念名字時剛好有我，我心裏好高興，吃穿問題不愁了！

這樣，我就到了成都機電工業學校讀書。這個學校管吃管住還發衣服鞋子，又發零花錢買牙膏牙刷，從此我讀書不要家裏負擔了。我寫信告訴父母，家裏人都高興極了，特別是我大哥。他本來反對我上學，要我跟他一樣跟着父親學泥水匠。當他聽到這樣的好消息後，高興得跳起來了。

1952 年放寒假，我回到家裏。却發現家已經不在原來的地方了，而是在楊建明開的東來旅店。我問是怎麽回事？大哥說，郫縣豆瓣廠把我們菜園那片地方占了，……我仔細觀察，才發現這個旅店已經不再是旅店了，還住了好幾家人，有吳花生、唐松山等。楊建明已經搬走了，我家就住他們原來住的房間。

這時我突然發現有個女人正抱着一個嬰兒在喂米粉，我問她這是哪個？她說：“哪個？這是你的么兄弟！”我這才知道母親又生了一個弟弟，算起來，我們六姊妹變成七姊妹了。我趕快去房間裏看望母親。

晚上全家人聚齊，我才知道抱小弟弟喂米粉的人是我大哥的女友。他們已經住在一起了。

提前進廠苦學技術

我們學校名爲工業學校，但校舍却因是利用原孤兒院的房子，受到限制。校長雷洪想要在華西壩那個地方建新校舍，報告到中央一機部，一機部認爲成都是個消費城市，缺乏工業基礎，要建新校舍，不如到重慶。于是我們學校就决定搬到重慶。

學校搬遷之前，對學生進行了一次統一考試，凡考試達不到要求者就留下另行安排，考試合格者就隨學校遷到重慶。我當然考試合格，隨學校搬遷到了重慶。從此，我就在重慶生活了二十年，重慶就成了我的第二故鄉。

學校的新校址在重慶市沙坪壩井口二塘村，附近還有個地質學校。我們的新學校是跟樂山五通橋高工校、萬縣高工校等合并

■1954年陽增泰在重慶機器製造學校讀書時向家裏要來的全家福照片，父母（坐中間）與大哥、姐夫及弟妹們在郫縣老家房前合影。

而成的，新的校名叫重慶機器製造學校。學校還建有實習工廠，專門製造磨床等機器。

按照五年學制，我1952年進校，本來應該是在1957年畢業。但是，1955年2月12日，經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批准，爲恢復國民經濟建設的需要，從我們學校抽調30名學生，提前畢業，到重慶的國防工廠716廠參加工作。我就在這30人之中。這對于我來說當然又是大好事，因爲我從學生一下跨進了工人階級隊伍的行列，還可以提前工作領到工資了，每月可向家裏寄錢了。

工廠人事科的趙科長帶領我們，坐上廠裏的汽車，到了工廠當時所在的化龍橋。工廠對外叫國營重慶無綫電廠[1]，它的前身是

[1] 國營重慶無綫電廠，四機部所屬軍工企業，代號716廠。後遷到重慶市沙坪壩區楊公橋，化龍橋原址作分廠，以後獨立成爲朝陽電機廠。

原國民黨軍政部電信一廠。南京搬過來的。生產手搖發電機，還有收發報機，乾電池。後來共產黨接收過後手搖機繼續生產，電池沒有生產了，收發報機也沒怎麼搞了，轉入民用的收音機。1955 年我們去了過後又學蘇聯，搞蘇聯的那種通訊機，進行仿製。

進廠後，我們先學習了保密條例、安全生產知識等，然後分配到車間，我和代德文同學被分到一車間鉗工組，組長熊萬里熱情接待了我們倆，并介紹全組師傅和我們相識。又介紹了該組生產產品的詳細情況。最後把我們二人安排給謝奉章、朱敬庭兩位師傅手下學技術。還說過幾天再簽師徒合同（簽師徒合同時又增加了斯有章、朱輝兩位師傅）。

我們這批學生，在校三年剛把普通課學完，還沒有開始學專業課，就分到工廠來了。所以我們名爲工業學校的中專生，實際上并沒有什麼工業生產方面的專業知識。進廠後我就想到，如果不會識圖，在生產中就等于是文盲。因此必須儘快學會識圖。廠裏有夜校，我就報名去上夜校，邊工作邊學習，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斷提高自己。

我在夜校學習了製圖學、三角、物理、高等數學、理論電工學等。兩年後又讀了夜大。我在學習中成績一直很好，當時是五分制，我的成績從來沒有三分，至少都是四分。多數是五分。老師都是廠裏設計科、工藝科的大學生，工程師。我在學習製圖課時特別用心，從點投影、綫投影、面投影到實物三面投影、剖面圖等，我都學會了。有一天晚上在宿舍裏復習製圖課，爲了不影響別人休息，我拿擦脚的乾毛巾把電燈泡包起來，只留出下面一束光綫照着我看書。沒想到時間一長，毛巾被電燈泡烤熱烤焦，燃起來了！我嚇壞了，趕緊扯下來把火撲滅，幸好沒有出大事。還好在宿舍裏的其他人都睡得正熟，沒有人被驚醒，第二天誰也不知道。

工作上，師傅們耐心教，我們認真學，很快就掌握了要領。我和代德文被分配做的是手搖發電機高低壓碳刷的製造，按照工藝規程，先要把原材料用手鋼鋸鋸成片塊，再用磨床把兩面磨平，公差只有 5 絲，然後再把磨好的半成品鋸成長方形小塊，再把磨

好另兩面的半成品轉給車工車圓頭，再打孔……

小小碳刷幷不複雜，但其中磨碳刷這道工序好多人都不願幹，因爲磨下來的粉末滿天飛，就是戴兩層口罩，鼻孔也是黑的，臉、脖子就更黑了。我們小組過去是由一位叫楊國凡的年輕師傅在做這一工序，我們來時，他已經公開提出不願幹了。小組長熊師傅把我們分到他手下去學。到了現場，楊師傅一操作，整個磨床周圍頓時黑壓壓的一片，比天上的烏雲還要黑。簡直叫人心裏發毛。操作完後走出來，演包公都可以不化妝了。

熊師傅問我們倆：你們哪個願意學?

我忽然想起我父親講過的，他給別人蓋草房，翻舊蓋新，工作完後，整個臉上黑得只能看見兩個眼珠子在轉。他是爲了養家糊口。我呢? 我們現在是爲了恢復國民經濟，爲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我馬上回答熊師傅說：“代德文負責下料，我願意去學！”

磨床是模具車間的設備，不同意白天加工，只同意晚上磨。在楊師傅的指教下，我很快便學會了，而且磨出的產品達到了要求，檢驗合格。

把小小的碳刷加工成合格品，工序還不少，而每道工序都有定額，一天下來，每個人都要填寫生產日記，完成多少任務，全部是數量乘定額。一個工人的工作成績也是這樣來衡量。我記得拉彈簧，每天 8 小時定額是 200 個，在工作中，我動腦筋找竅門，一天可以拉上 2000 多個。工作效率提高十倍以上。

車間團支部發現我的突出成績，很快就介紹我加入了共青團。廠團委又評我爲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發了紀念獎章。我還被廠技術教學委員會評爲優秀學工，獎給一本“建設”日記本，上邊寫了：“獎給刻苦鑽研，努力學習，技術進步快及尊敬師傅的優秀學工陽增泰同志。”我成了全廠青年學習的榜樣，每月工資從 19 元升爲 23 元，我每月給父母親郵回去 10 元。我認爲自己的一切成績都是共產黨教育出來的，一切榮譽都是共產黨給我的，一心要繼續努力工作，好好報答黨的恩情。

在工廠生活中，我們幾個學工每天早起，天才濛濛亮，我們就到廠門外，沿着嘉陵江邊的公路跑步鍛煉身體，每週一、三、

五向東跑到牛角沱再跑回來，每週二、四、六向西跑到小龍坎再跑回來。然後才去洗漱吃飯。上班鐘響前，我們已經在車間裏把班組的清潔衛生打掃好了，還打來了開水，把師傅的茶都泡好了。

每天晚飯後，除了上夜校外，只要有空閑時間，我們都要到車間去練銼刀，銼四方形、六角形，還要練鏨子。爲了檢驗我們的成績，師傅們出題，規定好尺寸，要我們自己造一個小榔頭，不准用砂輪磨，只能用鏨子和大小銼刀。我們真的還把小榔頭造出來了。當時我們組有五個學工：袁開雲，高鑫，周昌立，代德文和我。我們都一心撲在工作上，從不到社會上去貪玩。

廠團委體育委員歐陽鏗發現我很喜歡運動，便建議廠團委成立一個青年鍛煉小組，并任命我當小組長。這樣我們就開始了有計劃有組織的業餘體育鍛煉活動，除了在廠裏開展各種體育外，我們還到大田灣練長、短跑，到跳傘塔去練跳傘。有時還抬着帳篷爬到歌樂山上去野營。總之是搞得有聲有色，對全廠職工特別是青年工人鍛煉身體起到了很好的帶動作用。

不知廠工會的老曹怎麽知道了我會寫仿宋字，硬要聘請我每週出一次黑板報。我想這也是黨的宣傳工作，沒有推辭。凡是組織上要我去幹的事情，我都認真去幹，而且一定要幹好。

不讓我當兵就在廠裏安了家

1955 年，真正是我人生大轉折的一年。我從一個學生轉變成爲工人階級的一員，政治上入了團，工作上當了先進。還得到組織上關心，參加了一些社會工作。正當我在打算如何更好地學習提高自己的時候，突然接到人事科的調令，調我到設計所當練習生，

到了設計所，徐澤昭科長把我分配給接插件組張伯宗老師學習接插件的設計工作。徐科長還把全所的收發文件交給我管理。在設計所，除了學畫圖、描圖，還要學圖樣管理制度、材料學、公差與配合等等。張老師說：“不要着急，一步一步來。只要下得功夫深，鐵棒可以磨成綉花針。”

設計所同工藝科、供應科、資料室、標準化室的關係十分密切，新設計出來的圖紙會簽，資料文件的管理工作，都是我的事，每一步我都建立簽字本，圖紙文件傳給每一個人都簽字，一環扣一環，一點不亂。老師、科長他們都很滿意。1956 年工資改革定職稱，給我這個練習生定了個製圖員，工資每月漲到了 44 元，我給父母親寄回去 20 元。雖然好些接插件草圖上的設計師這一欄裏有我的簽名，實際上我離真正的設計師水平還有相當的距離。

因爲描圖養成的習慣，我那陣給女朋友寫信都寫仿宋體。

1956 年，工廠又新招收了一批學工，基本是中學生。據說要集中到紅槽房去培訓。教育科點名要調我去教識圖。我完成任務後，教育科對我的工作很滿意，希望我留下來，說馬上要辦技工校，要我繼續當教師。但是我還是想回去繼續當我的製圖員，進一步學習提高，爲成長爲一個真正的設計師而奮鬥。教育科同意把我放回了設計所，另調了武蘭清去任教。

就在這年 11 月，志願軍最後一批來招兵，我響應“保家衛國”的號召，就第一個報了名。但是後來通知去沙坪壩檢查身體，却沒有我的名字，我跑到負責徵兵報名的廠團委去問團委書記朱秀清，朱秀清說既然你那麽想去，你就去嘛。我就去參加了檢查身體。過了兩天，公布出來的合格名單裏有我的名字，我好高興，哼起了“雄赳赳，氣昂昂……”那首歌。

但是廠幹部科却通知我，廠裏不同意我去當兵，不放我走。

我看到廠這樣重視我，一心要培養我，當然也不好再要求走了。但是我想，既然廠裏不想放我走，我就得打算在廠裏安家立業了。我就提出，希望把我女朋友調過來。

廠幹部科的人吃了一驚，說：“沒想到你都有女朋友了，她在哪裏？”

我說，她跟我從小是同學，1956 年昆明那邊的 200 號信箱招工把她招去了，她們廠是造機槍的，都是軍工廠。我們一直很好。

幹部科的人想了想，說好吧，你寫個報告來。

我的女朋友蕭華勛，與我是小學同學，可以說是青梅竹馬。分別多年，我們一直有書信來往。廠裏確實比較看重我，我的報

告一交上去，真的就把蕭華勛調過來了。

後來，1958 年我們廠搬到沙坪壩楊公橋，我和蕭華勛在童家橋派出所辦了結婚手續。當時我二十一歲，她十八歲，符合《婚姻法》規定。1959 年元月，她回郫縣老家去生下頭胎，是個兒子，起名陽星。1961 年 6 月 24 號，她在重慶市第二工人醫院生下女兒，取名陽旭。1964 年 3 月 14 號，她又在家裏生下了兒子，取名陽光。

當上了生產調度員

1957 年“反右派”運動後，廠裏各部門要精簡機構，下放一些人員到車間。我趁此機會打了個報告，要求也下車間去，我想的是學理論後再到實踐中去多學習技術，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讓自己的發展更全面。組織上批准了我的報告，把我分到五車間 502 鉗裝組，還任命我當了組長。

我本來想的只是下車間後多學些技術，沒想到又給我增加了行政職務。我這個組十多個人，我得觀察和瞭解每個人的技術能力和專長，有針對性地安排工作，使全組每月的工作效率提高，任務完成得更好。每天上班時，各組都有一刻鐘的碰頭會，安排每人的工作，傳達上級指示，交代安全生產事項。爲節省時間，我就每天下午下班後，根據車間調度安排生產進度的要求，把第二天要安排哪些人做哪些事一條條寫在小黑板上，讓大家第二天一上班就能看到，一目了然。這樣，我把班前碰頭會從一刻鐘減少到五分鐘。同時我還公布每個人每天工作的成績，無形中形成了一種相互競賽、力爭上游的局面。

班組工作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是搞好團結。我們這個組雖然人不多，但仍然有個團結問題需要注意。我發現組裏兩個女工相互有意見，甚至鬧到了見面就吵架，或者往地上吐口水表示輕蔑的地步。我就分別找她們個別談話，做工作，促成她倆消除成見，握手言和。我馬上召開班組會，大家向她們二人和好表示熱烈歡迎，一起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歌。

我們組裏雖然有幾個女工已經當了媽媽，但是年紀都不到

三十歲，都還是年輕人。既然是年輕人就要保持青春的活力。在工作之餘，我組織大家一起做工間操，唱歌，跳舞……全組顯得朝氣蓬勃、生龍活虎，月月提前超額完成任務。年終評比時，我們組被評爲廠裏的先進班組，還照了集體相，貼到廠工會的光榮榜專欄上展出。

1958 年，在全國大躍進的熱潮中，我們經常加班加點幹工作，我還積極投入技術革新運動，提了不少改進工藝加工方法、修改設計結構的合理化建議。因爲我的突出表現，廠裏推選我出席了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召開的重慶市國慶獻禮慶功大會，我得到了一枚銀質獎章，獎章編號是 0296，我至今還珍藏着。

載譽回廠後，我又在 10 月 11 日廠職工代表大會上代表我們車間的十個先進生產者上臺發言，“打擂比武”表決心。

一天，我正在幹活忙，車間主任張起亞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通知我：“人事科的通知已經來了，你不要在小組上班了，回去把工作交代一下，到車間來當調度員。”

我從工人一下變成了一般幹部。本來我的理想是當設計師，走技術這條路，但是這次提幹，使我走上了企業生產管理這條路，我的人生道路改變了。但是我仍然高高興興地接受了組織的安排。因爲這畢竟是組織上對我的看重。

調度員，與技術員、工人、班組長都不一樣，要在車間和車間主任的領導下，按照廠調度會的決定及車間生產情況，主持車間的生產調度，召開每週的車間的生產調度會，按車間生產計劃安排旬、週、日的工作，按車間生產產品和零整件的工藝要求、技術要求、工時定額等要求來銜接各組、各工段的配合，還要根據生產上出現的問題，主動找技術人員、檢驗人員、物資管理人員和有關老師傅，召開專業會議，研究解決辦法，并與勞動競賽、評比相配合……

由此可知，調度員雖因所處的單位、層次、工作內容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有一點是一致的：始終處于矛盾之中。要經常去迎接矛盾，解決矛盾，這對人是個很大的挑戰和鍛煉。

我當調度員後，轉調了好幾個單位，首任調度員是在五車間，

這個車間從零件投入到成品出來是巨龍牌收音機。1958 年，我們 716 總廠搬到沙坪壩楊公橋，化龍橋這邊成爲第一分廠，石橋鋪是二分廠（後來叫巴山儀器廠）。總廠搬到楊公橋後，成立了一個標準化九車間，我調任該車間調度員。去了不到半年，工作剛理順，我又被調到技術研究所任新產品計劃調度員。在這裏時間也不長，因化龍橋的分廠供應室缺人，我又調到供應室當調度員。我在這裏的工作主要是參加廠生產調度會，瞭解車間缺料情況幷及時安排計劃人員限期解決。物資調度工作幷不複雜，關鍵是搞好人緣關係，這樣工作推動起來就很順利。

給弱勢者幫忙惹火燒身

供應室科長喬開文安排我管五個搬運工（合同工），不准他們偷懶,負責進出廠的物資、產品上下車。大概是1960年底的一天，五個搬運工到我的辦公室找我，組長宋立文說：“陽師傅，幫我們一個忙嘛！”我問有什麼事，他說：“你每天安排我們工作，我們沒有人偷懶嘛！我們幹的是體力重活，每月吃三十八斤糧，楊公橋那邊的搬運工，他們的工作和我們一樣，他們每月吃四十二斤，都是 716 廠，同一個工種，爲啥子吃兩種定量？我們幾個都沒得文化，麻煩你幫忙打個報告反映一下。”

我當時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只是勸他們要相信領導，回去好好工作。到了下午，他們又來找到我，仍然是提這個要求，纏着我，不去做事。我想，這也是個問題，在當時那個年代，都知道“民以食爲天”，“人是鐵飯是鋼”，一個月少掉四斤糧食，對于這些從事重體力勞動的人來說當然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不解決看來是不行的，工作肯定會受影響。于是我就幫他們寫了個報告，反映這個情況，希望得到解決。至于上邊怎樣解決，解決不解決，就不是我的事了。

想不到這一寫就惹禍上身了。

宋立文他們五個搬運工拿上我寫的報告，一起去廠長辦公室找廠長崔振全。崔振全一看，頓時發了火，在桌子上猛拍一巴掌：

“你們幹什麼？要鬧事嗎？是誰幫你們寫的？”五個搬運工見廠長發這麼大的火，都嚇倒了，只說是找外面代寫書信的人寫的。崔振全說：“不可能！”他馬上打電話把喬開文科長找去，訓了一頓，要他追查此事。

喬開文回來就召開供應室全體會議，說了這個事情，希望大家本着對黨忠誠老實的態度，說一下是誰幫搬運工寫的報告。我想我是共青團員，對黨要忠誠老實，不說假話，就主動承認是我寫的，把事情是怎麼來的詳細說了一下。結果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喬開文就喊“散會”。就去給廠長彙報去了。

第二天下午，全科人員被通知到工藝科開部門大會，不准請假，不准遲到，氣氛十分緊張。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各科室的人基本到齊後，黨委書記孔祥國來了，宣布開會，他說：“今天，全部門開個火綫整風大會，供應科陽增泰，對我黨的糧食政策不滿，挑起全廠搬運工大鬧糧食定量，甚至還罷工！請大家討論這是什麼行爲，進行分析批判。”

書記一發話，墻倒衆人推，馬上就有些人爭着發言，說我對黨的糧食政策不滿，就是對黨不滿。對黨不滿就是反黨，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分子。我一聽就火了。進廠以來我一直是受表揚、獎勵，從來沒有人這樣對我進行無端的指責，我這個人服軟不服硬，你要想壓服我是不行的。有人嚷着要我站起來接受批判，還有人要我低頭認罪。我本來是在椅子上坐着的，聽到喊我站起來低頭認罪，我就索性一縱身跳起來坐到了旁邊的桌子上，把頭高高昂起，心想，要我站起來，我偏要坐着，還要坐高點！我爭辯說：“我幫不識字的群衆寫個報告，正常反映情況，有什麼不對？人家該吃四十二斤，沒有多要一兩，憑什麼只拿三十八斤給人家吃？他們有情緒，工作推不動受影響，我才幫着打個報告。憑啥子說我是反黨分子？你們說我對糧食政策不滿，我自己吃十九斤都從來沒有提過意見，我哪點不滿？我陽某人解放前一天只吃一頓飯，全靠共産黨解放了，我一天可以吃到三頓飯，我怎麼會反黨？我哪一點對黨不滿？……”

這個所謂的整風會根本就不會跟你講道理，我越爭辯就越受

批判，不准我發言，說我態度不好，對黨有抵觸情緒，要端正態度……亂哄哄開了一陣開不下去了。

晚上，廠團委又在設計所召開全廠團員大會，指責我對黨不滿，有野心，想當車間主任沒有當上，就藉糧食問題向黨進攻……最後宣布將我“開除出團”。

第二天，廠保衛科李文成科長把我找到保衛科去個別談話，他說：“我查了你的檔案，你又沒有殺父之仇，怎麼會對黨不滿呢？態度還那麼强硬。你是貧農出身，有錯誤改了還是好同志嘛！”

李科長的話，看來還不是那種想把我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我聽了還有點感動，含着熱泪說：“李科長，你要知道，一分錢，雖然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不是自己的，你想要留下它，就會在染上永遠抹不掉的污點。開除我的團籍，我是不會承認的。我陽增泰怎麼可能反黨？幫別人寫個報告，就成了反黨行爲嗎？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更沒有我陽增泰，解放前我一天只吃一頓飯，餓得清口水長流，我都活過來了。讀解放書，國家公費培養我，直到進 716 廠……我對共産黨的恩情報不完。我怎麼會反黨呢？我今天吃定量十九斤，起碼每天有六兩米，早上吃一兩，中午晚上各吃二兩五，一日三餐不缺，比解放前好上百倍。我從來沒叫過苦，再苦也比解放前甜。”

李科長找我談話後，好長時間都沒有動靜。好像那場火綫整風會風波烟消雲散了。

1960 年 11 月 12 號，爲發泄心中的不滿，我寫了首打油詩，取名爲“溫室中開花不會結果”：

一個人哪裏沒有缺點？
十個指頭也有長短。
人，也有高低，
真正的十全十美，四海之內皆難尋。
思想，就是腦底的機能，
思維和意識，是人的頭腦底産物，
那環境（後天）

對這個有機體行爲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地密切，
工廠不等于軍隊，
就是軍隊，
也有上下級的密切，弟兄般的盡責。
要花盛開，要樹長直，要果甜大，
需要花匠耐心修剪。
漁翁不撒窩，魚兒不上鈎，
要想吃大魚，必須下功夫。
開會，鬥！
僅僅是階級鬥爭的一種手段，
但，溫室中的花不會結果，
而不見結果的花，就開會鬥，他就是 716 無綫電。

被罰農場勞動

1961 年 2 月 24 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調我到華鎣山農場去勞動，帶好行李，明天出發。

晴天霹靂！我老婆蕭華勛正身懷六甲（第二胎），我第一個兒子陽星才兩歲零五個月。調我去華鎣山，明顯是對我的懲罰，讓我去變相勞改。我走了，家中無人，日期無邊……我兩口子抱頭痛哭。有什麽辦法呢?

我想，五個搬運工，每人每月被扣掉四斤糧，五個人就是二十斤，這二十斤糧，一定是被書記、廠長他們分吃了。不然，我幫搬運工寫的報告怎麽會使他們如此大動肝火，對我下此狠手，非要把我往死裏整?

人咬人沒藥醫。是禍躲不過。1961 年 2 月 25 日，我懷着悲憤的心情，坐廠車去到鄰水縣高灘的長安機器廠[1]靶場——華鎣

[1] 國營長安機器製造廠，在重慶市江北區，五機部所屬大型軍工企業，代號 456 廠（重慶 20 信箱），原國民政府兵工署二十一兵工廠。

山農場 716 廠分場。那裏本來是長安機器廠檢驗產品（機槍）的靶場，因爲連年大饑荒，食物短缺，重慶軍工系統的各個廠都在那裏開設了農場，自己種些糧食蔬菜瓜果之類。

農場支部書記張立功和場長張道中接待和安置我們住下後，向我們宣布：同志們，我們熱烈歡迎你們來到農場！你們給農場增加了新的生力軍，開荒種地就不愁人手不够了，農場是體力勞動，管你們以前是幹什麽工作的，來到這裏，每人每月糧食定量吃三十八斤。

哇，這真像是一個炸雷！我幫別人爭取吃够定量沒有成功，現在自己也吃上三十八斤了！我過去吃十九斤，一下子增加了一倍！

我腦子裏飛快地計算起來：如果每天三頓按二兩、三兩、三兩吃，那麽一個月按三十天算，可消費二十四斤；如果每天三頓按三、四、四吃，那麽每月可消費三十三斤，還剩餘五斤……我眼睛一亮，心想，我妻子在廠裏定量才十九斤，她身懷六甲，等于是兩個人才吃十九斤，大兒子陽星定量只有七斤。我如果把大兒子的七斤給妻子吃，她就可每月吃到二十六斤，我把大兒子接到農場來，我們兩爺子一起吃這三十八斤……

1961 年 4 月 26 日，我編個藉口向農場領導請了一個星期的假，去接兒子來華鎣山共度灾年。我在高灘等車時，還寫了個順口溜，記錄我們農場勞動的一些感受，取名爲“刻苦初感”：

鎣山好風光，茅草滿坡長。
落點毛毛雨，勝過溜冰場。
二月二十五，離渝來農場。
山雨羊腸道，携手互幫忙。
隊長下指標，鷄鳴上山崗，
男女互相喚，似如鴛鴦翔。
一鋤挖茅草，二鋤挖元寶，
紅日當頭曬，汗水似雨掉。
目視雙手上，血泡像乾瘡，

腿痛腰又酸，收工難回轉。
見草當床鋪，只往上面躺。
回去熱水洗，今晚睡大覺。
三天就過去，還比農民强。
領導來關心，好像似爹娘。
農業第一綫，開荒播種忙。
刻苦加幹勁，度荒當英豪。

在農場幾個月中，我學到了不少農業生産知識，過去我只知道農作物有麥子、蕎子、豆子、洋芋，這時參加生産後才知道麥子要分大麥、小麥，蕎子要分春蕎、秋蕎，豆子要分冬黄豆、飯豆、綠豆，洋芋要分春秋洋芋……都要按季節性進行播種和收穫。

因爲我的工作表現，農場黨政領導提拔我擔任了農業計劃調度員。從一個單純的勞動者變成了生産指揮者。我虛心向同事們學習，向當地老農請教，并到書本中找依據，徵得領導的同意後，我進行了季節性的小春播種管理安排工作。

在工廠裏上班時，對下不下雨是漠不關心，只有因爲天太熱了才希望下點雨凉快，但若是雨下得太久了又嫌路太濕了不好走。在農場勞動後，天不下雨，就會想到田土龜裂，育苗不生，秧苗枯黄，紅苕栽不下去，包穀乾得像繩子，田土挖起來像鐵板，心裏就發急。

今秋播種，明春收割。實際勞動使我這個性急的人得到深深的鍛煉。

跟我同住一個連間鋪相鄰的樓醫生，挑糞上山，平路他都不會，上坡根本就上不去。我就幫他挑上山。他的衣服磨破了，不會用針綫，我就幫他補好。洗被子、縫被子，都是我給他幫忙。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問他爲什麽來農場，他說他的父親與蔣介石有過經濟來往，他就被揪到農場來了。這下我明白了，來農場的人，要麽家庭出身不好，要麽得罪了領導，遭到當官的打擊報復，或者因調皮搗蛋，當官的認爲不好管，都被弄來農場了。只有我的小孩陽星，才兩歲半，是我自己把他帶來的，爲了解決他母親

生了老二無法管他的問題，我才迫不得已帶他來。陽星很乖巧，我們下班時，還沒有走回來，他就自己拿上飯卡和瓷盅，跑到食堂去（食堂與我們的住處在同一個大房子裏），叫“叔叔我打飯”。那些炊事員大師傅都認識他，就給他打二兩飯菜，他就自己津津有味吃起來。

在農場的日子裏，除農忙時節外，空閑時間比在廠裏多。我有時就寫點打油詩，雖然說不上是詩，但是多少記錄了一點我當時的思想狀況和精神面貌，我都保存着，現選錄幾首——

玉米

我從家裏回來，
這時正值碧空黎明，
我過一個山坡，
眼前忽見玉米茁壯遍地。
就是在前七天的光景，
這地方還是茅草遍地，
年輕人辛勤地勞動，
已從工人變成農民。
一坡坡，一梯梯，
把它們親切地聯在一起。
銀珠似甘露，
孕育着玉米苗茁壯精神。
人們早出晚歸，
頂着烈日鋤草，黃昏施肥，
一切爲了玉米，
因爲它是今年度荒豐産的保證。

1961 年 4 月 19 日于農場

公布小春播種

看，鎣山在歡笑，
聽，方家河的水在歌唱，
哈！
滿山遍坡喜氣洋洋，
高歌起我們的歡樂。
滴千滴汗水，
播千顆春籽，
爲我們小春播種歌唱。
哈，
履行自然，勇創奇迹，
讓我們上鮮花，獻給英勇的戰士。
不，這是黨的英明領導，
所有這一切，應全歸功于黨！

1961 年 10 月 30 日于農場

不同的志向

有人說，
人生一世，以吃穿爲樂。
我認爲，
人生一世，就——
爲他人生而生，
爲他人歡而歡，
爲他人樂而樂，
爲他人苦而苦，這才是一個共産主義者的志向。

1961 年 11 月 10 日農場

雖然自己任勞任怨，但我畢竟是個工人而不是農民呀，對于在農場要勞動多久仍然心中無數。妻子生小孩時都沒讓我回去。

通知回廠得到甄別

在農場幹了十個多月後，1962 年元月，我接到調回廠的通知。這時我們在化龍橋的第一分廠已經獨立出來，改名爲國營朝陽電機廠（代號 907 廠）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處在華鎣山裏的人，誰也不清楚。是不是又要把我弄回去批鬥？真正打成“反黨分子”？

我忐忑不安地背着行李回到化龍橋正街 512 號家中。我問妻子知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妻子說她也不清楚，只聽說上邊好像又在搞什麼甄別運動。

第二天，我到供應室去上班。喬科長說：“你先到黨委辦公室去一下。”

黨委辦公室的幹部對我說：中央來了通知，對以前運動中搞錯了的同志要進行甄別，有錯就改，這是我們黨的一貫作風。去年對你的火綫整風搞過火了，現在給你恢復名譽。經研究，決定調你去機加車間當調度員，關于你的團籍問題，我們已經和廠團委書記黃興海協商好，恢復你的共青團員名譽。幷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自己是國家的人，聽黨的話，服從組織分配。

我到機加車間當調度員，只工作了一年左右，又被調到二十三車間。

二十三車間是個部、整件生產車間。車間支部書記王登鵬是部隊轉業下來的人，他在淮海戰役中是機槍手，後來提升爲連指導員。他爲人耿直，工作認真，就是文化程度低一點。他把車間工會的宣傳工作也加到我頭上，我不好推辭。

年終要到了，廠工會通知各單位要排練文藝節目，到年終作彙報演出。車間工會和車間黨支部都來找我，要我一定想辦法排個節目出來，一定不要給車間丟臉。

我深入各班組調查，發現白河清小組生產任務完成得好，有

技術革新成果，加班不計報酬，工時產值成倍翻，政治學習抓得緊，小組團結搞得好……我就用快板形式寫了個“歌唱白河清老師傅”，經車間黨支部審查後，我去找廠工會負責宣傳的專職幹事龍從雲，把稿子改成民間曲藝車燈的形式，唱詞，組織車間男女青年十二人（加上我本人），經過反復排練，最後在全廠年終文藝彙演中奪得冠軍。以後市機械局工會還把我們這個節目調去參加了市裏的彙演。

敢說話的性子改不了

1965年，廠裏搞二級管理，我從車間調到生產科任調度員。

長時間的調度工作，使我發現在上上下下各部門之間經常會發生扯皮的情況，總是要推卸責任。我看不慣，給廠黑板報寫了篇稿子：“論‘排球’”。我寫道：

> ……排球活動，在運動場上來說，是一個高尚的體育運動。它能增强人的體質，使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能發揮更大的威力從早到晚
>
> 但是長時間以來，在我們的工作上，在我們的幹部中，有不少同志，把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情，也進行“排球”。與其說是“排球”,不如說是“踢皮球”。這簡直是吃人民的飯，做資本家的事。怎麼能完成國家計劃呢?

最後，我按照當時宣傳的調子總結說：

> 搞生產管理工作的人，不講政治又怎麼能搞好生產呢?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統帥，是人的靈魂。

六十年代，全國掀起一個又一個的學習高潮，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學雷鋒，學王杰，學王鐵人，學麥賢德……我當時是二十三車間共青團支部書記，帶領全體團員投入這些學習活動，

特別是學雷鋒、學毛主席著作、學習貫徹共青團“九大”精神。

在學習貫徹共青團“九大”精神活動中，我整理出二十個問答來幫助大家加深大家對有關問題的瞭解，其中包括：

學習白求恩哪些精神？

張思德死了，爲什麼比泰山還重？

我們有了缺點，爲什麼不怕別人批評？

一個共青團員在工礦企業中怎樣爲人民服務？

當一個無產階級的接班人要具備哪幾個條件？

毛主席是怎樣關心共青團“九大”代表的？

要防止我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有些什麼措施？

目前我國還存在什麼差別這意味着什麼？

在我國的階級鬥爭中有哪四個存在？

在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綫的鬥爭中，要以什麼爲綱？要樹立哪些觀點？

在發展我國國民經濟中，什麼是“兩個拳頭”、“一個基礎”？

這時開始推行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制度，當時有幾種方式，有的是每週參加半天勞動，有的是頂替到車間當工人一月或一年，有的跟班勞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我被派到五車間磨床組參加勞動。在這裏，我認識了組長譚發祥，成都無綫電機械學校畢業的舒斌……

這個組加工的產品，主要是導彈上用的微電機磁鋼等，其他電機上的定轉子都是用矽鋼片衝疊加工而成的，唯有導彈上用的電機定子是澆鑄磁鋼經加工而成。

我被分配到電火花磨床上作第一道工序：電火花燃燒內孔，再用小砂輪精磨內孔。電火花磨床專門配備有一個乾冰滅火器，因爲電火花磨床是用電來燃燒磁鋼內壁，如果吃刀量大了，整個床子就要起火，乾冰滅火器一噴，它就滅了。然後繼續燒，一直達到技術要求。生產定額是每天燒兩個，這是老師傅親自操作定

下的定額數。如果上面催得急，就得加班，加班都是老師傅親自操作，可以出產品四個左右。

後來我才明白，老師傅家裏六口人，妻子沒有工作，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靠他一人掙錢養家活口，他是爲了多掙加班工資才定下的這個定額。小組的人誰也不敢超過這一。我參加勞動後，慢慢摸索，掌握燃燒規律，終于找到吃刀量開到不起火的最大界限，這樣下來，我一個班可以磨二十七隻磁鋼。

管生產的李文達副廠長聽說了，跑來視察，拍着我的肩膀，伸出大拇指。我只是一笑了之。

後來生產科長賀平來輪換我參加勞動，一天，他告訴我：“老陽，我按照你說的方法操作，我已達到每天二十五個了。”

第二章 在造反奪權的日子裏

不讓我參加工人糾察隊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1965 年底,市委派到朝陽電機廠搞“四清”的工作組李隊長,狠抓階級鬥爭,要求每個班級每天下班後都要增加一小時的政治學習時間,使人感到來勢凶猛,比 1957 年“反右派”運動還要厲害。每天工作,學習,工作,十分緊張,誰也不敢亂說一句話。1957 年的教訓都沒有忘記。

李隊長還給廠裏講黨課,我還不是黨員,也去聽了黨課。聽他講到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共産主義是按需分配時,我想,按需分配,那是個看不見摸不着的理想社會,人的私慾膨脹起來,如果沒有約束,國家消失了,可能會比原始社會還要亂。當然這些想法不敢講出來。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我們最初幷不理解這是一場什麼運動,儘管每天都認真讀報,特別是把《中共中央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條”反復學習,把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那些報道和有關社論讀了又讀,也仍然不知道這個運動與我們工人有什麼關係。我們朝陽電機廠是國防工廠,平時管理很嚴,每個人都是經過政審合格才進廠的,對外寫信一律只准寫“重慶 2007 信箱”,不准提廠名和地址,屬于“保密”工廠。

1966 年 8 月下旬,廠政工部門突然接到市委電話通知:沙坪

壩出現了“八一五”[1]暴徒，可能來衝擊工廠，你們要加强防範。廠裏頓時緊張起來，廠領導馬上决定組織武裝民兵護廠，并决定由工會主席王登鵬負責這一工作。王登鵬立即組織了男女民兵二十人左右，住到原總務科的兩間房子裏，男女各住一間，每天早上七點就起床出操，輪流值班站崗，不站崗的白天照常上班。

到了9月上旬，市委又通知各工廠：工廠不成立紅衛兵組織，要成立工人糾察隊護廠。工人糾察隊以黨團員爲主，選老工人和先進模範人物及政工幹部組成，市裏統一發袖章。

這時我已經年滿三十歲，超出當共青團員的年齡了，辦理了退團手續，但還沒有加入共産黨。我在二十三車間時就已經申請入黨，當時王登鵬是車間黨支部書記，他說車間支部已經討論通過，上報廠黨委，廠黨委還沒有批。後來我調到生産科，王登鵬調到廠工會，我入黨的事就擱淺了。

我想，我是貧農出身的工人，參加工人糾察隊護廠是我應盡的義務，于是我去申請，結果他們不要我參加！

這一下，我猶如挨了當頭一悶棒，一時間六神無主，茫然不知所措。仔細一想，我才感到，自己當年爲那五個搬運工寫報告受處分的事，雖然後來得到了甄別，但是顯然并沒有完，已經被廠領導們記了一筆，所以我的入黨申請也得不到批准，現在申請參加工人糾察隊也得不到批准。

我已經成爲廠領導心目中的不可靠人物了！

---

[1]1966年8月上旬，因對工作組評價上的分歧，重慶師範專科學校（今重慶師範大學）學生出現兩派對立，反工作組一派處于劣勢，向反工作組觀點已占大多數的重慶大學師生求援，8月15日上午，重大數千師生應邀前往聲援，與師專保工作組一派展開辯論，附近的一些中學生及工人、機關幹部、居民也帶着不同觀點前往該校加入辯論，雙方爭執不下，前去處理問題的市委領導被糾纏多時難以脫身。形成重慶第一次規模較大的群衆性大辯論及造反派師生與市委領導當面爭執局面。事後爲紀念這一事件，重慶大學造反派組織取名爲八一五戰鬥團，重慶造反派將此日視爲造反開始紀念日，在“一月奪權”前亦統稱八一五派。最初這些造反派被市委視爲製造“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暴徒”。

帶頭造反成立群衆組織

一天，我懷着心事，毫無目的東游西逛，忽然碰到好朋友胡瑞明，他說："哎呀，我正要找你！"

我問："有什麽事？"

他說："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走，我們走田胡兒那裏去。"

他說的田胡兒，就是廠裏的同事田林森，"田胡兒"是他的外號。田林森是工模具修理工，是斯有章老師傅的徒弟，我也是斯有章師傅的徒弟，所以我和田林森算是師兄弟，平時可以說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同他一起在工模具修理間的，還有一個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吳德新（後來當了八一兵團《八一戰報》的編輯）。還有一位機動科的鉗工萬同銘，我們幾個人經常在田林森的工作間裏聚會聊天。

胡瑞明把我叫到田林森的工作間後，對我說："重大八一五不是暴徒，他們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投身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師生，八月十五號那天，他們是到師專去進行革命串聯，支持師專的革命師生，被市委說成是暴徒。他們爲了紀念那一天的行動，把他們成立的革命組織起名爲八一五戰鬥團……"

老胡的家就住在重大附近，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現已合并到重慶大學）背後。他每天回家，都要跑到重大去看大字報，所以他傳回來的消息都是真實的。他本人是共産黨員，不會亂說。

聽了老胡的講述，我很受觸動。這時我才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是要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廠裏組織所謂工人糾察隊"護廠"，其實護的是當權派，是他們怕那些學生來宣傳革命造反精神，怕工人也起來造反。

于是我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是"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孔祥國拉下馬"，我列舉了大量事實，追問孔祥國：

當年那五個搬運工每月被扣除的二十斤糧食到哪裏去了？

電鍍小組工人黃樹雲爲什麽服毒自殺？

裝配車間女工裴永珍爲什麽死在單身宿舍床上無人問

津？……

這樣點名質問廠領導的大字報還是頭一張，在廠裏影響相當大。

一時間全廠職工議論紛紛，其他人也寫出了一些大字報，廠裏的造反氣氛一下子就高漲起來了。

許多人跑到工模具維修組來找我問下一步怎麽辦，我同大家商量後，一致同意建立我們的革命組織，取名爲“朝陽革命工人戰鬥團”。

我叫胡瑞明去重大聯絡以得到聲援，重大八一五就派了人來參加我們的成立大會，還帶了個宣傳隊來演出助威。

我們成立朝陽革命工人戰鬥團那天，不知工人造反軍的黄廉[1]怎麽得到消息也跑來了，而且他很有些鬼點子，本來他是不能進入我們這樣的“保密單位”的，但是不曉得他怎麽打聽到了我們開會的禮堂背後有後門通五一小學，他就從那邊偷偷溜進來了。他把我找到舞臺後面，自我介紹說他叫黄廉，是重慶無産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總部的負責人，希望我們朝陽革命工人戰鬥團加入他們造反軍總部。

我問他工人造反軍總部有些什麽單位的人參加，他列舉了一些單位，大多是些我不瞭解的小單位。他說話的口氣很有些街上賣藝販藥跑江湖的人那種吹噓味道，使我不大喜歡。我根本不瞭解他，也不瞭解工人造反軍的情況，覺得社會上的事情太複雜，最好不要招惹麻煩。我和幾個頭頭商量了一下，馬上回絕了黄廉，我說，我們不瞭解你們造反軍的情況，我們朝陽廠是國防廠，保密單位，我們的人都是經過政審的，大家相互都比較瞭解，我們

[1] 黄廉，時爲重慶市木材公司魚鰍浩木材廠采購員，轉業軍人。文革中1966年秋（33歲）參加造反，任重慶無産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總部主要負責人，1967年6月任反到底工總司勤務組副組長。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文革結束後1976年底被關押并點名批判，1982年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4年刑滿釋放後曾在私營企業工作。

成立組織是爲了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産，不想介入社會上的活動。

他見我態度很明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我們朝陽革命工人戰鬥團成立起來過後，得到了廠裏大多數職工的擁護，廠一級的幹部如副廠長李文達、廠工會主席王登鵬等也都表示支持。

1966 年 12 月 4 日，當時被我們稱爲“保皇派”的重慶工人糾察隊（簡稱“工糾”）在大田灣體育場召開誓師大會。我們廠的“工糾”也去了。不到中午，他們灰溜溜地回來了。我們一打聽，才知道是上午開會時有造反派去衝了他們的大會，雙方打起來了，聽說還打死了人，而且說是“工糾”打死了造反派的人。

過了兩天，聽說造反派在體育場舉辦了展覽，擺了幾具被“工糾”打死的造反派“烈士”的尸體在那裏讓大家參觀。我帶領我們朝陽革命工人戰鬥團和本廠其他一些職工，一起去體育場看了，其他單位也有許多人去看，人山人海，主席臺上的高音喇叭不斷播放着聲討“工糾”的文章和悼念“戰友”的歌曲。我們排着隊慢慢走過去，看到那幾具尸體都是傷痕累累的樣子，讓人一看就義憤填膺。回來後無不對“工糾”罵不絕口。

可是，沒過幾天，就聽說那幾具尸體是造反派從火葬場搶出來的，并不是那天開會時被打死的，有的是車禍死的，有的是病

死的，其中甚至還有勞改犯的尸體！是黃廉和羅廣斌[1]他們鼓動一些造反派，以尸體爲突破口來打擊“保皇派”，就搞了那個展覽。

儘管所謂“一二·四慘案”的真相弄清楚了，但是由于當時造反派把輿論造得很厲害，傳單滿天飛，大字報滿城張貼，特別是當時的全國形勢明顯可以看出毛主席、黨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那些事實真相也沒有多少人去追究了。

當時大家對“工糾”這種由官方操縱搞起來的所謂群衆組織都沒有好感，很少有人幫他們說話。在這種形勢下，他們很快就垮了。

組建全市國防系統的八一兵團

形勢發展很快，各行各業已經都建立起群衆組織了，重慶也有了一些如像工人造反軍、二七戰鬥團那樣的全市性跨行業的大組織。我想，我們國防系統的造反派組織應該聯合起來，互相支持，

[1] 羅廣斌，1924年生。四川忠縣（今屬重慶市）人。1948年3月加入中共，9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當局對關押在重慶的政治犯實行大屠殺之夜從白公館看守所率衆逃出。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市文聯創作員（專業作家），著名長篇小說《紅岩》主要作者。1966年9月爲首組建文聯紅衛兵戰鬥組。10月主持選出文聯文革籌備小組，實現了文聯造反派奪權。重慶“一二·四事件”（文革中全國第一次大規模武鬥）發生後，參加重慶造反派“一二·四慘案赴京控告團”，于12月17日在紅衛兵首都三司發起召開的“全國在京革命派爲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上代表重慶造反派作控訴發言。1967年1月下旬重慶造反派在駐軍支持下奪權建立革聯會後，站在反對革聯會一方，被革聯會一派打成“政治扒手”。2月5日革聯會一派紅衛兵到市文聯院內將其公開綁架。2月10日在關押地（解放軍重慶後勤工程學院）跳樓自殺。在羅死後，兩派爭論一直沒有停息，一派稱其爲“叛徒”，一派稱其爲“烈士”。直到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長接見四川軍政領導人時江青講話中定調：“羅廣斌是羅廣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們根本不理他。”隨即被作爲“叛徒”遭到大批判。1972年6月重慶市文聯鬥批改組作出將羅廣斌定性爲“叛徒”的結論。文革結束後1978年11月11日重慶市爲羅廣斌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這樣才有力量。

我和大家商量後，决定串聯我們重慶十大軍工廠[1]的造反派，成立一個統一組織，我考慮到我們軍工廠是爲軍隊服務的，就想了個名字叫“八一兵團”，大家都說好。

于是我就派了田林森和萬同銘二位去串聯其他軍工廠的造反派組織，聯繫得差不多了，我就到建設機床廠[2]去，同他們那裏的造反派組織頭頭周榮華[3]、周應古[4]等商量成立八一兵團的事。周榮華是建設廠的共産黨員，在1958年我和他一起參加過市裏的先進生産者慶功大會。

12月16日，我們在重慶工業學院成立了八一兵團[5]。决定總部設在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我們一般簡稱爲“市委二部”），總部不起領導作用，只是一個聯絡機構，每個分團派一至二名代表到總部工作，叫聯絡員，主要起到互通情報、協調行動的作用。我當場宣布，我們朝陽廠派出田林森和萬同銘兩位聯絡員先去市

---

[1] 指當時位于重慶市市中區周邊九龍坡區、南岸區、江北區、沙坪壩區的建設機床廠、空氣壓縮機廠、長江電工廠、江陵機器廠、嘉陵機器廠、長安機器廠、前衛儀錶廠、望江機器廠、無綫電廠、朝陽電機廠。

[2] 國營建設機床廠，在重慶市九龍坡區謝家灣，五機部所屬大型軍工企業，代號296廠（重慶1號信箱），原國民政府兵工署二十兵工廠一分廠。

[3] 周榮華，1931年3月生。文革爆發時爲國營建設機床廠41車間內綫電工。中共黨員，先進生産者。參加造反後任八一兵團負責人。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9月建設機床廠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後病故。

[4] 周應古，1939年9月生。文革爆發時爲國營建設機床廠工具科工人，文革中1966年秋（27歲）參加造反，一度擔任過建設廠八一兵團負責人。1967年5月任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總部勤務組副組長。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9月建設機床廠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1970年“批清”運動中曾被關押審查。文革結束後被清查。後提前退休在私營企業工作。

[5] 據《雄關漫道真如鐵——八一兵團英勇戰鬥的一年》一文記載：八一兵團于1966年12月16日在重慶工業學院禮堂成立。重慶8•15工總部八一兵團主辦《八一戰報》第18期，1967年12月31日出版。

委二部打前站，各分團確定派駐總部人選後可去那裏報到。爲保密起見，每個廠都以對外信箱編號爲該分團編號，這樣，當時全市的十大軍工廠就分別編成了八一兵團的各分團：

朝陽電機廠——2007 團，

無綫電廠——2701 團，

嘉陵機器廠[1]——2301 團，

空氣壓縮機廠[2]——2602 團，

建設機床廠——6657 團，

江陵機器廠[3]——65 團，

長安機器廠——20 團，

長江電工廠[4]——63 團，

望江機器廠[5]——16 團，

前衛儀錶廠[6]——4206 團。

其中，只有建設廠沒有用信箱代號（該廠的信箱代號是 1 號信箱），而用了一個紀念毛主席 1966 年 5 月 7 日發表“五七指示”的日子作爲分團名稱。據說這是他們團裏搞宣傳的幾個人想出的主意。當時的群衆組織起名也沒有嚴格的規定，也就由他們與衆不同了。

我們八一兵團 2007 團包括了朝陽革命工人戰鬥團和廠裏其他

[1] 國營嘉陵機器廠，在重慶市沙坪壩區雙碑，五機部所屬軍工企業，代號 451 廠（重慶 2301 信箱）。

[2] 國營重慶空氣壓縮機廠，在重慶市九龍坡區楊家坪，五機部所屬軍工企業，代號 256 廠（重慶 2602 信箱）。

[3] 國營江陵機器廠，在重慶市江北區大石壩，五機部所屬軍工企業，代號 152 廠（重慶 65 信箱），原國民政府兵工署第十兵工廠。

[4] 國營長江電工廠，在重慶市南岸區銅元局，五機部所屬軍工企業，代號 791 廠（重慶 63 信箱）。

[5] 國營望江機器製造廠，在重慶市南岸區郭家沱，五機部所屬大型軍工企業，代號 497 廠（重慶 16 信箱），原國民政府兵工署五十兵工廠。

[6] 國營前衛儀錶廠，在重慶市江北區，六機部所屬軍工企業。代號 4206 廠（重慶 313 信箱）。

幾個造反派組織，團部勤務組，由我和李華權、蕭保山、李成章、姚國章五人組成。隨着形勢的變化，後來又增補了胡友年、李雲聽、王思琪。當我被八一兵團派到革聯會以後，我們團部就由李華權負責。當李華權被派到八一五派化龍橋地區指揮部去了以後，團部又由蕭保山、胡友年負責。

與廠裏保守派的一次較量

工人糾察隊垮臺後，我廠的“工糾”不服氣，他們不願意參加我們八一兵團，另行組織了一個“11 · 27 革命工人造反兵團”(“11 · 27”是紀念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當局對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等地的政治犯進行大屠殺的日子，後來定爲重慶革命烈士殉難紀念日，他們取這個名字，表示他們認爲自己是繼承革命烈士遺志的真正革命派)，但是他們雖然名爲“兵團”，却沒有多少人，全廠大多數人都參加了我們八一兵團。

我們八一兵團在廠裏批判孔祥國，“11 ·27 造反兵團”不參加。但是他們另外做了一件事，我們都不知道：他們不知什麽時候秘密地把支持我們的廠工會主席王登鵬抓到成都去了，而且是同孔祥國一起去的。

過了幾天，廠裏通知召開全廠職工大會。會上，廠黨委書記孔祥國宣布：廠工會主席王登鵬，在負責民兵護廠工作期間，曾清早撞進女工民兵宿舍揭被子，有流氓犯罪行爲，經省國防工辦蔣崇璟主任批准，開除王登鵬的黨籍！

我馬上和我們勤務組的幾個同志商量，王登鵬是明確表態支持我們八一兵團2007團的廠級幹部，孔祥國支持“11 ·27造反兵團”這樣整他，明顯是轉移鬥爭大方向。我們決定把孔祥國也抓起來，到成都去找蔣崇璟主任彙報真實情況。

于是，我安排李華權去找司機張國柱，把車開到華村路口等着，李成章去找了十來個八一兵團戰士，和我一起去抓孔祥國。

我們把孔祥國抓來，坐上南京牌貨車，連夜疾駛，于次日到了成都。

當我們車開到成都一號橋時，路邊有人看到我們手臂上戴的“八一兵團”袖章，就大叫：“老保！老保！下來辯論！”

我聽到了，感到不對，怎麼叫我們是“老保”呢？我連忙叫司機把車停下，向路邊喊我們“老保”的人解釋說：“我們是重慶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團，不是老保。你想辯論什麼事情？”

他們一聽，忙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們以爲你們是成都的八一老保呢。”

誤會消除後，我們到了省委國防工辦，找到蔣崇璟主任。蔣主任聽了我們的反映後，才明白他上了當，同意跟我們一道去重慶處理此事。

蔣主任跟我們回到重慶，在朝陽電機廠召開了全廠職工大會，宣布恢復王登鵬的黨籍。

這一下，“11·27造反兵團”原想藉打擊王登鵬來打擊我們八一兵團的行動弄巧成拙，反而引起全廠廣大職工對我們的擁護。百分之九十的職工都加入了八一兵團2007團。

朝陽廠的假奪權與真奪權

1967年一開始，全國就刮起了“一月風暴”。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號召造反派奪權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當21號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把這篇社論提前廣播後，我們還在考慮怎麼響應中央號召，如何進行奪權的時候，廠裏的“11·27”已經搶先行動，他們與廠黨委書記孔祥國秘密商量後，連夜寫出布告，宣布他們奪了廠裏的權。其實他們本身就有些人是在廠裏各部門掌權的幹部，奪不奪權都是他們在管事。他們宣布的奪權只是一個趕時髦走過場的舉動，是地地道道的假奪權。

我們得知“11·27”宣布在廠裏奪權之後，根本就不承認他們的所謂奪權，決定要由我們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在廠裏奪權。我們勤務組商量好以後，又開了各車間勤務組會議，一致同意把廠裏的黨政財文大權奪過來。

■ 1967 年 1 月 29 日，重慶造反派及解放軍駐渝部隊指戰員 30 多萬人舉行大聯合大奪權抓革命促生産誓師大會，宣布已奪取市委、市人委一切權力。西南局宣傳部長劉文珍及市委領導人被揪到會場戴高帽子示衆。

當時我們對奪權幷沒有什麽認識，中央號召奪權，也沒有提出什麽具體的規定，我們只曉得奪權就是奪印章，要自己掌握“印把子”。廠裏的印章，最主要的是廠裏管經濟的財務章。財務科到銀行取款，以前用的是“重慶國營朝陽電機廠廠長崔振全”的印章，現在我們就宣布這個印章作廢，另外起用“重慶國營朝陽電機廠重慶八一兵團 2007 團”的印章，幷到銀行去更換了印鑒底單。這個手續就完成了。

“11 · 27”根本沒有想到我們會采取這樣的行動，只有瞪眼看着我們行動，打不出噴嚏來。他們的所謂奪權當然也就破産了。

2 月初的一天，我們八一兵團 2007 團在化龍橋的紅岩電影院召開了慶祝奪權成功和建立廠革命生産委員會的大會。當時選出

的革命生產委員會主任是駐廠軍代表董治朴，副主任是八一兵團代表姚國章，結合的革命幹部有副廠長李文達，還有工會主席王登鵬，還有文化不高的老紅軍、廠部辦公室主任賴和明，另外還有些群衆組織代表作委員，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我當時已經被派到市裏的臨時權力機構革聯會去工作，廠革命生產委員會沒有給我安排具體任務。

奪權風暴中當上革聯會常委

廠裏奪權以後，1 月底的一天，我們八一兵團 2007 團勤務組正在研究如何分工管理工廠的抓革命促生產事務，我們派到八一兵團總部的聯絡員田林森打來電話，說全市的八一五派已經聯合奪了市委、市人委的權，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五十四軍[1]）大力支持，并派出了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2]來，與造反派一起商量建立重慶市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要求八一兵團派出一名負責人參加，八一兵團總部各廠派去的聯絡員研究決定，由八一兵團的發起單位朝陽電機廠 2007 團

[1] 陸軍第五十四軍，1958 年從朝鮮返國後駐防四川，軍部駐重慶市。1960 年後，軍部奉命兼重慶警備司令部(1967 年 6 月後改稱重慶警備區司令部)。駐重慶時期代號爲 7788 部隊。自 1967 年 1 月起擔負重慶等 11 個專區(市)、40 餘個縣的“三支兩軍”任務（1967 年 6 月陸軍第 50 軍入川後範圍略有縮小)。1968 年 10 月奉命調防離川。

[2] 劉潤泉，1916 年生，河北直隸人。1938 年入伍。抗戰勝利後歷任連指導員、營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師幹部部部長、師政治部主任、師副政治委員。文革爆發時爲駐重慶的陸軍五十四軍政治部副主任。1967 年“一月奪權”時五十四軍按毛澤東有關軍隊要“支左”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奪權建立了臨時權力機構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劉被軍黨委安排擔任革聯會主任，主持了革聯會的大批判、群衆組織歸口大聯合、鎮反、抓革命促生產等工作。5 月中央下達《關于重慶問題的意見》（即“紅五條”）建立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革聯會權力機構職能移交後，劉回到部隊。1968 年底部隊移防雲南後歷任昆明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顧問。2005 年 5 月 12 日在廣州病逝，終年 89 歲。

派負責人作代表進革聯會。田林森叫我們儘快商定把人派去。

我們勤務組一研究這個問題，蕭保山馬上發言說："我認爲老陽去最合適，因爲我們軍工系統成立八一兵團時，老陽是大會執行主席，大家對他都熟悉，他代表八一兵團沒問題。"

其他人也都贊同蕭保山的意見。就這樣定下來，由我作爲八一兵團的代表參加市裏面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工作。

第二天，我拿上八一兵團總部的介紹信，到市人委去找到劉潤泉報了到。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劉潤泉，這個軍隊幹部是個很和氣的人，初次交談就使我很有好感。

革聯會召開籌備會議時，劉潤泉讓我主持會議，由財貿八一五戰鬥團的頭頭王紹川[1]作記錄。

會上討論了具體由哪些群衆組織組成革聯會。當時群衆組織太多太雜，打着各種旗號，有的號稱幾十萬，有的只有幾個人，很難弄清其組成人員情況到底如何。因此，我們討論中提出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一些全市性的跨行業組織，最好按部門歸口建立分團，由各系統各部門的分團出面參加革聯會。這就涉及到幾個大組織的問題，特別是工人造反軍總部和工人造反軍司令部、二七戰鬥團這樣的全市性跨行業組織。

在七嘴八舌的討論中，有人提到工人造反軍總部頭頭黃廉的問題。黃廉這個人我見過一面，我們朝陽革命工人戰鬥團成立時他來找過我，想拉我們加入工人造反軍總部，被我們拒絕了。但我對他幷不瞭解。這時，就聽一個坐在窗臺上的學生模樣的代表講了些黃廉的歷史問題。我當時不知道這個發言的年輕人是誰，

[1] 王紹川，時爲重慶市第二商業局教育辦公室負責人，轉業軍人，中共黨員，文革中1966年秋（32歲）參加造反，任重慶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總部一號勤務員，1967年2月革聯會成立任副主任。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文革結束後1977年6月10日中共重慶市委召開"揭發批判'四人幫'及其在重慶市財貿系統的幹將王紹川的罪行大會"。被撤職幷開除中共黨籍。後提前退休經營私營企業。

問旁邊的人，說他就是重慶大學的周家瑜[1]，現在是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代表。當時會議室裏人很多，到處都坐得滿滿的，他大概來晚了，沒有地方坐，就坐到一個窗臺上，他發言時就從坐的窗臺上跳下來站着講。這一點給我印象特別深。

周家瑜侃侃而談，講了些他所瞭解的黃廉的“歷史問題”（他是怎麼瞭解到的我不清楚），主要講黃廉從部隊轉業下來是因爲犯了什麼錯誤，是受了處分的，總之給人的感覺是黃廉這樣的人歷史上有污點，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他的造反帶有明顯的個人目的，應該引起警惕。

會上還有人說，黃廉所謂工人造反軍總部頭頭也是他自封的，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的時候根本就沒有他。他是後來才擠進去的，八方伸手到處拉人……總之會上多數意見都對黃廉表示反感。

在籌備革聯會期間，聽說黃廉和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他們一起搞了個什麼聯絡站，串聯了一批群衆組織反對革聯會，當時被支持革聯會的人稱之爲“廉羅棧”。我聽劉潤泉說，羅廣斌這個人的歷史也有問題，他從渣滓洞、白公館到底是怎麼出來的，跟他哥哥羅廣文（國民黨的兵團司令）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市委查過幾次，總之有些疑點。現在文革中羅廣斌跳出來向市委造反，其動機也很可疑。

當時要求參加革聯會的群衆組織很多，其中一個是軍工系統

[1] 周家瑜，文革中一般寫作周家喻，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大學無綫電系 68 級學生，共青團員。文革中 1966 年 8 月（21 歲）參加造反，任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主要負責人，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後爲紅衛兵重慶警備區）一號勤務員。1967 年底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任主任。1968 年 5 月 31 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1973 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1978 年 2 月 11 日經中共四川省委決定并報中共中央批准，被以“‘四人幫’在四川的代理人、幫派頭子、現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逮捕。1982 年 1 月 19 日被重慶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 16 年，剝奪政治權利 5 年。刑滿出獄後一度經營私營企業。

的軍工造反兵團。是長安廠的一個女工李桂芝[1]來申請的，她是長安廠軍工造反兵團的頭頭。我聽到她說要以軍工造反兵團的名義加入革聯會，我當即表示反對，我想，八一兵團是十大兵工廠裏面造反派的統一組織。你現在又拉一個山頭起來做什麼？我就直截了當給她說，現在中央提倡搞歸口大聯合，你們爲什麼不加入自己廠裏的八一兵團呢？你們加入了八一兵團，不就自然加入革聯會了嗎？現在有些“工糾”才不願意加入八一兵團，另外建立組織，搞“工糾”的變種……我這樣說，她很不高興，扭頭走了。

我本來是不想讓軍工系統再出現一個山頭，結果沒想到事與願違，軍工系統反而從此有了一個跟我們八一兵團嚴重對立的山頭。

革聯會成立大會決定在大田灣體育場舉行。大會前夕，劉潤泉告訴我，反對革聯會的一派要搗亂，讓我帶八一兵團的人去把會場清理好。

當時因爲提倡“造反有理”，對反對的東西動輒就要“打倒”、“砸爛”，反對革聯會的一派就表示要“砸爛革聯會”，所以稱爲砸派。砸派爲了破壞革聯會成立大會，搶先組織人員把體育場主看臺上的主席臺强占了。我奉命帶領八一兵團一百餘人衝上主席臺，從中心手拉手組成人墻，逐步向外擴大，把對方擠下了主席臺。那時還沒有形成武鬥的風氣，所以雖然有點肢體衝撞，但基本上沒有打架，只是相互爭吵謾罵。

1967 年 2 月 8 日，革聯會宣告成立。2 月 12 日，革聯會成立

[1] 李桂芝，女，時爲國營長安機器製造廠檢驗科工人，共青團員。文革中 1966 年秋（21 歲）在廠裏率先造反，1967 年 1 月任軍工造反兵團勤務組副組長，5 月任軍工井岡山總部常委。1967 年 7 月在兩派衝突中被八一五派抓捕關押于團市委，8 月 15 日反到底派打過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幷進占上清寺一帶時獲救。1968 年 10 月長安機器廠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後調離重慶。

大會在重慶市體育場舉行，我受命在大會上當司儀[1]。

這是我第一次主持全市性的群衆大會，心情十分激動，也有些緊張，生怕出什麽差錯。因此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主席臺上有關發言的安排等方面。按分工，會場秩序是由革聯會另一個常委、二七戰鬥團的王庭學負責。對鬧哄哄的主席臺旁邊發生了八一兵團的人撕毀軍工造反兵團的大旗[2]、從而導致軍工造反兵團此後加入砸革聯會陣營一事，我也完全沒有注意到。因此現在回憶起來沒有一點印象。

參與處理羅廣斌之死

革聯會成立後的第三天，1967 年 2 月 10 日，我在市人委辦

[1] 據《雄關漫道真如鐵——八一兵團英勇戰鬥的一年》一文記載：這天淩晨，正當八一兵團各分團在集合隊伍參加大會的時候，“混入建設廠八一兵團內的個別壞頭頭周應古之流（後投身砸派，成爲軍工反革命武裝暴亂的急先鋒）爲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提出種種奇談怪論，別有用心地提出‘砸爛革聯會’，幷狗膽包天地盜用八一兵團總部的名義貼出大幅標語‘八一兵團退出革聯會’，召回了‘慶祝大會’的執行主席（參加‘革聯會’的各革命造反組織的代表推舉我八一兵團擔任慶祝大會的執行主席），電話通知還未出發的分團解散隊伍，不參加大會。這樣引起了一場混亂，引起了山城各兄弟革命造反組織的誤解。眼看着大會有夭折的危險，各分團負責人紛紛趕到總部，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大家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據理駁斥了周應古之流的種種謬論，粉碎了周應古之流的陰謀詭計……”。重慶 8•15 工總部八一兵團主辦《八一戰報》第 18 期，1967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2] 據《雄關漫道真如鐵——八一兵團英勇戰鬥的一年》一文記載：江陵廠軍工造反團成立後，“削尖了腦袋往新生的革聯會裏鑽，妄圖混入革命造反派的隊伍，……2 月 12 日，他們高喊着‘向重大 8•15 學習！’‘向重大 8•15 致敬！’‘擁護解放軍，支持革聯會！’的口號，死不要臉地鑽進了慶祝革聯會成立大會的會場（大田灣廣場），幷將‘軍工造反團’的旗幟插在大會主席臺旁邊，妄圖撈取一點政治資本。我八一兵團戰士看透了他們的陰謀詭計，憤怒地將那面破旗撕個粉碎，揭了他們的老底。”重慶 8•15 工總部八一兵團主辦《八一戰報》第 18 期，1967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公樓的革聯會常委值班室值班。這天早上，上班時間還沒有到，我正在盥洗間洗漱，忽然有人跑來報告說羅廣斌死了。

羅廣斌這個人，我沒有見過面，但是讀過他和楊益言寫的長篇小說《紅岩》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是一本很有影響的小說，幾乎人人都讀，我還看過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文革前和文革中我同羅廣斌都沒有接觸過，文革中只知道他和楊益言也起來造反，很有一些影響。後來在重慶造反派奪權建立革聯會以後，有人曾經提出是否可以把羅廣斌作爲革命幹部代表推選到革聯會裏，但這個意見被否定了。我聽劉潤泉說過羅廣斌的問題，對羅廣斌的歷史，主要是他怎樣從白公館出來的歷史有懷疑，據說以前公安局做過幾次調查，對有些疑點還是沒有弄清楚[1]。

革聯會成立後，就聽說他和黃廉站在一起，反對革聯會，攻擊革聯會是“假奪權”，攻擊重大八一五是“右傾投降”，在造反派內部造成了分裂。羅廣斌因此被八一五派認定是“山城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政治大扒手”，甚至說他是“埋藏在造反派內部

[1] 羅廣斌的被捕與出獄問題，曾受到過六次審查。第一次是在中共執政後的1950年，由重慶市委組織部主持，審查他在被捕期間的表現，以便決定是否恢復其中共黨籍。結論對羅廣斌給予了充分肯定的評價，決定恢復黨籍。第二次審查是1955年的肅反審幹運動，由市審幹委員會主持。認定：被捕期間無問題。第三次審查是1959年，由公安部門主持，審查沒有結果。第四次是1964年，由于《紅岩》小說被翻譯成日文後，在日本青年讀者中產生强烈影響，日本共產黨邀請羅廣斌訪日。共青團中央徵求重慶市委意見。于是再作審查。結論肯定了一個基本事實：“未叛黨”。第五次審查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有關領導授意公安部門再次進行審查，力圖將羅與已經被打成“黑幫”的馬識途挂在一起批判。但因群衆造反運動很快使各級領導部門癱瘓，審查未能繼續。第六次審查是在文革結束、1978年舉行羅廣斌骨灰安放儀式之後，重慶市委再次組織力量對羅廣斌之死和歷史問題進行審查。關于歷史問題，決定維持1955年的審查結論。詳見胡康民《說不盡的羅廣斌》，載《紅岩春秋》雜誌2000年第一期。

的定時炸彈”，把他抓到 242 部隊[1]關押起來了。有關他的傳單和大字報，這些天到處都有，我看到過一些，因爲正忙于革聯會的工作（這時候的工作真可以說是千頭萬緒），也沒怎麽細看，大多只瀏覽了一下標題。本來我還在想，把他抓起來了，看他能交代些什麽問題出來吧。可是怎麽一下子就死了呢?

來報告消息的人不知是 242 部隊的學員還是哪個學校的學生，我記得是穿的軍裝（那時候紅衛兵都愛穿軍裝），據他報告，羅廣斌是這天早上在關押他的那棟樓裏藉上厠所的機會跳樓自殺的，看管他的學生因爲沒有跟着他進去，所以發現他爬到窗臺上去了時，已經來不及拉住他了。

我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立即打電話通知了革聯會專政委員會（分管重慶市公檢法），請他們馬上派人去現場作好調查，拍照幷向現場人員瞭解情況，作好記錄，寫出報告。

後來我看到過他們拍的照片，羅廣斌的頭都摔破了，死的樣子很慘。

[1] 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代號後字 242 部隊，在重慶市大坪馬家堡。當時校內設有重慶軍事院校造反聯絡站、北航紅旗聯絡站等。

主持批鬥李井泉[1]

革聯會在成立大會召開過後，就從市人委搬到了原市委大院辦公。

按革聯會常委分工，我分管國防工業委員會和工業交通委員會。我的辦公室設在原國防工業政治部。已經在此處辦公的八一兵團總部，經過協商，就決定搬到市委大院對面的團市委辦公樓。八一兵團總部的工作，我不在時就由 2301 團（嘉陵廠）的廖明華和 2602 團（空壓廠）的謝武周負責。

這時，爲了表現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革聯會決定召開一次大規模的批鬥李井泉大會。李井泉這時正關在重慶大學，掌握在我們手裏，要批鬥很方便。

2 月 18 日晚，革聯會常委召開緊急會議，研究第二天批鬥李

[1] 李井泉，1909 年 11 月 1 日生，江西臨川人。文革爆發時爲中共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成都軍區政委（未設第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文革中 1966 年 11 月 13 日原擬在成都群衆大會上作檢查，大會被反對派造反後，趁亂潛往外地躲避。1967 年 1 月 18 日被重大八一五與西南局機關造反派聯合組成的小分隊從上海抓回成都，次日押到重慶大學關押審查。2 月 8 日寫出《關于我在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的檢查》。4 月 26 日由紅衛兵成都部隊押回成都批鬥。後被送到北京。5 月 7 日《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稱：“以李井泉爲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李井泉等人堅持執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職務，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撤銷李井泉的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1968 年 5 月 31 日四川省革委會成立時被中共中央定爲西南及四川的頭號走資派，6 月 2 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七千萬四川人民在前進——熱烈歡呼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中稱“中國赫魯曉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區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黃新廷之流”。1973 年被安排爲中共十屆中央委員。1975 年被安排爲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89 年 4 月 24 日去世。

井泉大會的準備工作。

本來這個大會是要在大田灣體育場舉行的，但是反對革聯會的一些組織搶先占據了體育場，聲稱要在那裏召開“反右傾”（批判重大八一五）的大會，爲了避免雙方發生衝突，革聯會主任劉潤泉果斷決定將批鬥李井泉大會改在長江邊的珊瑚壩上召開。

這樣臨時改變大會地點，時間已經很緊了，秘書處緊急組織人員布置會場。晚上的緊急會議上，劉潤泉聽取了秘書處的彙報，說已經在珊瑚壩選好地點，用許多大方桌拼接、捆綁起來搭成主席臺，兩側和背後都用布幔圍了起來，周圍的高音喇叭也已經架好，有關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語錄、標語、橫幅、旗幟等也都全部準備好了。劉潤泉聽後表示滿意。

在會上，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1]提出，大會司儀還是請陽增泰擔任更好，因爲八一兵團是正統的産業工人，是重慶工人造反派的主要代表。大家也都同意了。

珊瑚壩，是重慶火車站附近長江邊枯水季節時的一大片河灘地，抗日戰爭時期曾作爲戰時首都重慶的一處臨時飛機場，荒草中還能看見當時用石板鋪成的飛機跑道的殘迹。這個地方的面積比大田灣體育場要大好幾倍。

2 月 19 日一早，我就提前到了珊瑚壩會場，檢查有關準備工作是否還有什麽疏漏，我到處看後感到十分滿意。有關的工作人員都非常盡心盡力，工作做得很好。周圍各處架設好的高音喇叭

[1] 熊代富，時爲重慶大學冶金系 69 級學生，共青團支部書記，文革中 1966 年 8 月（21 歲）參加造反，任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總團勤務組成員，1967 年 2 月重慶市革聯會成立任副主任,6 月任八一五派革聯會常委班長。同年底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制止武鬥小組副組長。1971 年 4 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73 年 6 月任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中共重慶市委常委。7 月任共青團四川省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 1978 年下放基層，任長壽化工廠黨委副書記。1983 年作結論爲文革中“犯有錯誤，不給處分”。後回重慶微電機廠，1984 年晋升工程師。1987 年被作爲“三種人”開除中共黨籍幷撤銷一切職務。後離職經營私營企業。

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語錄歌曲和當時的革命歌曲，使整個會場的氣氛熱烈隆重。

批鬥李井泉大會于 1967 年 2 月 19 日上午 9 點正開始。開始之前，各群衆組織、各單位群衆已經陸續到達指定位置，後來據統計有 60 萬軍民參加。長江邊珊瑚壩上人山人海，紅旗飄揚，口號震天,群情振奮。這是重慶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次批鬥“走資派”大會，批鬥的也是級別最高的一個“走資派”。。

9 點正，我拿着秘書處寫好的大會程序單，走到司儀的麥克風前，高聲宣布：

“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押上來！”

在驚天動地的“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砸爛黑市委，建設新山城”等口號聲中，李井泉和西南局宣傳部長劉文珍、重

慶市委書記處書記魯大東[1]、廖蘇華[2]等“走資派”被紅衛兵押送到主席臺前，三個人押一個，押送的人還以當時流行的“噴氣式”將他們反剪雙手、頭往前低低地按下去，我看到這樣不好，就走過去輕聲交代：不要按頭。紅衛兵就鬆了手，不過李井泉等人還是自覺彎腰低頭站在那裏，表示向人民低頭認罪。

大會由二七戰鬥團總部代表、重大八一五代表、市委監委紅色造反者代表分別作了批判發言，都是事先已經過審查的稿子。他們的發言中不時響起一陣陣的口號聲。

參加大會的群衆大多沒有見到過李井泉這樣的高官，紛紛伸頭張望，指指點點，人聲鼎沸。大家主要是想看看“土皇帝”李井泉是個什麽樣子。

會後，由解放軍部隊開路，李井泉等人被押在車上進行了游街示衆。這是重慶人民第一次看到李井泉、魯大東這樣的大官被

[1] 魯大東，1915年3月生，河北館陶人。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4月加入中共，1937年10月參加革命工作。文革爆發時爲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重慶市政協主席、市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1966年7月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被《紅旗》文章點名批判後，受命主持市委日常工作，因“執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綫”一度被打倒。1968年4月中央首長在“四二七”指示中否決了五十四軍一直準備結合的前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後，魯大東才被正式提上“三結合”的議事日程，并爲其組織突擊寫出亮相檢查，揭發李井泉、任白戈“罪行”，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1969年10月任重慶市革委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1969、1973年分別在中共九大、十大任候補中央委員。1971年5月任重建的中共重慶市委第二書記。1973年12月任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文革結束後先後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第二書記、省長。1977、1982年任中共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後任中共四川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8年病逝。

[2] 廖蘇華，女，1904生。四川內江人。文革爆發時爲中共四川省委委員、省監察廳廳長、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監察組副組長、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兼監察委員會書記、重慶市副市長、重慶市政協副主席。1972年10月任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1978年5月任重慶市政協副主席。1984年9月5日逝世。

批鬥和游街示衆，所以游行隊伍所到之處都是人山人海。

實際上，這次大會和游行等于也是向反對革聯會的砸派示威，因此游行中宣傳車一直高呼的口號中有“革聯會好得很！”“堅持團結反對分裂！”“打倒山頭主義！打倒分裂主義！打倒小團體主義！”“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我在革聯會做的幾件事

1967 年 2 月 27 日，革聯會下午召開鬥爭前市委負責人魯大東大會，安排準備“結合”的前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1]在揭發、批鬥魯大東時“火綫亮相”。

結合辛易之，是五十四軍提出的，劉潤泉給我們講，五十四軍黨委瞭解了辛易之的歷史，認爲他是部隊上出來的，沒有歷史問題，在重慶市分管農業，下鄉時還下田幫農民插秧，作風樸素，工作很認真勤懇，雖然有錯誤，但不是黑幫。

當時群衆組織有了不同觀點後，都按照毛主席語錄中“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教導，對領導幹部采取你保我就打、你打我就保的態度，因此砸派知道我們要結合辛易之，就堅決要打倒辛易之。爲防止砸派衝擊

[1] 辛易之，1917 年生，河北南皮人。高中文化程度。1938 年 2 月在南皮縣參加冀魯邊三十一游擊支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文革爆發時爲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分管農業）。文革中 1966 年 8 月 15 日因代表市委出面處理“八一五”事件，被重大八一五視爲“鎮壓八一五事件的劊子手”。但 1967 年“一月奪權”時，五十四軍認定其爲革命幹部，向八一五派推薦將其作爲結合對象，并安排奪權後建立的革聯會于 2 月 27 日召開鬥爭前市委負責人魯大東大會，讓辛易之在會上揭發、批判魯大東，作“火綫亮相”。後因八一五派（特别是其中的市委機關幹部）內部對結合辛易之仍有分歧，加上革聯會未獲中央承認，辛易之的結合暫未成爲事實。1968 年中央首長“四二七”指示中指責辛易之“滑頭滑腦”，更使他難于得到結合。後只好調離重慶，調任四川省西昌地委書記。文革結束後先後調任內江地委書記、四川省財辦副主任、省人大常委會常委、財經委員會主任等。2009 年在成都病逝。

會場造反，五十四軍在會場附近向陽街（上清寺）地區實施局部戒嚴。

按劉潤泉的指示，我打電話叫八一兵團總部田林森到革聯會來，由劉潤泉當面交代任務：調八一兵團上萬人員，將後字 242 部隊紅總爲首的砸派隊伍，包括打着“首都紅代會駐渝聯絡站”旗號的首都三司、一司的人員攔截、阻隔于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和上清寺一帶兩個小時，不讓他們去衝擊會場造反。

在那段時間裏，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因爲當時批鬥走資派是“大方向”，隨便哪個群衆組織都可以揪鬥領導幹部，一些市委領導幹部被揪過去揪過來，誰也不好阻攔干涉，我們還發現有的群衆組織在批判或游鬥領導幹部時搞體罰、武鬥，十分粗野、殘酷，有人在以“噴氣式”强迫被鬥者彎腰低頭時，把向後扭的胳膊都要扭脫臼了，强按頭的手手指都要摳到被鬥者的眼睛了……爲了防止在混亂中有不懷好意的人給原市委領導幹部（特別是我們準備要結合的幹部）下毒手，劉潤泉曾指示我，暫時將辛易之、廖蘇華秘密送到國防系統較安全的單位去保護起來。

我考慮過後，選中了南桐礦區的平山機械廠，那裏比較僻靜，遠離鬧市，較好管理。我親自隨車把辛易之、廖蘇華送到了平山機械廠，交給八一兵團的下屬分團 1701 團。當然也叫他們在那裏組織了對辛易之等人的批判會，以表示緊緊掌握大方向。

我在革聯會常委中分管國防工業，我想首先得把十大軍工廠的“抓革命促生産”搞好，消滅一段時間以來的無政府狀態，儘快恢復正常的生産秩序，保證完成國家下達的各項生産任務。于是我決定召開一個“抓革命促生産經驗交流會”，讓我們朝陽電機廠來介紹一下如何搞好“三結合”、如何“抓革命促生産”的經驗。

我通知朝陽廠八一兵團 2007 團的勤務組作好準備後，在革命大禮堂（原市委小禮堂）主持召開了由八一兵團各分團負責人和各大軍工廠的一些領導幹部（書記或廠長）參加的經驗交流會。在會上，朝陽電機廠的原副廠長李文達講了他如何支持革命造反派，如何與造反派一起搞好抓革命促生産的體會，八一兵團 2007

團勤務組李華權介紹了在廠裏奪權後如何依靠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群衆，搞好抓革命促生產的一些做法。最後我作了一個總結。

在“砸爛”聲中挨打

這時，首都紅代會的紅衛兵到建設廠鼓動砸革聯會，他們與該廠原八一兵團的一個頭頭周應古統一了觀點，在該廠勞動村球場召開辯論大會，想拉更多的人加入砸派隊伍。擁護革聯會的該廠八一兵團頭頭姚永年認爲周應古是在搞分裂，帶領一些人跟周應古進行了大辯論。姚永年個性耿直，說話如“炮筒子”，因該廠八一兵團另一頭頭外號叫陳大炮[1]，姚永年的外號就叫姚二炮。

我在八一兵團總部接到該廠打來的電話，立即叫總部的田林森向附近幾個分團打電話，調集隊伍去建設廠聲援我們這一派。

我本人隨同 2007 團前去，親自帶領隊伍衝擊砸派的廣播車，不准他們“放毒”。我衣服被撕爛，圍巾被撕成兩塊（只撿回一塊），人也被打得鼻青臉腫。由于我們人多，還是把對方打跑了。

4 月初，全國開始反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即“二月逆流”），革聯會因爲在前一段的“鎮反”中鎮壓了西師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革命小將，顯得有些被動。砸派趁機起來攻擊革聯會成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工具”，一些原在革聯會中的群衆組織如二輕兵團，也在革聯會副主任王紹川主持召開的歡迎炮轟革聯會大會上公開提出要“砸爛革聯會”，并從革聯中拉出了隊伍。那次炮轟大會我可能沒有參加，沒有一點印象。

4 月底，砸革聯會已經掀起高潮。那天我正在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辦公樓看市統計局報來的各大軍工廠生產完成情況報表，

[1] 陳忠文，外號陳大炮，1940 年生，文革爆發時爲國營建設機床廠 43 車間工人，參加造反後任八一兵團 6657 團負責人（分管後勤）。1968 年 6 月 15 日代表八一兵團到江北縣洛磧鎮參加慶祝涪陵紅聯司成立一週年大會，其間出現腹瀉嘔吐症狀，送回重慶後 26 日午 2 點因中毒性休克（出血熱）送第七軍醫大搶救，27 日淩晨因空回腸壞死、搶救無效去世。當時傳說被下毒致死，但無實據。

忽然聽見外面市委大院大門口一片喧嘩，我跑出去看，原來是一群砸派正在往大院裏衝，嘴裏高喊着：

“砸！砸！砸！砸爛僞革聯！砸！砸！砸！砸爛僞革聯！……”

就這麼一句話反復不停地喊。大門口值勤的解放軍戰士拿着《毛主席語錄》，手挽手組成人墻進行阻攔，可是衝擊的人群十分凶狠，拼命要衝進來，還動手打人，有的解放軍戰士被打得頭破血流。旁邊看的人群中有的婦女竟被嚇哭了。我看到一個市委機關的一般幹部被這陣勢嚇得邁不開步了，怔在那裏不能動彈，雙腿打抖。我從後面推了他一把，他才走開了。

因爲當時解放軍執行“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紀律規定，所以守門的戰士根本無法抵擋那些執意要衝擊的人群，戰士的防綫終于被衝開，人群潮水般地擁了進來，占據了市委大院內的空地，在辦公廳大樓前開始“靜坐示威”。他們唱歌，呼口號，進行宣傳，甚至晚上還拿了電影放映機來放露天電影，以吸引更多的人。

5月1日，一些砸派組織的武鬥人員衝砸革聯會，有的還衝進了革聯會辦公大樓（原市委辦公廳大樓）進行騷擾。革聯會常委黃履忠[1]（重鋼的代表）放在辦公室的錢和糧票也在混亂中不見了。我同他去找那些人討要，雙方爭吵起來，還發生了扭打，我的鼻子被打破，後由劉潤泉的軍人秘書送我去三院醫治。

第二天，5月2日天亮前，革聯會開常委會，劉潤泉說，不能讓這個局面繼續下去了，嚴重影響革聯會的工作。最後決定通知各群衆組織調人來，把砸派先包圍後驅逐，三個抓一個也得把他們扔出大門。會議決定由我負責調遣指揮。

我到八一兵團總部所在地團市委，打電話給附近各廠調遣隊伍，朝陽廠和無綫電廠的來得最快，開了幾車人來。頭頭找到我，

[1] 黃履忠，1938年7月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鋼鐵公司鑄鋼車間助理技術員。中共黨員。參加造反後任重慶九八戰鬥團勤務員。1967年2月重慶市革聯會成立任常委。後任鋼鐵八一五勤務員。1968年底重鋼公司革委會成立任委員。

我把劉潤泉的意思給他們傳達了，他們說沒問題。馬上行動。

這時已經是大約淩晨4點鐘左右。八一兵團的人衝進砸派靜坐的場地，兩三個人抓一個，把那些砸派一個個都拖到市委大院大門外面去了。

我們朝陽廠八一兵團的還把砸派的一輛汽車和電影放映機都收繳了（後來汽車交給了警司），電影機被我們廠的人拿回去，以後就用來在化龍橋放露天電影給群衆看。

那天，我們朝陽廠的八一兵團繳獲了砸派242紅總的汽車，十分高興，許多人擠着坐在車上開回廠去，車厢裏坐滿了，有的人就站在駕駛室兩邊踏板上，還有的甚至坐在車頭車燈處。開車的是個“黃司機”（當時稱那些沒有駕駛執照自己學着開車、技術還不過關的人爲“黃司機”），又不直接開回廠去，還往大坪、石橋鋪那邊去耀武揚威轉了一大圈，結果樂極生悲，在車子行駛途中拐彎時出了意外，一個坐在車燈處的青年工人彭治國被摔了下來，頭部撞到路邊石頭上，不幸身亡。八一兵團專門在人民大禮堂爲他開了個追悼會，還給他家屬發了“烈士證書”。

堅持保革聯會不動搖

隨着全國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重慶砸革聯會的風潮也越來越大，影響到我們隊伍內部也發生了動蕩和分化。

我們朝陽電機廠的副廠長李文達是部隊轉業的，他是一開始就支持造反派的，被我們作爲革命幹部結合到奪權後的領導班子裏來。

4月初的一天，他打電話把我請到他家裏去。我一去，他就熱情地給我倒茶，請我坐下後，他問我，對我們廠裏實行軍管有什麽看法，我說，對軍工企業實行軍管，是中央的決定，全國都要執行。

他說，我們過去軍管哪裏是這樣搞法？現在連群衆組織寫個標語也要他們審查通過。本來只是在廠裏檢查産品質量的駐廠軍代表也搞起軍管來了。造反派奪到手的權都被他們又奪走了。說

到這裏，他意味深長地對我說：“你在外面忙忙碌碌幹革命，說不定哪天自己腦袋掉了都不曉得是怎麼掉的！”

我有些不解，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你還不知道？這次鎮反，廠裏準備抓的第二個人就是你！”

我聽了很是吃驚，問：“第一個是哪個？”

李文達說：“第一個要抓的是鄒新峰。你到團部去問就知道了。”

鄒新峰也是我們廠的生產調度員，他是砸革聯會一派的。

李文達這樣一說，我的火氣一下就冒上來了。我想，我在市革聯會辛辛苦苦幹革命，居然還有人在背後整我的黑材料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我馬上把八一兵團 2007 團勤務組成員找到一起開會，把軍管會主任董治朴找來質問。董治樸說沒有那個事，他根本就不曉得，他也從來沒有整過我們的黑材料。但是我們不相信他的解釋，把他拉上到革聯會生產指揮部去告狀。在生產指揮部主持工作的許政委出來接見了我們，勸說大家回去，相信問題能得到很好解決。

這件事驚動了五十四軍黨委，因爲當時把矛頭對準軍管會，并把軍管會主任拉去告狀的，全市還只有我們朝陽廠一家，加上我本身又是革聯會常委，影響就更大了。

第二天，白斌[1]副軍長親自來到我們廠裏，給大家做工作，并向大家保證，決不會隨便抓人。

又有一天，我剛從市委大門出來，在路邊碰到了廠裏的一個車間主任林坡。他叫住我，說要跟我談談。我又倒回去，帶他到了國防工業政治部樓上的辦公室。

---

[1] 白斌，1921 年生，河北安新人。1938 年加入中共。文革爆發時爲駐重慶的陸軍第五十四軍副軍長。1967 年 5 月 16 日由中共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意見》任命爲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8 月調離重慶任國防科委第 21 基地司令員。1971 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後曾被審查。文革結束後不實罪名被推翻，1983 年 6 月至 1985 年 6 月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1990 年 11 月 7 日在濟南逝世。

他問我："現在革聯會的權，到底是你們在掌還是警司在掌？"

我說："革聯會班長劉潤泉是警司的政治部副主任，事情都是大家一起開會商量的……"

他不以爲然地說："你們開會有個屁用，人家把什麼都定好了才拿來要你們通過一下。你們不過是配盤的！重慶這次鎮反抓人，抓了那麼多造反派，你們知不知道？"

我說我沒有管那方面的工作。他笑道："你呀，什麼時候自己腦袋掉了都還不知道是怎麼掉的！"

我覺得他這樣說太小看人了，心裏不大痛快，就說了些相信解放軍、依靠解放軍的話。

大概他對我的腦筋不開竅有點失望，找我要了些革聯會的文件翻看了一下，就走了。

他走後，我想，這個林坡，今天不知是哪股風把他吹到革聯會來了。林坡是從部隊轉業下來的。文革初期廠裏有人寫了他的大字報，批判他的一些"反動言論"，說他1957年在部隊上曾被劃爲"中右"，以後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受批判的"運動員"，在我們剛起來造反的時候，認爲他屬于受迫害幹部，曾經找他請教一些事情，但他一句話都不願意講，好像生怕被說成我們的後臺。現在却突然關心起造反派的命運來了。聽他的意思，就是五十四軍有問題，想煽動我反軍。我可不上他的當。

過了不久，一天革聯會的人轉告我，說我們廠裏來電話要我回去。我回去後，我妻子蕭華勛告訴我，是李文達找我，叫她打的電話。

李文達聽說我回來了，親自跑到我家裏來。他先表揚我，說我上次回來抓董治樸到工業生產指揮部去，幹得很好，把群衆都發動起來了。然後他問我："革聯會裏面，劉潤泉怎麼樣？"

我說："劉潤泉作風很民主，每天都跟大家開會商量，一點官架子都沒得。"

李文達問："他住在革聯會嗎？"

我說："他每天晚上回五十四軍去住。"

李文達說："現在看來，革聯會實際上就是五十四軍在掌權。

你們這些群衆代表都只是陪襯。”

接着他說，五十四軍在文革中是有問題的，他們的軍長韋統泰，先是支持思想兵[1]，給思想兵當總輔導員，執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現在又支持革聯會，實際上思想幷沒有轉過來，對他們以前的錯誤也沒有做過認真的檢查。這次鎮反，又在大抓造反派。

他又說，他在部隊的戰友來信告訴他，現在軍隊中的問題很大，中央已經提出了，“帶槍的劉鄧路綫比不帶槍的劉鄧路綫更危險”。他認爲重慶的五十四軍肯定有問題。他說，你在革聯會裏工作，應該瞭解許多情況，應該站出來揭發。他給我分析形勢，勸我離開革聯會，“殺出來”，參加砸派。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明確對他說：“李廠長，我看不出五十四軍有什麽問題。這次鎮反，可能有些地方打擊了造反派，但到底是不是軍隊的問題？恐怕還要調查瞭解。即使有些錯誤，也不是大局。一個新生紅色政權剛剛建立起來，肯定會有不成熟的地方，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從愛護、支持的立場出發來看問題。革聯會畢竟是‘一月革命’的偉大成果，是我們山城八一五派共同建立起來的。五十四軍支持革聯會，也是符合毛主席關于人民解放軍‘支左’的教導的。我們的國家是黨指揮槍，軍隊都是聽黨領導、指揮的。即使個別軍隊幹部有錯誤，也可以通過組織程序進行處理。解放軍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柱石，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們不能反對軍隊，反對軍隊等于反對我們自己。軍隊不能亂，軍隊亂了就危險了……”

李文達看到不能說服我，只好閑聊了一陣，告辭走了。此後就再也沒有找過我了。

後來我得知，在此之前，李文達已經把我派到八一兵團總部

[1] 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 1966 年 8 月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興起後，中共重慶市委通過市學聯授意大、中學校建立的由“紅五類”子女組成的官辦學生組織，後被民衆譏稱爲“思想兵”。當時曾由重慶市委提議，經解放軍成都軍區批准，重慶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即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門擔任重慶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總輔導員。

的兩個聯絡員萬同銘和田林森都說動了，他們變成了砸派觀點。這時，這兩個人也動員我站到砸派這邊來，還說："你放心，你到砸派這邊來，我們還要推你到市裏面去負責。"

但是不管他們怎麽勸說，我都沒有同意。

在這個問題上，最重要的是我對軍隊的態度。

我對解放軍是一直很熱愛的。解放軍解放郫縣的時候，我十三歲，看到解放軍跟國民黨兵不一樣，國民黨的兵把我們菜地裏的菜砍起就走，跟土匪差不多。解放軍就不一樣，公平買賣，態度十分和氣。在我娃娃的心中就留下了良好印象。後來我曾經想參軍，因廠裏不同意沒有如願，成了我一生中的遺憾。這次文化大革命起來造反，得到解放軍的支持，在革聯會裏得到解放軍的領導，跟解放軍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榮幸。所以我認爲反軍不行。共産黨打天下就靠的解放軍，反軍就等于反共産黨。我接觸的軍隊幹部，不管是劉潤泉，還是五十四軍的郝處長，蔡處長，張處長，到警備區去，藍亦農[1]，謝家祥政委（後來調到成都軍區去了），韋統泰軍長，都很好，說話都很客氣。我覺得他們沒得問題。說他們有問題，我看不出來。我認爲他們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決不是反毛主席的，不是什麽"帶槍的劉鄧路綫"。

---

[1] 藍亦農，1919 年生，湖南茶陵人。1938 年加入中共。1960 年晋升大校軍銜。文革爆發時爲駐重慶的陸軍五十四軍副政委。1967 年 5 月 16 日由中共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意見》任命爲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1967 年 7 月升任五十四軍政委。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主任。年底因部隊移防調離重慶，後任昆明軍區副政委、軍區黨委副書記、昆明市革委會主任。1969 年中共九大上被安排爲候補中央委員。同年 10 月被中央任命爲中共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代理組長、省軍區第一政委。1971 年 5 月任重建的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同年"九一三"事件後，1972 年 9 月 15 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地、師級領導幹部批林整風彙報會議總結提綱》，稱藍亦農與貴州另一領導人"站在林彪反黨集團一邊，犯了方向、路綫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藍亦農同志的錯誤更嚴重"。1973 年 8 月至 1980 年 7 月下放工廠學習、勞動。文革中所定罪名被推倒後，1983 年 5 月至 1985 年 6 月任昆明軍區顧問。2008 年在北京病逝。

“紅五條”的二、三條讓我們想不通

從 1967 年 4 月開始，我們就聽說中央在召開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從北京不斷傳來各種的消息，街頭上經常貼出各群衆組織的《北京來電》，傳出各不相同的小道消息，都說中央是支持自己這一派的。不過，我們從內部得到的消息是，重慶的八一五派在北京不如砸派受歡迎。因爲首都紅代會的許多組織支持他們。特別是在中央否定“二月逆流”之後，一些在“二月鎮反”中被抓被鬥過的人跑到北京去，控訴革聯會鎮壓造反派，重大八一五就被宣傳成了“修正主義集團”、“叛賣集團”、“新老保”等等。但是聽劉潤泉說，五十四軍的主要領導都到北京去向中央彙報去了。我們相信中央會聽五十四軍意見的。

5 月 16 日，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意見》即“紅五條”正式下達。使我們非常失望的是，其中隻字不提革聯會，而是另外決定建立一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當“紅五條”的正式文本傳來後，砸派欣喜若狂，馬上于 5 月 17 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游行。而我們八一五派的許多人，特別是我們在革聯會工作的人們，都震驚、憤怒了。

5 月 17 號那天，聽着外面一陣陣傳來的砸派歡慶勝利的口號聲與廣播聲，革聯會裏的人們焦躁不安，議論紛紛。大家都忿忿不平地說，“紅五條”是中央根據四川省革籌組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四人的意見作出的。張、梁是分別從西藏、廣州調到四川來的，劉、張是剛由中央宣布平反的原四川宜賓的地方幹部。他們四個人，又沒有來過重慶，也沒有接見過我們八一五派的代表聽取意見，剛剛才就任新職，這樣匆忙做出的決定，能正確反映重慶廣大革命群衆的意願嗎？特別是第二、三兩條，我們認爲有問題：

第二條中說重慶駐軍“在處理持有不同意見的革命群衆組織的關係問題上，錯誤地支持了一方，壓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門錯捕革命群衆，把一批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這不就是

砸派攻擊駐軍“支一派壓一派”的調子嗎？砸派反軍，把鬥爭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難道不該打擊壓制？

第三條中提出建立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却隻字不提已經在“一月革命風暴”中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革聯會，實際上等于就是否定了重慶革命造反派與駐軍聯合奪權建立的革聯會，否定了“一月革命”的偉大成果。

這樣的決定怎麽能讓我們想得通呢？

5 月 17 號晚上，我們經過緊急討論，決定與砸派針鋒相對，公開表明我們的態度，于 5 月 18 日在大田灣體育場召開捍衛革聯會的誓師大會，表示要“誓死捍衛一月革命偉大成果”，要“與革聯會共存亡”，“堅決打退反革命逆流”……

我積極支持召開這個向中央表示抗議的“五一八”大會，我也認爲“紅五條”的二、三條“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應該修改。

5 月 18 日的大會在群情激憤中召開。會上八一五派各組織的發言全是表示要捍衛革聯會的，沒有一個是表示擁護中央五條的。所以砸派稱我們這個大會是“炮打中央的反革命黑會”。

會後，我們把革聯會的牌子抬到汽車上，立得高高的，舉行了環城游行。廣播車上的高音喇叭一路呼喊着慷慨激昂的口號。

游行結束後，我在大家的情緒鼓動下，還組織八一兵團 65 團（江陵廠）等單位的上千人，我親自帶着，跑到菜元壩火車站，打算强行乘車上京告狀，要求中央修改“紅五條”的二、三條，給中央施加壓力。

重慶警司得知後十分着急，劉潤泉急忙派人來找到我，給我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叫我勸說大家不要那麽幹，苦口婆心地開導我：過去警司支持革聯會，派了他來擔任班長，現在由中央任命的革籌組，是由警司藍、白首長主持工作，說明中央對重慶警司是信任的，而且現在的革籌組是中央正式任命的，比革聯會更上一層樓了。這不是更好嗎？總之，給我講了許多道理。

我對解放軍的話是堅決聽從的，冷靜一想，重慶警司的態度是明確支持我們的，這不就行了？跟着解放軍不會錯。何况當時還流行林彪的一句名言：“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暫

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于是，我就通知大家從火車站撤走。不過後來聽說還是有少數人上火車走了。

在市革籌工業生產指揮部

“紅五條”正式公布後不久，革聯會主任劉潤泉召開全委會，組織大家學習了中央的決定。他宣布：中央批准建立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革聯會的歷史使命已經勝利完成了，就不能再行使臨時權力機構的職能了，有關工作全部要移交給新成立的市革籌組。

6 月 12 日，重慶市革籌組正式辦公，當天，重慶市革籌組與解放軍重慶警備區聯名發出《聯合通知》，宣布了制止武鬥八條禁令。

從此革聯會就交出了權力，但這個機構幷沒有解散，而是轉變爲八一五派的全市性指揮機構，重慶市革聯會改稱“八一五派革聯會”。

在此之前，也就是在“紅五條”下達過後不久，五十四軍派到革聯會來的軍隊幹部就陸續撤回去了。劉潤泉離開後，革聯會的班長改由原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擔任，副班長還是王紹川，但王紹川這時因被砸派抓住其“家庭出身”進行攻擊，情緒有些低落，很少出面主持工作了[1]。

革聯會辦公從市委大院搬到了附近的市委第一招待所一號樓，二號樓是革聯會情報資料搜集彙總的地方，三號、四號樓是

[1] 王紹川的父親原爲鄉村教師，一度當過鄉長，因反對抓壯丁與當地駐軍發生矛盾被迫逃到成都靠賣畫爲生。爲讓鄉間老母生活有經濟來源，花錢買了些地，以地租供母親養老。爲此而在土改時被劃爲“地主”成份。文革中五十四軍支持造反派奪權時，調看了王紹川的檔案，認爲他是部隊培養的黨員幹部，值得信賴，動員他打消對“家庭出身”的顧慮到革聯會擔任副主任。在“砸爛革聯會”風潮中，砸派即抓住王紹川的“家庭出身”問題攻擊“革聯會是地主階級孝子賢孫掌權”。

工作人員住宿處。那裏的床是鋼絲彈簧床，我睡上去很不習慣，睡一覺起來腰都要痛好久。我享不來那個福，乾脆到鍋爐房去搭了個木板床，自己在那裏睡。

市革籌組正式辦公後的一天，藍亦農的秘書小楊通知我到市總工會去，說白斌副軍長在那裏等我。

我到了總工會辦公樓，找到白副軍長，他對我說，現在市革籌下面要成立一個工業生產指揮部，指揮部的領導班子也要三結合，由白斌代表軍隊，岳林[1]代表革命幹部，我代表革命群衆組織，組成市工業生產指揮部的領導班子，統一領導全市的工業生產。

市革籌工業生產指揮部一直工作到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時撤銷。在這期間，我印象較深的是我參與了這樣兩件事——

一件事是修建北碚朝陽橋。嘉陵江上，文化大革命以前只有從市中區上清寺修了一座通往江北區的大橋，北碚那邊，從北碚到施家梁這一段江面上，南來北往的人員、貨物都很多，全靠過江輪渡運送，交通十分不便。我們工業生產指揮部研究後，決定在那裏修一座大橋，這就是重慶市第一座大型鋼索吊橋朝陽橋，于 1969 年國慶前夕建成通車。

另一件事是加修一條到機場的公路。當時從重慶市區到白市驛飛機場，往返只有一條公路，要翻越歌樂山，路況不好，經常發生車禍。工業生產指揮部經多次研究，決定在歌樂山下另外修一條公路，讓到飛機場的車輛往返單向行駛，這樣大大減少了車禍的發生。

雖然現在來看這樣的事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要想到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大動亂、大規模武鬥已經開始的日子裏研究決定并克服重重困難完成的。現在回想，這使我感到欣慰，說明我陽增泰那時也并不是只幹了指揮武鬥這樣的壞事、傻事，也還是幹了點爲山城人民造福的好事。

---

[1] 岳林，文革爆發時爲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文革中 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1971 年 5 月任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1972 年 10 月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1979 年病逝。

當時工業生産指揮部還召開了一些抓革命促生産的座談會，如煤炭系統座談會，工業交通座談會等，但是都因爲很快就爆發了兩派大規模武鬥，整個社會秩序陷入混亂，工業生産自然難以按計劃進行了。

第三章 一步步走進“全面內戰”

下令停產增援武鬥

“紅五條”規定：“重慶市各革命組織應當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指向重慶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任白戈[1]及其一小撮同夥。”并要求兩派群衆組織“雙方的爭論應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進行解決，不准武鬥，不准打、砸、搶、抄、抓。”

可是，“紅五條”傳達下來後，重慶兩派不但沒有停止爭吵，反而吵得更厲害了。砸派罵我們是山城的“新老保”，“二月鎮反的打手”，我們罵砸派是“顛覆新生紅色政權的暴亂集團”、“左左派”……在圍繞着砸革聯會還是保革聯會、堅決擁護五十四軍還是攻擊五十四軍等問題上，各執己見，互不相讓。群衆性的辯論、爭吵很快就發展成謾罵、鬥毆，互砸廣播車，小型的拳脚武鬥不斷發生，單是5月份，據我當時知道的就達數十次之多。

6月2日，江陵機器廠兩派發生衝突，該廠的八一兵團65團頭頭周慶華打來電話，要求革聯會派人增援。

我聽說八一兵團的人被打了，十分氣憤，馬上召開了八一兵團總部緊急會議，叫人起草了一個特急命令，要八一兵團各分團停產出去增援江陵廠。我在盛怒中，揮筆在命令上簽上了“同意停產支持”幾個字，還加蓋了“革聯會國防工業委員會”的大印。

大概是因爲“紅五條”剛剛下達，我簽署的這個“停產支持”

[1] 任白戈，時爲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重慶市市長。

的命令又太違背“抓革命促生產”的原則，所以八一兵團下屬分團接到命令後基本上都沒有響應，派不出人來。我見遲遲無人去增援，又調動江北地區的紅農八一五和其他一些組織派人去增援。

後來得到消息，說我派去的人完全沒有準備，不知道這時武鬥已經發展到用棍棒了，他們就被砸派打散了。

熊代富被抓

1967 年 6 月 6 日，中央發出了制止武鬥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通令》，宣布：“爲了維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保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保護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正常進行，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混水摸魚，乘機搗亂，特發出以下通令”，通令共有七條，第四條中明確規定：“嚴禁武鬥，嚴禁行凶打人，嚴禁在本單位和到外單位打群架，嚴禁搶奪個人所有的財物”。因這個通令是 6 月 6 號發出的，被稱爲“六六通令”。

正當我們準備布置貫徹“六六通令”的時候，6 月 7 號，西師春雷造反兵團的兩個女同學跑到革聯會來求援。春雷造反兵團是在“二月鎮反”中西師八三一縱隊被宣布爲反動組織解散後，由八一五派支持西師一些師生建立的一個群衆組織，得到北碚駐軍（五十四軍炮團）的支持，春雷的成員中，有從西師八三一中分化出來的一部分老的造反派，也有原來屬于保守派的一些師生。西師八三一在 4 月份恢復活動以後，就視春雷爲眼中釘，稱之爲“老保的變種”、“資本主義復辟的產物”，而春雷當然不服，認爲西師八三一反軍、搞分裂，犯了錯誤，自己一點沒有認識。雙方矛盾難以調和，衝突越來越大，這一次，聽春雷來的學生說，是他們的人在西師一個新建的圖書館大樓裏，被八三一的人包圍了，八三一要把他們的人趕出去，他們的人在裏面堅守，但是很困難，已經退到二樓以上了，有不少人受了傷。

革聯會班長熊代富通知我和申平[1]、唐忠明[2]、葉臻榮[3]等，悄悄到師專開了一個會，研究決定先組織第一梯隊，由熊代富帶隊，親臨現場制止武鬥，把西師春雷被圍困的人解救出來；叫我調集八一兵團人員組成第二梯隊，準備接應。

熊代富走後，6月8日，由革聯會在解放碑召開了“堅決擁護認真貫徹中央‘六六’通令誓師大會”，八一兵團各分團都來了人員參加。

會後，我將八一兵團的這幾百人用汽車拉到重慶大學第七教學樓（當時稱爲“串聯大樓”），組織第二梯隊，準備到西師去增援春雷。中央“六六”通令的精神就是反對武鬥，我們當然表示擁護，但是我們那時的思想認爲武鬥是混進砸派中的階級敵人挑起的，我們反對的是他們搞武鬥，“六六”通令中明確規定了：“由各地衛戍部隊和駐軍負責保證上述各條的執行。自即日起，對于違犯上述各條的，都應該嚴加處理。對于肇事者和背後挑動者，對于打死和打傷人的凶手，衛戍部隊和當地駐軍，有權逮捕和拘留，依法懲處”，然而砸派却把制止武鬥的解放軍都打了、抓了，難道這背後不是有階級敵人在挑動嗎？我們必須“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所以我們并不覺得八一五派方面建立武鬥

[1] 申平，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市機電公司業務員。參加造反後任機電公司八一五派及物資局系統物資兵團負責人。1967年夏任八一五工總部勤務組班長，後因與重大八一五發生分歧，被視爲要走“第三條道路”，被“整風”下臺。文革結束後被作爲“幫派骨幹”勞教三年。回原單位工作後以高級經濟師退休。已病故。

[2] 唐忠明，1944年生。文革時爲重慶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66級畢業生，共青團員。參加造反後任師專八一五戰鬥團主要負責人。後任八一五派革聯會武衛司令部參謀長、文攻武衛總司令部參謀長。文革後期調重慶市公用局人民交通公司汽車修理廠當工人。文革結束後被作爲“幫派骨幹”勞教三年。後到技校任教。退休後從事民辦高校教育工作。

[3] 葉臻榮，1944年1月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68級學生。共青團員，復員軍人。參加造反後任師專八一五戰鬥團負責人、八一五派革聯會常委副班長、文攻武衛總司令部副政委。後任重慶師範專科學校革委會副主任。後分配到重慶造漆廠。已病故。

組織、進行武鬥準備有什麽不對。

就在這天下午，我們還在等候熊代富那邊的消息，準備去增援時，重大八一五總團頭頭秦安全[1]和楊仁義[2]（老師）緊急召集我們開會，向我們憤慨地通報了從北碚跑回來的重大同學報告的情況：

熊代富他們去後，終于趕走了西師八三一圍困春雷的武鬥人員，救出了春雷的人。今天早上，當熊代富他們從北碚返回時，走到施家梁，被大批砸派包圍追打，跑回來報信的同學是跳進嘉陵江裏游泳逃出來的。熊代富已經被砸派抓去了。聽說還有制止武鬥的解放軍也被打被抓了。

我們聽到這樣的消息，真是肺都氣炸了！我原以爲還是像那次將砸派驅逐出市委大院一樣，去一些人，三個抓一個，不費多少事就可以解決問題……沒想到事情竟會變成這樣一個結果。看來這時的武鬥已經升級了。

我把八一兵團在重大的人員召集起來，發表了憤慨的演說，我向大家介紹了熊代富被抓的情況，說：重大八一五是山城造反派的驕傲，熊代富是革聯會的班長，他這次被抓，而且聽說是被軍工井岡山的人抓的，這是我們八一兵團沒有盡到責任，是我們的奇耻大辱！也是八一五派的重大損失！我們一定要報仇雪恨！

隨後，秦安全跟我說，要我們八一兵團這幾百人留下來，駐

[1] 秦安全，1940 年 7 月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大學無綫電系 66 級（五年級）學生，校學生會幹部。參加造反後任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總團勤務組成員、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負責人、重大八一五對敵鬥爭領導小組組長。1967 年底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畢業分配到重慶無綫電廠，後調四機部某研究所。文革結束後被清查。後任中國計算機軟件與技術服務總公司工控部經理、高級工程師。長期從事計算機與自動化研究工作，曾作爲總設計師和課題負責人，先後承擔國家自動化工程項目 20 多個，有多項成果獲部級以上獎勵。

[2] 楊仁義，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大學機械系助教。參加造反後任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總團勤務組成員、重慶教工革命造反總部負責人、八一五派革聯會武衛司令部參謀長。文革結束後被清查。後因 1988 年“一•一八”重慶空難不幸身亡。

守重大串聯大樓，組織大家訓練，應付以後的武鬥。

建立革聯會武衛司令部

6月9日，我還在爲熊代富被抓走的事氣憤難平，接到革聯會通知進城開會。

在市委大院內三號樓，原市委書記處書記廖蘇華的住宅底樓，召開了一次八一五派各大組織的全市性會議。會議由重大八一五周家瑜和師專八一五葉臻榮主持，確定要吸取西師“六五”事件的教訓，由周家瑜代理熊代富任革聯會班長，并以周家瑜爲首組成革聯會武衛司令部。

這是八一五派最早的專門對付武鬥的指揮機構。

這個武衛司令部的人員分工是：

司令：周家瑜，

參謀長：楊仁義（重大老師）、唐忠明（師專八一五負責人），

秘書：韓樂渝（重大學生），

後勤：鄭忠、劉陵川[1]、劉萬秋，

我和楊大渝[2]、申平三人爲前綫指揮。

辦公地點以革聯會常委秘書組代辦公室。參謀部設市委交際處二號樓。後勤、指揮回各自兵團組織實力，聽從調令。會議要

[1] 劉陵川，1941年生。文革爆發時爲四川省汽車運輸公司22隊保修工。參加造反後任八一五派汽車兵團負責人。1968年3月15日中央“三一五”指示後發起組織了八一五派“忠于毛主席聯絡站”（簡稱“忠聯站”，主張承認錯誤，與反到底派聯合）。在八一五派內部遭到孤立，但得到四川省革籌組的支持。5月31日四川省革委會成立任委員。

[2] 楊大渝，1943年6月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人民交通公司修理廠工人，共青團員。參加造反後任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司令部二分團勤務組組長、八一五派工總部常委。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委會成立任委員。後任重慶市人民交通公司革委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作爲“幫派骨幹”勞教三年。已病故。

求各兵團總部相應組織武鬥班子。

我回到重大第七教學大樓，根據這個會議精神，同八一兵團總部頭頭謝武周、廖明華、張逸等人商量，決定正式建立一個八一兵團專門從事武鬥的“野戰司令部”領導班子。這個班子的組成人員名單，在我文革後期的交代材料中有詳細記載，現轉錄于下（其中有些人我已經想不起是哪個單位的了）：

八一兵團野戰司令部組成人員——

司令：陽增泰、湯少成[1]（嘉陵廠）、李思全，

政委：方文正[2]（空壓廠）、張逸（紅光廠，華鎣山地區八一兵團一分部，張逸回廠後由方文正一人擔任），

參謀長：廖明華（嘉陵廠），

司令部秘書：李志霄，

後勤：謝武周（空壓廠）、朱君桃，陳德然（無綫電廠），

---

[1] 湯少成，文革爆發時爲國營嘉陵機器廠 12 車間工人。復員軍人（原爲從國民黨部隊加入解放軍部隊的“解放戰士”）。參加造反後任八一兵團 2301 團武鬥隊負責人、八一兵團總部野戰司令部負責人。1968 年中央“八一五會議”上因武鬥殺人（涉嫌主使槍殺了八一兵團內部一對所謂“內奸”夫婦）問題受到清查，被關押審查多年。後病故。

[2] 方文正，時爲國營重慶空氣壓縮機廠技術員，文革前的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生。文革中 1966 年底（25 歲）任該廠八一兵團負責人，後任八一兵團總部副班長。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同年 11 月在中央召開的“八一五會議”上被以“武鬥殺人”、“破壞大聯合”等罪名抓捕。據知情者稱，實際上是當時五十四軍爲了抓捕反到底派的鄧長春（四川省革委常委），但又不願被說成是出于派性，就要同時抓一個八一五派的頭頭以示“對等”，因此軍代表動員空壓廠槍殺俘虜的八一兵團頭頭何大發，讓其檢舉殺俘是經方文正批准（何大發當時因“立功”得到“寬大處理”，但事後仍然被判刑）。1968 年 11 月 24 日《重慶日報》發表本報評論員《堅決把混進廣大群衆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點名稱之爲“混進群衆組織、作惡多端的壞頭頭”，并發表《徹底戳穿方文正的反革命嘴臉》、《揪出方文正，掃除害人蟲》等文。關押至文革結束後 1978 年 4 月被判處有期徒刑 7 年（實際已坐牢 9 年）。宣判後即獲釋。據說回了江蘇老家。

作戰指揮：王朝達（空壓廠）、姚安民[1]（空壓廠）、王玉良、儲文明、陳孝林、文仁火、翟守義（長安廠）、李德明、胡瑞明（朝陽廠），

敵工：陳偉立、歐祖良（空壓廠）、李志霄，

軍訓：陳孝林，張長良、陳永光，

宣傳：劉天紅、姜貴泉、舒斌（朝陽廠）、謝世敏。

重大八一五總團從市搬裝公司等單位的八一五派組織中調集了二十多部汽車，長期作爲我們這個野戰部隊的機動車輛。

■陽增泰（前左1）與舒斌（前排中）等合影

[1] 姚安民，1932年1月生。文革爆發時爲國營空氣壓縮機廠技術員。共青團員。參加造反後任八一兵團2602團負責人、八一五工總部九龍坡區分部主要負責人。1968年9月空氣壓縮機廠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清查。

首次出動八一兵團野戰部隊

6 月 13 日左右，革聯會武衛司令部秘書韓樂渝給我來電話，說文化宮被砸派的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占據，他們經常在文化宮前後門斷交通，搞搶劫，要求八一兵團去把九一縱隊總部給他們端了。

我得到這一命令，馬上派王朝達、王玉良、湯少成帶隊，分前、中、後三隊，前往文化宮端九一縱隊的窩子。我給他們說，這是八一兵團野戰部隊建立以來的第一仗，只能打好，打出八一兵團的威風。但是我交代他們不要傷人，只把對方趕出文化宮爲原則。。

我和舒斌一直在重大串聯大樓三樓等候消息。

這次武鬥首戰告捷，但是朝陽廠的曾天泉頭部受了重傷，胡瑞明報告我已經送到第二工人醫院二樓 5—06 床治療去了。幷告訴我，他們抄到一些現金回來。我到二樓問管後勤的謝武周，他們抄回來多少錢，謝武周說還在清點。後來聽說大概有三千多元，集中由謝武周保管起來待用。

那時，我的派性思想已經發展到十分强烈的地步了，有些事現在回想起來自己都感到好笑。比如在這個 6 月裏的一天，下着傾盆大雨，街上行走無人。我坐車經化龍橋到沙坪壩去，車經過我們朝陽廠門口時，我一眼看見“軍工井岡山朝陽兵團”的牌子挂在那裏，頓時火冒三丈，我叫車停下，親自冒雨跑過去，把牌子摘下來，拿回車上，然後叫車開走，開到一處臨江的路邊，我使勁把那牌子扔到嘉陵江裏，看着它被水沖走了，才心滿意足地離開。

1967 年 6 月 13 日，嘉陵廠兩派武鬥，反到底派占領了廠辦公大樓，控制了廠生産區。八一五派的一些武鬥人員跑了出來，到重大串聯大樓找到我，問怎麽辦。

我看到他們狼狽不堪的樣子，十分氣憤地說：廠不離廠，區不離區，堅持就是勝利，跑就是脫離群衆，怎麽出來的就應該怎麽回去！不是我們要武鬥，砸棒落到你們頭上來了怎麽辦？你們

沒有去找他們武鬥，爲什麼被打跑出來?

有人說：我們要打回去!

我說：打，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們不起來自衛，就還要被砸派再打出來。

我又說：現在你們廠裏的八一五派還分成兩個組織，這樣不利于鬥爭，不利于形勢變化的需要，團結就是力量，我建議你們還是合幷爲一個組織，對以前有什麼不同看法，要取長補短，多看別人的長處。這樣就好辦了。按八一兵團的規定，每個廠都以信箱爲分團代號。你們兩個勤務組先合幷，再選一個班長，這不是哪個把哪個吃掉的問題，如果再不團結起來，你們都會被砸派吃掉……

就這樣，經過說服，嘉陵廠八一五派的兩個組織合幷成一個八一兵團 2301 團，勤務組班長選了蘭進先老師傅。

我們又開會決定，把我們野戰部隊在文化宮抄搶九一縱隊的三千多塊錢拿去買成鋤把和藤帽，將嘉陵廠八一兵團的人武裝起來，由王朝達、湯少成在操場上對嘉陵廠的武鬥人員進行訓練。

6 月 18 日，八一兵團野戰部隊 200 人，以“武裝護送群衆回去抓革命促生産”的名義，同嘉陵廠武鬥人員一起，浩浩蕩蕩殺回嘉陵廠，占了家屬區和廠職工醫院。

這次武裝護送，帶隊前去的人是湯少成、王朝達、廖明華等。他們完成任務返回時，抓了不同觀點的十多個俘虜回來，其中還有個副廠長吳從科。這些俘虜被關在四樓上，由負責敵工工作的陳偉立、歐祖良等進行審訊。審訊的主要內容是瞭解對方內部情況和勸解對方不要“反軍”，只要寫了保證書後就由警衛排的人護送出去釋放。

有一天，我得到負責警衛的人報告，說嘉陵廠的人不執行紀律，跑上樓去打俘虜，他制止不了。要我親自去制止。我走上樓去，看見一個青年人，正把一個中年俘虜弄在屋中間站着，强迫把腰彎下,手指挨地,用木板在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他打的是誰，問他爲什麼要打俘虜，這個年輕人手指被打者說：他是我們的廠長,他支持軍工修築武鬥工事,親自檢查,把我們八一兵團打出廠,

弄得我們好苦……

我聽了這個人的話，就走上去問：“你是不是吳從科？”

他回答：“是。”

我問：“你支持軍工，指揮修築武鬥工事，把另一派打出廠，你說對不對？”

他說：“我罪該萬死。”

我訓斥說：“你本來就犯了走資派錯誤，現在又鑽進砸派裏面反軍，你還出謀策劃修築武鬥工事，還要親自視察，你抱的什麼目的？你要把這個問題談清楚！”

他連聲說：“是，是，是！”

當時我叫那個青年人走開，不要再打人了。他邊走邊威脅吳從科說：“你不談清楚，我們要你的命！”

隔了不久的一個晚上，吳從科從樓上爬外墻的水管逃跑，摔在地下受了傷，被執勤的人員發現，又被抓回去。我當時的精力放在瞭解社會情況，研究武鬥形勢上去了，沒有再管這些事。他後來的情況如何，我也不清楚。

差點當了送上門的俘虜

西師“六五”事件後，革聯會以周家瑜爲首成立武衛司令部，第一個計劃就是準備打工業校。

工業校，就是重慶工業學校，一所中專學校，位于化龍橋靠紅岩村那邊的山坡上。因爲該校是反到底派的紅岩兵團占優勢，他們又占據了制高點的地形優勢，對八一五派形成了威脅。特別是他們經常派出武鬥人員在公路上設卡，檢查過往車輛行人，對八一五派來往于市中區和沙坪壩區之間的車輛或游行隊伍進行攔截、騷擾，經常引起衝突，有時還要抓人。許多八一五派組織都吃過他們的虧，對其恨得咬牙切齒。

革聯會在決定端下工業校之後，先由管輿論的宣傳部門列出工業校砸派的所謂“二十四條罪狀”，向社會上宣傳，爭取同情和鼓動本派參戰。同時，周家瑜又派申平等人化裝到工業校偵察，

將偵察所瞭解到的地形地貌、武鬥工事等情況彙報後，由重大畫出作戰地圖。在周家瑜的召集下，革聯會武衛司令部的人們就圍着地圖研究如何打。

最後周家瑜宣布：吸取西師的教訓，我們要打它個出其不意，速戰速勝，打一個一口氣吃掉工業校的漂亮仗。

爲了使對方不瞭解我們的意圖，防止其聽到風聲後作準備，會上還決定把工業校取名爲“一號橋”，司令部取名爲“三號村”，電話聯絡答話是“618”，什麽是“618”呢？就是6月18號。6月18號就是我們計劃打工業校的日期，準備在那天晚上天黑後行動。

6月18號晚上，周家瑜派一部華沙牌小車，把我和楊大渝、申平三個前綫指揮官送到華村中學，華村中學是當時八一五派化龍橋地區聯防指揮部駐地。

由于我們這樣的所謂“作戰指揮”實際上對真正的作戰一竅不通，這一次就鬧了個大笑話，差點還讓我們自己當了俘虜。

那天晚飯後，按照事先的約定，我和申平各拿了一根鋤把作武器，悄悄去到工業校大門出來的支路與化龍橋公路交界轉彎處等待我們的武鬥隊伍前來。我們在路邊等待觀望了一陣後，看到一支工業校的武鬥巡邏隊從工業校大門裏走出來了。正在這時，公路上從城裏方向開來兩輛裝滿人員的卡車，我和申平都以爲這就是我們事先安排好的武鬥隊來了，其實我們這兩個“前綫指揮”和應該由我們指揮的武鬥隊之間連應有的聯絡方式、聯絡信號之類都沒有，我們便自以爲是地馬上衝出去，攔住工業校的巡邏隊，我已經和他們的人用棍棒交手了。工業校的人也以爲那兩車是我們的武鬥人員，慌忙轉身往學校大門裏逃回去。

這時，我才發現那兩卡車人并不是我們的武鬥人馬，只是過路車，一下就開過去了。這頓時讓我大吃一驚，嚇出一身冷汗。我和申平只有兩個人，根本就不是工業校武鬥巡邏隊的對手。要是他們逃回學校再慢一點，發現那兩卡車是過路車，很可能就會衝上來把我們倆俘虜了。那才真是要成爲繼熊代富施家梁被俘之後的又一重大新聞呢！

我和申平趕緊逃離那個地方，跑到化龍橋的人民銀行儲蓄所裏去，那裏是八一五派掌權的單位。我們在那裏躲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到華村中學。

我們回去後，打聽昨天是怎麽一回事，聯繫好的武鬥隊說，他們在我們之前就到了，沒找到我們指揮官，也不知應該怎樣行動，就只好回去了。到底是怎麽回事，誰也說不清楚。真叫人哭笑不得。

聲勢浩大的抬尸游行

就在我們計劃打工業校却差點當了送上門的俘虜那天，6 月 18 日，嘉陵廠八一兵團戰士、老工人陳國壽，在廠裏貼標語、大字報時，與嘉陵軍工武鬥人員發生衝突，被對方用刀殺死了。

尸體運到重大來，嘉陵廠八一兵團的頭頭、老工人蘭進先向我哭訴。我聽了感到義憤填膺，心想，我們還在準備用棍棒進行武鬥，砸派就在用鋼釬大刀了？武鬥又升級了。我們如果不在武器裝備上也跟上去，肯定要吃虧。

過了幾天，6 月 23 號，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小學發生武鬥，重醫的砸派死了一個學生，我們八一兵團也死了人，一個是建設廠的醫護人員程祥雲，我們野戰部隊帶隊的湯少成、王玉良回來向我彙報說，程祥雲正在路邊給我們一個傷員包紮急救時，被砸派一鋼釬殺進喉管，當場死掉，尸體已拖到重大。

我們與重大八一五總團研究，決定舉行一次抬尸游行，向全市人民控訴砸派的罪行，同時展示我們的力量。

1967 年 6 月 29 日，我們調集了沙坪壩及附近地區的八一五派武鬥隊，特別是機校、二機校、五一技校、石油校這幾所中專學校的武鬥隊，把陳國壽、程祥雲的尸體裝上汽車，組織了 72 輛汽車的龐大車隊，計劃從重大出發，經過化龍橋到牛角沱、大禮堂、一號橋、小什字、解放碑、兩路口、大坪……這樣轉一大圈返回重大。72 輛車上裝滿武鬥人員，每輛車表面上是紮滿了花圈，花圈下面却暗藏着鋼釬、大刀、棍棒。機校、二機校的武鬥

隊在前面開路，石油校武鬥隊殿後。八一兵團野戰部隊在死者靈車後面。我坐在前面第二輛車上，我是這次抬尸游行的總指揮，另外還有沙區紅聯的袁萬俊和八一兵團的湯少成爲副總指揮。

我們的游行車隊緩緩前進，一路上廣播車用高音喇叭反復介紹兩位“烈士”的簡歷和被害經過，不斷高呼憤怒的口號：“强烈抗議砸派殺人！”“血債要用血來還！”“嚴懲砸派殺人凶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當車隊經過朝陽廠大門前時，我一眼看到“軍工井岡山朝陽兵團”的又一塊牌子挂在那裏。好像在嘲笑我上次扔了他們一塊牌子，看你扔得完不！我一氣之下，馬上叫人把那牌子摘下來，當場砸了個稀巴爛。

當前車游行到李子壩這邊的牛奶場時，後面有人跑到前面來向我們報告，說橡膠公司樓上有人向我扔石頭、磚塊進行挑釁，甚至還罵我們車上運的尸體是假的……來報告的人問：“打不打？”

我知道橡膠公司是砸派的化龍橋地區指揮部所在地，早就想教訓教訓他們了，今天居然還敢來挑釁，豈能輕饒？我便命令前面停車。

這時副指揮袁萬俊跑上來，我給他談了來人報告的情況，說大家都叫打，問他的意見。袁萬俊說沒有意見。我就下令二機校第一輛車的人前進 100 公尺進行警戒，死者靈車前面的機校、二機校、五一技校的武鬥隊負責主攻，其他隊伍暫時不動。司號員周明全和二機校頭頭謝忠全（他和我是校友）不離我左右。

當隊伍調度好後，我就下令吹衝鋒號。司號員周明全是我們朝陽廠的轉業軍人，他的號一吹，武鬥隊員們就拿着鋼釬、棍棒，吶喊着向橡膠公司樓房進攻。

由于參加游行的人們復仇情緒很高，出發前就有思想準備和物資準備，所以很快就攻下了橡膠公司大樓，抓了砸派三十多個俘虜，有的被打得皮破血流。我叫先押到朝陽廠。

正在這時，有人騎一輛軍用三輪摩托來找我們負責人，他被帶到我面前，我事後估計是五十四軍的人，穿的便衣。他很認真

地對我說，城裏好幾處的砸派都作好了充分準備，要和你們大幹，如果你們繼續游行過去，很可能發生更大的流血衝突，希望你們的車隊不要再往城裏去了。說完他就騎上摩托車走了。

我把各隊負責人找到一起商量，大家也覺得還是避免發生更大衝突爲好，我們在這裏打下橡膠公司，已經出了氣了，抓到這一大批俘虜也得處理。

于是，我就決定不再進城了，下令各隊原路返回。

我回到朝陽廠，看到俘虜中有我們廠的人，就叫把朝陽廠的砸派全部放了。還剩下一二十個其他單位的人，全部押到重大去審訊。

當時我考慮到我也是化龍橋地區的人，這些俘虜中以中南橡膠廠的職工最多，好多我都比較熟，有的還是當初一道起來的老造反派，以後低頭不見抬頭見。我怕有人對他們進行傷害，所以決定親自出面處理。我馬上趕到重大去。

押到重大的那些俘虜關在重大七教學樓的斜對面，原來重大教職員工住的房子裏面。我對這些俘虜訓話說：我們以前衝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時都是老戰友，大家彼此都認識，發生今天這樣很不愉快的事件，大家皮肉吃了苦，我們也感到痛心，一方面你們反軍，另一方面是你們主動挑起事件的發生……我給他們講了一通不要“反軍”的大道理，我說，世界上誰最恨解放軍？只有帝修反最恨解放軍，地富反壞右最恨解放軍，但是你們砸派在施家梁血案中，不但把制止武鬥的解放軍打了，還抓了解放軍，這樣的行爲對嗎？只有帝修反才高興，地富反壞右才高興。我說了一通過後，要他們說出今天挑起事件的人是誰。他們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是朝陽廠的那個劉大鬍子。我一想，就是我們廠砸派的劉建修，但人早已放掉了。

然後我叫他們每人寫個保證，保證不反軍，不去參加武鬥，我說只要交了保證書就馬上放他們回去。

這些俘虜都寫了不反軍、不參加武鬥的保證書，我安排胡瑞明負責，于當天晚上分批把他們用車送到紅岩嘴一帶放了。

我又把俘虜中的中南橡膠廠砸派頭頭周必勝叫到一邊，給他

做工作，我說，我們很早都是老熟人，你當初起來造反時我組織人來聲援你，你們搶黑材料我也組織人來聲援你，你我都是戰友，爲什麼要去反軍呢？他說他們不是反軍，是“二月鎮反”受了壓……我說“紅五條”上已講了，那是成都軍區個別人搞的，重慶警備區沒有完全頂住，他們改得很快。周必勝沒有跟我爭辯。我又說，今天我們抬尸游行，有2000多人，你能打得贏嗎？誰下令向我們游行隊伍扔石頭的？我要他談一談。周必勝說是朝陽廠的老劉向你們扔石頭引起的這場武鬥事件。他當時在樓下，武鬥打起來後他才出來指揮的。我們要他寫一個交代後，第二天就放了他。

成立革聯會作戰司令部

1967年6月底，建設廠兩派爲爭奪總裝車間發生武鬥，八一兵團6657團失利。

我得到消息後，派出八一兵團武鬥隊200餘人前去增援，但未能獲勝。本來，建設廠的八一兵團6657團是在廠裏掌權的，但却在武鬥中一步步失利，該廠的重要部門逐步被砸派控制了。

1967年7月7日，嘉陵江橋頭響起了第一聲槍聲，砸派的二輕兵團在他們占據的二輕工業局大樓與八一五派的衝突中，用小口徑步槍把兩個進攻大樓的八一五派的人打死了。駐渝部隊派解放軍包圍了二輕兵團，要他們上交武器和交出殺人凶手。但他們拒不執行，說他們是自衛還擊有理。他們還從江北調來大批砸派武鬥人員，對解放軍實行了反包圍，幫助二輕兵團的人撤出二輕局大樓，轉移到江北去了。

武鬥在迅速升級，山城的空氣中火藥味越來越濃了。

就在7月7號嘉陵江南橋頭槍響這天，八一五派革聯會班長周家瑜在原市委交際處二號樓底層召開了一次革聯會常委擴大會，我參加了這個會議。

會議主持人是周家瑜和革聯會副班長葉臻榮（師專八一五頭頭）、副班長李雙箭（解放軍七醫大紅總頭頭）。參加者有八一兵

團頭頭、革聯會副班長陽增泰，二七總指揮部[1]頭頭王庭學[2]，港口兵團頭頭姜永榮，財貿八一五總團頭頭楊正中、王紹川，紅農八一五頭頭艾啓貴，農民造反軍總部頭頭趙行貴[3]（這兩個農民造反派都是原革聯會常委），市機關指揮部頭頭段德昌[4]，二鋼

[1] 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原爲 1966 年 10 月間建立的跨行業群衆造反組織。1967 年 2 月，二七戰鬥團總部態度傾向于反對革聯會。3 月，擁護革聯會的部分成員拉出隊伍另外成立了“二七戰鬥團歸口辦公室”，要求響應中央按系統按行業歸口建立群衆組織的號召，解散二七戰鬥團總部。4 月，因二七戰鬥團總部明確加入到“砸爛革聯會”的砸派行列，二七歸口辦公室即更名爲二七戰鬥團總指揮部，與二七戰鬥團總部正式決裂。此後，同樣名爲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總部爲砸派（反到底派），總指揮部爲八一五派。

[2] 王庭學，1945 年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造漆廠助理技術員，共青團員。參加造反後任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負責人。1967 年春二七戰鬥團分裂爲砸革聯會（二七戰鬥團總部）和保革聯會（二七戰鬥團總指揮部）兩派後，任保革聯會一派二七總指揮部主要負責人，後任八一五化工總部勤務組組長、八一五派革聯會常委。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

[3] 趙行貴，1944 年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市巴縣一品公社農民，共青團員。參加造反後任革命農民造反軍主要負責人。1967 年 2 月任重慶市革聯會常委。後任八一五派農聯會負責人。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文革結束後被清查。

[4] 段德昌，1931 年 10 月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市經濟委員會技術局協作處十八級（科級）幹部，轉業軍人，中共黨員。文革中 1966 年底參加造反，1967 年初（35 歲）任重慶市機關革命造反指揮部一號勤務員，後任八一五派革聯會常委。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後任重慶市經委鬥批改領導小組副組長。文革結束後 1977 年 3 月病逝。

廠[1]2307造反團頭頭袁金樑[2]，八一五工總部頭頭申平，造反軍二分團頭頭楊大渝等等。

會議由周家瑜作了形勢報告，周家瑜是一張“鐵嘴”，比熊代富更會說，很富于煽動性。他講完後，葉臻榮作了補充，并提出一個作爲八一五派行動方針的口號：

“山城八一五派立即行動起來，打垮李任死黨[3]，加强無産階級專政，徹底粉碎反革命武裝暴亂！”

我爲了回去作宣傳的方便，把這個口號寫下來，葉臻榮坐在我右手邊，還反復給我念了幾遍，并幫我寫了暴亂的“暴”字。

周家瑜向我瞭解了重慶各大兵工廠産品的類型後說：“你們八一兵團要作好準備，回去後開個會，大家討論一下，建設廠的槍，長江廠的子彈，無綫電廠的電臺，能够控制的都要控制在我們手中，看來這個仗是非打不可了，我們要學習北地東方紅，打出一個左派來！”

周家瑜還提出：爲了適應形勢的需要，必須把革聯會分成兩班人馬，一個作戰司令部專門負責武衛工作，一個政治部負專門責文鬥宣傳工作。

我問原來那個武衛司令部呢？周家瑜說那已經過時了。

葉臻榮提議由我來當作戰司令部的司令，他說：“你是八一兵團的頭頭，八一兵團都是國防工廠的組織，仗打起來了，要槍

---

[1] 二鋼廠，抗戰時期遷來重慶的國民政府兵工署第二十四兵工廠，中共執政後與原第二十八兵工廠合并，更名爲一〇二鋼廠，文革後改稱特殊鋼廠，主要生産軍工鋼材。

[2] 袁金樑，1926年生。文革爆發時時爲重慶一〇二鋼廠（即特殊鋼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1966年底（40歲）參加造反，任該廠2307革命造反團負責人，1967年9月任八一五派革聯會常委副班長。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文革結束後被清查并開除中共黨籍，後被作爲“幫派骨幹”勞動教養3年。已病逝。

[3] 李任死黨：李，指當時中央認定的西南最大走資派李井泉；任，指當時中央認定的重慶最大走資派任白戈。“李任死黨”是當時重慶造反派對本地區一切自認爲的反動勢力的統稱，兩派均互指對方的領導者或“幕後操縱者”爲李任死黨。

有槍，要炮有炮，其他人都調不動。”

我說：“要不得要不得！我又沒有當過兵，對打仗的事一竅不通，出了問題負不起責任。我建議還是周家瑜當司令，周家瑜本來就是武衛司令部的司令，在群衆中名氣大，威信高，同時又是革聯會的班長，應該承擔這個重任。”

周家瑜聽了，把頭往我這邊湊過來說：“你還沒有明白。我是學生，你是工人，你們八一兵團的東西（指槍、彈、電臺等），還是要你才調得動，我們學生咋調得動？”

葉臻榮說：“‘三高’[1]還是管政治部好，他可以到處作報告，你陽增泰去作報告又不行，從各方面看，還是你當作戰司令好。你不要怕承擔武鬥責任，以後出了問題大家負責，反正是開會決定的，大家都知道。你怕啥子？”

我當時沒有更多的道理來反對，就反過來推葉臻榮當司令。葉臻榮說：“我也是學生，指揮八一兵團更不行，我還是跟‘三高’一道搞政治，搞文攻，發動群衆。

最後，這次會議通過決定，建立革聯會政治部和作戰司令部——

革聯會政治部由周家瑜、葉臻榮、艾啓貴、楊正中、袁金樑等五個常委組成，專門負責文攻；

革聯會作戰司令部由陽增泰、趙行貴、李雙箭、姜永榮、段德昌、王庭學、王紹川七個常委（王紹川沒有到任，另外派了黃竹然來代替他）組成，具體負責武鬥。其中趙行貴、李雙箭是副司令，段德昌、姜永榮管辦公室，主管警衛，黃竹然分管後勤。

會議還提出找幾個“老果果”（比“革命小將”年紀大些的幹部）當參謀。段德昌主動提出他去物色。

---

[1]“三高”：1967 年 5 月 16 日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意見》即“紅五條”下達之前，八一五派駐北京人員曾傳回一則《北京來電》簡訊，其中說到周恩來在解決重慶問題會議上當面表揚了周家瑜的發言是“高水平，高風格，高姿態”，但後來正式公布的周恩來有關講話中無此內容，“周三高”遂成爲笑談。此後“三高”成爲周家瑜的外號。

當時很多八一五派的革命幹部不願意出來直接參加這樣的工作，所以段德昌只找到兩個幹部來當“參謀”，一個是體委的史某，另一個是港口的趙某（是姜永榮推薦的）。他兩人來後，工作不大膽，很少出主意，生怕負責任，純屬避難性質。

會議還決定，政治部辦公在交際處，作戰司令部辦公在魯大東住房，原革聯會二號樓政策研究組劃給作戰司令部作爲參謀部，負責人唐忠明，他的口才相當不錯，而且記憶力特別好，毛主席的哪句語錄出自哪篇文章，甚至在語錄本上好多頁，都能够說得出來。

會後，我就安排八一兵團的王朝達去魯大東住房（市委大院三號門外），找魯大東家人商量，請他們搬出去另找住處。革聯會作戰司令部就在那裏開始辦公了。

八一兵團的戰爭準備

7月9號，我按革聯會“七七”會議提出的要求，在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二樓上召開了有八一兵團總部和各分團頭頭參加的會議。會議由謝武周主持，我主講，參加會議的人有：總部王倫、王朝達、張逸、劉德勝[1]、廖明華，朝陽廠2007團李華權、李文成、林金熔，無綫電廠2701團馮一勝，嘉陵廠2301團湯少成、蘭進先，

[1] 劉德勝，1946年11月生。文革爆發時爲國營江陵機器廠22車間工人，共青團員，文革中1966年底參加造反，任八一兵團65團主要負責人。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10月江陵機器廠革委會成立任副主任。12月23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根據北京“八一五會議”四川重慶組提出的江陵機器廠革委會調整方案和重慶市革委會的報告，批准以“武鬥”罪名免去劉德勝江陵機器廠革委會副主任職務。197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結束後被清查并被開除中共黨籍。

空壓廠 2602 團方文正、李思全、何大發[1]、姚安民，建設廠 6657 團劉修仁、李志霄，江陵廠 65 團李澤夫，長安廠 20 團朱顯萬[2]、許世明，長江廠 63 團姜太煊。

在會上，我以毛主席提出的“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爲理由，動員大家準備槍支彈藥和聯絡設備，我還根據聽來的消息鼓動說：“嘉陵江橋頭七七事件已揭開了現代化戰爭的武鬥序幕，成都方面來電話不准警司收繳二輕的武器，不准抓開槍殺人凶手，還說那只是造反派的過頭作法。他們可以‘過頭’用槍打我們，這是爲什麽？這就是說在客觀上已經允許拿現代化武器了。我們不拿，砸派拿，我們就只有等死。爲了八一五派的生存，我們要學習北地東方紅打出一個左派來……”北地東方紅即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他們是怎樣“打出一個左派來”的，我也不清楚，這話是聽周家瑜講的。

經過我的動員，各單位根據本廠的生產性質，紛紛表示手中還能控制的東西不能被砸派控制了，回去盡力準備，以防萬一。各團發言落實的東西有：

2007 團——電臺，地雷，護心安全罩；

2701 團——設法生產步報機（同巴山廠合作生產）；

2301 團——自製手榴彈等炸藥；

2602 團——坦克，電臺，槍，炮；

---

[1] 何大發，1942 年 2 月生。四川璧山人。文革爆發時爲國營空氣壓縮機廠 22 車間車工。共青團員。復員軍人。參加造反後任八一兵團負責人。1967 年 8 月武鬥中撤退離廠時將對立派俘虜 5 人（其中一人爲孕婦）押至 12 車間丁字路口槍斃。1968 年 9 月空氣壓縮機廠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同年在中央“八一五會議”期間被揭發武鬥中有槍殺俘虜罪行，爲爭取“從寬”，指控槍殺俘虜爲方文正主使。12 月 22 日空壓廠革委會報經上級批准免去何大發廠革委常委職務。文革結束後 1978 年 4 月仍被重慶市九龍坡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刑滿後回璧山老家經商。

[2] 朱顯萬，1934 年生。文革爆發時爲國營長安機器廠電焊工，中共預備黨員。參加造反後任八一兵團 20 團勤務員。1968 年 10 月任長安機器廠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6657 團——步槍 500 支左右，和長安廠配套的高射機槍架子；

65 團——步槍 40 支，手槍 10 支，雷管，炸藥等；

20 團——槍支，雷管，炸藥，高射機槍；

63 團——子彈 100 箱，炸藥，并落實護廠槍支。

我本來沒有當過兵，更沒有打過仗，什麼是戰略戰術，根本不懂。如今當上了指揮千軍萬馬的武鬥司令，而且是山城一個大派的司令。隨着武鬥的發展和升級，我指揮的人越來越多，名聲也越來越大了。

7 月中旬的一天，長安廠兩派發生衝突，衝突中，長安廠八一兵團抓到了軍工井岡山的頭頭李桂芝。李桂芝是軍工那邊有名的女將，我在革聯會的時候曾和她有過一面之交，當時她代表軍工造反兵團來登記加入革聯會，被我拒絕了。後來軍工造反兵團成了砸派，現在又發展成了軍工井岡山。

我聽說李桂芝被關到了團市委，當時我們八一兵團總部設在那裏。我就去看了看。看守她的人交給我一本從她身上搜到的筆記本，我翻了一下，看到裏面還記着我們廠的幹部李文達、林坡的名字。我去提審了李桂芝，問她有哪些幹部支持砸派，她也提到了朝陽廠有李文達、林坡。

我們雖然觀點不同，而且這時已經成了刀兵相見的死對頭了，但我還是覺得對李桂芝這樣的老造反派，應該高抬貴手，今後畢竟還是要講大聯合的。我給八一兵團的人交代把她放了算了。至于當時是不是按我交代把她放了，還是後來反到底打過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後她才獲救的，我就不清楚了。

一次提走 72 萬發子彈

1967 年 7 月 21 日，八一五派一次就從長江電工廠運出半自動步槍子彈 400 多箱，共 72 萬發，據說可供解放軍裝備一個師一年之用。這是怎麼策劃、怎麼運出的呢?

7 月 17 日，建設廠的周榮華、姚二炮等八一兵團頭頭跑到總部找謝武周、廖明華他們，要求解決槍彈問題。謝、廖叫他們到

革聯會作戰司令部來找我。他們到魯大東住宅找到我，說明來意後，我回答說：“我這裏也沒有槍彈。”

姚二炮說：“長江電工廠不是生產子彈的嗎？我們廠試槍的子彈都是從他們那裏提的貨，叫他們拿點出來用嘛！”

姚二炮的話把我點醒了。我馬上撥電話到長江電工廠，把他們一個頭頭羅良才叫到革聯會來“商量緊急要事”。羅良才不知道是什麼要事，急急忙忙過江跑來，一聽是找他要子彈，邊擺手邊說：“不行不行！拿一顆彈殼出來都是犯罪的行爲！”

建設廠的周榮華一聽，激動地說：“犯罪？我們當初也是說拿一個零件出廠都是犯罪，結果被砸派‘紅大刀’把槍都拿走了，我們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給羅良才施加壓力說：“你把頭腦放清醒點，你們還要走建設廠的道路嗎？由于周榮華他們的慈悲，使建設廠的槍、彈都被對方控制了。再走那條路就是幫助砸派來屠殺八一五戰士！”

羅良才還是不敢同意。這時站在我身邊的楊國民說：“建設廠說他們在長江廠提貨，貨提完沒有？”

周榮華說：“好像七月份還沒有提。”

我又向羅良才說：“用這個辦法怎麼樣？”

羅良才說：“我回去找總部勤務組商量一下。”

我見羅良才鬆了口，馬上又問提貨要什麼手續。羅良才說：“要提貨單，提貨單上還要蓋上 296 廠的大印才行。”“296 廠”是建設廠的代號。

周榮華說：“廠裏的權是我們奪的，大印是二炮在管，曉得還在不在啊。”

姚二炮大概也沒怎麼用過那個大印，說：“我回去看一看。”

第三天，雙方都來回話。羅良才說：“只要見提貨單，我們就可以發貨。”姚二炮回去不但找着了廠裏提貨的公章，而且把提貨單的完備手續也帶來了。

這樣，我就調動人馬，組織船隻，由王朝達帶隊，羅良才帶路，于 7 月 20 日去提貨。

但是當天却沒有提到。後來才知道，那天因長江電工廠裏兩

派對立正厲害，小摩擦不斷發生，我們去提貨的人引起該廠反到底派的警惕，八一五派的人又不大好在那種局勢下直接讓我們提走子彈。我們去的人還與該廠反到底的人發生了摩擦[1]。

第二天，7 月 21 日晚上，我親自出馬，再次去長江廠提子彈。這次調動了三艘船：

401 號，裝港口兵團 67 人，機械兵團 22 人，石油校大慶公社 70 人；

101 號，裝三中抗大兵團和紡織兵團部分人員；

601 號，裝八一兵團 35 人，石油校石油兵團 86 人，五一技校 78 人。

三艘船分兩路出發，一路由王朝達帶隊，乘坐 601 號到銅元局，佯攻反到底軍工的廣播站，聲東擊西，吸引對方的注意力。我親自帶領 401 號直奔長江廠倉庫所在碼頭。因當時既無手機又無電臺，就由 101 號來回對兩邊進行聯絡溝通。

我們的船靠岸後，上去的人說有兩個民兵擋住不准進庫房。我就走過去對那兩個民兵說：“夥計，你們辛苦了，你們暫時靠邊休息一下吧！”并叫幾個人把他倆看起來，不准亂說亂動。我們船上的一百多人立即擁進倉庫。管倉庫的人已經得到該廠八一兵團頭頭的通知，知道是怎麽回事，便把倉庫門打開，給我們指明了建設廠提貨產品的堆放處。

就這樣，大家一鼓作氣，把堆放的 400 多箱 70 多萬發子彈全部搬上了船。101 號見我們已經順利完成任務，便去通知王朝達他們收兵返回。

這批子彈運到曾家岩下邊的嘉陵江邊上岸，先全部運到團市委院內八一兵團總部。以後分散放到：師專八一兵團野戰部隊 203 箱，港口兵團 50 箱，水運公司二七戰鬥團 150 箱，601 船上 1 箱，

[1]1967 年 7 月 20 日夜（至次日淩晨），長江電工廠兩派爆發劇烈衝突，反到底派死 2 人，八一五派將反到底派趕出廠區，控制了全廠。時稱長江電工廠“七二〇”事件。這一事件爲 21 日八一五派順利提走 72 萬發子彈創造了條件。

八一兵團總部 10 箱。

我們作了嚴格規定，每個單位要子彈，必須見我的批條。沒有批條不發。

但是有了半自動步槍子彈，却缺少半自動步槍，大部分子彈都沒有派上用場。後來中央發布“九五命令”，沒有用的部分，就由各存放點如數上交了。

分發重機槍

我們在長江廠搞到子彈以後，大家又爲槍的問題着急了。

大概在 7 月 22、23 號期間，八一兵團總部的謝武周告訴我，長安廠的坦克重機槍多得很，趕快派人去搞嘛。我聽到這一消息，就叫助手舒斌打電話到長安廠的八一兵團 20 團，把他們的頭頭朱顯萬找到革聯會來，“研究軍機大事”。

朱顯萬派了另一個勤務員許世明來革聯會。老許告訴我，他們庫房還有一些 762 的重機槍，是給空壓廠生產的坦克配套用的。我問有沒有步槍，他說沒有。他們主要是爲海軍服務，生產的都是大東西。我就向他們提出解決 50 挺 762 重機槍給革聯會，統一分配給有戰鬥力的下屬組織。

許世明一聽，猶豫了一下說：“數量多了不好辦，我回去查一下，同勤務組的其他同志研究一下再說。”

我表示同意，并告訴他，明天我派楊國民、舒斌他們來提貨。

第二天，楊國民、舒斌去到長安廠，拉回 12 箱 762 重機槍，每箱裝有 2 挺，共 24 挺。我叫把這批武器運到師專湯少成那裏放起來，再研究如何分配。

在革聯會作戰司令部研究後，這批武器是這樣分發的：

八一兵團總部 4 挺，

嘉陵廠八一兵團 2 挺，

建設廠八一兵團 1 挺，

謝武周要去 4 挺（他分給重大 2 挺，供電 1 挺），

二鋼 2 挺，

石油校 2 挺（石油兵團和大慶公社各 1 挺），
二機校 1 挺，
交造司（交通局造反司令部）搬裝公司 1 挺，
港口兵團 1 挺，
機械兵團 1 挺，
重慶飯店（八一五工總部駐地）1 挺，
革聯會作戰司令部留 4 挺放湯少成處備用。

研究決定後，由楊國民負責分配。各兵團到革聯會作戰司令部拿手續到師專去提，湯少成見手續發貨。

大約在 8 月 1、2 號，二七指揮部的滿德玉，被二七的頭頭、革聯會常委王庭學派來找我，說他們守全城制高點枇杷山公園，沒有武器，聽說長安廠有，要我開一個條子到長安廠去解決點。我表示同意，就開了個條子。滿德玉去後，經他游說，拿回去 10 挺 127 無架高射機槍給枇杷山公園，控制市中區的制高點。

搶糧解決吃飯問題

武鬥不斷升級。哪個單位哪一派占了優勢，另一派就會被趕出來，或者害怕挨打而自己撤出來。一些單位八一五派被趕出來或撤出來的人越來越多，到處都住得有。各方面壓力很大。

八一兵團住重大的武鬥隊，最先是按重大頭頭秦安全的要求住下的。在重大的吃飯問題，全是由各分團找一負責人統計人數，交總部後勤負責人謝武周到重大串聯食堂辦理手續（有的交錢糧，有的交條子欠帳），領出飯菜票發給大家。後來被趕出來的人越來越多，重大壓力太大，因爲欠帳的太多，造成糧食無來源，資金周轉不足，重大後勤方面向謝武周提了意見。當時重大甚至要求八一兵團搬走。

7 月上旬，空壓廠八一兵團頭頭方文正把大部分隊伍帶到空壓，成天在楊家坪一帶搞攔路搶劫，搶了車輛存放到工學院，說是八一兵團要有自己的戰備車。有些人看不慣，向總部反映。當時我在革聯會，湯少成打電話告訴我，說有的團要求換地方，不

換地方就散夥。

革聯會的唐忠明聽說這一情況，他就要求我們八一兵團武鬥隊搬到師專去住，并開一個條子去找他學校的人聯繫。

從此八一兵團武鬥隊就一分爲三，空壓廠的就在方文正帶領下住空壓廠，八一兵團總部頭頭廖明華（嘉陵廠）、謝武周（空壓廠）、彭乾元[1]（江陵廠）就帶領 65 團（江陵）、20 團（長安）等搬回城裏，住團市委院內八一兵團總部所在地。其他團如巴山、無綫電、嘉陵、建設廠的就在湯少成帶領下搬到師專住下。朝陽廠的大部分回廠去了。

我在 6 月下旬的一天，專門打電話給市革籌組長藍亦農的秘書楊學祥（軍人），我告訴他，我們八一五派被趕出來的人很多，沒有飯吃，請他報告市革籌設法解決。楊學祥接到電話後，叫我不要放電話，等他去向領導請示彙報。不一會兒，他回來了，在電話中對我說：“市革籌、警備區也住了不少人，吃飯也是個大問題，每天只能吃點紅苕稀飯。我們的壓力也很大呀！你們那些人的吃飯問題，只好請你們自己想辦法解決。”

我們自己能想出什麼辦法呢？“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呀。從幾個軍工廠陸續被趕出來住到團市委和師專的八一兵團人員不少。當時八一兵團總部在團市委食堂開火，人越來越多，壓力很大，糧食不足，食堂管理人員已經向我們多次緊急反映了。

7 月 23 號，八一兵團總部王朝達、彭乾元、廖明華來革聯會找我，要我解決糧食問題。市革籌要我們自己想辦法，但是怎麼解決糧食問題呢？我也很爲難。

這時，在革聯會作戰司令部工作的姜永榮說：“找楊國民嘛，他們水運公司經常拖運大米。”

---

[1] 彭乾元，文革爆發時爲國營江陵機器廠工人。參加造反後任八一兵團 65 團勤務組成員。1968 年 10 月江陵機器廠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12 月 23 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根據北京“八一五會議”四川重慶組提出的江陵機器廠革委會調整方案和重慶市革委會的報告，批准以“搶糧 3 萬餘斤，武鬥有嚴重問題”罪名免去其江陵廠革委會委員職務。

我找到楊國民，他不好推托，當即打電話把水運公司的調度周學良叫來，周學良說他們有一個駁船裝的大米，還沒有起運，如果要，只要給手續，他們就可以給。

當時我想，反正市革籌叫我自己想辦法，我就乾脆把這一船大米徵用了，開個手續還不簡單？我就叫王朝達開一個八一兵團總部借糧的條子，問明了周學良數量是 75 噸，條子上就寫了 75 噸。我在條子上以革聯會的名義批上“同意”，蓋上革聯會的大印，把手續交給了周學良。

他們雙方約好時間，由王朝達、彭乾元、謝武周、廖明華帶八一兵團駐總部的人員，于 7 月 23 日晚上乘江陵廠的建江號輪船，從團市委背後坡下嘉陵江邊上船，把 75 噸大米拖運回來了。

運回的糧食，一部分放在團市委，一部分運到了師專。據我所知，運到師專的大米，由湯少成安排沙坪壩糧食部門一個叫熊心一的（外號熊胖子）在具體管理。放在團市委的大米，由廖明華、謝武周他們在經管。本來沒有用完，沒想到 8 月 15 號被江北打過來的反到底派接收了。以後反到底工總司又從體育館搬到了團市委，那些大米就歸他們享用了。

武鬥平息後，聽說工陵廠八一兵團的彭乾元曾把一些大米拿去販賣了，數量多少我不清楚，聽說他在北京“八一五會議”[1] 期間爲此作過重點交代。具體情況如何，我不瞭解。

後來也有人說，我搞武鬥發了財，在外面天天三餐吃肉。這完全是想當然的編造。當時確實有個別頭頭利用武鬥混亂之機和手中的權力，在外面大吃大喝，這類問題不時有人反映到我這裏

[1]“八一五會議”全稱是“中央召開的國防工業部分工廠和一機部、化工部部分協作工廠抓革命促生產會議”，因開始于 1968 年 8 月 15 日而簡稱“八一五會議”。出席會議的四川代表有四川省革委會和成都軍區負責人及省內 43 個工廠的代表共 650 人。這次會議是中央在派駐工宣隊進駐首都高校結束紅衛兵造反運動之後，爲結束工礦企業的造反運動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期長達半年之久，實際上是一次變相集體隔離審查的“學習班”。各地與會代表團都舉行了人人檢討、相互揭發、批鬥“壞頭頭”的活動，其間有人被捕，有人自殺。

來。我很鄙視那樣的行爲。

我個人那段時間的吃飯問題，其實很簡單：在革聯會工作時，跟革聯會的工作人員一樣，吃飯是在市委食堂和交際處食堂用現金、糧票搭夥買飯菜票；1967 年 6 月在重大期間，是在重大串聯食堂搭夥；後來我在沙坪壩師專期間，是在師專教職員工食堂搭夥，都是自己拿現金、糧票購買飯菜票。

有一次，劉陵川肩上扛一個紙盒到我在師專的辦公室來找到我，他說：“司令辛苦了，我們搞到一點奶粉，送來給司令營養一下。”

我當時也沒有問他是哪裏搞來的，只是拍拍他的肩頭說：“本司令身體很健康，你還是拿到七醫大去給傷員們吃吧，我的後勤部長！”

他是否拿到七醫大去了我就不清楚了。這件事當時在場的蔡明訓也知道。

第四章“武衛”戰場亂像

組織攻打工業校

經過一番努力，槍支彈藥等都有了一定的準備，在 7 月 25 號，我們向工業校發起了進攻。

要打工業校，拔掉小龍坎至牛角沱公路邊上這顆“釘子”，我們早在 6 月份就訂下計劃了。但是那次“六一八”行動因缺乏經驗，指揮官與武鬥隊沒有建立起應有的聯絡，導致莫名其妙的流産，我和申平兩個前綫指揮官還差點成了給別人送上門去的俘虜。但是在那之後，拔掉工業校這顆“釘子”的念頭一直沒有從我們的思想中消失過，只不過是在尋找有利于我派造輿論的時機罷了。

1967 年 7 月 7 日，我被任命當上革聯會武衛司令部的司令後，周家瑜又一再提醒，叫我不要忘掉“拔釘子”的事。

7 月 20 日，武漢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七二〇”事件。23 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有關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光榮回到北京”的消息，表明了中央對武漢事件的明確態度。重慶兩派和駐軍都按照中央定的調子，紛紛上街游行，歡呼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又一偉大勝利，憤怒聲討武漢“百萬雄師”和“武漢地區黨内、軍内一小撮走資派”的罪行。

24 日，八一五派的游行隊伍在經過化龍橋地區時，遭到工業校砸派武鬥人員的攔截和襲擊，還扔了自製燃燒瓶到游行隊伍的車上，致使有人受了傷。好幾個單位打來電話，向革聯會彙報，强烈要求進行還擊。有的單位武鬥隊還跑到革聯會來請戰。

我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帶着强烈的復仇情緒，馬上召集在革

聯會的段德昌、姜永榮、唐忠明、朱遠容[1]、謝思全、劉萬秋、蔡明訓、楊國民、馮衛東、黃竹然（乾果公司職工）等開會研究，決定于當晚開始拔除工業校這顆“釘子”的行動。

那天晚上剛好化龍橋街上在放映露天電影，外來人員比平常多得多，這給我們的調兵遣將行動起到了很好的掩護作用。

晚上 8 點，我同謝思全先到朝陽廠，化龍橋地區指揮部的陳衛、老袁等已經在這裏等候着了，他們把幾個已經主動前來的群衆組織頭頭召集起來，隨後又來了一些得到通知的單位的頭頭，共有 16 個單位的近 20 個頭頭。

我們在朝陽廠辦公樓二樓護廠指揮部（原保衛科）開了個會，我再次詢問了當天發生衝突的情況，我不需要作什麽動員，大家就已經是摩拳擦掌急于參戰了。當我提出通報各單位能够參戰人數的時候，各單位都踴躍報名，報上來的參戰人數是：

化龍橋指揮部——80 人，
朝陽廠——40 人，
閥門廠——20 人，
化龍橋水運站——10 人，
二機校——40 人，
機製校——200 人，
二十中——50 人，
石油校石油兵團——80 人，
石油校大慶公社——50 人，
五一技校——200 人，
長安廠 20 團——50 人，
江陵廠 65 團——50 人，
巴山廠 2103 團——40 人，

[1] 朱遠容，1938 年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動力機械廠技術幹部，中專文化程度。參加造反後任八一五派機械兵團勤務組成員、革聯會作戰司令部成員、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部副參謀長。文革後期調開關板廠。文革結束後被清查。已病故。

機械兵團——37 人，
金屬兵團——24 人，
人交公司造反軍二分團——27 人，
六中 32111 戰鬥團——40 人，
合計一千多人。

會議按朝陽廠的胡友年、郭峰等人繪出的工業校作戰地圖，標明火力點和可能埋有地雷之處等內容，讓大家按圖討論進攻方案。最後確定從三面包圍——

第一路由郭峰、劉德勝帶爆破隊和二機校等單位從正門主攻，他們帶衝鋒槍一支，和日光燈管製作的土爆破筒及鋼釬、大刀等武器，并負責對二中反到底采取圍而不打的辦法，只准他們跑，不准他們增援工業校。

第二路由李華權帶領化龍橋地區武鬥人員，在紅岩嘴阻擊江北等處反到底的增援。

第三路由石油校、五一技校從山上直下，帶單子彈道步槍和輕重機槍各一挺，進行火力封鎖。

我要求大家：以武力包圍，但不要武力强攻，主要是要求他們交出抓去的人和打人凶手。如果不交，還要進行挑釁，我們再反擊，形勢有利，就把它端掉，不利就撤。

會議上規定了參戰人員標志：頭上帽子有白圈或纏一圈白布條；聯絡信號，問是手電筒繞一圈，答是手電筒擺一下；口令是“追擊”，回令是“勝利”；要求衝鋒和撤退都聽號聲指揮。各路有兩個通訊員向我報告情况和傳達我的命令。我坐鎮幼師樓上指揮。司號員周明全不離我左右。

一切部署完畢，各路人馬到位後，我們從淩晨 2 時發起了攻擊。

在正對工業校大門的方向，我們安排了一挺重機槍（坦克機槍），機槍手是巴山儀錶廠的青年工人段天星，他是副市長段大

明[1]的兒子。我囑咐他，槍只往天上打，最多打到房頂上，主要起威懾作用，把他們嚇跑了就行。不要傷到人。我們的目的不是打死他們的人，而是把他們趕走，拔除這顆“釘子”。

由于對方的廣播大叫：“不怕死的就來吧，我們的地雷已等得不耐煩了……”我們的人不知虛實，都怕碰上地雷，不敢輕率前進。一直對峙到天亮，也未能攻進去。我們反而發生了不應有的傷亡：江陵廠一個青年工人被自己背的幾根用日光燈管改裝的燃燒筒不慎爆炸而嚴重燒傷，搶救幾天後身亡。我們廠的郭峰被自己帶去的日光燈管改製的土爆破筒炸斷了一隻手臂，成爲殘疾。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又怕駐軍知道後前來制止，不能速戰速勝，急打電話要重大來增援，但重大根本不聽我的，要聽周家瑜的，我又打電話到革聯會作戰司令部，要蔡明訓馬上找到周家瑜，向他報告，要周家瑜調兵增援。

7 月 25 號早上，我看到工業校有許多人陸陸續續離開了校園，認爲是被嚇倒了，心想我們的威脅起到了作用。眼看 9 點過了，沙坪壩方面的援兵仍沒有來，我就下令撤兵。

我們的隊伍撤離後，我已經要走到朝陽廠了，這時周家瑜調來增援的部隊五六百人才來了，這些人是重大 301 部隊（專業武鬥隊）和沙區紅聯的武鬥隊。他們聽說我們已經撤退了，大爲不滿，紛紛要求再打回去，有的還說：“你們不打我們打！”

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就提出，把戰地指揮權交給重大 301 的司令[2]和沙區紅聯袁萬俊，我對他們說，我要回廠裏休息一下，從昨晚到現在已經搞得又餓又累了。

---

[1] 段大明，文革爆發時爲中共重慶市委常委、重慶市副市長（分管政法）。1967 年 2 月重慶市革聯會成立後被安排在農業指揮部工作。文革結束後 1978 年 5 月任重慶市政協副主席。1982 年 2 月任重慶市政協主席。

[2] 重大八一五戰鬥團 301 部隊司令是梁文福，時爲重慶大學冶金系五年級學生。參加造反後爲重大八一五戰鬥團骨幹成員，1967 年夏兩派武鬥爆發後任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專事校外武鬥的 301 部隊司令。畢業分配到重慶紅衛鋼廠（1972 年更名爲重慶長江鋼廠）任煉鋼技術員。後因武鬥問題被關押審查多年。2012 年因肺癌病故。

後來聽說，他們于10時向工業校發起第二次攻擊，攻擊隊伍先用土製噴火器進攻，把樓下的窗框打燃後，又被窗內的人用滅火器撲滅。火攻沒有起到作用。

但這次進攻又出現了傷亡：重大一個學生在前邊拍照，被對方的小口徑步槍當場擊中頭部死亡。消息傳出後引起我方人員的震驚和憤怒，因爲頭天晚上我們開槍都是朝天打，朝房頂打。現在他們竟然朝人打，這把大家都激怒了。

重大301部隊司令派人跑到朝陽廠來找到我，向我通報了這一嚴重情況，并且提出，重大受了如此重大的損失，他們帶了炸藥來，要我下命令，用爆破辦法把工業校的樓房報銷了算了。

但我沒有同意。我看到情況嚴重，不能不再到現場去看看。當我返回幼師去瞭解前綫情況時，攻擊隊伍已衝進大樓了，實際上校園裏并沒有地雷，大家膽量就更大了。裏面的人也沒怎麽抵抗，不敢露面，外面攻擊的人就組織人搭梯子爬上房子，從樓上往下壓，逐屋搜索，將工業校全部占領。

這一仗，雙方都有傷亡[1]。聽說我們抓了對方上百人，全部押回重大去，怎麽處理的我不清楚。

當俘虜押走，我們一些人在打掃戰場的時候，駐軍的制止武鬥小組從工業校後面山上下來，把我們的人勸走了。據說因此有一些躲藏在山洞裏的砸派這時才出來，逃過了我們的抓捕。

這次武鬥以後，我們大造輿論，爲自己進攻行爲辯護，說是爲化龍橋革命群衆“除害”，宣傳我們打得“有理”。

所謂“釘子”拔掉了，但山城重慶的武鬥從此也升級成爲動槍動炮的現代化戰爭。

---

[1] 據瞭解，重慶工業校1967年“七二五”事件中，八一五派重大學生被打死2人，八一兵團被土燃燒筒失事燒傷後搶救無效死亡1人；反到底派被土燃燒瓶擊中燒傷後死亡1人，被打死6人(均爲中學生，其中女生1人)。

私怨加派性引出的一樁冤案

“七二五”打工業校過後，化龍橋一帶沒有再發生大的衝突，相對其他地區顯得比較平靜。有一次五一技校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到化龍橋糧食倉庫搶糧，也被八一五化龍橋地區指揮部如數追回。整個化龍橋地區基本上在八一五派控制之下。

一天下午，我在革聯會接到朝陽廠主持工作的八一兵團2007團頭頭胡友年的電話，他告訴我，砸派的鄒新峰在三村家屬區搞了一個觀察點，專門監視我八一兵團的行動，竊取情報，與體育館的砸派聯繫密切，成爲我八一五派的一個心腹之患。他要我派八一兵團總部的武鬥人員去，將鄒新峰秘密抓起來警告一下，打掉那個觀察點。并且說，最好做得與朝陽廠2007團無關的樣子，以免在廠裏引起風波。

我同意了。馬上叫舒斌把八一兵團總部那邊的王朝達叫來，我對王朝達交代，調集他手下的武鬥人員十多個人，晚飯後去朝陽廠執行任務。

晚飯後，我跟王朝達他們一起，坐上陳如松開的一輛南京牌汽車，很快就開到了朝陽廠。陳如松原來就是我們廠裏的司機，對道路十分熟悉。

到廠後，我叫車上的人都不要聲張，不要下車，等候命令。我和王朝達到廠辦公樓三樓原保衛科辦公室，這裏現在是八一兵團2007團的辦公室，我找到等候在那裏的胡友年。他把情況介紹以後，對我說，主要是警告鄒新峰一下，要他停止對我們的監視、干擾。我問他鄒新峰在什麼地方，他說現在應該在家裏。我叫他找個人帶路，他說找周明全，跟鄒新峰是鄰居。

不一會兒，有人把周明全找來了，同周明全一起來的，還有個熊義成。熊義成一聽說要抓鄒新峰，就熱心地提出同時把另一個女工也抓起來，說她是跟鄒新峰一起的，也是個鐵杆砸派。我問胡友年怎麼樣，胡友年說那就兩個都抓吧。我就叫王朝達把手下人分成兩路，一路跟周明全去抓鄒新峰，一路跟熊義成去抓那

個女工。我和胡友年在團部等消息。

大約二十分鐘後，他們就把任務完成回來了，周明全跑上樓，說鄒新峰已經抓到了，當時鄒的大兒子（已經是個十幾歲的小夥子了）護着他老子不讓抓走，還跟我們的人打起來了，結果屁股上被戳了一刀“放血”（這是武鬥中雙方都常用的虐待俘虜的手法）。我問抓的人在哪裏，他說在下面。

我就隨周明全下樓去，走到廠門口，碰到動力科蕭素珍師傅，她悄悄用手指給我看抓到的人關押的地方，是對面馬路邊上職工宿舍的一個房間。我到門口去看了一眼，看到兩個人都被反綁着雙手坐在地板上，兩人的頭都被用他們自己的衣服蒙着。

我沒有做聲，不想讓他們聽到我的聲音。因爲畢竟是一個廠的人，以後還得在一個廠裏上班，在一個家屬區裏生活，低頭不見抬頭見。胡友年之所以要我派八一兵團總部的人來教訓鄒新峰，也是出于這種考慮。這次抓他們，其實也并不想做個什麽，只是給他們一個警告，一個威脅，把他們嚇走，不要再留在廠裏妨礙我們。

我轉身過來，叫王朝達的人把他們押上車帶走。

車開到李子壩，我就叫停車，要王朝達喊車上的人把兩個人抓下車來，警告他們不要再爲砸派賣命，要趕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然後把他們放了。我們就開車返回了八一兵團總部。但是那兩個人綁着的手沒有給他們解開，頭也仍然是用衣服蒙着的。

這次抓人行動，在那個幾乎每天都在死人的動亂時期本來只是小事一樁，不足爲奇，可是沒想到後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却引出了一樁冤案：那個被熊義成提議抓了的女工，一口咬定說熊義成抓她過後把她强奸了。當時正在“一打三反”的風頭上，熊義成就被逮捕入獄。當時的原則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越不認罪就越要收拾你，結果把他判了三年徒刑，還開除了公職。

後來到了 1976 年，我已經離開朝陽廠，在 630 廠工作了。從重慶來的公安局外調人員找我瞭解那次所謂的抓人强奸案的情况。我如實向他們講了我的懷疑，我認爲强奸不可能，因爲時間

很短，而且臨時關押的屋外又有武鬥人員看守着。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經過詳細寫了個材料給他們。重慶市公安局經過認真調查，最後那個女工也改了口，承認自己是出于派性情緒而亂咬的，“强奸”案終于被否定，熊義成得到平反，回廠恢復工作，補發了工資。

這件事，回想起來，都是派性惹的禍。熊義成跟那個女工本是鄰居，大概平時有些私怨，就想借助派性，趁我們八一兵團總部武鬥隊來抓鄒新峰之機，把那個女工也抓起來教訓教訓。沒想到那個女工也對熊義成進行報復，而且報復得使他進了監獄。

在那個動亂年月裏，這種私怨利用派性、派性夾雜私怨而導致矛盾激化造成的人間悲劇，實在太多了。這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例子。

中學生拿槍對準我們

拿下工業校之後沒幾天，7 月 29 日，江北區轉盤一帶發生了武鬥，反到底派的三鋼廠延安兵團和長安廠軍工井岡山聯手攻打我們八一兵團的長安廠 20 團，20 團的頭頭朱顯萬和陳仲學反復給革聯會作戰司令部打來電話告急，要求速調隊伍增援。這時在司令部的有我和朱遠容、楊國民、姜永榮、段德昌、蔡明訓、馮衛東、舒斌、向東（機校聯絡員），還有石油校一個姓張的學生頭頭。大家研究後，决定調石油校、五一技校、機校、二十中的學生武鬥隊去增援，由朱遠容負責調動隊伍并帶隊指揮。

朱遠容去了沒有多久就回來了，他嘆氣說這些學生簡直不聽指揮，還藉此機會擅自行動，跑到江北區武裝部槍搶去了。他沒有辦法，就自己回來了。

不一會兒，機校、二十中的一些學生端着槍來到革聯會作戰司令部，找我要子彈。我給機校批了兩箱，當時我知道他們武鬥隊就包括了二十中的學生（二十中和楊家坪地區幾所學校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都參加到機校武鬥隊中去了，稱爲“機校聯合兵團”），就沒有單獨給二十中批子彈。

沒想到，過了一會兒就衝進來一夥武裝人員，原來是二十中

的三十幾個武鬥人員，他們用槍對着革聯會作戰司令部的工作人員，高喊：“不准動！”然後在屋裏强行搜索子彈。

當時我一發現情况不對，就趁人不注意跑到旁邊一間厨房裏躲起來了。沒有我的批條他們肯定是拿不到子彈的。最後他們把存放在作戰司令部的一箱子彈搶走了。這些小青年走的時候，有人還把槍伸到窗口朝外面對天鳴槍示威，打了 10 發半自動子彈才罵罵咧咧地離去。

長安廠的八一兵團 20 團沒有得到及時增援，這次被反到底派打敗了，被迫撤到了新廠區那邊。不久他們又被趕出了江北區，撤到江北縣兩路鎮去了。一部分人跟着方文正、廖明華到處“打游擊”，根本不聽任何人指揮。

現代戰爭需要有電臺聯絡

1967 年 7 月 25 日，正是工業校事件那天，武鬥結束後我剛回到朝陽廠，舒斌就坐船從化龍橋上岸回來了，他通知我，要我立即回作戰司令部開會。

午飯後，我搭乘衛生八一五的一輛救護車回到革聯會作戰司令部。

大概在晚飯後，有段德昌、姜永榮、蔡明訓、楊國民等人，可能還有朱遠容、謝思全、劉萬秋、馮衛東（那時這樣的會議經常都有，現在已經記不清具體參加人員了），在作戰司令部開了個會，會議主要研究在江北轉盤支持長安廠八一兵團對抗反到底派攻擊的問題。

談到當時的情報交流和指揮、通訊所面臨的困難時，就扯到了聯絡問題上。段德昌提出，首先要解決通訊設備，才能適應現代化戰爭的需要。

姜永榮說：“老陽，你們八一兵團不是有電臺嗎？現在不拿出來用還等啥子時候？”

我說：“我們八一兵團步話機還沒有生產出來，有的都是大的。我可以聯繫一下看，但是根本不適合前綫打仗使用，最好能在哪

裏搞點步話機。”

楊國民說：“姜永榮你們船上不是都有無綫電嗎？船一進港都要用無綫電聯繫……”

姜永榮說：“我們港口只管船進港的事，船是長航兵團管的。還是你們八一兵團拿出來好了，你陽增泰未必還調不動嗎？”

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有的叫姜永榮想辦法，有的叫我想辦法，正在爭論不休時，外面站崗的人來通報何志誠來了。

姜永榮一聽，突然站起來說：“對了，老何是長航兵團船舶戰鬥團的頭頭，是實力派，他們船上有電臺，問他要嘛！”

何志誠走進來後，姜永榮給我們互相作了介紹。我就非常客氣地歡迎老何的到來。何志誠來的目的是想搞槍、彈。我就藉此機會向他提出要電臺的問題。老何滿口答應。我沒想到問題這樣輕易就解決了。

第二天，老何就用小車把“電臺”送來了。大家一看，怎麼像個電話機？我有些疑惑，問老何：“這是啥機器？”老何說是無綫電話機。

雖然不是我們想要的電臺，我們心裏還是很高興。但是只有一部怎麼用？

這時我就想到從我們廠裏想辦法，從廠裏拿一個出來，同老何拿來的配成套，就不愁前綫打仗聯絡不上了。

就在當天上午，我馬上就用自動電話向我廠挂電話找李華權，我問他手搖機試機用的電臺在不在？李華權說林金熔他們在修。我就提出我這裏要一部。他說要得，修好過後一定給一部。

大概在晚上，我又給李華權打電話問電臺修好沒有。李華權說不行了，姚國章拿到長安廠去換重機槍去了。我又問他廠裏還有沒有，他說：“有嘛，廠頭要用噻。”

我就在電話上嚴肅地對他說：“你一個廠重要還是全市重要？”

我們那時候的人都是受正統教育成長起來的，都有大局意識。李華權當然不好再說什麼，答應儘量想辦法。

大概在 7 月 27 號上午，李華權用汽車把一臺完整的八一型

收發報機和一個只有發訊部分的半臺八一型收發報機外加兩部65瓦手搖機、一個三用表、一對甲電池，給我運到了設在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辦公樓的《八一戰報》編輯部門口，我就派人把機器搬到魯大東住房三樓一間小屋。交我妻子蕭華勛管起來（她當時臨時調來替我守電話）。

在搬機器的同時，我發現車上還有部手搖機，就問李華權是拿到哪裏去的，李華權說是八一兵團總部謝武周打電話要的。他一邊說，車子一邊開動，到八一兵團總部（團市委）去了。

機器拿來了，大家看見都很高興，但是都用不來，又缺耳機和話筒。段德昌說他去找郵電八一五借。

大概過了一兩天的一個早上，段德昌打電話把郵電八一五的頭頭曾步勝叫來了，我從洗漱間出來，段德昌給我們作了介紹，我就帶起曾步勝轉了幾個屋，檢查了原電話綫路和指定安裝電話的地點。我問老段耳機話筒借到沒有，老段說：“郵電的頭頭都來了，還怕借不到嗎？”

老曾問我：“你們有電臺沒得？”

我說：“有，就是缺耳機和話筒。”

他要求看一下，我就帶他上三樓看機器。他只看了一眼，沒有多說什麼。在這過程中，我又向他提出借耳機和話筒的問題。老曾說：“老段打電話說過，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中午飯後不久，安電話的兩個師傅，一個年紀大的，一個年青的，就來了。下午就安好了。我還問了他們無綫電話機能不能用我們廠拿去的機器通話，他們說不行。

7月30日晚上，段德昌突然從外面進來，要我準備一下，郵電八一五有電臺拿到我們這裏來，要我派人作好接應。我一聽心頭很高興，就派舒斌、楊國民等安排接應，把三樓打掃乾淨，放出崗哨。

大概在晚上11點鐘左右，去接應的人和老段帶領郵電八一五的楊忠富等三個人進來了，他們徑直到了三樓。把機器放下後，其中一個說要檢查一下機器摔壞了沒有。我問老段怎麼回事，這才知道，他們幾個人因偷運電臺翻墻到交際處。被解放軍發現，

喝問：“幹什麼的？”他們慌亂中從墻上摔了下來。幸好機器檢查結果是好的。

然後我請他們檢查一下我們的機器。舒斌進小屋把機器搬出來，又把 65 瓦手搖發電機拿一個出來開封，架好。他們一檢查，發現缺接綫板，無法接電源。就把他們機器上的接綫板取下來暫時接上使用，楊國民、舒斌也去幫忙搖馬達。檢查結果機器是好的。他們還特別稱贊我們的手搖發電機比他們的好。當時我認爲他們拿來的機器是給我們作配套用的，檢查完了才知道是給北碚郵電局的。

最後他們向門外走的時候，段德昌拍着其中一個人的肩膀說：“你們給我們司令部弄一臺怎麼樣？”對方沒立即回答。

我對楊忠富說：“我們機器缺的零件，能不能設法解決一下？”

楊忠富說可以。他也就在這天晚上算是報了到，成爲革聯會作戰司令部的成員了。

也就在 7 月底的一天，我打電話到朝陽廠，把李華權叫到革聯會來，交代了要電臺的事宜後，又派革聯會的謝思全、舒斌同李華權一道返廠，用廠裏小車，把一臺測試檢查産品用的八一型 15 瓦收發報機運到國防工業政治部。當時缺天綫、耳機、電鍵、插頭，以後都由郵電八一五頭頭楊忠富設法解決了。

混亂的楊家坪戰場

這時，江青有關“文攻武衛”[1]的講話已經傳遍全國。參加武鬥的人們哪個不認爲自己是在自衛？于是都有了合理的依據。

[1] 江青在 1967 年 7 月 22 日淩晨接見河南代表時的講話中說：“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衆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議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後來許多著述都把江青這個講話作爲導致 1967 年各地大規模武鬥的主要原因，有的還將“文攻武衛”口號誤記爲是江青提出的。

1967年7月底到8月初，大坪、楊家坪地區兩派動用現代化武器，發生了十分激烈的武鬥。建設廠反到底軍工的“紅大刀”等組織武器優良，戰鬥力强，建設廠八一兵團6657團本來是在廠裏掌權的，却被打得節節敗退，其占據的單身職工宿舍，著名的“彎彎大樓”，在雙方激戰中被燒毀，6657團被迫撤出。楊家坪地區的三十五中、二十中、衛校的八一五派都相繼被趕出了本單位。

這些消息不斷傳來，我們聽到後，復仇的情緒更加高漲。

8月1日，建設廠八一兵團的頭頭周榮華和潘某等來到革聯會求援，我同周家瑜等在交際處一號樓會議室召集了八一五派的全市武鬥指揮人員會議。

這次會議沒有怎麽爭論就一致通過了一個作戰計劃：爲了給建設廠6657團解圍，同時藉此機會一舉控制建設廠，以取得該廠生産的半自動步槍，解決我派缺少優良武器的困境，組織多路人馬，集中優勢兵力，拿下建設廠。會議指定建設廠的潘某和姚永年（外號姚二炮）爲武鬥前綫指揮官。

會議開完後我又處理了其他一些事情，很晚才休息。深夜4點鐘左右，我睡意正酣，被司令部值班的蔡明訓從睡夢中叫醒，他向我高興地喊着：

“報告好消息！”

我迷迷糊糊地問：“啥子好消息？”

他說：“建設廠拿下來了！”

我有點不大相信，問他是誰告訴的，他說是唐忠明在2號樓打電話告訴的。

我還是有點不大相信，那麽重要的建設廠，反到底派能這樣輕易就放弃嗎？我馬上又打電話問唐忠明是哪裏來的消息。唐忠明說是公安總部的電臺告訴的。應該是可靠消息。

我當然很高興，馬上叫蔡明訓等打電話通知各兵團總部去建設廠提槍。

大約過了一、兩個小時，有些總部就打電話來了，不是報告好消息，而是罵我們革聯會作戰司令部亂傳消息。

隨後一瞭解，才證實并不是建設廠拿下來了，而是負責給打

建設廠的隊伍帶路的潘某大概是臨陣畏怯，沒有去。各單位武鬥隊到了楊家坪後，沒有統一指揮，無人帶路，像沒頭蒼蠅一樣亂作一團。空壓廠的頭頭方文正見此情況，靈機一動，就召集各隊負責人碰頭，提出將隊伍帶去打空壓廠……

因電話不通，當時革聯會作戰司令部與下屬各單位也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通訊聯絡，作戰司令部一點情況都不瞭解。不知怎麼就把“空壓廠拿下來了”誤傳成“建設廠拿下來了”。有的單位聽說這個“好消息”後，急忙派車去提槍，結果汽車開進了反到底派的火力控制區，遭到槍擊後發現情況不對才趕緊倒了回來。

隨即我又聽說，我們朝陽廠 2007 團的頭頭李華權在參加打空壓時肩胛骨被子彈打穿，胡瑞明胯下睾丸被打掉一個，都住進了七醫大救治。我急忙叫了車趕到七醫大去看望他們。他們也給我講了當時現場的混亂情況。

更爲嚴重的是，在打空壓期間，發生了空壓廠八一兵團槍殺俘虜的惡劣事件。

當時我幷不知道此事，也完全想不到，這一事件後來會給我帶來十分嚴重的影響，成了八一五派內部某些人暗中整我的一個藉口。

周家瑜叫我準備電臺上前綫

8 月 2 號空壓廠勝利的消息傳來後，周家瑜對我說，要我想辦法搞部電臺上前綫，藉打空壓的勝利，集中兵力把建設廠拿下來。

我問：“你去不去？”他點頭說要去。

我回到設于魯大東住宅的作戰司令部，正碰見郵電的楊忠富來了。我叫他晚上給電臺試試機，準備帶上前綫。

他問：“前綫……在哪裏？”

我說：“在楊家坪一帶。”

晚飯後得到消息，說有砸派要來襲擊革聯會作戰司令部。爲了防止意外，我和段德昌、蔡明訓、楊國民、朱遠容、黃竹然等

研究，決定把電臺搬到市委院內國防工業政治部，分兩處辦公。

當天晚上，楊忠富、曾步勝、阮和勝他們來試機的時候，那部完整的電臺已經搬到國防政治部樓上。另外半部和無綫電話機、65 瓦手搖機、三用表，搬到了國防政治部那棟樓裏《八一戰報》編輯部吳德新住的房間裏。

8 月 2 號晚上，朝陽廠和國防工業政治部兩邊開始試機。

在國防工業政治部樓上負責試機的有曾步勝、阮和勝、楊忠富，另外幫忙的還有舒斌、蔡明訓、楊國民、黃竹然等。在朝陽廠負責試機的主要是林金熔。試機用的天綫是曾步勝從郵電局拿來的。耳機、話筒、電鍵是楊忠富帶來的。另外阮和勝還拿了一些零星小東西。試機前是我打電話回廠（舒斌也打過）通知團部、再通知林金熔來接電話，在電話上決定通話時間等。曾步勝在電話上同林金熔具體協商聯絡方法等。由于對方是用的收音機在收訊，反復試了幾次，都沒試通。因時間太晚了，林金熔在電話上答應第二天再試。結果第一次試機沒有成功。

因夜已深了，曾步勝、楊忠富、阮和勝他們就在樓房裏就地休息。第二天早上才回到郵電局去。

8 月 3 號下午，我接到林金熔電話，說顏笑竹到國防工業政治部試機來了。接電話不久顏笑竹就來了。當時國防工業政治部只有我和周明全、楊明全和蕭華勛等幾個人，都是朝陽廠的，就幫忙搖馬達。顏笑竹就同朝陽廠那邊的林金熔兩人通話，我聽他倆在呼叫什麼“太空，太空，我是大地，你聽到了沒有，請回話”，如此反復數次。

試機要完時，楊忠富、舒斌等來了。楊忠富和我都戴上耳機呼叫了幾下。當時試機的目的主要是檢查機器能不能通話，怕到時候上了前綫通不了話，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

這當中還有個細節。楊忠富準備機器的時候，周家瑜來了，還到機房去看過一下。當時從朝陽廠來試機的顏笑竹正在機房，因他只聞周家瑜大名，未見過人，周家瑜進機房時他不知道是誰，沒有在意。當周家瑜出門到另一房間時，他才聽人說“周三高”來了。爲看清楚周家瑜，他跑出房間去到處問哪個是“周三高”，

舒斌等人專門指給他看，他看清楚了才滿足了。

這部電臺後來交給了楊忠富，作爲革聯會作戰司令部主機臺。

這部電臺于 8 月 3 日晚 12 時正式同師專通話。以後，我不在司令部時就由段德昌和姜永榮負責，具體管的是蔡明訓。後因得知反到底要打過來，于 8 月 12 日停臺，14 日轉移。1968 年 5 月 5 日由舒斌把機器運回廠。

在這期間與電臺有關的還有件事情，但具體時間我記不清楚了，只大約記得是 8 月初的一天，那天正下着雨（這個印象很清楚），716 廠（無綫電廠）的張大群、王成遠先到八一兵團總部，隨後又到國防工業政治部來找我，問我要武器和資料。他們看見我們屋裏放着電臺，就很興奮地問：“可以通話不？”我說還沒有試機，不能通話。

我就問他們：“你們廠裏有沒有 104 機？”

張大群說可能有，王成遠說有。我就說：“那你們就拿一臺來嘛，這是總部開會研究過的，爲了加强聯絡……你們的馮一勝曉得，他說過，只要有就拿出來用。”我當時找他們要的目的，是想裝在汽車上機動靈活配套使用。

張大群聽我講後，就說可以，回廠去找頭頭。我又問他馮一勝在不在，他說在。我就叫舒斌馬上打電話到八一兵團總部找曾久泉，把他開的嘎斯 69 車開過來。舒斌去打電話的時候，我就給張大群、王成遠批了到長安廠要重機槍的條子。

舒斌打完電話回來，我又開了張條子，蓋了革聯會的公章，叫舒斌拿着去找馮一勝要 104 機。

然後舒斌就和張、王二人坐曾久泉的車去無綫電廠。他們走後，我也打過電話給無綫電廠找馮一勝，但未找到。

天黑以後，舒斌和曾久泉二人回來了，說馮一勝沒見到，只找到他們廠裏另一個頭頭劉德富，他不同意給。只給了點甲乙電池。我聽了有點不高興，革聯會會議上決定了的事，他們怎麽不照辦呢？我又打電話到無綫電廠找劉德富，但他可能知道我是說這個事情，不接電話。我再打電話找馮一勝，人也不在。看來他們對這事還有顧慮。後來還是通過郵電八一五解決了這方面的問

題。

幾天過後，因又得到砸派要來襲擊的消息，擔心電臺放在國防工業政治部辦公室裏也不安全，我就找國防工業政治部認真戰鬥團一個姓于的頭頭，請他想辦法把東西轉移一個地方藏起來。

——9 月份我從沙坪壩進城後，向這個頭頭問起機器的下落，他說，8 月 15 號砸派武裝衝擊市革籌大院時，把機器全部抄走了。他是把機器藏在原市委機關圖書室裏，用圖書蓋起的。

我這時也去看了一下，圖書室和國防工業政治部確實被抄得不像話，辦公用的桌子、櫃子的門和抽屜全都被撬開了，沒有一個完好的。東西被洗劫一空。

在工學院前綫指揮部險些中彈

1967 年 8 月 3 號下午，周家瑜到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來找到我，他問：“上前綫的電臺準備好沒有？”

我說：“還沒有。好久走？”

他說：“越快越好，不然那邊說我們當頭頭的怕死……”

我趕緊叫楊忠富把電臺準備好，上前綫。

他問：“什麼時候走？”

我說：“越快越好。”

他回答：“可以可以。”

楊忠富很快就把機器準備好了，對我說可以走了。我就叫蔡明訓找劉乾均（重慶市交通局汽車修理廠工人）把中吉普開過來，給楊鬍子（楊忠富的外號）裝電臺。

楊忠富辦事很能幹，在準備上前綫的同時，還調了郵電八一五的王思貴、鄭賢芝二人到國防工業政治部來負責電臺報務工作（後來我曾起草過電報交鄭賢芝發給師專，內容是詢問前綫情況）。

那天楊忠富另外找了郵電的陳國安、何啓群和他一道上前綫。爲了保證通話不誤，楊忠富行前還和王思貴在放電臺的桌子上編好了密碼，并決定晚上 24 時正式通話。

一切就緒後，我很滿意，對楊忠富說：“你們先走一步，我還有點事，晚一步來。”

我晚走一步，是周家瑜在國防工業政治部找我們開了個小會，在新設電臺機房隔壁一間辦公室裏，參加會的有楊大渝、朱遠容、蔡明訓、楊國民等。周家瑜主要是向我們通報了所得前綫情報：建設廠八一兵團、二十中、三十五中、機校、衛校等已被趕出，工業學院吃緊……大家研究後，決定周家瑜、陽增泰，唐忠明、朱遠容等人上前綫，實地瞭解情况後作出下一步部署。其他的人留下，隨時隨地同我們保持聯繫。

晚飯後，周家瑜、唐忠明搞到一部汽車先走了。我和朱遠容到市委機關總部車隊去借了陳師傅開的一部米黃色轎車，前往我們所說的“前綫”。因爲從各方得到的消息是凶多吉少，前綫情况十分令人擔憂，臨走之前，我大聲對留下的人們說：“如果我這次‘光榮’了，請在我的墳上送一個花圈！”

按照約定，我們沒有直接到楊家坪，先到沙坪壩師專碰頭。周家瑜他們先到，不知到哪裏去了，我和朱遠容就到師專指揮部（生物大樓二樓）去，當時我不知楊忠富他們到沒到，就問在師專負責八一兵團野戰部隊的湯少成：“裝電臺那部車來了沒有？”湯少成叫我跟他去看。

結果就在辦公室隔壁房間裏，推門進去，就看到機器早已安好。楊忠富看到我進來很高興，給我說：“聽說去空壓的路不通，我們聯絡的時間又要到了，在湯司令的關懷下，就把電臺架起來了。”

我表示滿意：“可以可以！”

8月4日，我們從城裏到師專的這幾個人，與原在師專的湯少成等人一起，在生物大樓一樓（湯少成睡覺的房間外間）開過一個小會，時間比較短，主要是進一步瞭解前綫情况。因師專的人都說不清楚，就決定馬上到石坪橋前綫指揮部再研究。我印象

中，北碚捍紅總部的頭頭湯大華[1]也參加了這個小會，我也在此第一次認識了湯大華。

當時湯少成還給我提出要重機槍子彈。會散後，我就到二樓電報機房，用鉛筆起草了一份電報稿，交楊忠富發國防工業政治部段德昌、蔡明訓、楊國民，大概內容就是要他們設法解決一批“大花生米”速運師專。

下午，我和周家瑜、朱遠容、唐忠明等頭頭及其他一些人坐車到了石坪橋的前綫指揮部。指揮部設在建築公司樓裏。我們一下車，就有人迎上來，把煮熟的雞蛋塞到我們手裏，我有些措手不及，很不好意思地接住了，心裏很是感激這些熱心群衆。我這才注意到，馬路上有不少支持八一五派的群衆，端着煮好的飯菜、熱茶，在慰勞我們的武鬥人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裏很有“正義戰爭”得到人民群衆支持的感覺。後來才知道，其實兩派的武鬥人員都有贊同其觀點的群衆在支持、慰勞。

石坪橋指揮部的人說，工學院還有一個前綫指揮部，那裏是最接近楊家坪前綫的地方，是工學院的武裝部長夏德科[2]在坐鎮。

天黑以後，我們幾個頭頭就由一隊武裝人員帶路到楊家坪前綫，轉來轉去，從一處破墻洞鑽進去，到了工學院。

在一個燈火通明的房間裏，我們會見了已經聽人們多次提到

---

[1] 湯大華，1945 年 1 月生。工人出身。文革爆發時爲四川外語學院法德系德語專業二年級學生。共青團員。參加造反後任四川外語學院八二六戰鬥團主要負責人。1967 年春因對革聯會問題分裂爲兩派後任八一五派川外八二六星火燎原縱隊主要負責人。武鬥期間任八一五派北碚捍紅總部主要負責人。後任四川外語學院革命委員會常委。畢業分配到國務院外辦，曾被下放到廣東汕頭牛田洋軍墾農場，是 1969 年 7 月 28 日那次愚昧的“戰颱風”（犧牲解放軍官兵 470 人，大學生 83 人）悲劇的幸存者。後被安排回四川工作。因金光中（同爲川外八二六星火燎原頭頭）“現行反革命案”（金在雲南服役部隊秘密串聯個別人提出推翻九大路綫恢復八大路綫）牽連，被勞教三年。文革結束後平反，但隨即又遭到清查，以文革中犯有“組織指揮武鬥”錯誤，受廠內警告處分。

[2] 夏德科，時爲重慶工業學院教務部部長，轉業軍人（瀋陽炮兵研究所轉業），中共黨員。文革結束後曾因武鬥問題受到清查。已病故。

的工學院前綫指揮夏德科，這是一個胖胖的中年幹部，人們都稱他“夏部長”，但我當時幷不清楚他是什麽部長，只聽說是武裝部長，後來才知道是教務部長。我們進去時，他正在指導一些武鬥人員如何在窗口向對方進行射擊，同時保證自己的安全。

周家瑜和夏德科是認識的，他倆相互握手後，周家瑜向他介紹了我們幾個人，然後夏部長帶我們另外找了一間小房間，開了個臨時現場會。他給我們介紹了情况，又帶我們到外邊去查看地形，有一個戴眼鏡的老師大概是他的秘書，一直緊跟在他身邊。他介紹戰場情况時，那個老師有時還會拿一塊小黑板按他要求畫出示意圖。

我們商量了如何防守和奪取建設廠制高點清水池的計劃，以及如果戰事不利如何撤退的辦法，還規定了撤退時由指揮部打三發紅色信號彈。朱遠容帶去了一支信號槍交給他們。

研究之後，我趁他們在給參戰武鬥隊頭頭作布置的時候，獨自走到大樓走廊的盡頭去，從走廊盡頭的磚墻角落探頭出去觀察對方情况，沒有看到一個人影。我剛縮身回來，就聽到“啪”的一槍打過來，剛好打在我剛才探頭的地方，把那一處磚墻轉角的紅磚打掉了一角。我暗自吃驚：好險！心想對方一定是個神槍手。

在前綫指揮部這天晚上，我曾看見空壓廠八一兵團的頭頭姚安民和另一個我不認識的人，用兩部坦克電臺在指揮坦克向清水池制高點的 1 號、2 號、3 號陣地進攻。

第二天，8 月 5 號早上，我們正在夏部長的前綫指揮部策劃攻打清水池，打算一舉奪回建設廠的計劃時，周家瑜收到一封發給他的電報，要他馬上去警司，警司首長要接見。于是他就提前離開了。

我們計劃 8 月 5 號上午 10 時發起總攻。這時我接到師專湯少成發來的電報，說“大花生米”缺，城裏不給，要我親自去解決。大家同意我回去調運子彈。

于是我坐上陳師傅開的米黃色小車，用 100 碼的速度回到師專，與湯少成接頭問明情况後，再進城到革聯會作戰司令部。

我回到司令部才知道，幾天前還出了一件事：他們運子彈時，

反到底派在上清寺工業展覽館打伏擊，把坐在一輛車上的機校駐革聯會聯絡員向東（袁明弟）打死了。

郭一民的態度讓我火冒三丈

8月5日下午，我親自從城裏押運了十萬發重機槍子彈到師專。

我在師專意外見到了從楊家坪前綫回來的唐忠明，我問他開始總攻後的前綫戰況。他把我叫到一旁，低聲對我說：“可能內部出了問題……”

據他講，本來當天上午10時我們向清水池發起總攻後，1、2、3號高地已陸續被我們拿下，指揮部正在研究向縱深發展，不知什麼人却打了撤退信號彈，造成全綫敗退下來。唐忠明看到後，想阻擋也阻擋不住，汽車全開跑了，他都是走路回師專的。他說，到底是誰打的撤退信號彈，到目前也不清楚。[1]

就在這天深夜（6日淩晨），駐渝部隊督促兩派代表[2]于8月6日零時40分達成《關于立即全面停止武鬥的協議》，決定于12時正式停火。

得知停火消息後，我同唐忠明、朱遠容趕到警司，白副軍長和省革籌劉、張派來重慶坐鎮的郭一民[3]出來接見了我們。我們

---

[1] 此事有不同說法，據原八一五派242部隊文籌知情者講，是前綫指揮部的人不瞭解情況，實際上八一五派的進攻缺乏有效指揮，混亂不堪，已經受挫幷開始敗退，但衝到前沿的少數人不知道，還留在清水池制高點堅持，有陷入重圍甚至被消滅的危險，因此在242文籌人員强烈建議下才發射了撤退信號彈。

[2] 兩派談判代表各3人：八一五派葉臻榮（師專八一五）、馮國璉（八一兵團）、楊正中（財貿八一五），反到底派周應古（軍工井岡山）、黃廉（工總司）、王興國（大專院校反到底司令部）。

[3] 郭一民，文革前曾任中共四川省江安縣委書記，與劉結挺、張西挺等一起受到批判處理。文革中1967年4月與劉結挺、張西挺等一起由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宣布平反。1967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建立後任革籌小組辦事組組長。1969年中共中央“一二·二五”批示後被批判、撤職。文革結束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彙報了停火協議被撕毀、反到底派在楊家坪地區繼續向我八一五派開槍開炮進攻、我們許多單位的人員都被迫撤離等情況，我們要求立即派部隊把雙方包圍起來，收繳武器，制止武鬥。

在我們激動的訴說中，郭一民一直用冷冷的目光死死盯着我們。聽我們說完後，他搖頭表示不同意我們的說法。我們要求派部隊占領當時兩派武鬥爭奪的地方——清水池 1、2、3 號高地，隔開兩派，由部隊控制爲中間地帶，使停火協議起到真正的停火作用。郭一民還是不同意。他還帶着明顯的傾向性向我們提出質問，“到底是他們先打你們，還是你們先打他們？到底是誰在破壞停火協議，我們還要調查。”

我們聽他這樣說，頓時火冒三丈，我抓住郭一民說：“好，那就請你跟我們走一趟，我們一起到楊家坪前綫去現場調查，看到底是誰在進攻……”唐忠明和朱遠容也上來，對郭一民拉的拉，推的推，要他跟我們走。

警司首長趕緊過來把我們勸解開了。

我想，郭一民的態度十分明顯是偏袒反到底派的。這樣看來，還是只有憑實力打了。

其實，當時兩派誰都不願意真正停火，都認爲自己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自己有群衆，有後臺，能打贏。

“八八海戰”[1]與朱榮龍之死

還在剛拿下工業校後，我們就得到情報，說砸派在望江廠組建“艦隊”，要來進攻紅港。

紅港就是重慶的水運大碼頭朝天門，文革“破四舊”時改了

[1]1967 年 8 月 8 日，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總部負責人鄧長春爲給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幷提取槍支，主持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沿途與占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長江電工廠等地的八一五派武鬥隊交戰，全市爲之震動。據記載：此事件中“打死 24 人，打傷 129 人，打沉船隻 3 艘，打壞 12 艘，長江交通爲之中斷。”《重慶市志·第一卷·大事記》（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410 頁）

個革命名字。這裏是八一五派港口兵團、長航兵團控制的地區，還有不少重要的國家倉庫。我想，決不能讓紅港落到砸派手裏。于是我就和姜永榮、楊國民、段德昌三人去到紅港，找到長航兵團朱榮龍，港口兵團李習玉，水運兵團姚安國等頭頭開會，商量決定成立我們的“艦隊”。

商定後，我回到革聯會作戰司令部，叫辦公室人員打電話給長安廠，把八一兵團 20 團的朱顯萬、許世明等頭頭找來，經過協商，朱顯萬同意在 7 月 27 號晚上，由長航兵團派船到長安廠江邊碼頭，由他們 20 團組織武裝護送二五炮等武器上船，運到紅港組建“艦隊”。

可是沒想到，到了那天晚上，長航兵團的船到了長安碼頭後，左等右等不見來人，那時既無電話又無手機，無法聯絡。等他們垂頭喪氣回到紅港，才找個電話打去詢問，結果那邊居然說不知道安排護送的人到哪裏去了！

我們組建“艦隊”的計劃就這樣落空。緊接着就發生了“八八”紅港事件：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頭頭鄧長春[1]在望江廠組建的“艦隊”，從長江下游一路打上來。打到紅港時，我們這邊根本無力對抗。鄧長春的“艦隊”中那艘主力船望江 101 號，原來就是國民黨軍閥混戰時劉湘的軍艦，後來被改成瞭望江廠的交通艇，這時又被反到底派將它重新武裝起來，恢復了“軍艦”的本能。他們在船上兩頭都安裝了可以連發的三七炮，這本來是用來支持越

[1] 鄧長春，時爲國營望江機器製造廠工人，共青團員。文革中 1966 年冬（21 歲）參加造反，1967 年 5 月任軍工井岡山總部勤務組副組長，6 月任反到底工總司勤務組常委。1968 年 5 月 31 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1968 年 11 月在中央召開的“八一五”會議上因“武鬥殺人”、“破壞大聯合”等罪名被逮捕。11 月 24 日《重慶日報》發表本報評論員《堅決把混進廣大群衆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點名稱之爲“混進群衆組織、作惡多端的壞頭頭”，并發表《鄧長春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凶惡敵人》、《窮追猛打落水狗，徹底揭露鄧長春》、《鄧長春是毀我長城的急先鋒》等文。文革結束後 1978 年 4 月被判處有期徒刑 20 年。刑滿（減刑兩年）出獄後在私營企業工作。2003 年病逝。

南打美國飛機的高射炮，用作平射，火力極强，雖然那天打出的炮彈都是不會爆炸的試炮用填沙彈，但是也把紅港的建築物打了不少洞，傷了不少人。

被激怒的長航兵團頭頭朱榮龍，駕了一條船從嘉陵江這邊開出去，他船上只有一挺單管的 127 高射機槍，還沒有固定好，打起來根本無法控制。船身也沒有像反到底派的“艦隊”那樣加焊鋼板作爲保護，只是堆了些沙包。但朱榮龍可能是太衝動，什麽也顧不得了。他的船還沒有靠近，便已經被對方的炮火擊中，他身負重傷後，繼續駕船向對方衝去，似乎是想學文革前上映的電影《甲午風雲》中鄧世昌最後駕船衝撞敵艦的壯舉。但他的船在離對方還有幾米遠的地方就沉下去了……這些情況是後來我參加朱榮龍的追悼會時聽他們講的。朱榮龍比我大幾歲，對他的死我非常悲痛。

爲了報仇雪恨，我下令把工業學院那挺原打算反攻建設廠清水池用的四聯（四管聯發）高射機槍調到紅港去，準備等鄧長春的“艦隊”返回時狠狠打它一下。

但是等了幾天都沒有見它返回。復仇計劃落了空。

攻占嘉陵廠

在建設廠武鬥和“八八海戰”接連失利後，我們很空虛，也很緊張。這時二鋼、嘉陵廠不斷告急，三番五次求援。我們認爲當時沙坪壩正處在包圍之中，十分危險。在我們這派頭頭中，產生了兩種思想，一種是守，就是死守石坪橋，不能讓砸派的勢力從楊家坪再往沙坪壩方向擴展；一種是退，就是跑到北碚，準備上華鎣山。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革聯會作戰司令部于 1967 年 8 月 9 日在師專召開了形勢分析會。會議由我主持，參加會議的人很多，一個教室都坐滿了。其中我認得記得到的人有：袁金樑、唐忠明、

朱遠容、吳慶舉[1]、湯少成……

吳慶舉在發言中提出：我們現在武器不行，大多是搶武裝部的老套筒，而砸派那邊主要是半自動，火力比我們强，我們雖然手中也有127、145機槍[2]，但是缺少子彈。因此我們應該首先把嘉陵廠打下來，解決127、145機槍缺彈的問題，這樣就可以彌補我們在武器上的缺陷。

當時，在重慶市內的八大兵工廠中，長江電工廠是與建設機床廠配套生產半自動步槍子彈的，嘉陵機器廠是與長安機器廠配套生產機槍子彈的。長江廠現在被我們占領了，但我們有彈無槍。嘉陵廠的生產區現在被反到底派占據着，我們若不爭奪過來，我們從長安廠得到的機槍也會因缺少子彈而發揮不了多少作用。

會議聽了吳慶舉對形勢的分析後，經過熱烈爭論，都同意了吳慶舉“打嘉陵”的提議,特別是二鋼最積極,袁金樑興奮地大叫：“只要打嘉陵，我二鋼拿出十萬元作後勤開支！”

最後制定出一個“三面包圍嘉陵廠，拔掉釘子，打通沙區到北碚路綫”的計劃。會上,大家選了吳慶舉擔任攻打嘉陵的總指揮，我和唐忠明、朱遠容、袁金樑、湯少成爲副指揮，袁金樑負責後勤供應，湯少成在師專負責兵力調度和同革聯會直接聯繫。我同唐忠明、朱遠容協助吳慶舉到二鋼前綫指揮部執行攻擊任務。

8月12日晚上，我們到達二鋼前綫指揮部。總指揮吳慶舉把二鋼和嘉陵畫的作戰地圖拿出來，分了四個戰區：進廠門左側制高點，辦公大樓，水塔，和廠後的制高點挂榜山，并分別編了號。

---

[1] 吳慶舉，1944年生，四川遂寧人。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大學機械系機冶專業67級（四年級）學生，校文工團樂隊隊長，是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發起人和總團勤務組成員。1967年武鬥中任重大八一五專業武鬥隊301部隊“政委”。多次率隊外出參加武鬥。年底籌建重大革命委員會時，因謠傳其有投靠四川省革籌劉、張，出賣八一五派利益之嫌，遭到排斥。畢業後分配到重慶鋼鐵公司大軋車間任技術員。七十年代初加入中共。文革結束後被關押審查，開除中共黨籍。後自辦工廠。已病故。

[2] 指子彈直徑分別爲12.7毫米和14.5毫米的高射機槍，當時是支援越南打美國飛機的武器，文革中被重慶兩派用到了武鬥戰場上。

在攻擊發起前，我們得到一個消息：嘉陵廠砸派用了大量炸藥做很多地雷，是用電雷管引爆，如果我們攻進去，會有被炸的危險[1]。據瞭解，嘉陵廠的電是通過二鋼輸送進去的，吳慶舉把兵力布置調度後，命令二鋼截斷輸送嘉陵廠的電源。

吳慶舉的兵力部署是：二鋼 2307 造反團和嘉陵廠八一兵團 2301 團打正面主攻，二機校打後側攻。其餘配合作戰，坦克隨時聽從調動。吳慶舉在指揮部把兵力調配宣布後，決定下半夜拂曉發起總攻。

大家走後，我和唐忠明、朱遠容顯得無事，吳慶舉要我們先休息一下。因天太熱，那時連電風扇都沒有一個，我們就在屋外露天搭起凉板簡單睡下。這時大概已經是淩晨兩三點了。

睡了沒一會兒，天還沒有亮，我們被吵醒了，仔細一聽，才知道是進攻已經開始了，但是作戰地圖與實戰相差較大，隊伍互相配合不力，造成傷亡大，進展小。負責率隊攻擊水塔的嘉陵廠頭頭賴德濤從前綫下來，說水塔前沿陣地已拿下，但水塔和辦公大樓的火力很强，隊伍受到損失，無法前進。他要求吳總指揮調後備力量增援，或者要吳慶舉親自上前面火綫去看一下。兩人大吵大鬧，賴德濤手裏還拿着一支手槍亂舞。他罵吳慶舉是“瞎指揮”，吳慶舉也不服氣，發怒說：“我是瞎指揮？那你來指揮嘛！”

我們三人趕緊上前勸解。我還生怕賴德濤手中的那支手槍指指戳戳時走火出事。吳慶舉經我們勸解，氣呼呼地說：“不想幹了！哪個能幹哪個來……”

大家又好言相勸，作了一番撫慰。歇了一會兒，他提出要我們三個副手代他去火綫看一下。他去調動坦克。

隨後，由吳慶舉調來的三輛坦克[2]作前鋒，再次發起攻擊，總算拿下了進嘉陵廠大門左側的制高點。

---

[1] 據瞭解，此說爲誤傳，當時嘉陵廠反到底派無此行動，事後該廠清查武鬥事件時也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方面問題。

[2] 這裏使用的坦克，除了空壓廠生產的坦克外，還有一種是一〇二鋼廠八一五派用解放牌汽車加防彈鋼板幷裝上槍炮拼凑成的土坦克。

這時天已經大亮，我和唐忠明、朱遠容三人，在賴德濤的引導下，到了水塔戰區第一綫，我們走到了山脚下一間小屋，發現一具尸體，問是怎麽一回事。在場有一個人說：“是砸種，他一個人打三挺機槍，亡命得很。我們攻擊受阻。有幾個同志繞道接近他的地堡，趁他背朝我們用那邊那挺機槍時，我們搭人梯上去把他幹掉了。”[1]

我們聽了，表揚他們打仗善于動腦筋，想辦法，要他們總結經驗以利再戰。說話這個人忙說不是他幹的，幹的人已衝進去了。

我們又爬上水塔地堡，看見地堡專用電話已被打爛。

這時守在辦公大樓的反到底派人員，因見大門左側高地和水塔高地已被我方攻下，他們就撤走了。全廠除廠後的制高點挂榜山外，基本由我派控制。

我們三個跟隨老賴等人向縱深前進。走到變電站外面時，有人叫我們去看，看見變電站裏裏外外埋了很多疑似地雷的東西，我想，幸好斷了電，沒有炸。

退守挂榜山的反到底派還在向這邊不斷射擊。爲了整個戰鬥的徹底勝利，我們三人又將唯一的一輛四聯高機調過來，集中火力攻挂榜山。終于把挂榜山的機槍打啞了。

這時，我得到報告，說砸派的人員紛紛乘坐大小船隻往嘉陵江對岸搶渡逃走。我們打高機的是建設廠的陳師傅，他問我打不打那些渡江的人，我問他：“高機可以往下打嗎？”

他說：“可以往下 5 度打，打到河裏不成問題。”

我說：“算了，不打他們。我們的目的就是把他們趕走。只要把他們趕走了，我們拔除釘子的目的就達到了。”

當我們三人返回指揮部時，吳慶舉已不見了，聽說他已坐坦克回重大去了。指揮部也搬到二鋼家屬區去了。

這時在河對面的反到底派爲了掩護他們的人撤退，也爲了報復，用三七炮往這邊猛轟，把辦公大樓打燃起火，大家正去救火時，

[1] 這個一人打三挺機槍守衛水塔制高點的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嘉陵兵團成員叫黃銀成，嘉陵機器廠司機，四川江安人。中共黨員。終年 40 歲。

火把裏面存放的很多子彈引炸了，烈火中只聽得一片劈裏啪啪的子彈爆炸聲，彈殼滿天亂飛，誰也不敢接近一步。眼巴巴看見大樓燒掉，剩下一堆廢墟。

當辦公大樓還沒有燃燒完時，江對面又打過來三七炮，把一個倉庫擊中起火，倉庫中又有不少 127 和 145 子彈爆炸。

8 月 14 日晚上，嘉陵江對面反到底派的三七炮彈不間斷地飛向嘉陵廠的水塔和各交通要道。爲防止對方組織反攻，我方從二鋼廠江邊用重火力封鎖了江面，對方無法反攻，只好隔江打炮報復。

有人槍殺了女俘虜

我們走到新的指揮部時，無綫電廠出的一部接力機正在安裝。

剛坐下不久，外面有人大叫“陽司令”，我出去一看，看見二鋼廠的一個頭頭周胖子和嘉陵廠頭頭湯少成的警衛員、外號叫“張癟嘴”的，兩人手中各提一支手槍，氣呼呼地向我走來。我身上沒武器，一眼看見這個情況，心頭還有點緊張。後見他們不是對準我來的，才放了心，問他們有啥子事。

周胖子用提槍的手指着老張說：“他在我二鋼廠隨便槍殺俘虜，影響很壞，群衆要求執行紀律，以命還命！”

我聽了一驚，忙問張癟嘴：“你爲什麽要槍殺俘虜？”

張癟嘴辯解說：“不是我槍殺的，是學生先開槍，我是補的火。”

周胖子反駁說：“群衆都說是你開的槍！人家押着俘虜在前邊走，你在背後一槍把人家打死了，還是個女的，說是砸派的廣播員。”

我大聲斥責說：“不管她是什麽人，槍斃俘虜都不對，補火也是錯誤的！”

周胖子直問我“怎麽說”，手裏的槍不停地在我面前晃。我說：“補火肯定也是錯誤的，把名字記下來，運動後期處理。”

周胖子聽了，眼睛一瞪，不服氣地說：“這樣簡單就處理了呀？我回去怎麽做工作？”

我給周胖子解釋說：“我們群衆組織無權殺人。老張說是學生先開槍，他補的火。學生是誰，你抓到沒有？你把老張執行了紀律，你負得起責嗎？”

周胖子張口結舌無法回答我，他想了想，不得不同意了。

但張癟嘴又不同意，他央求說：“陽司令，這點事還要記我的名字呀？我跟着湯司令跑了那麽久，就算了嘛！”

我說：“記個名字你都不同意，老周說要把你執行紀律，執行紀律就是槍斃，你願不願意？”

姓張的只好說：“好嘛好嘛，記名字嘛。”

其實我也沒有記下他的名字。後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有嘉陵廠和二鋼的外調人員來找我調查此事，我如實將有關情況給他們寫了文字材料。我問外調人員：姓張的爲啥子要打死那個女廣播員？有什麽深仇大恨嗎？他們告訴我，姓張的原來追求過那個女子，人家沒答應，不跟他好。他就利用文革武鬥之機，以派性爲掩護，把人家槍殺了[1]。姓張的自然被逮捕判刑。那時候不管派性有多嚴重，但是人們對于殺害無辜者還是很反感的。

除去殺俘以外，當時群衆組織的武鬥隊還有些違法亂紀行爲也引起人們的反感。只是當時普遍認爲只要“大方向正確”就好，對“細節”問題就不大在乎。頭腦狂熱的人們很少想到運動後期會受到清查處理。

當時我們八一兵團下面也出現過一些違紀情況。1967 年 8、9 月期間，方文正的隊伍被打出空壓廠以後，與嘉陵廠的廖明華合夥，同謝武周、秦老么、周學川、張正良、歐祖良、平玉等帶了些人活動在北碚、江津、華鎣山等地。廖明華曾告訴我：老陽，你在前面頂住，我們到後方去打游擊。後來聽說他們就搞了一些打砸搶。在楊家坪時搶了一車肉，在九龍坡茄子溪搶了一火車皮

[1] 被槍殺的女工叫葉永芬，嘉陵機器廠檢驗工人，重慶人。反到底派軍工嘉陵兵團廣播員。1967 年 8 月 13 日下午與丈夫一起回家取糧時在姜家院被該廠八一五派曾追求過她但被拒絕的張某率人抓捕并槍殺于二鋼百貨公司門前。終年 25 歲。已有身孕五個多月。張某後被判處有期徒刑。

香烟，據說有700多箱，價值十餘萬元。最糟糕的是在華鎣山金光廠搞打砸搶，甚至搶了八一兵團戰士的手錶、衣服、錢糧，原來該廠八一兵團占職工總數的90%以上，被他們這一瞎胡搞，使得許多人退出了八一兵團，參加軍工井岡山去了。最後該廠八一兵團只剩下70人。

第五章 我這個“總司令”

我們的武鬥方案被否決

1967 年 8 月 15 號，我和唐忠明、朱遠容從二鋼回到師專，聽湯少成說，市革籌（實際上指市革籌大院，即原來的市委大院）已失守[1]。

我當時不相信，馬上挂市革籌電話。市革籌秘書楊學祥接電話，他也證實了這個消息。他在電話中用隱語說：“我們這裏天很黑，希望你們趕快回來。”

我當時怪湯少成消息傳得太晚了。我叫他馬上組織人從化龍橋進城。一定要奪回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奪回市革籌大院。

由于反到底在江北用三七炮和 127 和 145 高機及輕重機槍封鎖牛角沱至小龍坎的公路很緊，我們派去的武鬥隊伍走到土灣就被打回來了。

我帶着隊伍回到師專時，湯少成告訴我，接到重大的電話，叫我和朱遠容馬上到重大實驗大樓去，參加一個對當前時局的形勢座談會。

我和老朱走到那裏一看，除了重大八一五總團的一些頭頭外，

[1] 因重慶八一五派要在 1967 年 8 月 15 日這天紀念“八一五”造反一週年，反到底派決定對其紀念活動進行騷擾破壞，于 8 月 14 日晚 11 時半開始從江北向重大及嘉陵江大橋南橋頭一帶炮擊整整一夜，并于 15 日晨派武鬥隊衝過大橋，占據南橋頭，追擊八一五派武鬥人員進入市委大院（即市革籌大院），但未進入市革籌辦公樓。事後，反到底派帶隊的黎敦智（長安廠技術員）被以“武裝衝擊市革籌”等罪名關押審查 4 年後無罪釋放。

另外還有幾個軍事院校的幹部，有總字 421 部隊[1]的教官劉冠軍，工業學院的夏部長夏德科，五冶的一個姓胡的中層幹部，我一直不知他的名字，只聽大家都叫他胡胖子。

會議由重大八一五總團頭頭秦安全主持，會議圍繞着反到底攻占嘉陵江大橋南橋頭，攻占市革籌大院，將其占據的體育館一帶與江北區連成一片後的嚴重形勢（當時我們還聽到一個不知哪裏傳來的情報，說支持反到底派的原團市委幹部于克書[2]提出要反到底派一鼓作氣端掉重大），研究怎樣對付。談來談去，最後集中在兩個意見上爭論：

以革聯會作戰司令部朱遠容和我爲主的意見是：工業學院一

[1] 總字 421 部隊，即解放軍通信兵雷達技術學校，時駐重慶市石橋鋪。其群衆組織中的紅色造反團是八一五派。

[2] 于克書，1924 年 10 月生。山東牟平人。1943 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49 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青委大隊一中隊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參加接管重慶後長期從事青年團工作。原爲共青團重慶市委副書記，1962 年以“一個共産黨員”名義寫匿名信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反映四川領導人李井泉違法亂紀，獨斷專行，强迫命令瞎指揮，造成糧食大減産和四川群衆大量非正常死亡等問題。後被李井泉查出，遭到打擊迫害，被定爲“蕭李廖反常集團”成員，批判後撤職下放勞動。文革中起來翻案要求平反，得到反到底派支持。1967 年夏大規模武鬥爆發後，爲躲避武鬥，逃到反到底派占優勢的建設廠。後被誣爲反到底派“黑後臺”、“武鬥黑手”，五十四軍領導人在全市群衆大會上公開誣指“于克書就是赤膊上陣，開槍，火燒國防倉庫”；“于克書是死心塌地出謀策劃，赤膊上陣，并親自打機槍，把轉盤百貨站、銀行都打起了火。”（《重慶警備區雷副政委在“全面落實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全會精神，進一步動員清理階級隊伍大會”上的講話》和《重慶市革委會副主任、五十四軍副軍長白斌同志的講話》，1968 年 11 月 9 日）1968 年 11 月 8、9 日《重慶日報》連續發表《揭穿于克書反革命真面目》《徹底批臭于克書的“武力解決問題”謬論》《聲討于克書燒毀革命寶書的罪行》《堅決粉碎于克書反奪權陰謀》《向于克書討還血債》《徹底粉碎于克書刮起的右傾翻案風》，11 月 24 日《重慶日報》發表本報評論員《堅決把混進廣大群衆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點名稱之爲“反革命黑手”。遭到殘酷批鬥，一條腿被打斷致殘。1975 年“解放”後任重慶氮肥廠廠長、重鋼五廠廠長。文革後 1983 年獲得平反。1984 年離休。2004 年病逝。

仗失利後，我們拔掉了嘉陵廠這個大釘子，扭轉了局面，嘉陵廠這一仗，大大鼓舞了我派廣大戰士的鬥志，也解決了 127 和 145 高機彈藥不足的最大困難，我們現在應趁熱打鐵，趁對方在嘉陵江南橋頭和上清寺一帶立脚未穩之機，組織隊伍迅速打回南橋頭，連通沙坪壩與市中區，截斷對方江北與體育館的聯繫，來一個分塊切割的反包圍形勢，把戰局扭轉過來。

但以重大秦安全和 421 部隊劉冠軍爲主的意見則是：直接攻打河運校航鋒[1],比打嘉陵江橋頭更爲有利。航鋒是反到底中的武鬥之花，影響大，打下航鋒就滅了反到底的威風，大長八一五派的志氣，提高武鬥的勝利信心，比打嘉陵廠還要鼓舞人心。然後再端寬銀幕電影院，直搗嘉陵江南橋頭，奪回市革籌大院，使沙坪壩到市中區的電車路連通，把革聯會駐地保住，可以得到比小龍坎至牛角沱更安全的通路。另一方面先發制人，又可以粉碎于克書妄想端重大的陰謀。

這兩種方案爭論不休，最後劉冠軍提議，都不要爭了，乾脆明天上午先到 421 去觀察航鋒（即河運校）的地形，下午在一中召開各總部在沙區的武鬥隊頭頭會議，把這兩個方案交大家討論，依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

當晚，劉冠軍的小車把我和老朱送回師專。第二天一早，劉冠軍又把他的吉普車開來接我和老朱到 421 部隊。在劉冠軍的帶領下，有秦安全、胡胖子、朱遠容和我，從 421 部隊裏觀察了河運校的地形，中午在 421 部隊吃的午飯。

下午，我們一起到了一中參加討論會。在會議上，兩種方案

[1] 文革中重慶河運學校學生組織航鋒戰鬥團是反到底派著名組織，在武鬥初期打鋼釬戰時被八一五派稱爲“武鬥之花”。但在槍戰開始後其主要武鬥人員大多已撤到成都。在 1967 年 8 月 18 日至 20 日的大坪、潘家坪一帶大規模武鬥中，河運學校一些房屋被毀，8 月 24 日，重大八一五 301 部隊燒毀河運學校實習工廠和庫房等建築。8 月 26 日，重大八一五 301 部隊又燒毀河運學校東、西學生宿舍和西教學樓等。至此，該校全部建築物 15000 餘平方米及室內設備全部被毀。此後很長時間裏河運學校的“戰爭廢墟”成爲馬路邊引人注目的獨特景觀。

經過熱烈爭論後，壓倒多數的人同意秦安全的意見，先打河運校航鋒。這樣就確定了“打航鋒直取重醫然後端寬銀幕直搗橋頭”的作戰方案。會議推選秦安全爲總指揮，劉冠軍、唐忠明、朱遠容和我爲副指揮。當時秦安全宣布，作戰地圖由 421 的人畫，具體作戰方案到 421 再作布置，并决定參戰武鬥隊當晚在師專集結待令。大家分頭回去調隊伍到師專。

我和朱遠榮奉令到二機校調武鬥隊伍。我們是坐師專的小車去的，當我們把二機校武鬥隊伍調到師專時，天已經黑了。這時却得知秦安全又傳下命令：今晚不行動了，還要開會研究，大家暫時休息待命。

當時我和朱遠容對此决定很不滿，一是我們的意見沒有被采納，二是秦安全作爲總指揮，决定問題隨意性太大，一會一變，也不和我們通個氣。我就很不高興地回師專招待所休息去了。

到江華廠拖炮

我和朱遠容回到師專招待所，剛準備休息，唐忠明就來了，他笑嘻嘻地對我說：“我曉得你心頭不愉快，我給你找個好差事……”

我問：“啥子好差事？”

唐忠明說：“華鎣山江華廠一個頭頭來講，他們那裏有幾門炮，我們去把它拖回來，怎麽樣？”

我問：“你認識江華廠那個人嗎？”

唐忠明說：“我們學校同學去這個廠串聯時就認識了。”

跟唐忠明一起來的師專一個戴眼鏡的同學看我不放心，就插話說：“老陽，是你們八一兵團的，你還不認識呀？”

我問：“什麽時候走？”

唐忠明說：“說幹就幹，今天晚上就走。”

我說：“就我們這幾個人呀？”

唐忠明說：“你和老朱去二機校的時候，我就同七醫大聯繫好了，他們調一個排，他們穿的軍裝，又是軍車，根本不引人注意。

江華廠的頭頭同我們一路回去。我還借了幾套軍裝，我們一家一套。保證馬到成功。”

朱遠容也勸我說：“去一趟也好。打航鋒的事等秦安全去搞，我們把炮拖回來，對他也是幫助。”

就這樣，我和唐忠明、朱遠容和師專的一些同學，同七醫大的軍人學員，當晚就坐了三輛軍用汽車，連夜前往華鎣山江華廠。

大概在 8 月 17 號天亮前，我們到達江華廠。車上一部分人下來，到江華廠大門周圍警戒，同車來的一個江華廠頭頭帶路去拉炮。這時我同唐忠明、朱遠容在外面等候。

當三門炮拉過來時，天已亮了。唐忠明就把警戒的人叫回來上車。車開走大約 200 米時，唐忠明突然又叫停車，原來是他聽一個戴眼鏡的同學說沒有炮栓，拉回去沒有用。戴眼鏡的同學說炮栓在軍管會。

老朱說：“那就到軍管會去要嘛！不給就搶！”

我也同意這個意見。唐忠明便調動隊伍，七醫大的學員一部分擔任警戒，一部分到軍管會，每個車留下二人守車，司機不去，我們給司機交代：如果有人來奪炮時就把車先開走。

以唐忠明爲首，在該廠頭頭帶領下，我們一行人去到廠軍管會。這時，廠裏已經有不少職工站在高坡上看熱鬧了。

我們進了軍管會，唐忠明向軍管會的人說明來意，要“借”炮栓。軍管會的人當然不同意。這時我們便幾個人圍一個軍代表，有的向軍代表講形勢，做工作，說好話，有的就到處去翻找，找到一個五七炮的炮栓，三七炮的沒有找到，這時有人翻出在軍管會藏的半自動步槍，軍代表不准拿，大家你爭我奪，我也去幫着爭奪了一陣，當把軍代表的精力集中到爭奪槍上面時，五七炮的炮栓被悄悄地拿走了。

這時江華廠裏也來了不少我們這一派的人幫忙找炮栓。由于我在爭奪槍時把褲子屁股處撕了一尺多長一個大口子，裏面又沒穿內褲，不得不一手捂住破洞處，先回汽車上去了。

找了好一陣，三七炮栓實在找不到，唐忠明怕回去路上出問題，就叫：“走！以後再找。”他交代該廠的頭頭設法打聽放炮栓

的地點。我們的人就陸續走出軍管會，上車返回重慶。上車後，師專那個戴眼鏡的同學喜孜孜地給我看他奪到的一支半自動。

8 月 17 號下午我們回到師專，拖回的兩門三七炮無炮栓，一門五七炮是完整的。唐忠明說都交給他們師專八一五管理、使用，我同意了。

革聯會撤離後抄走我的“罪證”

這時在城裏革聯會作戰司令部的蔡明訓、楊國民聽說我回來了，一前一後來到師專，我向他們打聽了嘉陵江南橋頭失守的情況。

蔡明訓講述他所知道的情況是：

“8 月 14 號晚上接到各處打來的電話，有財貿八一五打來的，說他們的外貿大樓遭到江北的反到底炮擊；有兒科醫院打來的，也是說被江北反到底炮擊；化龍橋指揮部也來電話，說虎頭岩警報臺（國家設立的戰備防空警報臺）遭到江北炮擊；六中 32111 戰鬥團也來電話說遭到江北區委方向打過來的三七炮炮擊……當時段德昌、葉臻榮、姜永榮、楊國民、黃竹然、老史等我們都沒有主意。不知道對方是嚇唬一下就算了還是要攻哪裏。半夜過後，反到底開始集中炮火攻擊六中和市革籌一帶。我們這才作出判斷，可能是要攻占大橋和市革籌大院。但我們手中無隊伍可調，找你又找不到。正好三鋼的頭頭全權帶一支隊伍來，我們請他們守橋頭，全權看對方火力太猛，把隊伍帶起跑了。楊大渝派來幾個人，把他的兩挺機槍拉上去，橋頭一邊一挺，又無輕武器，守也守不住。我們警衛班的同志聽說這一情況，何班長主動提出他們去防守。大家都同意，老何很勇敢，帶上他的六七個人，就到橋頭去了。外面的情況我不瞭解，楊國民去看過。你可問他。”

我問：“你們什麼時候撤走的？”

蔡明訓說：“天都要亮了，聽說反到底已衝過大橋，我們這裏警衛班也上去了，大家又沒有防身武器，手槍也沒一支，段德昌決定撤。大家就各奔前程。現在我也不清楚他們跑到哪裏去了。”

我問警衛班撤下來沒有，蔡明訓說沒有看見。

隨後我又問楊國民，他說：

“哎呀，好看得很，8 月 14 號晚上炮彈滿天飛，打了一晚上，像禮花一樣！我從來沒有看到過。”

我不想聽他講這些，要他說一下橋頭情況。楊國民說：“橋頭，全權把隊伍帶走後，楊大渝他們在防守，兩挺機槍一邊一挺，沒有步槍，對方火力很猛，他們要我們調隊伍增援，不增援就要撤。人又沒得，都到沙坪壩去了，何班長他們要求去，大家同意了，我不放心，也跟着去……雙方機槍對射，對方火力强，壓得我方抬不起頭，天要亮前，對方發起衝鋒，大橋的上游河頭也在過來人，橋上也在過來人，橋上過來的人，每人推一個汽油桶作掩護，邊滚汽油桶邊前進，我看到還有女的，她們在橋邊上跑，以電綫杆作掩護，跑一根電綫杆躲一下……正在這個時候，體育館那邊又衝出一隊反到底，全部拿的半自動和衝鋒槍。我們前後受敵。我趕快喊撤。我是從人民小學這邊撤回來的，沒有看到何班長他們下來。我回到司令部一看，人早跑光了。”

何班長這幾個人都是十八冶的。武鬥平息後，我去打聽了一下，在市革籌院內被打死的兩個人不是他們，一個是川煤兵團的。埋在人委的花園裏。十八冶的人在嘉陵江橋下找到兩個尸體，是何班長手下的人，後來聽說其他人已陸續找到，就是不見何班長。

後來我聽十八冶的人講，聽到喊撤，他們都往回跑，何班長沒有跑，他在掩護大家，如果沒有死就是被活捉了。在 1970 年北京“一二·二五”批示學習班上，我向軍工頭頭周應古問過，他說他不知道。

何班長的下落，就成了一個始終找不到答案的謎。

反到底派衝進市革籌大院後，還在裏面一些辦公室進行了查抄，我放在國防工業政治部辦公室裏的證件、工作筆記本、錢包等都被抄走了。反到底派還在我的朝陽電機廠通行證（編號：9000734）內夾進了兩張他們不知在什麼地方拍攝的墻上標語照片，一張寫的是：“英雄的五十四軍萬歲！”一張寫的是：“打倒劉、張兩挺！還我戰友！還我鮮血！打倒劉、張兩挺實現全川革命大

聯合！”反到底派以此作爲我“瘋狂反對紅十條”的罪證，連同我的“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出入證”（編號：041）、“重慶市工業生產指揮部出入證”（編號：工字第 018 號）和未用完的市委機關食堂飯菜票、重慶大學革命串聯食堂餐券等，一齊上交給中央文革辦公室，用來告狀。

可惜他們這一狀沒有告准，中央文革對這些東西毫無興趣，全部退回來了。1967 年底，這一包東西又全部回到了我手中。

在潘家坪[1]前綫險些中彈

我們從江華廠搶炮回來後，得知攻打航鋒的武鬥已經打響多時了。

打航鋒是從 8 月 17 號一早就開始的，但在進攻中，我們的隊伍不斷遭到反到底派從潘家坪方向射來的密集炮火，進攻嚴重受阻。秦安全在 421 部隊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決定除重大 301 和 421 部隊的武鬥隊繼續攻打航鋒外，其他武鬥隊集中于 18 號一早向潘家坪發起總攻。

有人告訴我，攻打航鋒前，秦安全向大家宣布：陽增泰向華鎣山逃跑了。我聽了很生氣，認爲這是有意破壞我的名聲。不過，因我們走的時候確實沒有給他打招呼，也不好多說什麽。

---

[1] 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是重慶當年唯一的國賓館（今渝州賓館）。1967 年 8 月 18 日至 20 日，八一五派爲固守其占據的沙坪壩區，保障該區與市中區之間的道路暢通，打掉位于兩區之間大坪、潘家坪一帶的“攔路虎”，向這一地區反到底派占據的石油路重慶河運學校、郵電器材廠和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大坪重慶醫學院等地發起總攻，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等武器，死上百人，許多房屋被毀。另據重慶市博物館記載，文革前“劉少奇來渝時，按上級要求提出館藏珍品到潘家坪招待所作布置陳設，‘文革’開始後，未及時收回，1967 年被武鬥組織搶去碧玉香爐等珍貴的文物 10 件，當時估計損失 127.5 萬元。”（《重慶市博物館大事記》，載《巴渝文化》（第二輯），1991 年 3 月第一版 483 頁）

8 月 18 號早上起來，我從生氣中轉過神來，同朱遠容、蔡明訓、楊國民三人決定到 421 去看一下戰鬥進展情況。這時唐忠明去擺弄他的大炮去了，所以沒有跟我們一起去。

潘家坪，是重慶當時最高檔次的高幹招待所，毛澤東、周恩來、李井泉以及西哈努克親王等到重慶都住在那裏。起初八一五派并沒有想到要占領那個地方，因那裏平時駐有部隊。所以八一五派不知道它已經于 8 月初被反到底派武裝占領和控制了，駐在那裏的部隊已經撤走了。

我們四人到了設在 421 部隊的前綫指揮部，正看見秦安全、劉冠軍在發號施令。

我把劉冠軍叫出來問了一下情況。劉冠軍先問我們到哪裏去了，我說到華鎣山拖炮去了。劉冠軍才告訴我，潘家坪制高點火力猛，威脅打航鋒，秦總指揮決定除了重大 301 和 421 的武鬥隊留下繼續攻打航鋒外，其餘的全部去攻打潘家坪。劉冠軍問我有沒有意見，我說聽秦總指揮的。我問他前綫是誰在指揮，劉冠軍說：“航鋒這邊是夏部長，潘家坪那邊是老胡（胖子）和我們部隊的李景山。”

我問現在情況怎樣，老劉說潘家坪這邊已攻了好久沒攻下，現在情況不明。他忍不住發牢騷說：“唉，群衆組織不球聽指揮，真不好辦！”

這時我們同老劉告別，說要到潘家坪前面去看一下。

我們從黨校到了潘家坪，躲在一幢房子角上觀看，正在這時，對方一槍打過來，把墻角打掉一塊，只差一個拳頭的距離就打在我頭上！

我們問了一下情況，現場的一個青年說，裏面左邊一幢房子已被我們占領，右邊那幢火力很强，攻不下，這個青年自告奮勇帶我們四人繞道鑽墻洞，爬過一片廣柑林，去到已被我們占領的

那幢房子，發現是藺習廉[1]帶領的機械兵團武鬥隊在那裏，他們正向我們介紹情况時，對方打過的槍彈把同我幷排靠墻壁站在我左手邊第二的那個帶路青年左臂打穿。大家趕緊把他抬下去包紮急救。

我們很快結束交談，從原路退回。這時胡胖子把一輛坦克調了上來，當坦克從黨校這邊衝到潘家坪圍墻進去不遠時，被對方的三七炮彈從坦克側面打進去，把坦克手等三人炸傷，跟着坦克進攻的隊伍不少人受傷，敗退下來。

因 421 部隊拿出步話機指揮坦克作戰，一臺在前綫指揮部，一臺跟着前綫指揮官（421 部隊一個瘦長臉軍官），我也好奇地去試用了一下，拿起話筒叫前面坦克開炮。

再到江華廠動員裝炮彈

8 月 18 號下午，我從潘家坪回到師專，唐忠明對我說：“我正要找你。”

我問他什麽事，他說：“爲炮彈的事。江華廠打電話來，叫我們再上去一趟，炮彈沒有現成的，要我們去做工作，現裝炮彈，裝一個拿一個走。同時他們要求調一點武裝力量上去保護，幷幫助發動群衆。”

我想了想說：“那就把湯少成那支隊伍調上去。”

我到生物大樓去問湯少成能不能去，他滿口答應，但提出要

[1] 藺習廉，時爲重慶長江機床廠熱處理工人，共青團員，文革造反中1967年(25歲）任八一五派機械兵團總團一號勤務員。1968 年 5 月 31 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後任長江機床廠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據記載：因其“毒打幹部和工人 15 人（其中 6 人重傷致殘）和聚衆衝擊市委機關，破壞社會治安秩序，1975 年 9 月 8 日經省委批准，由公安機關拘留審查。1976 年，藺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釋放，幷在‘四人幫’突擊納新和提幹中竊取了該廠黨總支第一書記職務。”(《重慶公安 (1949—1997) 大事記》196 頁，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編)文革結束後 1977 年 2 月 17 日被逮捕。1980 年 8 月被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刑滿出獄後經商。

設法架個電臺，好同家裏聯絡。

我回到招待所，把這個情況轉告大家，大家都同意。我又告訴楊忠富，要他準備一部電臺。他說北碚有一部沒有用，可以把北碚那部拿去。朱遠容說再搞個電影上去放映，更有利于發動群衆。你一言我一語，這些提議大家都同意，并分頭作準備。唐忠明還把師專的黑色轎車開出來，說到北碚去運電臺。

就這樣，我們帶上湯少成的武鬥隊伍，下半夜出發，第二次去華鎣山江華廠。

車到北碚，等船過河的時候，天已大亮。師專的黑色小轎車去北碚郵局裝電臺，因一時沒找到人，電臺沒拿到。

我們隊伍開到江華廠時，已快中午了，廠裏早已準備好午飯。飯後湯少成去安排他的隊伍住宿問題，我們就同廠裏的頭頭交換情況，決定由唐忠明去作形勢鼓動報告，其他人和我去動員老師傅裝炮彈，師專那個眼鏡同學去動員會打炮的師傅到重慶去教他們打炮技術。

因爲江華廠遠離重慶，當地又沒有發生過武鬥，廠裏兩派也沒有打過架，所以對突擊裝炮彈參加武鬥的事都有顧慮。經過兩三天多次反復工作，先裝好了一發炮彈，并動員了一位炮手同師專那位眼鏡同學一道坐師專的小車回去試炮。

我們留下來繼續做工作，以後又相繼裝了兩三發炮彈。直到8月23日袁金樑派車來把我接回去。那裏的事就由唐忠明和朱遠容他們負責了。

從此我沒有再到421部隊和潘家坪前綫去過了。潘家坪這場武鬥，戰綫拉得長，從九龍坡黃葛坪、大坪到石油路郵電器材廠、河運校、潘家坪、大渡口……時間拖得長，有近萬人參戰，死傷上百人。并沒有按重大的主觀想像實現，反而陷入僵局，進不能進，退不能退，一直僵持到兩派停火上交武器，才不得不各自收兵。

建立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部

8月23日，袁金樑派交通局的劉乾均開一輛綠色華沙牌小車

來華鎣山江華廠，把我接回去，說有要事研究。因楊忠富的電臺還沒有拿到。湯少成暫時留在江華廠不走。

我回到師專後，袁金樑來見我，十分興奮地對我說：“江青同志最近在一個講話中再次肯定了‘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我們搞武鬥合法化了。趁這個時機，把我們的領導班子很好整頓一下，迅速成立革聯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你來當總司令，怎麼樣？”

我看了他們給我的資料，原來是江青在 8 月 22 日接見北京紅代會、工代會、農代會和駐京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時，講話中再次肯定了“文攻武衛”這個口號。她說：“革命派處于劣勢，沒有武裝，赤手空拳。在這樣的情況下，像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衛’，你要向我進攻，我要還擊你，這對不對呢？我認爲這是對的。”本來她在 7 月 22 日接見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時就對“文攻武衛”這個口號作過肯定，所以自那以後我們都把武鬥說成是“文攻武衛”了。現在江青再一次肯定這個口號，我當然感到很振奮，覺得自己參加指揮武鬥更有了合法的依據，更加理直氣壯了。

于是，在 8 月 25 日，由革聯會班長周家瑜主持，在重慶市一中召開了一天一夜的整頓武鬥領導班子的全市八一五派頭頭會議。

當時，重慶警備區剛向我們傳達了中央文革對重慶武鬥問題的“八二三”指示——後來才知道這個指示是經周恩來 22 日深夜審閱後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名義發來的關于制止重慶武鬥的特急電報，內容包括：

一、立即停止對一切工廠、學校、機關、商店、街道和居民點的火力進攻和射擊。立即停止對空壓廠的進攻，幷撤除包圍。

二、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

三、雙方立即達成停火協議幷保證切實執行。

這個指示讓我們八一五派十分振奮，因爲其中提到的“立即停止對空壓廠的進攻”和“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顯然都是針對反到底派的，這說明五十四軍向中央的彙報起到了作用，中央文革也在對反到底派施加壓力了（此前不少人認爲中央文革是偏袒反到底派的，所以反到底派才那麼氣焰

囂張)。我們八一五派的小報、傳單和廣播在宣傳這個中央文革指示的時候，一般都要在“立即停止對空壓廠的進攻”這句話前面加上“反到底派”或“軍工井岡山”。

文革中，特別是兩派武鬥越打越厲害之後，群衆組織都已經不再像造反初期那樣嚴格執行中央指示了,用當時的說法就叫“各取所需”，即對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群衆組織都學到了按照自己的需要來作取捨，對自己有利的就“堅決執行”，不利的就表面擁護實際上拋到一邊。所以，我們對中央文革“八二三”指示的傳達、宣傳，强調的是中央批評了反到底派，對我們是極大鼓舞，加上江青再次肯定“文攻武衛”的講話，這都成了我們建立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部的最好理由。

這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這個司令部建立了四部（參謀部,政治部,組織部,後勤部）一室（司令部辦公室）的龐大機構，辦公地點分別設在師專（參謀部，政治部，組織部）和一中（後勤部)。

文攻武衛總司令部的機構是：

革聯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

辦公室→警衛班

政治部→宣傳科，民運科，保衛科

後勤部→辦公室，軍械科，軍需科，運輸科，衛生科

參謀部→偵察科，通訊科，作戰科

文攻武衛總司令部的有關負責人是：

總司令：陽增泰。

政委：周家瑜。

副總司令：秦安全，張吉林，李雙箭，趙行貴。

副政委：袁金樑，葉臻榮，蘆文德。

辦公室主任：蔡明訓。

參謀長：唐忠明。

副參謀長：朱遠容，湯大華。

政治部主任：查正理[1]，姜永榮，楊正中，段德昌，謝利洪。

組織部長：沈志清[2]，劉乾均，梁克强[3]，陳季林，于國富。

後勤部長：韓俊（沙坪壩文具店職工），劉陵川，黃竹然，熊心一，楊國民，蔣懷紀，湯少成，滿德玉。

後勤辦公室負責人：蔣懷紀。

警衛連長：羅××（十八冶工人）。

作戰科：謝思全，楊金華。

通訊科：楊忠富，張大群。

偵察科：名字不公開，由公安總部派人，參謀長直接掌握。

軍械科：楊國民，滿德玉，張輝，湯少成。

軍需科：黃竹然，熊心一。

運輸科：劉陵川。

衛生科：姚婉霞（女）。

保衛科：謝利洪。

民運科：段德昌。

宣傳科：(名字失記)。

---

[1] 查正理，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大學冶金系68級學生。參加造反後任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總團勤務組成員。畢業分配到大連紅旗造船廠。因受金光中（原四川外語學院學生，八一五派頭頭）“現行反革命案”（金在雲南服役部隊秘密串聯個別人提出推翻九大路綫恢復八大路綫）牽連入獄，被判勞教三年。文革結束後平反，後調回重慶在北碚水文儀錶廠工作，以副總工程師職稱退休。

[2] 沈志清，1942年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學生。共青團員。參加造反後任八一五派建院八一八戰鬥團主要負責人。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委會成立任委員。畢業後參軍到昆明軍區後勤部設計所。後被處理復員。

[3] 梁克强，1938年7月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鋼鐵公司汽車隊司機。參加造反後任重慶九八戰鬥團勤務員、鋼鐵八一五勤務員。1968年底重鋼革委會成立任常委。文革結束後被清查。已病逝。

胡胖子差點被槍斃

文攻武衛總司令部成立後，我抽空回朝陽廠去了一趟。一方面給他們交代配合二鋼、嘉陵等廠聯合試製八一五式衝鋒槍的事，一方面要他們給我選派個秘書，因我原來的助手舒斌在城裏走不開，我現在一個總司令却身邊無人幫忙，許多工作無法開展。廠裏 2007 團團部勤務組商量後，决定派部隊轉業下來的熊兵給我當秘書。熊兵本人也同意了。我就叫上他一道回到師專。

當我們回到師專時，辦公室的人告訴我，說紡織兵團來了一群人來找我,要我解决什麽問題。我問他們在哪裏,說在會議室裏。

我帶着熊兵到了會議室，紡織兵團的一群人，在他們頭頭蔣懷紀、馮開華帶領下，一窩蜂涌上來，有的人手裏還拿着槍，在我面前指指戳戳，萬一槍走火，豈不是我的命就沒有了？這些人七嘴八舌嚷着：

“陽司令，拿話來說！”

滿屋子亂七八糟，根本聽不清他們在嚷什麽。我氣得往桌子上猛拍一巴掌，喝道：“你們到底要做什麽？”

這一下他們才安靜下來了。我對他們兩個頭頭說：“老蔣，老馮，你們是來找我解决問題還是來吵架的？你們這樣亂吼亂叫，我聽哪個的？”

這時大家才不再嚷了。蔣懷紀代表他們那群人對我說了這樣一件事：

他們紡織兵團的武鬥隊被調來增援潘家坪武鬥，來到 421 部隊時，天已經黑了。因爲天太熱，大家都在外面馬路上休息待命。不知爲什麽，突然遭到胡胖子指揮的一些人開槍襲擊，當場打死紡織兵團好幾個人。紡織兵團後來查明了這次突然襲擊是胡胖子指揮的，就把他抓起來了，找秦安全處理，秦安全說他處理不了，說八一五派的文攻武衛總司令部已經成立了，叫我們把胡胖子押來交給你總司令處理。

我問：“你們要我怎麽處理？”

紡織兵團的人紛紛說：“執行戰場紀律，槍斃！槍斃！”

我說：“這麼簡單呀？胡胖子在哪裏？”

他們說已經押來了，關在另一間屋裏的。

我說讓我先去找他問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到那間屋去，看到被五花大綁的胡胖子垂頭喪氣地坐在地上，顯然已經挨了不少打。我叫把捆他的繩子解開了，讓他坐到凳子上來，叫熊兵給我作記錄，要胡胖子把事情的經過情況詳細講一講。

胡胖子嘆了嘆氣，給我講了當時的情況——

那天，他和秦安全、夏德科三人正在設于421部隊的臨時指揮所裏研究下一步的進攻方案，忽然闖進來一個楊公橋中學的學生，他報告說有砸派的人混進來了。胡胖子問他怎麼知道的？那學生說我們的人戴的藤帽是一圈紅色，砸派戴的藤帽是一圈白色。我看到他們當中有人戴的藤帽是砸派的那種。胡胖子就說我去看看。他提上手槍，叫那個楊公橋中學的學生帶路，爲了防止出問題，又叫上了機校的武鬥隊人員，并對他們叮囑：先不要有什麼動作，只把馬路上那群人包圍起來，如果發生問題，聽到我的槍響了再開槍。

楊公橋中學那個學生帶着胡胖子走到馬路邊上，看了一下，那學生悄悄對胡胖子說：“在那裏！”

胡胖子看到一個青年正在路邊一個水龍頭下用涼水沖頭，一隻手裏拿着的正是一頂有白圈的那種藤帽。胡胖子不聲不響走過去，拿手槍對準那個青年，大喝一聲：“不准動！把手舉起來！”

那個青年一楞，從水龍頭下抬起頭來看了胡胖子一眼，十分機靈地一下從胡胖子舉槍的手臂下鑽過去，同時把胡胖子拿槍的手往上一抬，這時胡胖子手中的槍就扣響了。這一響，就成了信號，機校武鬥隊包圍在四周的人員立即向馬路中的人群開火……一場不應有的慘劇就這樣發生了。

事情發生過後，他們才知道那個戴的有一圈白色的藤帽，是紡織兵團繳獲的反到底派的“戰利品”。誰也沒想到戴這個帽子會惹出什麼事端。

胡胖子把情況講完後，嘆口氣對我說：“事情已經出了。組織上怎麽處理我都沒意見。”

我心想，這件事果然棘手，難怪秦安全這位戰地總指揮自己不處理，推到我這裏來。

我心情沉重地返回會議室，對紡織兵團的人們說：“同志們，這件事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司令部要組織專案組，進行詳細調查，寫出專案報告，上報警備區備案，至于對胡胖子怎麽處理，我的意見是交警備區，運動後期處理。”

會議室裏的人們一下子就嚷起來了，紛紛表示反對，七嘴八舌地嚷着：“槍斃！”“立即槍斃！”“要他償還血債！”……

我提高了聲音說：“同志們，聽我把話說完！我們是幹什麽的？我們是響應毛主席號召搞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衆組織，我們不是專政機關，我們沒有權力槍斃人！我們必須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把鬥爭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砸派把矛頭對準解放軍，想轉移鬥爭的大方向，我們就要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他們屠殺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就要和他們血戰到底！在這個時候，我們內部必須加强團結，加强組織紀律，不能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來。你們要槍斃胡指揮，爲什麽又要抓到我這裏來找我處理？既然找我處理，就得聽我的，群衆組織無權槍斃人！……”

我說了這一席話，基本上把紡織兵團人們的衝動情緒壓住了。但是還有人不服氣地說：“我們要求把胡胖子押回去，脫了褲子打屁股，給他留個教訓！”

我說：“這個可以，但是必須講清楚：不能把人打死了。如果打死了人，我就找你蔣懷紀、馮開華負責！”

後來聽說他們把老胡押回去，果真脫了褲子打屁股，把扁擔都打斷了一根。後來還是把老胡放回五冶去了。

處理完胡胖子的事，我却發現我帶來的新任秘書熊兵不見了。我問辦公室的其他人，說是他回廠裏去了。

後來我回到廠裏時找到他，問他怎麽剛來就走了，他說：“你當總司令的，他們都拿起槍在你面前指指戳戳，我看那個架勢不

得了，我是個小兵，今後還不知道要遇到什麽事情，太嚇人了。我還是回廠裏來安全些。”

警司首長罵我光長腦袋不長腦髓

革聯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成立以後，1967 年 8 月底，我在司令部所在地師專辦公大樓（進校門的左手邊）二樓會議室，召開了司令部各部、各科的負責人會議，絕大多數有關人員都參加了會議，參加者有——

司令部：陽增泰、張吉林、趙行貴、李雙箭、代水生（重大學生，代表秦安全）、蔡明訓、喬世成；

政治部：周家瑜、蘆文德、袁金樑、趙普德（代表查正理）、謝利洪；

參謀部：唐忠明、朱遠容、謝思全；

組織部：梁克强、劉乾均、于國富、陳季林；

後勤部：韓俊、劉陵川、黃竹然、蔣懷紀、楊國民、熊心一、滿德玉等人。

在會上發表各種意見的人都有。

有的說，我們的武鬥人員很亂，不聽指揮，是群烏合之衆，應抓組織整頓；

有的說，要向解放軍學習，要有野戰軍，有地方軍，有單位民兵；

有的說，搞野戰軍很多問題不好辦，最好以轉業軍人爲主，搞分地聯防，狠抓組織落實；

有的說，下面反映，每打一仗，在前綫分不清敵我，建議在搞組織落實時從服裝上想點辦法也落實一下；

有的說，八一兵團的槍、彈都拿出來了，紡織兵團拿點布出來還是可以的；

有的提出，我們槍少，吃了不少虧，716 廠（無綫電廠）同建設廠試製成功八一五式衝鋒槍，司令部應出面組織他們擴大生産，統一分配；

有的說，北碚捍紅指揮部老套筒多，就是缺子彈，嘉陵廠是生產子彈的，想辦法解決“79”彈（老式步槍子彈），也是解決部分槍支不足的問題；

有的提出，聽說江津一個長風廠是生產機槍的，司令部應出面去找一下他們解決點問題……

會議根據各方面建議，進行討論，也有些爭論，你一言我一語，最後總結出了當前急需抓的幾項工作：

一、成立八一五民兵師，分地區，以轉業軍人爲主，狠抓組織落實。由組織部負責。

二、趕製黃色武鬥服 5000 套，改變“烏合之衆”和在前綫分不清誰是自己人的現象。由後勤部負責。

三、派人到江津長風廠聯繫機槍，組織嘉陵廠恢復“79”彈生產，組織嘉陵、二鋼、無綫電廠、朝陽廠聯合生產八一五式衝鋒槍 1000 支，統一分配。由後勤部軍械科負責（由我協助抓）。

四、搜集全市武鬥動態，有情況及時處理。由參謀部負責。

組織部按會議要求，分別到各地區聯防指揮部進行組織整頓，落實編制。後勤部蔣懷紀本人就是紡織兵團的頭頭，他回去活動，從重紡廠拿出 4 至 5 捆白布，到印染廠染成黃色。具體抓這項工作的是重紡廠的馮開華、劉武揚。由後勤部蔣懷紀、黃竹然、韓俊、劉陵川主管負責。

正當這批武鬥服在分批縫製、分配中，消息被警備區首長知道了。白斌副軍長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評了一頓，罵我“光長腦袋不長腦髓”！要我把建立八一五民兵師的決定馬上撤銷，把打好沒打好的衣服全部上交市革籌。

我從沒看到白副軍長態度這樣嚴厲，頓時明白我們犯了個大錯誤。他要我當面向他保證執行他的命令後，馬上派小車送我回革聯會。

回到革聯會，我馬上打電話通知司令部辦公室的蔡明訓，要他通知馬上撤銷八一五民兵師的決定，我又打電話通知蔣懷紀、黃竹然等，說我們搞八一五民兵師的事，已經受到警備區首長的嚴厲批評，要他們把打好和沒打好的武鬥服集中起來，不准下發，

全部上交給市革籌。

他們問我：“已經發下去一些了，怎麽辦？”

我說：“去追回來！追不回來的，把發放名册一道上報。”

這件事的善後工作一直是由黃竹然、蔣懷紀、馮開華、劉武揚經手具體處理的。他們向市革籌上交有清單。這批衣服我們司令部的人沒有發過一件。後來由市革籌處理給各宣傳隊了。

後來曾有人懷疑我穿的黃軍裝是不是從這批八一五武鬥服中扣留下來的，其實，我穿的黃軍裝是正牌子的軍裝，是我兄弟陽增福當兵轉業回來，1969 年初我在成都參加“九二三”學習班（追查電臺問題的學習班）後回家時，我用紅岩煤礦朋友送我的工作服同他交換的。

找江津長風廠要機槍

根據文攻武衛總司令部會上明確的解決武器不足的問題，我會同後勤部軍械科的楊國民、滿德玉，召集了朝陽廠的朱青，嘉陵廠的賴德濤，二鋼的周胖子，在嘉陵廠簽訂了由二鋼出材料，由嘉陵、朝陽廠生産八一五式衝鋒槍 1000 支的合同。還動員嘉陵廠同觀點的技工恢復生産“79”式子彈，并迫使該廠副廠長孫壽彭作技術指導。

8 月 27 日，周家瑜通知我到重大專業武鬥隊 301 部隊飯堂開會。

到會的人有周家瑜、秦安全、湯大華、吳慶舉、朱遠容和我。秦安全要我同意調派武鬥人員到北碚，支援北碚捍紅總部攻打 424 部隊[1]。

對于北碚那邊的情況，我和副參謀長朱遠容都一點不瞭解，現在一下子就提出要我這個“總司令”調派人員去參加武鬥，我認爲這是重大已經同北碚捍紅總部的湯大華把事情都研究好了，

[1] 總字 424 部隊，即解放軍通信兵技術學校，時駐重慶市北碚區歇馬場。該校占優勢的群衆組織紅聯屬于反到底派。

才來要我點個頭而已。我很不高興，當時同秦安全大吵了起來，我說：

“你們這樣做，等于把我這個總司令架空，革聯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成了虛設！重大乾脆向山城八一五派發一個通知，宣布重大八一五總團就是革聯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一切聽重大的……”

鬧了一個多小時，在吳慶舉、湯大華的反復勸解下，我想還是以大局爲重，我取得朱遠容的同意後，決定調二鋼一個重火器連，配合重大 301 武鬥隊去北碚，參與攻打 424 部隊。

8 月下旬，我同意軍械科楊國民建議，派水運公司周學良，帶上司令部的介紹信和我給江津長風廠頭頭何正國的私人信件，找水運兵團幾位女士，身背數千發通用彈，長途旅行到江津長風廠，聯繫要機槍事宜。

8 月 31 號，周學良返回沙坪壩，找到後勤部軍械科長楊國民，然後由楊國民帶來司令部向我彙報。周學良說：

“我們去的時候，各地去要槍的人很多，就是重慶去的單位也不少，想找他們要槍很困難。我去時把總司令部的介紹信一亮，說要找何正國，長風廠的見我牌子硬，就把重慶去要槍的其他單位往我身上推，要我代表文攻武衛總司令部簽意見。這明明是推包袱嘛，但爲了全域，我也不得不做些思想工作。隨後我在江津九七總部見到何正國，人不高，是個大鬍子，是長風聯合兵團派到江津九七總部的第一號負責人。在群衆中很有威信。我說明來意，并把你寫的信給他，把我們帶去的半自動步槍子彈送給他們，這樣很快就談攏了。他們生產的是重機槍，我開始向他們提出要 200 挺，他們說太多了，不行。後來東扯西扯，同意給我們 100 挺，但他們也提出六項條件，要求互相解決困難，我拿不穩，答應回來請示。”

這六項條件是：

①要半自動步槍圖紙去生產用；

②因他們的部隊都在山上作戰，要求解決帳篷 10 個；

③他們步兵武器是老套筒多，要求解決“79”彈生產用的銅

板和彈丸；

④要求解決電臺一部，主要是同瀘州聯繫，怕瀘州失守，他們就是第一綫，以防意外；

⑤要求去人作報告講形勢；

⑥他們的機槍只對重慶革聯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不對下面單位，其他單位包括八一兵團總部在內都由文攻武衛總司令部分配。

對這六條意見，我和楊國民、蔡明訓、周學良幾個人當時研究，覺得⑤⑥沒有問題，④條可以找楊忠富想辦法，但①②③條不好解決。對①條，問他們要不要八一五式衝鋒槍圖紙，對②條，由楊國民找後勤部去活動一下看行不行。對③條，我們只能拒絕。因我們都是用舊彈殼復裝，材料（銅板）無來源。回答他們不好辦。

9月3日左右，我到參謀部找楊忠富，問他還有電臺沒有。他說：“有，在那裏擺起在……”邊說邊用手指我看。

我說：“好，這一下問題就解決了。”

他問：“做啥子用？”

我說：“要到江津一個廠搞些武器回來，他們提出要部電臺，因瀘州打得厲害，如果瀘州失守，江津就是第一綫，對我們的威脅很大。”

楊忠富說：“這機器是71型，發報部分是壞的，要想法找個地方修修，修好了就把嘉陵廠那部換去。”

我說：“就拉到朝陽廠去修。”

當天晚上，軍械科滿德玉就開了輛米黃色小車，把電臺拉到朝陽廠去了。但那部電臺一直沒修好。

我批給江津1000套冬衣的來歷

9月8日，我在朝陽廠檢查八一五式衝鋒槍試製情況。那天深夜，天正下雨，滿德玉開小車，同楊國民把江津長風廠的于杰載來會我。當時我還不認識于杰。我們在朝陽廠三車間進行了會談。

于杰說：“我是冒着生命危險來找你們的。我們見你們回來聯絡的老周同志長時間沒有回音，考慮可能是重慶吃緊。我們已經準備好 100 挺機槍，本來想請八一兵團總部在江津的方文正、謝武周、周光清所帶的武鬥隊幫忙押車把武器運回來交文攻武衛司令部，又怕他們獨吞，何正國等同志才決定用自己的車裝，請他們一道下重慶。開初他們都同意，誰知船渡開到河心，方文正他們帶起隊伍在岸上架起輕重武器向船開槍，把船也打了幾個洞，何正國見事不妙，才把九七的部隊調來把他們包圍起來。船也不敢再往河對面開，這樣才沒有鬧出亂子來。爲了解決這一問題，上面派我來聯繫，要求司令能親自走一趟。”

我一聽，竟然出了這樣的事情，心裏有些生氣。我看于杰語言誠懇，所談問題情況緊急，我怕要到手的東西又失掉，便問楊國民：“他們要的東西準備得如何？”

楊國民說：“其他都還沒有着落。”

老于又提出要點過冬衣服。我考慮其他幾個問題又沒有落實，先解決點衣服也行。就問他要多少。他提出要 2000 套。我當時批了 1000 套。

我批給江津九七總部冬衣 1000 套，這些衣服是怎麼來的呢？

那是在 8 月裏的一天，我從外面回到師專，發現湯少成部住的教學大樓門口堆放了不少運動衫和棉毛衫，有的人還在那裏挑選。我問湯少成這些東西是哪裏來的，他說是後勤部從石坪橋倉庫拉來的。我一聽，心頭就有點火，馬上制止那些還在挑選的人，并站到高處向大家講：“我們八一五派的戰士，是最聽毛主席話的，我們絕不搞打砸搶，亂動國家的物資是犯罪的行爲。請同志們已拿了的主動退回來。我們把東西送回去……”

當時那些正在挑選衣服的人只好扔下離開了，但是已經拿走了衣服的人主動退回來的不多。我就發出嚴令：必須退回！

歌樂山林校的一夥學生不理睬我的嚴令，拒絕交回他們已經拿走的衣服，開車衝出師專大門，還開槍把一個想攔下他們的值勤人員的大腿打穿了。

我命令湯少成，加强警戒，不執行命令的先抓起來。然後我

要劉乾均組織人挨房間搜查。

他去搜了一圈回來問我：“有的人把衣服泡在水裏了，收不收？”

我說：“徹底收！收回來交後勤部退回去。”

事後，後勤部的黃竹然、韓俊來找我，黃竹然說：“我勸他們不要去，那個劉陵川不聽勸，帶起隊伍就走。”

韓俊說：“是石坪橋倉庫的人來說，怕落到砸派手裏，叫我們去拉的。”

我說：“砸派拿是砸派的事，群衆看見我們拿，我們就不得人心。就要打敗仗。打敗仗失掉的比拿到的還多。我們八一五派經常講最忠于毛主席，我們搞武鬥也是不對的事。拿倉庫的東西就更不對。是對毛主席最大的不忠！”

當時韓俊說：“石坪橋那邊砸派迫近，東西不好退回去了。”

我要黃竹然想辦法，黃竹然說：“把它存放在沙坪壩百貨公司行不行？”

我說可以，要他二人去辦。

這些物資不一定是全部都收回了，拿出來的有多少我也不清楚。我批條子給江津九七總部冬衣 1000 套，就是這批暫時由後勤部寄放在沙坪壩百貨公司的物資。最後這批還未動的物資，是在武鬥平息後，由黃竹然和韓俊一手辦理上交手續的。

好不容易搞到手的機槍被迫上交

江津于杰來找我那天晚上談完後，他同楊國民坐滿德玉的車子回沙坪壩後勤部去住，第二天回江津去了。于杰從朝陽廠走之前，我告訴他，我一定儘快去江津一趟，9 號不到 10 號一定到。

9 月 9 號上午，可能是于杰剛走不久，我就到師專去找到楊忠富，告訴他馬上到江津，并說：“你拿到朝陽廠修理那部電臺沒修好，要另想辦法解決一部。”

楊忠富想了想，說到小龍坎 ×× 倉庫去看一下。

我同他坐上滿德玉開的米黃色小車到了小龍坎，我在那個倉

庫外面等，楊忠富進去了一會兒，出來說機器有，馬達是壞的。我問是什麼馬達，他說是641，我說：“641是我們廠造的，拿到朝陽廠去修！”

就這樣，我們又把機器拉到朝陽廠，找李成章修理。機器是當天晚上修的。楊忠富當晚就住朝陽廠。他回來後告訴我，主要是電錶壞了，換一個電錶就修好了。

9月10號，我們一行兩部解放牌卡車，裝上電臺就出發到江津。同去的人有楊國民、周學良、楊忠富、舒斌、李華權和我。一個司機是化龍橋汽車23隊的張師傅，另一個是文攻武衛總司令部警衛連才學開車的司機（他本人是十八冶二七的）。另外李華權在化龍橋指揮部調了帶短槍的武鬥隊員十幾人。

當天中午12時前我們到達西彭(即112現場)，大家住下休息。我派周學良去聯絡，計劃晚上到河邊到江津城。

去聯絡的人比較順利。下午我們上車出發，車到江邊正好天黑，江津九七的輪渡已開到河邊等我們了。我們上船一直走上水，深夜才到江津九七總部（江津某招待所）。

第二天我們到了長風廠，于杰、許德林等頭頭出來迎接我們。到後不久，何正國回來，我們就正式開始會談問題。地點是廠內軍管會住的那幢房子的會議室。參加會談的，他們那邊有何正國、于杰、許德林等五人，我們這邊有我和楊國民、周學良、李華權。

會談開始，我先發言，我說他們要的東西，有的無法解決，并逐條解釋了無法解決的原因。最後告訴他們電臺已經拿來，幫助架設的人也來了……

何正國見他們要的東西才解決一項，顯得有些不自然，說：“你們要的東西，我們只解決了一部分，數量沒有那麼多。”

于杰發言說：“本來前天計劃給你們送50挺下來，昨天瀘州吃緊，要求增援，我們又沒有新裝好的出來，就在這50挺中拿出13給瀘州紅聯站送去了。”

許德林說：“全川各地戰友都來向我們要，我們又要忙打仗，又要忙生產，確實我們很困難。”

何正國又說：“現在看來，最多能給你們解決37挺。”

互相之間談來談去，我們堅持要原來提出的 100 挺，他們堅持只能給 37 挺。頭一天的會談沒有結果。

晚上，他們拿吉普車把電臺拉運到九七司令部所在地——農校，當時楊忠富由他們的人帶去看安電臺的地點，我們就在九七司令部閑聊。從九七司令部回長風廠招待所休息時，我告訴楊國民等人，如果我們堅持要 100 挺，看來是不現實的，但最少要 50 挺，在數字沒有落實以前，告訴楊忠富先不要給他們架設電臺。他們不同意我們的條件，我們就把電臺拉走。我要大家說話要硬點，少一挺都不幹。

在第二天的會談中，江津九七的頭頭們最後同意給 50 挺，但又說目前沒有這麽多，還要趕裝，明天才能裝好。事情講好後，我們就到江津城裏去逛了一圈。

第二天，即 9 月 13 日，我們拉上 50 挺機槍，從原路返回重慶。

但我們沒有想到，就在我們離開重慶的這幾天裏，由于中央調查組的努力工作，和中央“九五”命令的無比威力，整個重慶的形勢已經大變了。我們這批武器剛拉回來，就碰到兩派已經達成停止武鬥上交武器的協議，各武鬥隊的武器原地封存，由警備區派車收回。當時我們對交出這批剛拉回來的武器有些捨不得，同時又怕停火協議又像 8 月 4 號一樣失效，就不想交出去。楊國民出了個主意：把這批武器運到陳家坪 153 炮校（那裏是八一五派掌權）去儲備放好，以備以後形勢變化使用。

楊國民先到陳家坪去查看了，說路上無收繳武器的檢查哨。第二天，他就親自把這批武器護送到炮校去。

但是沒想到還是碰上了檢查哨——那幾天警備區在全城到處都增設了檢查哨，正對偷運武器的車檢查得緊。他們的車剛到陳家坪，就被警備區的檢查哨攔下來，把這批武器全收繳了，還給楊國民打了個收條。

我們在嘉陵、二鋼、朝陽合夥生產的八一五式衝鋒槍，和復裝“79”彈，這批武器按無綫電廠出的藍圖剛試製出樣品，正在改製進行生產中，這時也不得不按“九五”命令精神和上交武器的協議，由所在廠主動把一切半成品、工裝和樣品一齊上交到警

備區了。

我批給江津九七的那1000套棉毛衫和送去的電臺（55型），後來我同楊忠富、周學良、李華權、舒斌、韓斌武等人于1967年11月15日左右坐水運公司的一艘宣傳船去江津，在九七總部找何正國，提出要收回那些衣服和電臺上交。何正國說：“衣服沒有發出去，電臺也在，你們什麼時候走就帶回去。”

電臺由楊忠富拿回郵電局（後來聽他說南桐要電臺，從江津拿回那部電臺南桐拿去了），衣服由船運回去後就放在水運公司，由周學良負責上交了。存放在沙坪壩百貨公司的那些物資，最後是由黃竹然上交的。

第六章 兩派內戰中的本派內鬥

想要我答應清除“內奸”

1967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革聯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的副政委葉臻榮到師專辦公樓找到我，說：“老陽，‘三高’來了，請你下去一下，有事商量。”

我有些奇怪，周家瑜來了怎麽不直接到辦公室來找我呢？不過我也瞭解周家瑜平時有些拿架子，也沒多想什麽，就隨葉臻榮下樓，到了門外左手邊花園內一棵樹下，看到周家瑜、袁金樑等人在那裏。

周家瑜看到我來了，就說：“找你來研究一個重要問題，你用的人有問題。”

葉臻榮看到我發怔的樣子，搶着解釋說：“蔡明訓、劉萬秋，不是我們的人，是申平綫上的人，明保暗砸。蔡明訓是申平派到我們內部來的，‘三高’和我們幾個人的意見，是把他們清洗了。看你的意見如何？”

我一聽，頭都大了！怎麽在自己內部搞起清洗來了？

他們提到的蔡明訓，是機電公司的八一五頭頭，轉業軍人；劉萬秋，是搬裝公司的八一五頭頭。申平是物資局機電公司的業務員，當過首屆八一五工總部的班長。在 1967 年 8 月，我們都忙于武鬥期間，申平對重大八一五在八一五派內部以“老大”自居，到處指手畫脚操控一切的情況不滿，提出重慶的文革不應由重大學生來左右局勢，要學習上海工總司，由工人來左右局勢。他的意見在八一五工總部內得到一些人擁護。這個意見傳到周家瑜那裏後，被周家瑜認定申平是想排斥重大，上綱爲“明保暗砸”，即明保革聯會，暗砸革聯會，投降反到底派，給他定了個罪名叫

“申平路綫”。我想，他們說要把蔡、劉二人當“內奸”清洗了，可能是打擊申平的第一步，接下來不知還要做什麽動作。而且，把自己內部的人當作敵人清洗，這可是含糊不得的大事！我所瞭解的情況，同他們所說的完全不一樣，這些人與我長期共事，雖然在某些看法上與重大有分歧，但仍然是堅定的八一五派，對革聯會，對解放軍的態度都是擁護的，根本不是什麽“明保暗砸”。退一萬步講，即使他們是“申平綫上的人”，也不應該平白無故就把人家清洗了呀！

我冷靜了一下，提出了我的疑問：“你們說什麽明保暗砸，怎麽我一點也沒有看出來呢？”

周家瑜不屑地說：“你一天到晚忙昏了頭，哪裏看得到這些嘛！我們已經調查好了。”

我還是不讓步，說：“那好，把你們調查的材料拿出來我看！”

周家瑜不做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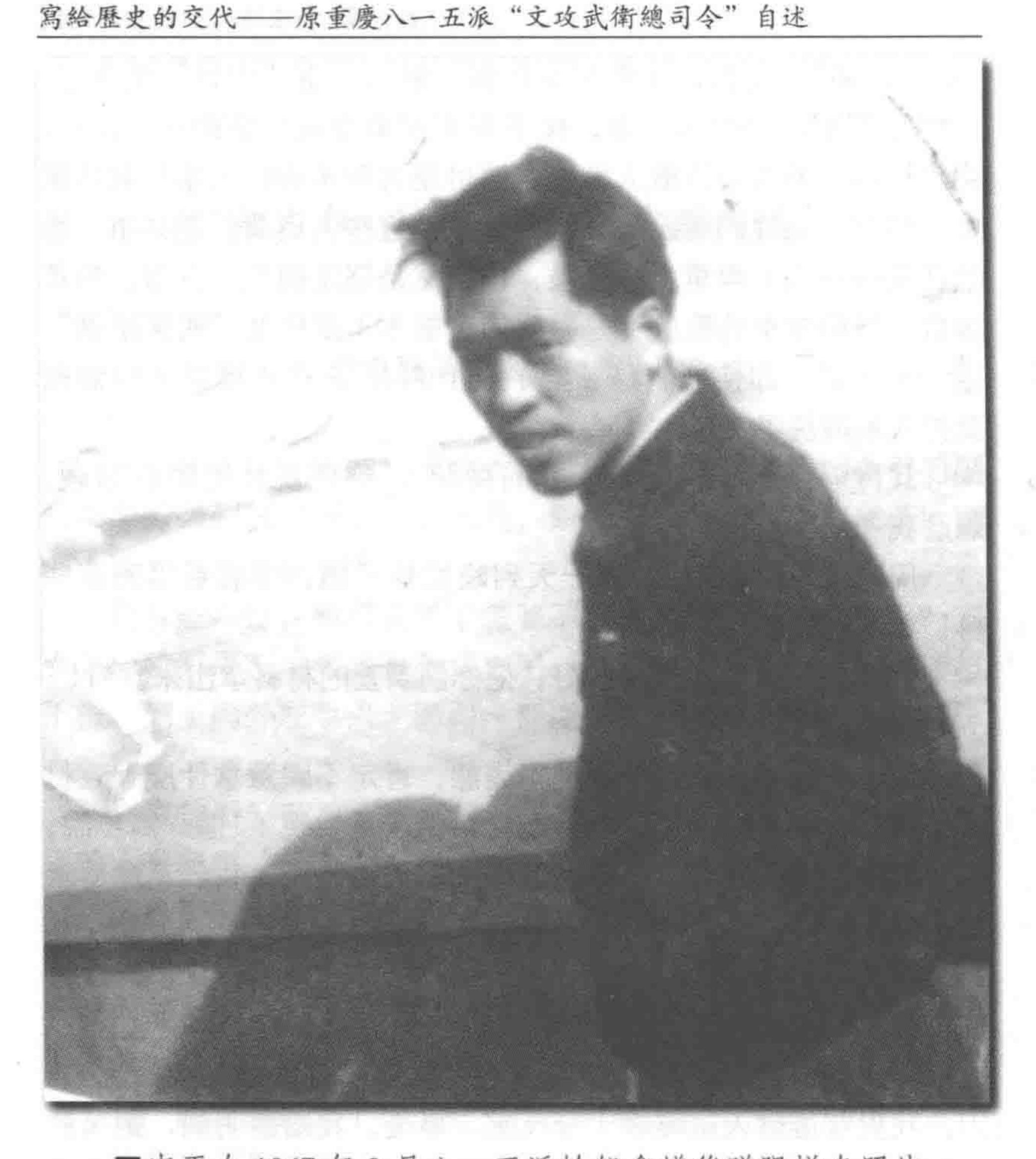
等了一會兒，我看他們都不表態，肯定不願意拿什麽調查材料給我看，或者根本就沒有什麽材料，于是我說：“退一萬步說，即使真的是明保暗砸，也不能隨便就把人清洗了，我們革命群衆組織，沒得那個權力。”

袁金樑見我態度很强硬，就打圓場說：“算了，算了，以後注意就行了。我們也是爲你好。”

我這個人做事不喜歡搞陰的，喜歡直來直去擺到桌面上來。因此我對背後整人這種事十分反感。事後，我給蔡明訓、劉萬秋他們打了招呼，要他們注意一點。他們聽了，沒說什麽，心裏肯定是很不愉快的。平白無故被自己人猜疑，哪個願意呢？

從“輪船會議”到批判“申平路綫”

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的精神，槍都交了，要搞兩派大聯合了，武鬥機構就沒有理由再存在了，我們那個剛成立幾天的文攻武衛總司令部也就撤銷了。革聯會班子整頓，我仍被大家推選爲革聯會副班長。



■申平在 1967 年 9 月八一五派輪船會議後贈陽增泰照片

我回到城裏後，申平曾與我私下交談時交換過意見，談到了他提出的不能由學生左右山城局勢，要學習上海由工人左右局勢的意見。我很贊同，回想武鬥期間，許多時候都是重大在左右局勢，革聯會裏都是周家瑜說了算。我平時對這些事情都沒有仔細想，只管埋頭做事。這時聽申平一說，覺得有道理。但也沒有深入考慮應該如何改變這樣的局面。

這時，周家瑜已經決定要改組工總部，到處物色能取代申平，

又能代表他控制八一五工總部的人。

在“九五”命令下達，兩派停火、交槍之後，1967 年 9 月 8 日，是重慶鋼鐵公司最大的造反組織九八戰鬥團造反一週年紀念的日子。周家瑜到重鋼公司參加九八戰鬥團造反一週年紀念活動，發現重鋼“九八”的主要負責人陳萬明[1]很有水平，能說會道，有魄力有威信，又是產業工人中年輕的“老造反派”，很有代表性。周家瑜就給“九八”頭頭們做工作，也給陳萬明做工作，動員他出來，到市裏的工總部來爲大家辦事。

本來，陳萬明是不大願意離開重鋼本單位“根據地”的，成立革聯會時，重鋼“九八”都是派的另一個頭頭黃履中出來擔任革聯會常委，陳萬明這個主要負責人都沒有出來。這一次，周家瑜不知怎麼把他說動了。

隨後，1967 年 9 月 19、20 日，周家瑜主持召開了以“整頓革聯會組織”爲名的一次革聯會重要會議，因爲會議是在停泊于長江邊的輪船上開的，所以又稱爲“輪船會議”。

這是山城大規模武鬥停息後八一五派領導層的一次重要會議。

我和一些頭頭是在重慶市公安局院內集合乘車前往紅港（朝天門）碼頭，再上輪船參加會議的。在這次會議上，爲了推出陳萬明，周家瑜向大家作了許多宣傳，表揚重鋼“九八”在武鬥中關心群衆，愛護群衆，顧全大局，資助了七醫大幾萬塊錢用作救護傷員的費用，是全市八一五派學習的榜樣。

本來革聯會常委根本就沒有研究過，但周家瑜在會上以革聯會常委會的名義提出“打劉、張”的方案（即公開提出打倒四川省革籌小組中的領導人劉結挺、張西挺夫婦），說“第一步炮轟，

[1] 陳萬明，文革爆發時爲重慶鋼鐵公司機修廠起重工，共青團員。文革中 1966 年秋（25 歲）參加造反，任重慶九八戰鬥團一號勤務員。1967 年 9 月以後任八一五派革聯會常委班長。1968 年 5 月 31 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1976 年由支部大會通過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結束後被清查。中共黨籍不予承認，并以“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罪名給予“留廠察看一年”處分。後提前退休。

第二步由大家去想”，要大家討論。

當時我負責召集工人系統的各工人組織頭頭討論，大多數意見都反對周家瑜的方案。以申平爲首的工總部甚至拒絕派工人常委到革聯會。

在這次會議期間，申平與我作了許多交談，我很贊同他的觀點。大概他覺得跟我很有共同語言，或者是他已經預感到將要被趕出工總部了，他在會後特地贈送了一張他的照片給我留念。

本來周家瑜就對以申平爲首的八一五工總部不信任甚至猜忌，再加上在這次輪船會議上以申平爲首的工人代表反對在社會上公開“打劉、張”，因此周家瑜就更加排斥申平等人，千方百計要把申平等人趕出工總部，一心把陳萬明抬出來取代申平。

大概也考慮到八一五工總部內部有不少對重大的意見，“輪船會議”後，周家瑜把革聯會的班長一職讓給了陳萬明。

由于抵制重大不顧大局“打劉、張”、干擾毛主席戰略部署的錯誤作法，當時以申平、伍子明[1]、李召亮爲首的工總部創辦了《重慶工人》報，這個小報的創刊號[2]和第二期（編好後沒有出版），隻字不提打劉、張，也沒提“八一五”這個派性代名詞，而是按中央“紅五條”精神，按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講話中提出的“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爲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衆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

[1] 伍子明，1941 年生，四川資中人。文革時爲重慶搬運裝卸公司石橋鋪汽車修理廠工人。參加造反後任八一五交通兵團搬裝分團負責人，交通兵團常委。1967 年夏調八一五工總部任常委，負責宣傳。1967 年 10 月負責主編《重慶工人》報。因與工總部負責人申平一起主張消除派性，在《重慶工人》報上不提“八一五”派而提“無產階級革命派”，不提當時八一五派“打倒劉、張”的口號，被認爲“右傾”、“走申平路綫”，被撤銷職務貶回原單位。

[2] 《重慶工人》于 1967 年 10 月 15 日創刊，創刊號發表了呼籲堅決執行“鬥私批修”方針、促進兩派大聯合的社論，隻字不提“打劉、張”，不提這派那派，只稱“無產階級革命派”。

現革命的大聯合”等精神，只提“無產階級革命派”。

這一作法引起了周家瑜等人的警覺。1967 年 11 月 3 號，周家瑜讓陳萬明出面主持，在沙坪壩區工人俱樂部禮堂召開了八一五派各大工人組織數百人的會議，批判申平和《重慶工人》報創刊號。

在會上，申平起來爲自己的觀點辯護，認爲省革籌劉、張有錯誤，應該整理材料向中央彙報，不能公開宣傳打倒，應按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搞大聯合的指示辦事。因爲周家瑜等人在會前做了充分的準備，組織了足够的反對力量，申平當時的正確意見，不但得不到陳萬明等人的支持,反而遭到圍攻,對所謂“申平路綫”進行了狠狠的批判。申平被解除了工總部勤務組班長職務，會議作出了由徐國勛代理申平職務的決定。

在不同意見的爭論中，當工總部常委、《重慶工人》報主編伍子明站出來爲申平的觀點辯護時，堅決支持周家瑜的革聯會常委藺習廉，還當衆拿雨傘打了伍子明，使會議不歡而散。

11 月 3 日的這個“武打”會議還不能讓周家瑜他們滿意。接下來，又由對周家瑜言聽計從的二鋼頭頭袁金樑老工人出面，于 11 月 13 日在港口工人俱樂部再次召開了批判“申平路綫”的會議。這次會作出了增加工總部常委（由原 15 個增加到 21 個），派革聯會工人常委韓俊等常駐工總部的決定。這就從組織上保證了工總部不再偏離周家瑜等人確定的方向的目的。

這以後，八一五派就統一了“打劉、張”的部署，在全市貼出了同一口徑的標語：“八一五派努力幹，打倒劉、張過元旦！”

我作爲八一五派的主要頭頭之一，雖然對這個時候提出“打劉、張”的做法不大贊同，覺得不大符合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而且會讓八一五派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因爲劉、張畢竟是中央“紅十條”任命的省革籌領導人），不過我也不想讓自己被人認爲真的是“明保暗砸”，加上大規模武鬥以來心中積壓起來的對省革籌劉、張等領導人的不滿（如劉、張的代表郭一民在重慶的表演），于是也積極參加了這場“打劉、張”的活動，我派了長安廠常駐八一兵團總部的張輝到成都，找紅成派組織搜集打劉、張的材料。

在八一五派鼓吹“打劉、張”的重頭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發表後，我還在衛生局禮堂召開了八一五派各級組織頭頭和五十餘種小報的編輯會議，熱情推薦這篇文章，要求大家大量刊登“打劉、張”的材料。

向中央調查組彙報的風波

1967年10月4日，警備區首長把山城八一五派頭頭召集到警備區小禮堂學習林副主席國慶講話和國慶社論、周總理第五次接見廣州代表的講話等。學習由趙副政委主持。

正當劉處長在讀兩報一刊國慶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時，一個軍人把我叫出學習室，問我：“你是陽增泰同志嗎？”

我說：“是。有什麼事？”

“中央調查組李副組長找你，你跟我來吧。”

李副組長在警備區院內圓亭裏等着我。他十分熱情地和我握手，叫我坐在他身邊，問了我的家庭情況、個人簡歷和社會關係後，又問了我在工廠造反前後的情況和八一兵團從誕生之日起的一系列情況。接着又問我山城武鬥升級情況和八一五派在這次武鬥中特別是上層組織的活動情況。他用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指示來啓發我，要我本着“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的精神，不談反到底，自己鬥私批修，向毛主席獻忠心，向中央調查組作個詳細彙報。

我當時想，中央調查組是毛主席、黨中央派來的，我們八一五左一個最聽毛主席的話，右一個最聽毛主席的話，今天是毛主席、黨中央派來的中央調查組向我瞭解情況，代表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我是革命群衆組織的頭頭，就要聽毛主席的話，就要向中央調查組說老實話。所以李副組長問什麼，我就如實地回答什麼，一點都不隱瞞，一點都不回避。

聽我談完以後，李副組長點點頭，肯定說：“你這樣的態度很好。”他又要求我把講的這些寫一個書面彙報材料，儘快寫出

來交給中央調查組。我答應說："沒問題，一定照辦！"

回來後，我在革聯會常委會上把李副組長的這次接見和要求向常委們作了彙報，大家決定由我主持起草這一書面彙報材料，找幾個有關單位又瞭解情況又能寫的人參加，然後找法院、《新重慶報》的幾個筆杆子彙總寫出來，由革聯會常委會通過，再上交給中央調查組。

爲了把這個任務完成得更好，我找了十多個單位的人（大約二十人左右）來參加這一工作，我先給大家講了有關情況，要大家作好記錄，根據記錄整理彙報主件，再根據需要確定補充附件。

但是，搞了兩天過後，我一瞭解，他們都沒有動筆。負責寫主件的人叫苦說：我們又不瞭解你們當頭頭的腦子裏是怎麼想的，咋個寫得出來呢?

我就只好自己動筆，寫了個有關大事的回憶稿，要大家以此作參考寫彙報材料。

後來我才知道，一個重大的老師見了我寫的回憶稿後，背着我，也背着大家，去轉告了周家瑜。

周家瑜聽了，立即在交際處二所四號樓召開了革聯會常委會，在會上嚴厲批評我說："你寫的彙報材料，把武鬥都說成了八一五主動進攻，全說的八一五，沒有一點說反到底，像這樣給中央調查組彙報，是出賣山城八一五派的利益！"

我沒有想到他會這樣給我扣帽子，便想進行解釋，但是他根本不讓我發言，不聽我的。其他人聽了周家瑜的訓斥，也不聽我的說明、解釋，一個勁地批評我。我一氣之下就說："好，你們不要我彙報，我就不彙報了！"

回到革聯會，我就通知把我寫的回憶稿收回來，把彙報材料組解散。

給中央調查組寫彙報材料的事就這樣拉倒了。

那次會後，葉臻榮說，中央調查組問陽增泰的祖宗三代，一個可能是作爲進革命委員會的群衆代表在考察，另一個可能是要把他作爲壞頭頭來揪……

我被作爲“叛徒”調查

就在那次會後，八一兵團總部于 10 月 23 至 30 日，舉辦了首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

學習班剛開學那天，方文正跑到學習班來（他這時還不是八一兵團總部的頭頭，只是空壓廠分團的頭頭之一），把他們空壓廠派到八一兵團總部任常委的謝武周叫出去，神秘地說：“陽增泰要跑，趕快把他看起來。”

謝武周有些不明白，問：“他要跑到哪裏去？”

“跑成都，可能都跑了。”

“沒有啊，在裏面學習嘛。”

方文正一聽，“啊”了一聲，不好再說什麼，就走了。

第二天，學習班上就有人把矛頭指向我。周光清發言中說：“革聯會有人說的，你是‘叛徒’……”

當時傳說中給我定了幾條罪狀：

一、私自向中央調查組彙報，出賣山城八一五派的利益；

二、明保暗砸；

三、把筆記本交給砸派；

四，把江津運回的 50 挺機槍送給砸派。

等等。

八一兵團總部首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根據一些人提出的所謂陽增泰的“叛徒”問題，決定選出杜昇[1]、陳仲學、周明高、何大發等組成臨時專案調查組，在全市範圍內進行調查。

許多人都不知道也沒有想到，正當八一五派在大張旗鼓“打劉、張”，對張西挺歷史上是否叛徒進行秘密調查的時候，

[1] 杜昇，1940 年 5 月生。文革爆發時爲國營望江機器廠 36 車間搪工。中共黨員。參加造反後任八一兵團 16 團勤務員。1967 年底任八一兵團總部常委副班長，後任八一五工總部常委班長。1968 年底望江機器廠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委員。

八一五派內部也對我進行了所謂“叛徒”的調查。

不過，八一兵團這個調查組經過調查，最後向大家作了否定“叛徒”罪名的結論，認爲這是一種八一五派內部的工人與學生之間矛盾的發展。

以後由于社會上形成“打劉、張”的高潮，內部矛盾又下降到次要地位，暫時緩和下來。但是在中央“三一五”指示下來以前，重慶局勢始終被重大爲主的學生左右，在這個時候，八一五派內部誰要想提出與重大八一五不同的意見，就要被加上“明保暗砸”、“叛徒”的帽子。

這件事也被中央調查組知道了。李副組長就把我第二次叫到警備區內的圓亭，進行思想政治工作，要我堅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又安慰我說：“群衆組織不存在叛徒不叛徒的問題。”李副組長還告訴我，我向他們口頭彙報的情況，經過調查核實，認爲都是實事求是的。他叫我不要被這種極左思潮所嚇倒，并說：“就是剩下你一個人，你到北京來，我們也會接待你，支持你。”

八一兵團總部改選鬧劇

八一兵團總部這次學習班，對領導班子進行了整頓。原在八一兵團總部當班長的空壓廠的謝武周，換成了方文正。但其他廠派往總部的常委不同意方文正當班長，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這時，各分團派來總部任常委的共有 16 人，分別是：

4206 團（前衛儀錶廠）何光輝，

2201 團（3403 廠）馮國璉，

2602 團（空氣壓縮機廠）方文正，

6657 團（建設機床廠）呂永琪，

2007 團（朝陽電機廠）陽增泰，

2103 團（巴山儀錶廠）張順華，

67118 團（長江電工廠）林伯君，

2701 團（無綫電廠）劉德富，

07 團（五機部供辦）王倫，
2301 團（嘉陵機器廠）廖明華，
20 團（長安機器廠）周光清，
65 團（江陵機器廠）彭乾元，
16 團（望江機器廠）杜昇，
1701 團（平山機械廠）呂元明，
6501 團（二分部，陵川廠）王好錄，
1703 團（一分部，晋林廠）王世德。
11 月 28 日，我們開常委會選正副班長。

當時各分團派到總部的常委不齊，到會的只有杜昇、彭乾元、廖明華、方文正、王倫、王世德、何光輝、周光清、林伯君、馮國璉、呂永琪、王好錄、肖光啓（會議主席）。王好錄、馮國璉到會後就有事外出了，剩下十一人。班長候選人兩個：陽增泰、方文正。

當時，在武鬥期間與方文正關係較密切的廖明華、周光清、彭乾元、王倫等五票選了方文正，其他六票選了陽增泰。

見方文正沒有當選，有人便到會外去糾集了周學川、雍平書、張正良、秦老么、李培生、曾天泉等人衝進來，持槍哄鬧，向我施加壓力，說：“陽增泰，你想當班長，要不要腦袋？”有人還公開威脅要開槍。

方文正坐在一邊也不制止，其他人勸也無用。這時彭乾元出面假意調解說：“你陽增泰、方文正都想當班長，方文正又少一票，陽增泰你雖然多一票，你看嘛，群衆又有意見，弄不好，還要挨槍打。我的意見，你兩個都不要當了，推選王倫老頭當班長，你們兩個都當副班長。”

其他人見此情況，也覺得是個緩和矛盾的辦法，都順水推舟同意了。

最後，又選出杜昇、劉德富爲副班長。四個副班長中要派兩個分別到工總部、革聯會。當時一些人選我到工總部，一些人選方文正到工總部，意見相持不下，于是又進行無記名投票。結果是方文正以七票當選，但他却不願意去，說工總部太亂了，又在

革聯會的領導下，沒得意思。大家就翻開《毛主席語錄》219 頁、220 頁有關“紀律”的“最高指示”反復學，但他根本不聽，說：“工總部我是不去的。實在要我去，那我就到革聯會。”

後來經廖明華、彭乾元、周光清等人提議，把杜昇推到工總部，把我推到革聯會，方文正留在八一兵團總部。于是，他這個八一兵團總部的副班長，仍然在總部行使了班長的實權，班長王倫實際上只有個虛名。

方文正坐鎮八一兵團總部後，常委中與他意見不合的就被他想法換掉，工作人員也換得差不多了。控制了八一兵團總部後，方文正就到處作報告、講演，說八一兵團是山城工人階級中最純潔、最有力量的一支產業軍，是工人階級的主力軍，工人階級要左右形勢，就是八一兵團要左右山城文化大革命。山城文化大革命運動要以八一兵團爲核心，等等。

周家瑜可能怎麽也沒想到，拉下了一個申平，又出來一個方文正，都想讓工人組織擺脫學生組織的操縱，都想由工人組織來控制局勢。

回老家一趟惹風波

1967 年底，成都的紅成派工人組織紅衛東成都部隊舉行慶祝毛主席誕辰暨紅衛東造反一週年活動，我被派到成都去，以重慶八一五派代表的身份參加這個慶祝活動。陪我去的有我的助手舒斌和水運公司的周學良（我們都喊他周二娃）。

我們乘火車到成都後，即轉乘汽車去了東郊。儘管因爲四川省革籌組和駐成都支左的五十軍都支持八二六派，成都的許多地方都是八二六派占優勢，但東郊這個國防大廠集中的地方却是紅成派的“根據地”，那些企業中基本都是紅衛東的力量占優勢。我們在四機部駐成都的 807 庫住宿，因我們朝陽廠平時就在那裏的招待所訂有出差人員住宿的房間。

紅衛東造反一週年慶祝活動在成都東郊體育場舉行。我作爲重慶八一五派代表上了主席臺，講了些“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

勝利在一起”的話，發言稿當然是走之前就有人替我寫好的。

隨後，我帶着舒斌等一起去了我的老家郫縣，看望我的老父親。離家多年，我和父親已經有很長時間未見面了。不過我也沒有在家多呆兩天，只吃了一頓飯就匆匆離開了。當時一心想的還是“幹革命”。

我沒想到，我回家一趟的消息，不知怎麼被當地的八二六派（與重慶的反到底派同一觀點的）聽說了，他們有人跑到我家去想抓我或者是想找我的麻煩。而當地的紅成派得知後，也跑去想保護我，進行干涉。結果兩派還在我家鬧起來了。

事後，當地的八二六派組織貼出了布告，聲稱誰要抓到了陽增泰，可得 600 元獎金。

這是幾年後我父親跟我閑聊時告訴我的。我當時一點都不知道。

我和申平爲什麼沒有去中央學習班

1968 年 1 月初，革聯會的一次常委會上，班長陳萬明提出：“據各個方面的情況瞭解，重慶兩大派的武鬥又要出現了。我們今年要吸取去年的教訓，早作準備，來它一個先發制人，以免挨打。”又說：“我建議還是由陽增泰，我們的陽司令重新上任，另外再選兩個人作司令的左右二膀，把武鬥司令部重新成立起來。看大家的意見如何。”

陳萬明一說完，周家瑜、袁金樑、韓俊馬上應聲贊成。

由于當時山城根本沒有武鬥，再加上 1967 年中央調查組對我的教育後，我對搞武鬥的錯誤也有一定的認識，我就表示不同意再建武鬥司令部，更不願再當武鬥司令。革聯會常委姜永榮便提議袁金樑來當武鬥司令，袁金樑馬上跳起來大吼大叫：“不幹不幹！”但他堅持陳萬明的意見，還是要我這個司令重新上任。

經過一番爭論，最後終于確定：趙行貴、韓俊、危昌林三個常委負責搭架子，組成武鬥司令部，由陳萬明直接領導。

這個司令部成立以後，第一個行動就是組織武鬥人員，于 2

月初包圍攻打建設廠，控制半自動步槍，武裝八一五派……

1968年2月份，警備區通知山城兩大派各派58名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當時警備區耿參謀長[1]通知我，這次到北京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有我，要我作好準備。

得知這個消息後，我內心非常高興，因爲我還沒有到過北京，正好去看看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

在革聯會常委會上討論這個問題時，衆常委都同意周家瑜、陳萬明和我三人代表革聯會去北京中央學習班。但是陳萬明却說："要代表革聯會，只有周家瑜一個人就行了。我和老陽都不能代表。"

會後。陳萬明却背着我，和韓俊二人悄悄跑到市革籌去辦理到中央學習班學習的有關事項。當時機關總部段德昌從南部搞以物換物回來，在市革籌碰上了，才聽說是要到北京去參加中央學習班。陳萬明解釋說："我是革聯會的班長，我不去，學習班的領導小組就沒有人參加了。這對八一五派不利。"段德昌聽說沒有安排他上京學習，當時就表示不滿，吵鬧開了。陳萬明趕緊給段德昌做工作，并決定把韓俊的名額讓給了段德昌。

陳萬明把我作爲革聯會代表的資格排除後，我們八一兵團總部決定讓我以八一兵團代表的名義到京參加學習。不料，有人又給八一兵團總部的方文正做了工作。于是，八一兵團總部就出現了一幕鬧劇：彭乾元不知受誰的指使，跑來大叫大嚷說不能讓陽增泰上京學習，還拿手槍當衆把電話機砸壞了，大聲宣布："誰要讓陽增泰上京學習，就是這個下場！"

爲了避免爲上京學習的事引起內部衝突，我就決定退讓一步息事寧人，表示把我這個代表名額讓給了建設廠的何道雲。

---

[1] 耿志剛，1919年生，河北灤縣人。1937年11月入伍，1938年8月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年12月加入中共。1961年3月晋升爲大校軍銜。文革爆發時爲第五十四軍參謀長。後任五十四軍副軍長、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裝備部副部長。1983年離休。1999年1月在北京病逝。

這時，陳萬明又來給我做工作：“老陽，你還是留下來好，北京是導演場所，重慶是表演場地，肯定會有場武鬥。重慶搞武鬥，只有你才把大家組織得起來。你在群衆中有威信，群衆都聽你的指揮。”

但是，經過這樣幾番折騰，我已經對這些事淡心無腸了，不管他怎麽說，我也沒有答應在重慶負責領導八一五派的武鬥。

陳萬明見我不答應，可能也不放心我這個革聯會副班長在重慶掌握革聯會的大權，又作了個决定：在他上京學習期間，由革聯會常委張祖祥（市公安總部的頭頭），代理他的革聯會班長職務。

張祖祥代理班長工作後，又怕我不高興，反復給我做工作說：“老陽，你在前面幹，我在後面給你作後盾。去年我在枇杷山地區指揮部給劉昌友作後盾，反到底根本不敢來動枇杷山。這次我給你作後盾，保險他們不敢動你一根毫毛！”

1968 年 2 月，八一五派革聯會下屬各大總部都在積極準備派代表上京參加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學習。工總部的申平、杜昇也得到了市革籌組的通知，準時到警備區去報了到。

當八一五派的 58 名代表要起程赴京之前，周家瑜通知將這 58 名代表拉到重慶大學，在重大那座剛落成不久的毛主席塑像前進行宣誓。這時，周家瑜發現了代表中有申平。這當然使他感到不快。他和一些人就在私下商量了不讓申平去北京學習的辦法。

當警備區通知這 58 名代表集合乘汽車，要到火車站去上專車赴京時，就有一些得到授意的學生代表出面，不顧警備區首長的勸告，硬將申平從汽車上拉了下來，不准他去北京。申平就這樣被排除于赴京學習的代表之外。

在這以後，八一五派內部的一些人又傳出許多不實之詞，不但對申平進行攻擊，而且對與申平同一單位（機電公司）的蔡明訓也進行攻擊，說他們是野心家，有刑事問題，有歷史問題等等。總之千方百計進行抹黑。甚至在 1968 年的清隊工作中又有人書寫大量黑材料進行陷害。幸好駐機電公司的軍代表經過詳細調查，才將這些謠言戳穿。

第七章 最後的武鬥高潮

張國華親自給我傳達“三一五”指示

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長在北京接見四川軍政領導人，作了一些重要講話，時稱“三一五”指示。其中，對重慶八一五派進行了空前嚴厲的指責。中央學習班最先傳達，那些在學習班的頭頭們聽到後有什麼反應，我不瞭解。我是在重慶得到這個消息的。先是有北京傳來的小道消息，說中央這次嚴厲批評了八一五和成都的紅成“打劉、張”，但到底是怎樣批評的，內容不詳。

一天，我在革聯會突然接到通知，警備區來了一輛小車，點名要接陽增泰去有重要事情。我到了警備區後，一個軍官把我引進一間專門的小房間，大概是軍部與中央通電話的專用房間，值班軍官接通了電話，對那邊說：“報告首長，陽增泰到了。”然後讓我接電話，對我說是成都軍區張國華政委要跟我通話。

我沒想到張政委會直接跟我通電話，不知有什麼重要指示，心情十分激動。聽到張政委在電話裏聲音很親切地說：“陽增泰同志，你好，我是張國華，我現在給你傳達中央首長的重要指示……”接着，他給我講了最近中央首長對四川問題所作的“三一五”指示。其要點就是不能再“打劉、張”了，“打劉、張就是爲李、廖[1]翻案，就是劉、鄧[2]復辟”，是錯誤的。張政委十

[1] 李，即前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廖，即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二人已經于1967年5月被中央明確認定爲四川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在四川的代理人。

[2] 劉，即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鄧，即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二人已經被中央明確認定爲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分鄭重地對我說：“請你把中央首長的這個指示精神迅速傳達給八一五派的同志們，請他們立即停止打劉、張的活動，落實中央首長的指示。”

當我聽到中央首長批評我們“打劉、張”，把問題上綱到了“就是爲李、廖翻案”、“就是劉、鄧復辟”的高度時，我感到大吃一驚，就像挨了當頭一悶棍，要不是在警備區接的電話而且是張國華政委親自給我傳達的，我可能根本不會相信，而會認爲這是砸派造謠。但這確確實實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我聽完後立即向張政委表態：一定迅速向八一五派傳達，落實中央首長的重要指示，請張政委放心！

接完電話，警備區派車把我送回了革聯會。我馬上召集在家的所有人員，把這個重要指示精神向大家作了傳達。可以想到，這個指示在八一五派的人們心中引起了多大的震動！可是這是中央首長的指示，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令，我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派，不能表示不滿，更不敢表示反對。我們只能認錯，只能轉變態度，在哪裏跌倒了就在哪裏爬起來。

不過，說實話，我口頭上這樣講，但內心裏仍然是想不通的，這個彎要轉過來，實在是太難了。有的人甚至委屈得當場哭了起來。

我想，認不認錯，是對中央的態度問題，必須檢討。但我只認爲我們“打劉、張”可能是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發動的時機和采取的方法不對。而這實際上就是申平當初反對公開參與“打劉、張”時就提出過的意見。事實證明了申平當時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他却被八一五派排斥、清除了。

我那時候對派性利益還是看得很重的。我擔心“三一五”指示對八一五派的極大壓力會引起內部混亂，就在向下傳達時一再强調：這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是中央的策略，中央對劉、張也有批評。目前重要的是要穩住內部陣脚，不能讓對方趁機將我們武力壓垮。

雖然說起來對中央指示要堅決執行，但心中的想不通却一直像塊大石頭壓着，一直到一個多月後中央的“四二七”指示下來，

又把反到底和成都的八二六派狠批了一頓，八一五派才算緩過氣來。

中央首長“三一五”指示下來後，反到底派翹尾巴，八一五派想不通，雙方矛盾激化，一觸即發，山城再次爆發了武鬥。八一五派中的一些人去搶了存有援越物資的 351 倉庫和解放軍駐渝部隊的武器[1]，造成很大影響。

這時，周家瑜、陳萬明等奉學習班領導指示，從中央學習班回山城制止武鬥。

陳萬明回來後，在革聯會二號樓召集我們在家的常委開了個會。他指責說，搶 351 倉庫的武器，一點不策略，那個部隊感情上偏“砸”，以後要注意，多給下面做工作……

陳萬明撤銷了張祖祥的革聯會代班長職務，宣布由我來擔任代班長，并說：“‘三一五’指示對我們不利，你們在家要穩住陣脚，只要不被對方吃掉就好辦。我看老陽，還是大膽幹，出了問題大家承擔，山城八一五的同志不會忘掉你的。”

我問：“周家瑜咋不也來講一下？”

陳萬明說：“周家瑜不好出面，警備區把他抓得緊。我倆的意見都是統一的。”

我從 1968 年 3 月 31 日起代理革聯會班長。沒有幾天，4 月初，八一五派革聯會就宣布撤銷了。我又被八一兵團推選到工總部代理杜昇的班長職務（杜昇當時也到北京中央學習班學習去了）。

---

[1] 1968 年 4 月 28 日，八一五派武鬥隊兩次衝擊 351 倉庫搶奪武器，又搶走 405 團大批槍支。周恩來聞訊後于當天 16 時指示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找重慶八一五派負責人談話，指出他們搶槍是違犯“九五”命令的，直接影響戰備和援越抗美的任務，是非常錯誤的。爲此：一，要他們立即停止搶武器的錯誤行動。二，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三，公開承認錯誤，否則嚴辦，中央馬上向全國通報肇事的爲首分子是盜竊國庫的壞分子。

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鬧劇

1968年6月1日，梁司令員、李大章[1]、張西挺等四川省領導人，爲慶祝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來到山城。當天晚上在警司接見兩大派頭頭。接見會上宣布：各群衆組織都不能打出自己的派旗，只能打紅旗和大聯合單位的旗子。反到底派有人就提出不准重大革命委員會的旗子打出來，說重大革委會是沒有實現大聯合、一派掌權的“僞革委”，要砸爛重來；八一五派則堅決反對。兩派爲此爭論不休。梁司令員和李大章在講話中都說：重大革委會是經過省革委批准的，不能說是“僞革委”，這個說法是錯誤的。當藍亦農政委把話筒遞給張西挺請她講話時，她怎麽也不表態。

[1] 李大章，1900年生，四川合江人。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入中共。文革爆發時爲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四川省省長。文革中1967年1月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街道工業分團抓去批鬥，在被囚于該組織期間發生“一·二九事件”（所謂街道工業分團衝擊公安局搶劫機密檔案的“反革命事件”），成都軍區在鎮壓工人造反兵團時將李打成“一·二九事件”的“黑後臺”，遭到游街批鬥。後被周恩來下令送去北京參加4至5月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等說服他早日作好檢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7月上旬謝富治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四川視察時又向他轉達了毛澤東的關心，希望他早日“站出來”（即早日表態與李井泉等人“劃清界限”，好站出來工作），并向軍隊支左幹部傳達了“毛主席講過多次，李大章是可以用的。”（《謝富治副總理、王力同志等在川期間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彙編（第一輯）》47—48頁，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辦公室印，1967年7月））于是“李大章是可以用的”成爲傳遍全川的“最新最高指示”。1968年中央首長“三一五”指示中江青再次强調要儘快解放李大章。講話傳達後，3月19日即被任命爲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領導小組成員，突擊寫出了“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妄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罪行”的長篇文章。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第一副主任。在1969、1973年的中共九大、十大上被安排爲中央委員，被毛澤東內定準備補選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5年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1976年5月在北京病逝。

■陽增泰 1968 年任八一五工總部班長時在紅港碼頭留影

我們在下面把手都拍痛了，她也還是不表態。其實她這個不表態也等于是表了態：表示她不同意梁司令員和李大章的講話。

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重慶大田灣體育場隆重召開。

正當重慶軍分區司令員唐興盛宣布大會開始時，突然從主席臺對面左側看臺上打出了“砸爛重大僞革委”的橫幅，越舉越高[1]。也就在此時，從會場大門外向會場中心駛來幾輛汽車，上面滿載身帶武器的人，但他們在解放軍手挽手組成的人墻阻攔下沒有進入會場。看臺對面左側那個橫幅慢慢往主席臺方向移動過來，引起許多人的不滿。在主席臺上許多人的强烈要求下，張西挺才

[1] 據當時八一五派報紙報道：是在熊代富講話時，“在 ××× 派的隊伍裏突然打出了一面早已準備好的‘砸爛重大僞革委’的巨幅標語，繞場半周，挂到主席臺前。”（《觸目驚心的“六·二”反革命事件》，載重慶八一五工總部《重慶工人》編輯部主辦《重慶工人》第 21 期，1968 年 6 月 17 日出版）

對坐在她旁邊的重大井岡山頭頭徐光明說：你去叫他們把它收了。徐光明走出去幾分鐘就回來，說他們不聽我的話，還要打我。

大會按照程序進行。接近尾聲時，突然看臺右側外面亂哄哄鬧起來，數十人簇擁着一具用木板抬着的死尸，破場而入，直向大會主席臺衝來！

唐興盛打斷正在發言的代表[1]，抓過話筒進行勸阻和制止，但衝擊會場的人根本不聽，繼續往主席臺衝來。在主席臺前維持秩序的解放軍人不多，唐興盛趕緊從會場中調來部分解放軍跑步上前維持秩序，那些抬尸體的人乾脆放下尸體，把抬尸體的杠棒拿起來打，把會場上的語錄牌、毛主席像的牌子砸了，木棒拆下來打，還有磚頭、石塊亂擲，有的還扔到主席臺上來了。

唐興盛、藍政委、韋軍長出面都制止不了。梁司令員叫張西挺出面勸阻，張西挺才走上去拿起話筒說：反到底派的同志們，你們是最聽毛主席的話的，是最革命的，你們不要衝主席臺了……那些抬尸體衝主席臺打解放軍的人才停下來了。張西挺轉身回來，還沒有坐下，那些人又鬧起來了，而且那具尸體突然被拋起一人高，在場的人們都看得清楚，尸體已經發綠，而且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

現在我才知道，當時八一五工總部的報紙《重慶工人》上對那天大會情況的報道中，記載的是在我發言時發生了這個抬尸衝擊主席臺事件。但我現在完全想不起當時是我在發言了。我一直想到的是，我沒有進入省、市革命委員會，就不可能到那個大會上去發什麼言。但我清楚記得那一具已經發綠、臭味難聞的尸體在混亂中被拋起來的情景。

大會就在這樣的意外干擾中宣告勝利結束了。

---

[1] 據當時八一五派報紙記載，這時發言的代表正是陽增泰（小報上誤排作“楊增泰”），見《觸目驚心的“六·二”反革命事件》，載重慶八一五工總部《重慶工人》編輯部主辦《重慶工人》第21期，1968年6月17日出版。

方文正主持“打天下”

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前，方文正在北京中央學習班通過電話和長信授意張順華在江陵廠召開了八一兵團總部的第一次江陵會議，主要是排除异己，將杜昇和陽增泰二人撤換調回分團。當時杜昇還在北京學習班，但我在重慶，却不通知我參加會議。會上决定把八一兵團總部副班長、工總部班長杜昇調回望江廠，但還是决定讓陽增泰到工總部接替杜昇任班長。張順華自己則當上了八一兵團總部副班長。

方文正當上了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于市革委成立之前乘飛機回到重慶，成立大會後，他就以新任市革委常委的身份，于6月4號至7號在望江廠主持召開了八一兵團各分團主要勤務員的全委會即望江會議。這個會議我沒有全程參加，只參加了開始的準備會議。方文正在準備會議上總結北京學習班上的經驗說：這次進省、市革委會，鋼鐵和重大都“搞到了着”（即嘗到了甜頭，得到了利益，他指的是重鋼的陳萬明和重大的周家瑜當上了省革委的常委），八一兵團靠邊站了，只得到一個市革委常委，重大還想要我們讓出來。八一兵團和砸派的軍工井岡山相比，八一兵團是失敗的[1]。警備區首長縱容、遷就學生，使我們八一兵團站不出來。我們八一兵團是山城産業工人的主力軍，我們應該左右山城局勢，要向軍工井岡山學習，不能讓學生左右局勢。現在山城武鬥又有苗頭，我們八一兵團一定要通過這次武鬥來左右局勢，重慶只要武鬥一搞開，其他各大總部都要向我們靠攏，都要依靠我們。我們一定要打得有理有利有節，打出威風來，到時候都要聽我們的話。他重大、鋼鐵就靠邊站了。

[1] 方文正此說指的是：1968年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和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時，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團只有一名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方文正），而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有一名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常委（鄧長春）和一名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李木森）。

後來在望江會議的公開決議上就寫了這樣一段話：“會議一致表示，八一兵團在山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貢獻，決心更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兄弟工人革命群衆組織的團結，爲爭取山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爲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作出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犧牲。”

在望江會議上，方文正還提出，二號樓是革聯會的尾巴，必須砸爛，砸是爲了使工人殺上陣，砸是爲了割學生左右山城局勢的尾巴。不采取砸的辦法就不能驚動山城內外，砸是一鳴驚人的革命行動。他作了精心部署，哪個團調多少兵力，誰站崗放哨，誰去抄砸，誰看守工作人員，誰搶東西……動手時間，對外輿論等等，都作了安排。行動總指揮是張順華、周光清等。

那次抄砸我沒有參加。聽說抄回的東西裏面有一本稿子，是一個師專八一五的學生寫的電影劇本，歌頌重慶八一五造反精神的，但主要不是寫學生，而是以二鋼的工人造反派爲主角。八一兵團的人看了很不高興，把這稿子燒了。

方文正還給各分團下命令，沒有總部的命令，各分團的武鬥人員任何人無權調動。爲了與其他各大總部搞好關係，以達到他左右山城局勢的目的，他還主動把從建設廠搞到的槍支分送給各大總部。

方文正還召開了幾次會議——

長安會議。

在長安廠後面的金紫山開的，張順華主持。會期三天。白天開會,晚上看電影和文娛節目。主要研究專縣形勢,積極擴軍備戰。總結望江會議後的經驗教訓，進一步左右山城局勢。

空壓會議。

沒有通知我去。主要是慶祝建設、空壓的武鬥勝利（將反到底派打跑了），解決建設廠有計劃地運槍出來的問題。

第二次江陵會議。

方文正主持。主要慶祝江陵的武鬥勝利(將反到底派打跑了)，同時解決前兩次會議後未兌現的“擴軍”計劃。在會上，建設和

長江兩邊的頭頭互相說對方“不落教”[1]，吵了一個通宵，幾乎打起來,有人還跳上了桌子。最後方文正拿出《毛主席語錄》來學習，決定每個廠配備槍支彈藥的數額,大廠半自動 200 條,小廠 100 條,每條半自動配 200 發子彈，機槍是 1000 發子彈。會上答應給工總部 100 條半自動，實際只給了 12 條。這次會議後，建設的槍支由周光清、馮一勝、張邦華和建設廠的老張一手包乾，用巧妙的方法偷運若干車（大概 2000 條左右）通過解放軍哨卡，存放到無綫電廠，然後進行分配的。

我參加了方文正在江陵廠召開的這次會議,支持他提出的“大打大勝，小打小勝，不打自潰”的口號。

長江會議。

這個會是我碰上的。由方文正主持，在長江廠俱樂部召開。主要解決子彈供不應求問題。長江廠幾個勤務員都叫苦。方文正說：“我是市革委常委都不怕，你們怕什麼？”

江陵廠彭乾元說：“三七炮裝好了，我踩第一脚，把責任承擔了，下面的兄弟夥膽子就大了。現在市革委方常委都點頭了，你們還有啥子怕的？”

最後方文正還要大家簽字作爲憑據。我在簽字時特別註明：“務必以守爲攻政策”。

散會後，方文正又把空壓的何大發、建設的姚二炮、江陵的彭乾元等頭頭和總團常委留下來，與長江廠頭頭繼續商量武裝盜運半成品槍彈問題。最後決定：建設、空壓、江陵、嘉陵、無綫電各出人員,共 200 人左右,全部于當天下午 6 點鐘到建設廠集合，然後坐船出發。到長江廠後，一部分（建設）擔任警戒，其他的就搬運子彈上船。走的時候打幾槍，說是學生和外單位革命群衆組織到長江廠來搶了子彈，以後就出通告或布告，限制其他人再來搶。總團協助宣傳。

爲了實現這一計劃，方文正和張順華沒有回總團，而是留在

[1] 不落教，舊時重慶袍哥用語，含有指責某人不守信，不幫忙，不配合，不服從等多種意思。

長江廠，等彭乾元、周光清、張邦華等帶人和船來。長江廠的頭頭雖然不大情願，但也沒有辦法，結果就在這天（7月9號）晚上，方文正指揮八一兵團盜運走輕重機槍子彈一百萬餘發。本來會上定的只拿半成品，實際成品也拿了。另外還偷了底火。東西盜運走後，成品就由出兵單位分了大部分，半成品全部運到空壓廠，由方文正安排。這就是長江廠“七九”盜彈事件的經過。

我沒有參加這次行動，會完後我就回工總部了。

8月9號，警備區韋軍長、藍政委、雷副政委[1]同我們工總部常委交心，動員我們上交武器，執行中央發布的兩個布告（“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會後，我在路上給方文正提出：“我們八一兵團是不是帶個頭，先交一部分？”

他反對說：“我們一交，其他的就跟上來了。還是穩一下好。”

這時，“八一五”造反兩週年紀念日又要到了，首長又動員我們在兩週年的時候上交武器。我又找方文正商量。他說時間來不及，分團的頭頭都不容易召集到一塊。又把交槍的事往後推了。

我拒絕與專縣組織“脫鈎”

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的一天，我來到設于朝天門重慶飯店的八一五工總部參加常委會，會上，我被大家推選爲工總部常委的班長。

工總部常委共有22人。我記得有：陽增泰、蔡明訓、蔣維

[1] 雷遠高，1921年生，山西平遙人。1939年加入中共。文革爆發時爲陸軍第五十四軍副政委。1968年底隨部隊移防雲南，調任雲南省軍區政委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政委、中共雲南省委常委。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後被定爲“林彪安插在雲南的死黨”。文革結束後不實罪名被推翻，調任北京某軍事院校研究部部長。2009年9月16日在南京逝世。終年88歲。

漢、黃履忠、丁盤興[1]、蔣懷紀、顧正桃、王永珍、楊國民、唐良柱、代正華、張志華、潘祖文、史國經、譚正禮、何啓元、楊容生、劉家聲、顏其文……

在這批常委中，只有丁盤興和潘祖文是市革委委員，但他二人不是以工總部名義推選進市革委的，而是分別以紅岩機器廠八三一戰鬥團和重慶市革命教職工造反總部代表的名義推選進市革委的。在北京中央學習班推選進入省、市革命委員會代表時，因周家瑜等人已經認定以申平爲首的工總部實行了“明保暗砸”的所謂“申平路綫”，所以沒有推選一個工總部代表進入省、市革命委員會。

我主持這次工總部常委會，提出了六個方面的問題請大家討論：

一、精兵簡政。現在工總部人員編制達 170 人左右，但真正在總部每天堅持工作的不到 100 人。建議總部辦事機構進行精簡。

二、加强組織紀律。工總部人員中，有的是有人無手續，有的是有手續無人。建議凡無手續而在總部工作的都清退回去；有手續而經常不來上班，多次提出意見不改正錯誤的（包括常委），就除名。

三、加强基層聯合。凡一個單位有兩個八一五派組織都參加了工總部的，無條件促成其聯合。只以一個組織參加工總部，否則就都不參加，撤回在工總部的所有人員。

四、紅衛兵（學生）在工總部協助工作的，均一律由紅警

[1] 丁盤興,1938 年 10 月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紅岩機器廠施工員。中共黨員。參加造反後任八一五派紅岩八三一戰鬥團總部委員，八一五工總部副班長。1968 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委會成立任委員。

區[1]介紹來，工總部不直接與學校發生關係。已經在工總部工作的學生，一律由紅警區核實後介紹，才能作爲正式編制人員。

五、工總部現有宣傳隊建議撤銷。以後宣傳隊均由各大兵團或基層單位組織。工總部宣傳組只起統籌作用。電影宣傳問題，現有石油校和五一技校有業餘電影放映隊，他們主動找上門來要求與工總部挂鈎，如何處理請大家討論。

六、建議組建一個强有力的保衛班子（一個排）。行否請大家討論。

總之，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工總部的工作要適應新的形勢，逐步走上正軌。

正當我在工總部忙于這些具體事務時，一天忽然由工總部外事組叫我去接周家瑜從成都打來的電話，當時周家瑜正在成都參加省革委的會議，他向我傳達了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在省革委常委會上，已經決定將四川省涪陵地區的紅貿派（紅聯司），南充的臨聯，瀘州的紅聯站，永川的工農派等組織定爲保守組織，省革委首長已經提出，要求我們八一五派與這些專縣的組織脫鈎，不要再去管專縣。周家瑜在會上表了態，堅決落實這一決定。他要求我把這一決定的精神向工總部傳達。

我一聽，頓時火冒三丈，我在電話裏對周家瑜說：“周家瑜，你曉不曉得你這個省革委常委是怎麽當上的？是千百個八一五戰士用白骨把你堆上去的！你現在當了官就不認人了嗎？省、市革委會早已成立，現在哪裏還有什麽‘革’與‘保’？大家都是保毛主席。你可以與專縣的革命戰友脫鈎，我陽增泰辦不到，我八一五工總部堅決與專縣的革命戰友戰鬥在一起！……”

當時工總部外事組的工作人員平時對重要的電話都要錄音，

[1] 紅警區，全稱爲紅衛兵重慶警備區，是1967年10月31日重慶八一五派三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中學生紅衛兵紅聯會、重慶東方紅紅衛兵）聯合建立的全市性組織。取這樣的名字表明八一五派紅衛兵與解放軍重慶警備區的親密關係。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中央調查組代表和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市革籌領導應邀出席了紅警區成立大會表示祝賀幷接受了所獻的袖章、胸章。

錄音過後要整理成文字記錄，這次這個電話他們也錄了音。後來一些專縣的我們這一派群衆組織跑到重慶來，到重慶飯店找到我們工總部，瞭解八一五派對他們的態度是不是有變化，工總部外事組的人就把那個電話錄音放給他們聽，叫他們放心。這件事情就在他們當中傳開了。

天寶[1] 要警司把我抓起來

當時涪陵紅聯司的一些人因被涪陵軍分區支持的忠實派（與反到底派同一觀點）趕出了涪陵，跑到重慶來的人住在重慶飯店等幾個地方。他們的幾個頭頭找我聯繫要求支援武器，我把他們介紹給了建設廠八一兵團的負責人“陳大炮”陳忠文，陳大炮給他們解決了一些槍支。

1968 年 6 月的一天，是涪陵紅聯司成立週年紀念日，頭一天晚上，他們的頭頭趙永令、郭貴廷、黃連福到重慶飯店八一五工

[1] 天寶，1917 年生。四川馬爾康人。原名木爾加·桑吉悅希，藏族。1935 年加入中共，參加紅軍長征。在延安中央黨校由毛澤東起名“天寶”。文革爆發時爲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四川省民族工作委員會書記、主任，四川省副省長兼中共甘孜藏族自治州委第一書記、康定軍分區政治委員。1967 年初因支持康定造反派“炮轟派”奪權而于 1 月 29 日被支持保守派的康定軍分區打成“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瀘定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禍首”拘捕，并交保守派批鬥。軍分區黨委向群衆廣泛宣傳其“反對毛主席，抵制學習毛主席著作”、“瘋狂反對社會主義，瓦解集體經濟，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大搞民族分裂活動，陰謀策劃獨立王國”、“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大搞宗派主義”等“十大罪狀”，并編印了《關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天寶罪行的綜合報告（草稿）》上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4 月 28 日被中央下令釋放送北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會議。9 月，康定軍分區發出《關于徹底爲天寶同志平反的公告》。1968 年 5 月 31 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後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副省長，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西藏軍區第二政委。中共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8 年 2 月 21 日在成都逝世，終年 92 歲。

總部來，邀請我到江北洛磧去出席他們的紀念大會，我沒答應，他們就不走，一直纏了我一夜，再三勸我。我也再三給他們做工作，說你們已經請了那麼多戰友，就行了。我們八一兵團有建設廠的 6657 團代表去了，就代表了我。我在工總部有許多工作走不開，而且根據當前形勢，我不去，比去的好。

一直磨到天亮，他們見無法說服我，只好走了。我這才能够躺下睡一會兒。當時舒斌一直在場陪着。

過了兩天，舒斌告訴我，紅聯司的小報發表了我在他們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我到外面張貼小報的地方去看了一眼，果然如此。我心想，這是他們鬥爭策略的需要，借用我的名義給他們壯聲勢吧。我一笑置之，也沒把這事放在心上。

誰知道這事却惹出了麻煩。

大約是 6 月底或 7 月初的一天，警司有人來工總部找我，問我：“你去參加了涪陵紅聯司的大會嗎？”

我說：“沒有啊。”

警司來人嚴肅地說：“你還說沒有？人家小報都刊登了你在大會上的講話了！”

我笑道：“你搞錯了。那是他們瞎胡搞的。我真的沒有去。不信，你問問工總部這麼多人，都曉得我這幾天一直呆在工總部沒有離開過。”

警司來的人向工總部的一些人作過瞭解後，又來找到我，這次口氣變緩和了，對我說：“紅聯司小報上登了你的講話，省革委天寶同志看到後非常生氣，要我們警司把你抓起來，說涪陵紅聯司是省革委定了的老保組織，不予承認，重慶八一五派不能把手伸到涪陵去支持他們。”

我笑笑說：“現在小報上造謠的多得很，天寶同志怎麼相信小報上的東西？”

我心裏還想，現在省革委都成立了，還有什麼“革”與“保”？人家那麼多人的群衆組織，憑什麼要把人家打成“老保組織”？

給長壽八一五派出主意

1968年7月10日，八一五工總部長壽分部的頭頭方久祥、鄺守倫來重慶，他們通過舒斌找到我，彙報了長壽吃緊的情況。反到底派在長壽已經步步進逼，從獅子灘到雙龍、石堰一帶已經連成一片，準備進一步拿下江北洛磧，還提出了“拿下洛磧，吃掉長壽，解放重慶”的口號，妄圖切斷我八一五派的退路。現在兩派正在石堰打得天昏地暗難解難分，希望重慶工總部火速派人增援。

我說，建設廠陳大炮不是已經派人去增援了嗎?

方久祥說，陳大炮的人不足一個排，根本頂不住。

我說，我現在如果派人去，怎麼走? 走水路嗎? 走到唐家沱就會被鄧長春的軍艦消滅了。走陸路嗎? 去長壽的道路都被砸派控制了。我們的人還沒走攏長壽，就會被消滅或者重創……

我想了想，說，古人兵法上有一句話，叫“哀兵必勝”，現在重慶的砸派就在搞這一套，他們大量跑到成都等地，訴苦告狀，給省革委和成都軍區施加壓力，你們長壽何不也學學他們，來個以退爲攻，如何?

方久祥問：怎麼做法?

我分析說，在重慶支左的五十四軍是支持八一五派的，在長壽支左的軍分區的部隊是支持砸派的，軍分區是聽命于成都軍區的。你們乾脆組織長壽的八一五派群衆，扶老携幼，公開撤退，沿途還儘量丟一些不要的東西，如破槍之類，儘量做出狼狽不堪的樣子。你們把人從水、陸兩路撤到重慶來，但是不要到警備區，人都住到軍分區去，軍分區要管吃管住，給軍分區施加壓力，讓他們去向成都軍區報告。這樣，我估計長則一週，短則三四天，成都軍區就會發話下來，要安排你們回去。那時候你們就要提出要求長壽砸派交槍，不交槍你們不回去。我想，這樣會取得效果。

方久祥他們聽了我的建議，回去研究後采取了一些辦法，確實起到了作用。

在江陵廠慶功會上發酒瘋

1968 年 7 月上旬，兩派在大坪、江北等一些地區展開大規模武鬥。這一次，因爲八一五派吸取了 1967 年的教訓，搶先控制了武器生產廠，從而掌握了主動權。反到底派處處失利，大批外逃。

在 1967 年的兩派大規模武鬥中，我是八一兵團的一號勤務員，同時又是由八一兵團派到革聯會去的常委。而在 1968 年的這次大規模武鬥中，我雖然還是八一兵團的一號勤務員，但却只是群衆組織的頭頭，而方文正已經成爲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是經上級批准、正式任命的政府要員，因此我就把方文正看作是“新生紅色政權”的代表，是八一兵團的驕傲，自覺接受他的領導，在八一兵團內部自動以二號人物的姿態出現。我這個人本來就沒有什麼野心，不願讓人家說我想爭名奪利。

1968 年 7 月大武鬥八一兵團取得勝利後，我參加了方文正主持的兩次會議，長江電工廠的八一兵團總部全委會議與江陵廠的慶功會。

在長江電工廠的八一兵團總部全委會上，我發言說，劉、張在全川大搞反革命武裝圍剿，現在重慶周邊專縣危急，我們不能同專縣脫鈎，專縣是“劉管區”通向重慶的障礙，失去了專縣，就等于失去了手足。

方文正說，通過這次武鬥，八一兵團要左右山城局勢。建設、長江廠要拿出槍、彈，武裝我八一兵團各分團，小廠一個排，大廠一至二個連，平時配彈，半自動 50 發，機槍 200 發。打起來了，要多少給多少。

我在會上還積極主張要武裝八一兵團六分團——即瀘州 255 廠的紅聯站組織，武裝涪陵紅貿、雲陽“11 · 27”、江津“801”等與我們同觀點的專縣群衆組織。當時長江電工廠的八一兵團負責人對向外提供那樣多的子彈有顧慮，擔心以後不好交代。方文正就叫作出從長江廠“提走”子彈的總部決定，總部頭頭大家簽字，集體承擔責任。我也二話不說簽了字。

7 月 9 日，方文正指揮八一兵團武鬥隊從長江電工廠運走子彈 100 萬發。

就從這一天開始到 7 月 12 日，八一兵團在江北江陵廠地區與反到底派展開激戰，經過江陵廠八一兵團武鬥隊“鋼八一”在八一五派其他武鬥隊增援下的突擊，反到底派敗退撤離，八一五派控制了江陵廠及周邊地區。

消息傳來後，江陵廠的八一兵團 65 團要我過江去出席他們 7 月 17 日召開的慶功會。

我從化龍橋過江，到了 65 團駐地，他們正大擺宴席慶祝勝利，一桌桌人都在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看到我去了，65 團的頭頭劉德勝和彭乾元端着大碗酒迎過來說：“司令海量，來，乾了這碗！”

這一碗酒乾了，我也就醉倒了。他們在那裏熱鬧，我在一邊扯呼嚕。

不知什麽時候，他們把我搖醒，說：“請司令作指示！”

我也沒有推辭，就藉着酒勁，在會上大吼大叫了一通，說：八一兵團 65 團的勝利，就是我山城八一五派的勝利！砸派說什麽 7 月開頭，8 月決戰，說什麽頭斷西南，血灑四川……砸種頭頭鄧長春，聲稱要在宜賓組織一百個連隊殺回重慶來。人家打來了，我們沒有跑處，全川幾乎都成“劉管區”了，我們往哪裏跑？跑到成都去嗎？可能命都保不住。專縣被吃掉，只剩下重慶一座孤城，我們去跳長江？八一兵團要左右山城局勢，不能忘掉支持專縣……劉、張要打得我們血流成河，尸體遍地，我要打它個有來無回！來吧砸種！你反革命到底，我八一兵團定叫你有來無回，血流成河，你活着過來，我們用火車皮一火車一火車把你的尸體堆尖尖運回去！……

後來審查我的時候，專案人員要我交代在那次江陵廠慶功會上作了些什麽反革命煽動，我說，那是喝酒喝醉了發酒瘋，說了些什麽我都記不得了，你們還能當真嗎？

工總部北碚全委會

在江陵廠慶功會發酒瘋的第二天，1968 年 7 月 18 日，我到北碚參加了八一五派工總部在北碚區人委禮堂召開的全委會。

這次會議是八一五派工人組織中進入了省、市革委會的常委、委員們提出來的，他們認爲形勢變化了，工總部應該進行全面的組織整頓，以加强八一五派的團結。

會議開始後，大家先集體學習了毛主席著作中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我在會上主要講了三個問題：

一、工總部常委，省市革委常委，要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各自多作自我批評，加强團結，共同對敵，强化領導核心。

二、對工總部進行組織整頓，落實辦事人員。

三、分析形勢，明確下一步的任務。

在 19 日的形勢分析會上，我提出了六個問題（當年筆記本上的記錄）：

一、毛主席說全國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我們重慶的大好形勢的表現是什麼？

二、山城在大好形勢下出現反復的實質是什麼？階級敵人新動向是什麼？我們怎麼辦？

三、革命委員會成立後要進行清理階級隊伍，怎樣清理？如何揪出壞人？

四、如何正確對待專縣的兄弟組織？

五、如何抓革命促生產，迅速恢復社會秩序？

六、八一五造反兩週年慶祝活動搞不搞？怎麼搞？

從我當年留存的記錄上，可以看到在這次會議上發言的部分要點——

張順華（八一兵團副班長）：

省市革委會成立後，階級敵人千方百計利用各種方式進行破壞，如望江、112廠、嘉陵廠的原國民黨留下來的傢伙畏罪自殺。

對今後鬥爭的看法：

1、階級敵人利用我們內部的各種矛盾挑撥離間，互不團結，造成工人與工人組織之間，工人與革命小將之間的不團結，轉而挑起打內戰；

2、北碚的“6·12”事件[1]說明，反到底在所謂“紅十條派”統籌全川的思想指導下，妄圖武力控制北碚，“紅十條派”統治北碚，然後逐步向全市推進。目前他們“以我爲核心”的指導思想還沒改變；

3、砸種在北碚、楊家坪、江北主動挑起武鬥而失利，又主動後撤，未發生武鬥的地方也强行動員外出，重慶會出現一度的不平常的平靜；

4、從全省來看，如瀘州問題，18個縣市攻打瀘州，這是從張國華政委的三點指示中可以看出來的。如果瀘州吃不住，一旦失守，那整個川南就更加困難了。戰綫就會向江津推進。重慶會不會出現瀘州的情況呢？我想不會，因爲①重慶有强大的五十四軍支左；②重慶有中央的“紅五條”；③重慶有“三一五”、“四二七”指示而且成立了革委會。看來要用武力解決重慶的問題是不會出現的。但圍困重慶，斷重

[1] 北碚“6•12”事件：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流落在外的反到底派著名武鬥組織北碚猛虎團響應停止武鬥回原單位大聯合的號召，于6月11日返回北碚，暫駐北碚新華書店，其團長邱開全在陽臺上向樓外圍觀人群發表了簡短講話。當夜即6月12日淩晨，北碚八一五派包圍新華書店，以高射機槍等重武器展開猛烈攻擊，當即打死5人（其中二人是從北碚家中跑來找猛虎團中熟人玩的中學生）。早上毫無抵抗能力（只有隨身短槍）的邱開全等趁槍擊停止間隙跳樓翻墻逃離。被打死的猛虎團副團長王樹良（重紡五廠工人）等3人被陳尸街頭示衆三天。此事進一步加劇了北碚地區兩派對立。

慶糧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戰爭是爲政治服務的。如果瀘州一旦失利，可以說他在政治上也就完了。

歐正中[1]（市革委委員，交通兵團班長）：

一、山城八一五應該對專縣盡最大力量給予支持，包括政治上、精神上、物資上的支持；

二、山城强大的工人階級，應組織一支强大的自衛力量，在工總部的領導下真正左右局勢；

三、工總部常委和省市革委常委、委員應表態，怎樣辦？現在我們有的同志在“看”，看省、市革委當常委的；但省、市革委當常委的有些同志又抱着一個“等”的思想。“看”和“等”這兩種態度都不對頭。今天在全委會上應該丟掉這種思想。這種思想不丟掉，說小點是“私”字，說高點是右傾機會主義。

藺習廉（機械兵團）：

當前山城八一五派的廣大戰士，都在看着工總部對本市和專縣的態度，對專縣應不應該支持，應明確表態。

目前專縣是以攻爲守，重慶是以退一步進兩步的手法向我施加政治上的壓力。作爲革命群衆組織的代表，應該對專縣義不容辭地支持。建議工總部將農聯會、紅警區召集起來，組成一個全市性的領導班子。各兵團要造輿論，支持工總部的一切革命行動，使工總部的腰杆硬起來。

李其玉（港口兵團）：

一、專縣八二六派采取各種方式對重慶進行封鎖；

二、反到底組織人跑專縣，武裝專縣。我們也應該這樣，對專縣，有什麼支持什麼，也可以派人去；

三、這次反到底跑了，我們應統一思想，堅決不發工資。

[1] 歐正中，1946年12月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市交通運輸管理局汽車修理總廠鉗工。共青團員。參加造反後任八一五派交通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委會成立任委員。後任交通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清查。

你們要發，我們堅決不發。

姚安民（九龍坡區工分部負責人，他是這次會議的倡議者）：

一、剛才陽增泰同志點的問題很好。大家談的是現象。到底我們面臨的是派性還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綫的鬥爭？當前有兩種看法：①兩派都是革命群衆組織，武鬥是階級敵人挑起來的，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其他一切不管，美其名曰：不上當。或超過這個範圍就違反政策。②另一種看法是認識鬥爭的實質，在戰略上積極防禦。

二、我認爲當前重慶、四川鬥爭的實質不完全是派性，而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綫鬥爭，也就是共産黨同國民黨的鬥爭。中央指出不要反軍，不要反革委會，而它反到底反其道而行之。我們控制的地區是比反到底多些，但在這些地區內，哪裏在攔車搶人？而反到底控制的交院、重醫、市體育館、江北，又是如何？我認爲我們進行的戰爭是正義戰爭。

楊雲秀（大渡口區）：

一、戴帽五類分子打我們的老工人，他參加砸派，五類分子聯合起來，并拿起武器，二十中反到底的頭頭陳玉光，拿 13 支槍，40 公斤炸藥，和一些手榴彈，武裝黑五類

二、專縣不能脫鈎，而且這個鈎應該挂得更緊。我們山城八一五派要在政治上、道義上給予支持，物資上也要支持。

三、砸種頭頭中，鄧長春主張打，黃廉主張和，我認爲這實質上是一個，就是反革命的兩手。其中目的就是把八一五拉垮。我們八一五也有兩種思想，一種是積極自衛，再一種是單純主張聯合。我認爲聯合是有原則的。去當省市革委委員的，應當看到這個實質。如果八一五垮了，你也當不成了。

四、反到底跑，破壞抓革命促生産。他有另外的情況沒有？我看有可能。我們八一五不要輕信謠言，我們八一五要抓革命促生産，不要抓人。他們回來，只要不帶槍，我們歡迎，如果回來帶武器要幹，我們就要采取强硬措施。大家思想上

要去掉怕字，要敢于主動承擔責任，特別是負責人，天下就亂不了。

18號上午就是這六個人發言。沒有一個是省、市革委會的代表。午飯後，大家又繼續發言。

金魁卿（市中區）：

同志們上午談了很多有關形勢的分析。我同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一、當前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就是挑起武鬥，亂重慶。他們說，重慶的方向路綫沒有解决，軍隊是“歪屁股”，要轉過來支持砸派就解决了。當前的主要危險還有三個指向，是老路重走：①造輿論，②打，③走，④然後告。總之要以砸派爲核心。反到底猶如毒蛇一樣，或者要贏光，或者要輸光。這樣就正好迎合階級敵人的需要，就以亂挑起武鬥。上午同志們說要針鋒相對，我也同意。他要亂，我們就不准亂。要說國民黨，就是羅廣斌、任白戈，當然也有的暗中鑽到反到底中去了。不能把我們的對立面都看成是國民黨。而我們兩派的共同敵人是國民黨，這樣看形勢就不會犯錯誤。

二、同志們說話的意思，好像立足于打。我的看法是不能立足于打，應立足于政治。整個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大革命，武鬥始終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流，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

三、同志們分析專縣幾十個縣市來圍剿我們，我認爲這不太可能。圍困，斷絕物資供應，是有可能的，一般武鬥是存在的。這就提出武衛怎麼辦的問題。我的意見，

①工總部要立足于政治，狠抓對敵鬥爭，這就是大方向；

②現在我們要給八一五派廣大戰士大講大好形勢，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在精神上武裝起來。人有了軍心，就什麼都不怕；

③告全市人民書，公開說明形勢大好，安大家的心。市

中區開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抓革命大批判，抓毛著學習。我們越這樣，他老砸就越走向犯罪；

④武衛。一些老的國防工廠，要搞些武衛，各人搞就是了，不要高聲大叫。吼得高的是政治上文攻。軍事要服從于政治，不是政治服從于軍事。我們的立足點，不應立足于打，應立足于政治，不要上階級敵人的當。

蔣文漢（工總部常委，這次會議的主持者之一）：

我認爲反到底派已經成爲階級敵人的防空洞。

專縣鬥爭的實質：原來一些走資派利用貧下中農對黨中央、毛主席的無限熱愛，保黨委書記，曾一度當過老保。但這些走資派一旦看到形勢變化不利，群衆覺悟起來造他們反的時候，就鑽到防空洞裏去了，當了什麼紅十條派。反而把貧下中農說成是國民黨。我認爲四川鬥爭的實質就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鬥爭。

北碚工分部負責人：

重慶和附近幾個專縣的戰場不是一般的問題，如果認爲是一般武鬥，要吃大虧。大聯合，三結合，革委會，沒有武裝保護，就是不行。專縣要堅決聲援。重慶市沒有一個强大的武裝是不行的。

劉萬秋（交造司）：

我們不能住在重慶只看到重慶。我主張就是要打。現在瀘州只剩下一個高壩了。江津已經成爲第一綫的戰場。

劉應明（基建八一五）：

我同意蔣文漢同志的發言，把專縣的問題點出來了。好多同志的發言，是砸派把專縣的糧倉卡了，我們才支援專縣。這是私字的表現。抱着家當鬧革命。當前的階級敵人不是明的，而是暗的。這個暗，就是打入革命群衆組織，利用革命群衆組織之名，行國民黨之實。從山城“六五”事件開始，是歷史事實教育我們，就是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薛英一（交造司）：

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兩種思潮。下面戰士動起來了，

我們的頭頭還在辯論幹與不幹。我們要一分爲二。重慶立足于大方向，專縣要立足于打。我們大家的腰杆硬，八一兵團的腰杆才會硬起來。

歐正中（再次發言）：

我表示我願意站出來同大家一起高舉文攻武衛的大旗，就是不當市革委的委員也行。但我希望進入省、市革委會的同志都表個態。（到會者拍手歡迎）

譚正禮（衛生八一五，工總部常委，分管《重慶工人》報）：

同專縣脫鈎的思想要批判。有些人打着批右傾翻案妖風旗幟，行右傾翻案。全川出現所謂合法的武裝圍剿，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前面有同志說爲了重慶有糧食吃才支援專縣，把問題看得太狹隘了。我們要看到專縣的鬥爭不是僅僅爲了糧食問題，我認爲不是，問題就是右傾翻案。

任少泉（南桐礦區工分部）：

毛主席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爲現在反到底就是成了階級敵人的防空洞和避難所。現在全川、全市的鬥爭，就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鬥爭，南桐礦區反到底幹部邱光澤就是特務。

對專縣問題，進入省市革委會的同志應表態，不要怕丟官。

袁金樑（市革委副主任）：

專縣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問題。我同意大家的意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陳萬明（省革委常委）：

當前兩派鬥爭的實質，反到底派廣大群衆和我們是內部矛盾，鑽入反到底派內部的階級敵人和我們是敵我矛盾。但反到底派中拿起槍杆子的人，是受了階級敵人的利用，性質就變了。我們應該武衛。對專縣應該支援。專縣的剿匪是反革命的行動。應該在政治上物資上給予（被圍剿一派）支持。

丁盤興（工總部副班長）：

擔子要大家挑，我同意在政治上、道義上、物資上支持

專縣。

劉家聲（工總部常委）：

同意支持專縣。

李光亨（文藝兵團，工總部常委）：

治，要有階級性。堅決同意重慶大搞文攻武衛。專縣不存在脫鈎問題。我們是戰友關係。堅決站在工總部一邊，在政治上、道義上、物資上支持專縣的戰友。

史國經（機關指揮部）：

實質的看法，我們的鬥爭就是兩個階級的鬥爭。但說我們就是代表共產黨，反到底就代表國民黨，我是不同意的。對專縣支持，派武裝去支持，我不同意。

蕭平南（市革委委員）：

堅決支援專縣。

蕭天榮（市革委委員，工總部常委）：

當前鬥爭的實質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鬥爭。對專縣問題，我們同山城八一五派一道，有多大力量貢獻多大力量。我的態度是要支持到底。

印仁祥[1]（省革委委員，工總部副班長）：

我同樣要批判同專縣脫鈎的思想。對專縣要支援。需要我們貢獻多大力量就貢獻多大力量。

蔡明訓（物資兵團）：

對當前鬥爭的實質，同意大家的意見。對專縣應在政治上、物資上給予支持。

張順華（再次發言）：

我們認爲武裝支渝的危險是存在的。是否得逞，要看我們的準備。鬥爭的實質，按毛主席的提法，是共產黨同國民

[1] 印仁祥，1940 年生。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市物資回收公司幹部，共青團員。參加造反後任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勤務組常委，後任八一五工總部副班長。1968 年 5 月 31 日四川省革委會成立任委員。文革結束後被清查。已病故。

黨的鬥爭。但對反到底中的廣大群衆要區別開來。武鬥一不怕，二反對，三堅決自衛。要有理，有利，有節。對專縣問題，對專縣廣大群衆，只有講理，說服教育。但現在是武裝鎮壓，性質就變了。我們的態度是堅決自衛到底。敵人挑起武鬥，我們堅決打，但不要亂打。

蔣懷紀（紡織兵團）：

同意陳萬明同志對鬥爭實質的意見。對專縣，應該怎樣支援就怎樣支援。

蔣懷紀談到的陳萬明對“鬥爭實質”的意見，是一個在很長時間裏困擾我的問題：“我們同反到底到底是什麽矛盾？到底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因此我在這次會議一開始就向大家提出來了。與會者似乎都覺得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如果說是“敵我矛盾”，那就顯然與毛主席有關“兩派都是革命群衆組織”的精神不符合了，但是如果說是“人民內部矛盾”，那麽又怎麽解釋我們像打“敵人”那樣進行的武鬥？

陳萬明是個會動腦筋的人，他在發言中說：“反到底派廣大群衆和我們是內部矛盾，鑽入反到底派內部的階級敵人和我們是敵我矛盾。但反到底派中拿起槍杆子的人，是受了階級敵人的利用，性質就變了。”他這個回答很巧妙，回避了兩派鬥爭是否“敵我矛盾”的問題，又爲我們搞武鬥找到了理論根據。

當天晚上繼續討論。工總部常委蔣文漢先介紹了一些當前的“敵情”，然後大家討論。

周光清（八一兵團）：

重慶形勢大好，怎樣發展這個大好形勢，這個問題是研究的重點。當前無政府思潮嚴重，這也是受階級敵人挑動武鬥的思想基礎。重慶武鬥，當前還不能徹底制止。依賴解放軍去制止武鬥，就上了階級敵人的當，他就造“解放軍鎮壓反到底”。要制止武鬥，

①徹底清理階級隊伍，這是根子；

②把武鬥局限在局部地區，使它不發展；

③要徹底制止武鬥，關鍵還是靠自己。

姚安民（再次發言）：

要發展大好形勢，應一手抓文攻武衛，一手抓立即恢復生產。要防止把文攻武衛與抓革命促生產對立起來，但這裏面，從頭頭開始，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凡脫離生產崗位的人員，一律不發工資。軍管會要發，把錢搶了也不發。

林德文（財貿八一五）：

一、對工總部的態度，凡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堅決貫徹，不符合的就堅決抵制。

二、對專縣群衆組織，原則上脫鈎。凡中央未定成反革命、保守組織的群衆組織，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在政治上支持。

靳行倫（川煤兵團）：

一、當前文攻是主，武衛是次。

二、專縣問題同意林德文同志的意見。

原計劃 7 月 20 號通過會議決議，但是我們 19 號上午就接到警司通知，警司首長 20 號要接見八一五各大兵團勤務員，于是大家都往重慶城裏趕，會議決議就拖到 24 號的工總部常委會上去通過了。

最後通過的決議有八條，主要內容是：

一、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群衆運動，開展“三忠于”、“四無限”運動，抓好形勢教育；

二、掌握鬥爭大方向，深入持久開展革命大批判，加强工總部對敵鬥爭專案小組的工作，把一小撮階級敵人揭深批透，批倒批臭；

三、一小撮階級敵人煽動和强制廣大反到底群衆離開生產崗位，破壞生產和交通運輸，八一五派要識別敵人的陰謀，團結群衆，采取適當措施恢復生產和交通運輸，建立革命新秩序；

四、提高警惕，加强文攻武衛，以保證“四大”的正常進行。全會授權常委會組成文攻武衛領導小組，并抽調得力同志組成武衛辦事組，工總部應成立一支由工人組成的自衛隊，由各大兵團抽調人員組成；

五、一小撮階級敵人在專縣挑動一派，武力鎮壓另一派。八一五必須對專縣的階級兄弟從政治上、道義上、物資上……等等進行支援[1]；

六、八一五兩週年紀念必須隆重慶祝，以發揚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全會决定，由工總部、農聯會、紅警區聯合組成籌備小組進行此項工作；

七、加强工總部領導班子，精簡工作人員。工總部原有常委單位不變，增加已經擔任省、市革委會常委、副主任委員的陳萬明、袁金樑、方文正、段德昌、韓榮華等五同志爲工總部當然常委；

八、向沙坪壩工分部、北碚工分部和化龍橋地區指揮部學習，組織地區聯防，協助解放軍維持社會秩序；

簽字通過决議的有如下代表（當時只有財貿八一五的林德文和市中區人委的老金二人發表了不同意見并拒絕簽字）——

十八冶建設兵團：許大壽

二七總指揮部：蔣文漢、羅明富

大渡口區分部：楊雲秀

二鋼 2307 造反團：袁金樑

[1] 在公開發表的《重慶八一五工總部全委會北碚會議紀要（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對此內容的表述是：“會議對于專縣無産階級革命派的反圍剿鬥爭，寄予深切的同情和關懷，與會者紛紛表示要在政治上給予聲援。”“會議嚴厲譴責了某些反到底組織中的一小撮壞頭頭，蒙蔽群衆，參與武裝圍剿專縣無産階級革命派的罪惡行爲。”“會議一致認爲，專縣兩派都是革命群衆組織，兩派革命群衆組織的分歧，只能通過鬥私批修，各自多作自我批評來解决。”載《重慶工人》第 27 期、《山城紅衛兵》第 62 期兩報合刊，1968 年 8 月第三版。

造反軍二分團：劉伯超
化工聯合兵團：張慶新
交通造反司令部：歐正中
江北工分部：陳姚
川煤兵團：白富坤、李國成、劉家聲
石油工人八一五：何闖
電力兵團：顏其文
長壽工分部：葉長江
市中區工分部：田世民、金魁卿（簽名後註明：第五條保留）
巴縣工分部：葉曉東、趙澤英、李世杰
港口兵團：李其玉
八一五汽車兵團：王榮
綦江工分部：劉道華
財貿八一五：印仁祥、林德文
南桐工分部：陳琳
北碚工分部：張淑英
衛生八一五：譚正禮
沙區工分部：程夢齡、楊正川
郵電八一五總部：蕭天榮
鐵道聯合指揮部：張志華
永紅兵團：黃忠誠
人交捍紅指揮部：楊大渝
八一五一輕指揮部：車勤書
南岸區工分部：解銀先
物資兵團：易君善、蔡明訓
文藝司令部：蔣興堂、李光亨
化工八一五總部：黃志一
機械兵團：蕭平南
機關指揮部：史國經、任光泉
教工八一五兵團總部：黃□□（後二字潦草難認）

鋼鐵八一五：陳萬明、楊容生
紅岩八三一：丁盤興
九龍坡工分部：劉光誠，姚安民
基建八一五總部：袁成德
長航兵團：曾永昌
農墾八一五兵團：張世孝
紡織兵團總團：毛天泉、賀道銀、任肯
八一兵團總團：周光清、張順華、馮一勝、陽增泰

這個決議隨後在《重慶工人》報上發表了[1]。

這次會議推選出的常委會又決定了陳萬明、袁金樑、段德昌、藺習廉、劉家聲、楊國民、楊大渝等七人組成組織第二組，實際上是吸取 1967 年的教訓，以改頭換面的方法代替全市的武鬥指揮機構。

我沒有再進入這樣的武鬥指揮機構,或者說就“轉入幕後”了。

警備區首長嚴厲批評八一五派

1968 年 7 月 20 日，重慶警備區韋統泰軍長、雷遠高副政委、白斌副軍長，在重慶警備區小禮堂接見八一五派各大兵團的主要

[1] 公開發表的《重慶八一五工總部北碚全委會紀要》中的決議內容，將八條壓縮成了六條，沒有慶祝八一五造反兩週年和加强工總部領導班子等內容。六條要點是：一、深入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衆運動，辦好各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二、狠抓階級鬥爭不轉向，把開展對敵鬥爭、清理階級隊伍和革命大批判結合起來；三、狠抓恢復革命新秩序，迅速恢復交通運輸，爭當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四、狠抓革命大聯合；五、廣泛開展擁軍活動，我八一五革命派誓與英雄的五十四軍和駐渝部隊團結、戰鬥、勝利在一起；六、提高革命警惕，嚴防一小撮階級敵人再次挑起武鬥，我八一五革命派堅持文攻武衛的原則，武裝進攻我八一五派決沒有好下場。詳見《重慶工人》第 27 期、《山城紅衛兵》第 62 期兩報合刊，1968 年 8 月第三版。

負責人及各支左辦公室幹部。那天幾位首長的神情都很嚴肅，臉色十分難看，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結果，那天是首長們對八一五派近段時間的打砸搶抄抓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是大規模武鬥以來，重慶警備區領導人對八一五派最嚴厲的一次批評。我在筆記本上記錄了他們講話的要點。

白副軍長首先領讀《毛主席語錄》219 頁“紀律”部分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和 220 頁第二段“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221 頁第二段“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等語錄；

隨後是警備區制止武鬥小組廖副組長彙報了近來有關情況：

7 月 6 號制止武鬥領導小組成立以來，八一五派單方面的問題，而又是不好的問題。

一、在武鬥中渾水摸魚，搞打砸搶抄抓。在交院、江陵、重醫，都是這樣。

二、在交院，7 月 17 日早上 4 點 30 分開始武鬥，誰打第一槍？調查八一五派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空壓八一，建設八一，是在頭天晚上進入陣地，據空壓說是路過碰上的。八一五派有 200 多人，交院九一五不到 100 人。武鬥發生後，八一五又派機械兵團 2 個排和南岸中學生的武鬥人員去增援。交院九一五撤走後，八一五還進行追擊。

三、江陵廠，階級敵人從 7 月 8 號到 7 月 11 號三次挑起武鬥，7 月 11 較爲嚴重。八一五派不當的是，制止武鬥小組打電話不接，到現場講也不聽，并到建字 028 部隊去抓反到底派的人，江陵八一兵團，下午 4 點制止有力，并處理江陵軍工 12 個傷員很好，有理。

四、7 月 12 日重醫兩派發生武鬥……

雷副政委講了八點意見：

一、我們談的問題是一部分。這說明八一五派內部有壞

人。壞人做壞事，這說明無政府主義思潮嚴重。有的同志講，要整頓組織，清理階級隊伍，這很好。我看問題不在戰士，主要在于你們頭頭。有個別同志說“以亂爲亂”，反到底跑了，乾脆把它幾個點打掉算了：交院，體育館，江北轉盤……我看交院就是你們有計劃地把別人打走的。打出來了還繼續追，追到軍隊的倉庫還打，八個女同學，內衣內褲都搞光了，手按着胸部和下身……希望八一五派的同志們查一查，打交院是誰策劃的？把它查清楚。

2、武器擴散問題。據我們瞭解，不止大家所說的數字。特別是子彈，上百萬發，還有半成品。有專縣的人參加，是內外結合搞的。建設廠半自動步槍的半成品也流出不少。據說你們要恢復生產，如果這樣，我們支持。但聽說是支援瀘州武裝九個連，這就不好了。（群衆有插話：造謠。）

三、在隆昌，援越物資被搶，總理指示要執行“七三布告”。現已追回一部分，還有一小部分正在追。我們懷疑你們，這是不是和你們有關？要查。（群衆插話：沒有關。）我們有的倉庫也被你們搶了。你們認爲從局部來看有道理，我們要從全域來看。這同你們個別同志指導思想分不開。現在反到底的地點，不能再打了。再打就不是武鬥問題，是政治問題了。

四、現在你們生產的武器，應立即停下來，你們擔心專縣，我看不必擔心，武器再不能向專縣擴散。一定要跟專縣脫鈎。你們插手，就把事情搞複雜了。使革委會不好處理。

五、武器還是要交。我們再召集你們兩派，要一起交。拿着武器光搞打砸搶。未上交前先封存若干點。通知我們。現在不能再把槍發給戰士，拿上街我們部隊就强行收繳。當前哪裏打槍，我們就派人去。你們不管怎樣先恢復社會秩序。群衆反映意見多，我們不能不管。

六、你們八一五派內部的打砸搶，同志們要引起注意。同志們不要原諒自己，不要看不到自己身上的黑點，特別是中學生，紅警區要加强做工作，不要簡單地采取開除的辦法。開除就推向社會上去了。做壞事的，你們要采取點措施。就

是群衆專政，扭送我們。

七、正確對待反到底廣大群衆。你們大部分打砸搶是對反到底。抄別人的家，打抓，把別個打跑，或別個怕挨打，跑了，這個數量不少的。這樣會造成政治上很嚴重的後果。同志們要把這作爲條紀律貫下去：反到底未跑的，你們要保證人家的安全。已經外出的，要歡迎人家回來。據說成都有六萬，最少也有三萬人，瀘州、宜賓、涪陵還有些。你們可以通過信、電話勸他們回來。保證安全。

八、軍事院校，你們要脫鈎。按中央指示辦事。你們幫242文籌把紅總打走，以後再不要這樣幹了。還有七醫大，別人聯合很好，你們打別個“一〇五”的人，就有二十多人跑了。聽說後來去道歉了。

接下來，白副軍長講了話：

我同意雷副政委給同志們講的幾個問題。這次給你們批評很重的。主要是刹住打砸搶抄抓。掌握住大方向。

重慶形勢大好。分析形勢看你站在哪個立場。只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綫上，用階級鬥爭觀點去分析形勢，才會正確估計形勢。重慶形勢大好，是主流。當前應重點解決的問題是端正鬥爭大方向，把矛頭指向黨內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兩派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一定要制止武鬥、打砸搶抄抓的歪風。反對武鬥，不上階級敵人的當。特別是好鬥的頭頭，兩派都有，要引起注意。當前主要矛盾是你們八一五派。可能這話說得很重，認識重點有好處。鬥爭矛頭對準誰？是對內還是對外？這是個嚴肅的問題。原來你們是一派……你們立下不朽的功勛……奪權以後……分成兩派……大部分來說，矛頭沒有對準階級敵人。同志們要重溫中央“三一五”指示。

大方向，是搞好對敵鬥爭，搞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搞抓革命促生產。有條件的，搞本單位的鬥批改。

街上大方向的口號少得很，大批判專欄破舊不堪，一看就像搞武鬥的樣子。就連無限忠于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標語也少，有的禮堂，連毛主席語錄也沒有。希望三天內改變。向解放軍學習，全國都在搞三忠于活動，連歌頌毛主席的大標語都沒有，怎樣把山城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當前八一五派問題不少，還是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我們希望你們帶着你們的問題搞學習，搞鬥私批修，整頓組織紀律，克服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新的形勢下立新功，建新勞，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最後韋軍長講了話：

給同志們批評，是愛護同志們，有缺點錯誤，指出來改正，這是應當的，對軍民關係也有好處。

不要錯誤估計形勢，錯誤估計了就要犯錯誤。要用毛澤東思想去正確分析形勢。當前形勢一片大好，是不動搖的，這是主流，是本質的東西。文化大革命正向深度、廣度進軍，反復必然存在，但反復是支流，沒有反復也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我的記憶中，從五十四軍開始在重慶支左以來，我還從來沒有聽到過他們對八一五派進行過這樣嚴厲的批評。特別是其中講到那些學生打交院，把人家女生追得那個樣子，我們聽了都感到很生氣，也感到很尷尬，沒想到八一五派會出這樣丟人的事。不過我們也覺得反正這是學生幹的，與工總部無關，既不是我們布置的，我們也不知道。是哪些人幹的，查到誰就由誰負責。

工總部常委的分工與內鬥

儘管這次警司首長對八一五派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批評，但我們工總部的頭頭們還是認爲主要是針對學生組織的，思想上并未

引起足够的重視。

這樣，根據北碚全委會精神，工總部又于1968年7月24日在重慶飯店一樓召開了常委會，到會包括常委和一些單位代表共23人：

丁盤興，史國經，譚正禮，蔣文漢，楊容生，劉家聲，潘祖文，蔡明訓，段德昌，袁金樑，顏其文，藺習廉，張志華，王紹川，印仁祥，方文正，陽增泰，蔣懷紀，楊大渝，代正華，王培揚，蕭天雲，陳萬明。（其中有8人未到會，但我想不起是哪些人了。）

這次會議選出了工總部的新一届領導班子——

班長：陽增泰。

副班長：陳萬明、丁盤興、印仁祥、藺習廉。（陳、印抓文攻，丁、藺抓武衛）

負責武衛班子常委五人：袁金樑、段德昌、楊國民、劉家聲、楊容生。其餘負責文攻。

會議研究了武衛的原則是：本市均以各區縣工分部爲主，不同下面組織直接挂鈎。專縣由各專區確定一主要負責人進行工作聯繫，工總部不對下屬各組織。各專區派一負責人組成全川統一領導機構進行有秩序的工作。

但是這次會議開得不怎麽樣，不同意見爭吵不休，整整開了一天，確定了幾個問題，但散會後來上任的常委沒有幾個。

各區縣的工分部組建起來的有：長壽工分部，班長方久祥；南桐工分部，班長任少權；巴縣工分部，班長李世杰等。

到合川參加專縣問題串聯會

根據“七一八”、“七二四”兩個會議精神，我找陳萬明研究了一下，認爲當前專縣武鬥問題是個重點，每天來重慶找工總部的人很多，特別是那段時間涪陵的紅聯司一派被當地支左部隊與“忠實派”武力圍剿，大量人員逃難來到重慶，向我們請求支援。我覺得要真正解決專縣問題，必須要出去走一趟。當時江津專區確定要開一個專縣問題革命串聯會，正好我們想去瞭解一下具體

情況。

因此，經過協商，決定陳萬明多抓一下文攻，造輿論；我暫時把精力放在武衛上多抓一下。當時我又找負責武衛工作的常委楊國民、劉家聲、丁盤興研究到專縣去的問題，老丁不同意我走，只同意楊國民、劉家聲去。我堅持了意見，所以于 7 月 25 號就同楊國民、劉家聲、吳世國，同時帶上了涪陵紅聯司的頭頭，一起坐汽車到合川去了。

到合川的第二天，我們就參加了在那裏召開的專縣問題革命串聯會。

在會上，瀘州紅聯站、涪陵紅聯司、雲陽“11 · 27”、中江縣繼光兵團等組織的代表都把自己單位、地區的鬥爭情況，特別是遭到武力圍剿的情況作了介紹，有的代表的發言完全是聲泪俱下的“血泪控訴”。大家聽了都義憤填膺，紛紛聲討劉、張鎮壓革命群衆組織的罪行，總的要求是提出比較統一的政治口號——徹底粉碎全川反革命武裝圍剿。有的還提出要在思想上組織上聯合起來，建立地區聯防指揮部，組建以退伍軍人爲主體的專業武鬥隊，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有的還提出要建立全川反圍剿總司令部，還有人提議由我來當總司令……

因爲此前已經聽了重慶警備區首長的嚴厲批評，所以我們在會上沒有輕易表態，只在會上念了一下我們山城八一五工總部對專縣問題的緊急聲明（已登在《重慶工人》報上）。

會後，我們幾個人到第一綫去走訪了一下“前綫的戰友”。參觀了正在試製的“蛤蟆炮”（一種開炮時會像蛤蟆一樣跳起來，殺傷力很大的小型火炮）。

7 月 30 號，我們在璧山看見毛主席召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關于制止武鬥的“七二八”指示，知道形勢又有了新的變化，就立即趕回重慶，向工總部常委彙報了這次去專縣之行的所有情況。

這次常委會在枇杷山上的川煤兵團會議室召開。主要是兩個內容：一是學習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研究處于目前四川武鬥局勢如此嚴重

情況下怎樣辦？二是彙報專縣之行的所見所聞。

聽了我們有關專縣情況的彙報後，大家都感到不安，議論紛紛。

蘭習廉說："聽了專縣的情況很焦急。但無法。出人有，只要決定支持一定去。"

袁金樑則說："專縣問題同我們是血肉關係，必要時可以出擊，但不要去人，要山城八一五去總指揮沒有必要。我們不能離毛主席他老人家太遠。"

正當我們開會時，江津專區的大足縣也打起來了。江津專區801指揮部和大足縣駐重慶的聯絡代表也找起來了，會議立即作了研究，最後作出兩點決定：

一、八一兵團解決部分半自動步槍，支持大足（實際上支持了二十條，是方文正去辦的）；

二、調動楊家坪（九龍坡區工分部）的重火器部隊去大足解圍，由楊國民去執行。

會議還爭論了分工問題，吵得不亦樂乎，對落實"七三"、"七二四"布告沒有重視起來。

由于對于工總部正副班長的組成，仍然有人不滿意。于是又于7月31號在川煤兵團召開了一次常委會。當時我筆記本上記錄有幾個常委的發言。節選其中兩個發言的要點，就可以大致瞭解到一些情況。

袁金樑發言：

上次分工情況，給總團彙報了，認爲沒有按照北碚會議辦事情。同時人未到齊，分工是不當的。北碚會議白開了。工總部要整頓。我們有决心，一定要按照北碚會議精神負責。總團認爲袁金樑要這樣子的話，就把人撤回。

丁盤興發言：

我個人認爲，如果說北碚會議沒有貫徹，首先是常委不到，而現在把責任推到在工總部工作的同志身上，這是錯誤的。人不來，怎麼研究組織調整？如果認爲分工不當，我們

紅岩八三一的常委可以退出。北碚會議精神，是選正副班長不分單位，只要哪個同志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誰就可以選上。如果認爲分工是錯誤的，就說明北碚會議後第一次常委會是錯誤的。那麼到會的二十多個常委又是幹什麼的？老袁同志可以提出哪些地方沒有貫徹北碚會議精神。我認爲二十三個常委都應該到工總部來，常委之間有問題，可以展開思想鬥爭。第一次常委會我認爲是民主的會。如果認爲我當副班長不合適，可以明確提出來。我到工總部來，沒有考慮要當副班長。

8月1日，我和陳萬明、印仁祥、丁盤興開了一個核心組會，研究決定了以下問題：

一、雲陽遭到武裝圍剿問題，全川無産階級革命派發表了聯合聲明，我們不參與，重慶三大總部另外發一個聲明。

二、專縣問題，按北碚會議精神，在政治上、道義上、物資上支持，關鍵時刻實行武力支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

三、組織調整問題——

辦事組，丁盤興分管；

①辦公室：秘書室3人，接待3人，打印機6人，通聯3人，共15人；

後勤：分賬、現金、管物、購買、分發，共5人。

②組織組：藺習廉分管；

組織1組：10人；

組織2組（即武衛班子），含外事活動，共15人。

③政工組：陳萬明分管；

宣傳組10人，

彙報組：16人，

學毛著組：5人。

④鬥批改組：印仁祥分管；

對敵鬥爭組：7人，

大批判組：8人，

幹部組：4 人。

工總部經過會議研究，最後決定除常委外，工作人員編制定爲 97 人。《重慶工人》報爲獨立編制。

根據警備區首長指示，1968 年 8 月 15 日的八一五造反兩週年紀念不搞活動，8 月 14、16 號也不搞。工總部堅決執行警司首長的指示，并通知下屬各兵團執行。

“原來是白面書生”

重慶八一五工總部，當時設在重慶飯店。我在那裏的辦公室，就是在飯店原來的客房裏的床前邊加一張辦公桌。我的助手舒斌和我同住一個房間。

自從我拒絕了周家瑜從省革委打來電話要工總部與專縣同一派群衆組織脫鈎的要求後，工總部的人把事講給專縣來的群衆組織人員聽。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在其他專縣的同一派群衆組織中傳開了。

有一天，我正在辦公室裏忙着寫什麽東西，舒斌進來對我說：“有南充臨聯的戰友想要見你。”

我問：“他們有什麽事？”

舒斌說：“他們說就是想見見你。”

我問：“他們人在哪裏？”

舒斌說：“就在外面。”

我說：“那就請他們進來吧。”

舒斌從門外帶進來兩個人，個子都比我高出一頭，舒斌向他們介紹說：“這就是我們工總部的班長陽增泰。”

那兩個人和我握手過後，圍着我轉來轉去上下打量，以十分驚奇的口氣說：“原來是白面書生！”

我感到奇怪，問：“這是什麽意思？”

他們兩個才笑着拉我坐下來，說：“陽司令，你不曉得，我們南充臨聯的人都聽說你身材魁梧，氣勢如牛，爲人講義氣，不畏權勢，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爲專縣的革命戰友打抱不平。

劉、張要把我們打成老保，武力圍剿我們，還强迫你們跟專縣脫鈎，你堅持原則，堅决和專縣戰友團結戰鬥在一起。我們南充臨聯的人聽說後，都很感動，托我們順路來看看你，向你表示感謝。我們一直以爲你是身高八尺面如紅棗的那種樣子呢……”

“哎呀，你們把我想像成關雲長了！”

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

兩支手槍

在 1967 年的武鬥中，我這個武鬥司令却一直沒有帶槍，身邊只帶了一顆軍用手榴彈，當時想的是：如果被反到底派抓到了，脫不了身時，就拉響手榴彈同歸于盡。

1967 年武鬥停息後，八一五派開了個布置“打劉、張”的輪船會議。會前，在重慶市公安局集中。當時朱遠容碰到我，說：“老陽，你沒得一支槍要不得。我給你一支。”他遞給我，我一看，是一支比較大的手槍，槍裏只有兩發子彈，子彈又短又粗。老朱說是加拿大造的手槍。我心想，這樣的槍防身幷不方便，子彈又不好找，本不想要，但是考慮到人家是一片好心給你，不要也不大好拒絕。于是我只好收下了，還連聲道謝。

過了一陣，我想到楊忠富曾多次向我提出幫他找一支手槍，就把這支加拿大造手槍給了他。他很高興地拿去了。

就在我把手機拿給楊忠富的當天，公安總部的張德錄，把我一人叫到旁邊，悄悄對我說：“聽說你當司令的，連一支護身的手槍都沒有？”我說：“是呀。”他說：“你跟我來，我借一支給你。”他帶着我邊走邊說：“武鬥表面上平息了，但是可能還會有鬥爭，可能還會發生暗殺之類的事情。你應該有支防身的手槍。周家瑜他們好幾個人都來找我借了手槍……”

聽他說起，我才知道八一五的好幾個頭頭都已經來他這裏借了手槍了。

他把我帶到公安局的一間屋裏，對我說：“周家瑜他們借的都是‘掌心雷’，你來晚了，沒有了，借一支槍盤去吧。”

我寫了借條，張德錄給了我一支槍盤，裏面有 4 發子彈，他給我講解了使用方法。

但是這支槍在我手裏也沒有放多久，不到一個月，就被南桐地區的平山機械廠八一五頭頭蕭光啓借去了。半年多過後才還給我。

1968 年 9 月，“九五命令”一週年前夕，兩派都再次上交武器，楊忠富把那支加拿大造手槍還給了我。我叫我們廠的李華權拿去統一上交了。

1968 年底，張德錄到我家來，找我收回那支槍盤。我搭上梯子，從窗口上邊的鴿子籠裏把槍盤取出來交給了他。他笑着說：“你藏在這個地方好，哪個都找不到！”

他反復檢查後，在本子上記下了歸還人姓名、槍的號碼、歸還日期等。放心回去上交了。

我提出工總部帶頭“倒旗”受到指責

1968 年 8 月 15 日，本來是我們準備大張旗鼓慶祝的八一五造反兩週年紀念日，但是因爲市革委和警備區首長已經先打了招呼，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了，不能再這樣搞派性紀念活動，我們就沒有再像上一年那樣搞。

正在這一天，《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發表了社論《熱烈歡呼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其中公布了毛主席的又一條最新指示：“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那時候，凡是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傳達下來，各地都要立即組織群衆舉行慶祝游行。我們參加游行後，馬上在工總部組織了大家學習毛主席的這一最新指示，討論怎樣在行動上加以落實。

就在這時，南川傳來消息，那裏的反到底派還在向紅岩煤礦的八一五派進攻。我就立即趕到紅岩煤礦和南桐工分部瞭解現場情況。

我到了紅岩煤礦後，那裏的武鬥已經停止了。我去後第三天，在廣播中聽到毛主席關于“認真搞好鬥、批、改”的最新指示，這條指示是在《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1968年8月21日發表的社論《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熱烈祝賀福建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中公布的，這篇社論中又再次重申了毛主席有關“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那條指示。我立即會同紅岩煤礦八一五頭頭張繼生組織礦區群衆游行集會。會後我趕回重慶前，張繼生還送我一件皮夾克工作服作紀念——那時候這樣的工作服還很少見，後來我用它跟我轉業的弟弟換了軍裝。

接連發布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形勢的變化。1968年8月30日，警備區韋軍長和雷副政委接見我們工總部常委，與我們交心，希望我們在學習了毛主席最新指示過後，作爲工人階級的一員，在山城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下，在制止武鬥、上交武器等方面起好帶頭作用，并且要準備鏟平派性山頭，實現革命大聯合，在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他們的誠懇勸說，把我們思想搞通了。

回去後，我們立即在渝渡八一五會議室開了緊急會議，傳達了首長指示，并向大家彙報了工總部關于貫徹執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出的決定。

我提出要迅速落實毛主席這一偉大戰略部署，重慶目前看來是落後了，重慶要趕上去，必須迎接9月份倒旗（撤銷總部，解散組織）大聯合高潮的到來。我建議，毛主席提出“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我們工總部，作爲工人階級中的革命派，應該表現出比其他組織更高的政治覺悟，首先帶頭倒旗。

有人提出：“反到底不倒旗怎麽行？”

我回答：“他們對毛主席不忠，我們不能對毛主席不忠，他們要當反革命，我們不能跟他們學。如果我們要緊抱山頭不放，也是對毛主席最大的不忠。”

不過，我的說法沒有得到大家的贊同，許多人的思想感情都還轉不過彎來，丁盤興、印仁祥、蔣文漢等幾個工總部常委批評

我這個表態是“過左了”，是“形左實右”。

會後第二天，下面的組織就開始敲鑼打鼓上交武器了。

第八章 看不見的戰場

小李的情報

文革中有些事情，我至今都還感到神秘莫測，弄不清楚真相。

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不久，有一天，我到交際處第二招待所二號樓去辦什麽事（那裏還是我們八一五派的一個情報彙集點和聯絡點）。我們八一五派一位已經進入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把我叫到一間屋裏，向我介紹了一個小姑娘，說她是小李，是我們安插在反到底工總司裏的內綫，以前是與他單綫聯繫的，現在他在革命委員會任職了，不方便再做這類事，就把這個綫頭移交給我，今後有什麽事情，小李就直接跟我聯繫彙報。

這位小李，個子不高，在重慶女孩中屬于中等身材（可能不到一米六），瓜子臉，短髮，一說一個笑，模樣沒什麽鮮明的特徵，走在大街上不會惹人注意。她是沙坪壩那邊一所中學的學生。她是什麽時候到反到底工總司去當工作人員的，又是怎樣成爲八一五派的“情報員”（用現在的話來說叫“臥底”）的，我都不知道，也沒有多問。我只是告訴她，如果有什麽事，她可以到重慶飯店的工總部，幾樓幾號房去找我，如果我不在，或者我身邊人太多，找我怕惹人注意，她可以找我的助手舒斌，只要找到舒斌，就等于找到了我，只要向舒斌作了彙報，就等于給我作了彙報。

她聽了，笑笑，直點頭，沒有多說什麽就告辭走了。

過後，我就陸陸續續從小李那裏得到了一些“情報”，我都記錄在我的筆記本上了。比如——

1968年7月5日[1]：反到底頭頭在體育館開會，提出8月大決戰，殺光八一五，留下光杆五十四軍。如果打敗了就拖上山。鄧長春在會上說：警備區首長說五十四軍是轟不垮趕不走的，我們反到底就是要把它轟垮、趕走！以後就揪小掉爬蟲、變色龍。要拿下五個兵工廠，拿下後再跟軍隊打就沒問題了。這次大幹，有首都紅代會的七十多人來重慶協助，都帶有手槍、電臺，他們來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在外面出現主要裝扮成賣藥的，賣鷄湯的，一般是講普通話的年輕人。他們提出的口號有“頭斷西南，血灑四川……”打起來了過後，在八一五內部會有人協助，在三中、印刷部門、師專，都有人經常給反到底送情報。

1968年7月10日[2]：反到底撤退時，遭到警司襲擊，工

[1]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1968年7月4日，八一五派在江陵機器廠所在的江北大石壩地區實行戒嚴，抄家抓人；7月5日，市革委副主任、反到底派負責人李木森和江北區支左辦公室劉政委一起主持江陵廠兩派談判達成立即停火、上繳武器、調查處理抓人問題等三條協議，轉眼即被破壞。7月6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制止武鬥領導小組成立，組長范朝運（警備區副參謀長），副組長熊代富（八一五派代表，市革委副主任）、李木森（反到底派代表，市革委副主任）。當天兩派在江北大石壩地區大規模武鬥，江陵廠4個車間和中心計量室、廠內家屬區、街上居民區遭連續炮擊，若干精密機床、計量儀器遭破壞，廠內203小學和一些家屬區房屋及石門街上若干民房被打壞。傷亡多人。駐軍領導召集兩派負責人談判後達成于11日20時停火的協議。但簽字1個多小時後(次日淩晨)武鬥又重新開始。7月8日，重慶警備區和江北區支左辦公室代表再到江陵廠主持兩派談判，于當晚22點30分再次達成立即停火協議，1個多小時後武鬥再起。至12日，八一五派攻占江陵全廠，隨後在江北大石壩地區實行“戒嚴”、“清鄉”。

[2]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1968年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八一五派攻占原由反到底派控制的後字242部隊（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煤礦設計院、地質部第二普查大隊、重慶醫學院及其附屬第一醫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重醫一院藥房、庫房、材料科被搶劫一空，大量貴重醫療設備遭到破壞。7月上旬兩派在大坪、楊家坪地區的大規模武鬥，使國家財產遭受嚴重損失，群衆死傷慘重，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綫網被打壞，導致全綫停車一年餘。該地區反到底派大批逃離。

總司向中央發了電報。電報是經劉結挺、張國華簽字後發出的。電報中說：我們從楊家坪撤退，在兩路口遭到八一五和警司的襲擊，我們逃到火車站，那裏又埋伏得有警司的部隊，我們只得逃上火車，司機是我們的人，把我們拉到黃沙溪，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們下車後又遭到襲擊，警司用機槍掃射，我們只好往河裏逃，李任死黨仍然不放過我們，反到底的鮮血染紅了長江水……希望中央儘快調查處理。

1968年7月12日：動員反到底派群衆大批離渝，大造輿論，收買專縣的土砸。重慶只留下一些武鬥人員。給中央發電報，說警司把重醫的反到底傷員都殺了。文藝界有個老楊在八一五內部。

1968年7月19日：反到底在宜賓開會，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已經撤到宜賓去了[1]。要先把專縣一個一個拿下來，先打公路後打鐵路，疏通交通要道，再集中兵力，分三路圍攻重慶。一路從鄰水、秀山、涪陵、豐都，集中150萬人打到重慶、江北；一路從武勝、合川打到重慶北碚；一路從合江、南川、內江、宜賓過來，拿下永川後直搗重慶。

1968年7月23日：反到底內部開會說，專縣吃不住了，承受不了啦，現正開會研究如何殺回重慶。

……

這類消息源源不斷地通過小李傳到我們這裏，雖然不是反到底派的核心機密（看來小李作爲一般工作人員也接觸不到更重要的情報），有的顯然只是些小道消息，但也可以作爲我們分析形勢時的參考。後來我在江陵廠慶功會上發酒瘋時說的“砸派說什麼7月開頭，8月決戰，說什麼頭斷西南，血灑四川……砸種頭頭鄧長春聲稱要在宜賓組織一百個連隊殺回重慶來”那些話，都

[1] 實際情況幷非如此。當時已是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總勤務組組長李木森正以市革委制止武鬥領導小組副組長身份隨同組長、警備區副參謀長范朝運到處調查、制止武鬥。

是從小李那裏傳來的，到底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也不管它，反正能爲我所用就行了。

那時做這種“情報”工作是沒有任何報酬的，全憑個人的信念或者說派性。我曾告訴小李，坐車到工總部來回，車票可以交給舒斌報銷。這是我們唯一可以在經濟上給她的一點補償。以後聽舒斌說，小李到他那裏去報銷過兩次車費。

後來兩大派都撤銷總部、解散組織了，我還到小李住在七星崗和平隧道附近的家中去看望過她一次。

後來我就再沒有跟她聯繫了。但願那一段荒唐的經歷沒有給她以後的生活帶來什麼不利影響。

反到底頭頭塞給我一張字條

我這個八一五派的武鬥總司令，曾經的革聯會常委，却在省、市革命委員會裏連委員都沒有安排一個，不能不引起許多人的猜疑。八一五派內部的一些矛盾，自然也會傳到對方的耳朵裏。于是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1968 年 9 月 4 日晚上，重慶警備區首長召集山城兩大派頭頭到警備區，主要是協商 9 月 5 號紀念中央“九五”命令下達一週年上交武器和游行路綫問題。

會開完後，在分別返回各自總部時，反到底工總司的頭頭主動和我握手，一個頭頭朱鎮坤[1]和我握手時，我感到他把一個紙團捏到我手心裏了。我心想一定有名堂，但當時我沒有聲張。因天色暗，也沒人注意到。

我被警備區的小車送回到工總部後，一個人在房間裏，關上門，打開紙團一看，紙條上寫着：

[1] 朱鎮坤，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市建工局 402 工區工人，共青團員。文革中 1966 年秋（21 歲）參加造反，任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總部勤務組副組長、組長，1967 年 6 月任反到底工總司勤務組常委。文革結束後被清查。

老陽：

這次到成都去一趟，省革委同志和鄧長春都和我談了關于你的事，準備找個時間與你交談一下，不知你有空否？如果有空請來電話聯繫怎樣，我的電話可打52342。

敬禮！

朱鎮坤　1968.9.4

我看了這個條子，認爲這說明省裏有人對我開始感興趣了，“省革委同志”是指誰呢？當然朱鎮坤最明白，按當時情況，我估計多半是劉結挺、張西挺。條子上提到鄧長春，因爲鄧長春是反到底軍工井岡山頭頭，進入省革委當了常委。他們大概已經聽說了八一五派內部的一些情況，以爲現在找我，給我一點好處，讓我像劉陵川一樣，站到他們那一邊去，所謂的“反戈一擊”，在八一五派內部，打着八一五的旗號，幹着使劉、張和反到底滿意的事，起着他們起不到的作用，擴大劉、張所謂“紅十條派”的山頭，憑我當時在八一五派中的資格和聲望，肯定比劉陵川的影響和作用大得多。

我因爲對周家瑜他們認爲我走“申平路綫”，“明保暗砸”，一直耿耿于懷，希望能還我一個清白，從來不會想到要真正投靠砸派。這時越看這條子，心裏就越是氣，心想，要是這事傳出去了，豈不是更會讓一些人相信我是“明保暗砸”與砸派有勾結了嗎？我不是更說不清楚了嗎？

第二天上交武器後，晚上我又專門跑到警備區去求見首長。

韋統泰軍長和另外幾個幹部出來接見了我，我把這個條子拿出來，念給他們聽，說明條子的由來。他們顯然都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事。

韋軍長問我：“你有什麽打算？”

我當即回答他說：“很明顯，他們想拉我過去，分裂八一五，要我在八一五內部造起一股逆流來反對英雄的五十四軍。我陽增泰對于這種陰溝裏面的活動堅決反對！我們兩派既然都是革命群衆組織，要找我談什麽，就到警備區來當着首長的面談。”

五十四軍首長們聽到我的話，都高興地哈哈笑起來。韋軍長笑着說："對呀，對呀，你這樣的態度很好，我們支持你！"

有了這句話，我就放心了，高高興興地回工總部去了。

這個條子，後來我在北京中央學習班上交了。

我給警司寫信要求明確結論

在反到底派想拉我的同時，八一五派內部則有人到處散布我的謠言，說我這個人不宜當工總部的班長，要我們八一兵團把我調回去，同時給我編出了若干條罪狀，什麼組織二組（即武衛辦事組）是個別人（意思就是指我）搞的，說陽增泰總喜歡往專縣跑，還說什麼警備區首長接見時愛頂嘴呀，什麼不右就左呀，不抓大方向呀，沒有進入省、市革委會說明問題嚴重呀……甚至還有人說，雷副政委說了："陽增泰是個壞人跑不脫，是個好人也永遠翻不了身。"又有人說，韋軍長說過："我們對工總部是信任的，對陽增泰當班長我們是信不過的。"還有人說工總部北碚會議是陽增泰强行要大家簽字支持專縣的，又有的說陽增泰私自跑到合川去開黑會，等等等等。我也不知道這些風言冷語是從哪裏冒出來的。

聽到這些謠傳，我當然十分氣憤，越想越想不通。最後我想，這件事只能由警備區首長出面表態才行。哪怕就像韋軍長那樣說一句"我們支持你"都好。

于是，我在 9 月 23 號寫了一個彙報材料，將工總部北碚全委會、北碚會後的工總部常委會及合川會議等情況，給警備區首長作了詳細彙報，并請求接見一次。我在報告中懇切地寫道：

> 幾天以來，包袱越背越重。我建議警備區首長快下結論。因爲藍政委 5 月份就講了，再過三四個月問題就清楚了。現在已經三個月過去了，問題該下結論了。如果我是個壞頭頭或其他什麼，就把我抓起來，如果還下不了結論，還需要調查，請能告訴本人，本人也可提供綫索。爲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綫，

我是把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的，從來沒有放在心上。目前反到底在抓我活思想，要我參加忠聯站[1]，我是斷然拒絕，發表了嚴正聲明，我總認爲兩派都是革命組織，我在八一五雖然挨內部整，越整越鍛煉人，如果我是個壞頭頭，不管你在哪派，那還不是照樣揪？兩派當前唯一的出路就是鏟平山頭，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報告交上去過後，一直沒有消息。

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重慶局勢正面臨一個重大變化：

五十四軍將要調防離開重慶。

反到底派想拉我的希望落空

再次上交武器以後不久，1968 年 10 月 15 日，重慶市兩大派在市革委會、警備區主持下，在人民大禮堂召開了“撤銷各自總部，掀起鬥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八一五派的工總部、農聯會、紅警區、機關指揮部、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反到底派的工總司、農總司、機關司令部、紅大司、紅中司、文藝界延安兵團總部，都宣布撤銷了[2]。

工總部撤銷後，我回到了朝陽廠裏上班。一天，我在廠裏一宿舍碰到反到底派的田林森，他原來是我們八一兵團的，還是我

[1] 忠聯站，即忠于毛主席聯絡站，是在 1968 年 3 月 15 日中央領導人“三一五”指示對八一五派提出嚴厲批評後，八一五派中以劉陵川爲首的極少數人組織的，以落實“三一五”指示、促進兩派大聯合爲號召，試圖從八一五派中拉出人馬形成“第三勢力”，但因中央領導人很快又作出了對反到底派進行批評的“四二七”指示，互不服氣的兩派又再次展開大規模武鬥，忠聯站實際上名存實亡，只有劉陵川被安排進了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當了個委員。

[2]1968 年 10 月 18 日《重慶日報》頭版頭條發表報道，標題爲《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在鬥批改中立新功 / 本市兩大派革命群衆組織鏟平山頭撤銷總部》。

派他到八一兵團總部去當聯絡員的，後來他參加了砸派。雖然觀點不同，但是我們彼此間還沒有什麼個人恩怨。他對我說："老陽，你在八一五的處境我們都瞭解，我們很爲你擔心。你一定要小心。"同時，他還告訴我，李文達想跟我談一談。但是我沒有表示願意與李文達面談的態度。我知道他們的目的就是想拉我到反到底一邊去。

這時，重慶社會上爲八一五出了個"忠聯站"的事鬧得沸沸揚揚。甚至有人造出我是"忠聯站"站長或幕後指揮的謠言。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更要提防，不讓人抓住什麼把柄，壞了我的名聲。

10月份的一天，我和姚國章、韓斌武一起找廠裏反到底派的徐世安商談聯合起來儘快建立廠革命委員會的問題。徐世安也對我說，李文達想跟我談談。我表示可以談，只要他哪天到廠裏來，我就去找他。但是徐世安說："想請你到上清寺去談。"

我說："在上清寺哪裏？"

他說："在方震家裏。"

方震是朝陽廠技術科長，同李文達都是反到底觀點。徐世安見我未表示答應，怕我不放心，又强調說："我們保證你的安全。"

我回答說："有什麼要談，你轉告他，叫他回廠來談。"

我其實并不擔心什麼安全問題，而是擔心跟他們私下談話被一些人拿來做文章，造謠說我跟反到底派暗中勾搭，這就會更讓我說不清楚了。

在廠革委成立後，有一次歡呼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發表，進城游行返廠時，我同李文達廠長坐在同一輛車裏，當時李文達對我說："原請你來談一談，結果你不來！"

我說："你要談啥子呢？"

他說："算了，時機已經過了，再談那些沒得意思了。"

因爲十二中全會公報上說全會嚴肅批判了"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爲'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李文達說："記得當時你也是反對'二月逆流'的嘛。"

我說："我現在也反對'二月逆流'呀！不過，當時重慶有

人藉反‘二月逆流’,把矛頭指向英雄的五十四軍,我就不答應了。”

李文達說：“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反五十四軍，是錯誤的。”

是什麼錯誤，是策略上的錯誤還是立場上的錯誤？他沒有說。他也沒有再與我深入談下去。顯然，他們已經看出我的派性思想頑固不化，放弃了拉我到反到底派一邊的念頭了。

在這一段時間裏,社會上一直有些傳說,說陽增泰是“忠聯站”的站長，申平是副站長。當然都傳到我的耳朵裏來了。

爲了澄清事實，表明自己的態度，有一次在人民禮堂陳萬明主持召開的八一五派的大會上，我在發言中明確表態：

“我陽增泰生是八一五的人，死是八一五的鬼！我姓陽的願意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上前一步死，絕不後退一步生！”

當場引起全場的熱烈鼓掌。

現在回想起這些話，自己都覺得好笑，但在當時却是十分真誠的。這充分說明我當時的派性思想重得很。

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下，反到底派想拉我過去，怎麼可能呢？

郝處長說出有人寫我黑報告的秘密

兩大派撤銷總部解散組織後，周家瑜、陳萬明、袁金樑等秘密地在交際處二所二號樓（原革聯會情報資料彙集中心）保留了一個由他們控制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沒有山頭名義，仍然是爲八一五這個山頭服務。這個辦公室裏安有二部電話，并從學校抽調男女學生數人日夜值班，瞭解下邊情况和向下傳達派性指示。

一次，我到這個辦公室去玩，碰到陳萬明。他對我說：“老陽，你這次沒有進入省、市革委會，問題不在我們，你們自己單位在北京學習的人幫你填表時，優點只填三條，缺點就填了八條，我當時看了都反感。”他又說：“當初我從重鋼到革聯會來，你就應該回廠裏去，這樣起碼可以在廠革委裏有個位置。”

11 月 9 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在人民大禮堂召開“全面落實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進一步動員清理階級隊伍大會”，雷副政委在講話中,宣布反到底派頭頭鄧長春（四川省革委常委）、

■ 1968 年 11 月陽增泰寫給重慶警備區和市革委首長的有關攻打工業校武鬥的交代材料底稿一頁

八一五派頭頭方文正（重慶市革委常委）已經在北京的“八一五會議”上被中央下令逮捕，并公布了他們的武鬥殺人、破壞大聯合等罪行材料。

那天大會後，市革委副主任白斌召集我們兩派頭頭開座談會。我在會後碰見市革委常委段德昌和委員蕭平南，他們二人主動拉着我說：“老陽，實在對不起你，當初我們在北京學習班，以爲空壓殺俘虜這件事是你幹的，結果是方文正幹的，使你沒有進入革委會。實在對不起！……”

11 月 25 日，重慶市革委主任藍亦農的秘書小楊，打電話通知我到市革委辦公室，說警備區郝處長要見我。

我到了市革委一號樓，郝處長熱情地接待了我。

我跟郝處長還在 1967 年“一月奪權”建立革聯會時就認識了。他是五十四軍文化處的處長，當時就被派到革聯會來參加工作。後來砸派到革聯會靜坐，要砸革聯會，我按劉潤泉的交代組織人員把在市委大院靜坐的砸派人員拖出去後，郝處長曾帶上我和葉臻榮等幾個人，去浮圖關八一小學住下，研究砸派動向。1967 年大武鬥期間，郝處長在 8 月 22 日乘車路經兩路口山城寬銀幕電影院前邊三岔路口時，被反到底派的武鬥人員開槍打傷腹部，腸子都打出來了。我去看望郝處長時，他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不放，眼泪都流出來了。我安慰他說：“郝處長，你好好養傷，我們一定給你報仇，血債要用血來還！……”我跟郝處長在文革中相處很好，可以說是成了無話不談的老朋友。

我不知道這天郝處長找我去有什麽事。他先問我在忙什麽。我說撤銷工總部後，我就回朝陽廠去了，還是回原來的生産科搞我的生産調度老本行。郝處長說：“抓革命促生産，很好嘛！”

隨後，郝處長鄭重地對我說：“陽增泰同志，這次請你來，我是代表市革委、警備區，向你賠禮道歉。”

我有些不解，忙說：“市革委、警備區又沒有對我做什麽，怎麽要賠禮道歉呢？”

郝處長解釋說：“是這樣的。去年你們八一五派在空壓廠武鬥期間，殺了五個俘虜，其中還有一個是孕婦，等于是殺了六個人。後來重大有人向警備區寫了報告，說這次殺俘行爲是你下的命令。本來在成立省革委時，我們已經考慮推薦你作八一五派的

省革委副主任，反到底派那邊我們考慮推薦汪友根[1]。但是有了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把你的名字劃掉了[2]，當然汪友根也就不考慮作爲省革委副主任了——兩派要對待嘛。這就是重慶兩派在省革委都沒有副主任的原因[3]。這次在中央召開的‘八一五會議’上查清了，那次空壓廠的殺俘事件，是方文正下令幹的，與你陽增泰無關。我們馬上要離開重慶了，在走之前必須把這個事情給你說清楚，作個交代。我今天就是特地向你賠禮道歉的！”

郝處長的誠懇態度讓我十分感動，我說：“郝處長，千萬別說什麼賠禮道歉的話。我對進不進省、市革委會，并沒有多大興

[1] 汪友根，文革爆發時爲重慶市供電公司修試場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1967年6月（30歲）任反到底工總司勤務組副組長。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1973年6月任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市總工會主任。1974年底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文革結束後被清查并撤職。後提前退休在私營企業工作。

[2] 另據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總勤務組組長李木森回憶：反到底派在中央學習班把推薦進入省、市革命委員會的代表名單報上去後不久，重慶市革籌組副組長、五十四軍副軍長“白斌找我去，說：‘邱開全是一個雙手沾滿鮮血的武鬥幹將，八一五派堅決反對邱開全進入市革委，市革籌和我們軍部掌握了不少邱開全的材料，希望反到底派自己研究，把邱開全換成其他人爲好，如果你們硬要把他報上來，我們也一定要把他的名字劃掉，我們也要求八一五派不要報陽增泰，陽增泰也是武鬥幹將嘛！八一五派就在內部統一了認識，不報陽增泰，另報了其他人。你們也研究研究吧！’”（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註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165頁。）

[3] 在1968年5月28日中央領導人爲批准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接見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全體代表時周恩來講話中說：“最嚴重的重慶，兩派對立那麼凶，現在能坐在一起商量，一道搞革命委員會了，提出了重慶到省革命委員會的名單，還有兩名副主任沒有解決……重慶的兩名副主任委員還未解決，我覺得這還是一件遺憾的事，革命委員會成員270名，常委55名，主任張國華，副主任18名，還留有一些機動，重慶兩名副主任委員沒有推出來，既然常委都推出來了，爲什麼兩名副主任推不出來，總還有一些問題……”見《中央首長接見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全體學員的講話》，重慶八一五赴京學習代表整理，工總部一輕山城八一五印刷工人戰鬥團總團翻印，一九六八年五月。

趣，參加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并不是想爲自己撈點什麽好處。過去那些老紅軍,跟着毛主席長征,槍林彈雨,南征北戰，身上好多槍眼，有的都還沒有當上省級幹部。我們搞文化大革命，不過寫寫大字報，喊喊口號，才一年多時間，有什麽不得了的功勞？哪裏就一定要進省革委嘛！我在革聯會工作了一段時間，都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沒得那個水平。不進省、市革委，可能對我還好些。謝謝郝處長的關心，我在廠裏能把抓革命促生産做好就不錯了。”

從郝處長那裏出來，在回廠的路上，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想不到自己一心一意在爲八一五派出力，八一五內部却有人暗中打我的黑報告，歪起屁股錐我一下。要不是這次郝處長告訴我，我還一直被蒙在鼓裏。

其實，不光是空壓廠殺俘虜的事與我無關，就是那次打空壓廠的事也與我無關，當時我們根本就沒有研究打空壓的行動，研究的是打建設廠，爲了拿到槍。只是因爲原計劃給各路武鬥隊帶路的那個建設廠的頭頭臨陣畏縮自己跑了，無人帶路，才被空壓廠的方文正藉機把那些武鬥隊拉去打空壓廠。我們在革聯會作戰司令部根本就不知道。

後來在 1970 年批判劉、張的北京中央學習班，我有一天碰到袁金樑，他對我說：“老陽，怎麽樣，現在明白了嗎？當初不要你進革委會的是劉、張，今天也有他的好下場！”以後學習班搬到在民族學院後，陳萬明、袁金樑又在群衆中說：“陽增泰沒有進革委會,不是藍政委不同意,主要是張政委（張國華）不同意。”

關于我未能進入省、市革委會的原因，我在不同時間聽到這種種不同的說法,我都沒去管它,聽到後一笑了之。他們都不知道,警備區郝處長已經給了我一個跟他們完全不同的說法。我當然相信郝處長說的。

就在郝處長找我談話的第二天，市裏就召開了隆重的“熱烈歡迎十三軍光榮進駐四川和重慶”的群衆大會。在重慶擔負“三支兩軍”工作近兩年的五十四軍，正式離開重慶，和我們告別了。

第九章 漫長的學習班生涯

追查電臺問題的“九二三”學習班

1969 年 1 月 25 日，我和重慶其他一些群衆組織頭頭及個別骨幹成員（都是與武鬥期間參與私設電臺一事有關的人員），得到通知，到成都參加由省革委和成都軍區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個學習班被叫做“九二三”學習班，專門清查文革中群衆組織私設電臺的問題。

爲什麽這個學習班要叫“九二三”學習班呢？因爲在 1967 年大規模武鬥結束之後的 9 月 23 日，中央發布了經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取締私設電臺、廣播電臺、報話機的命令》，看到這個文件，我才知道我們在武鬥中私設電臺的作法是錯誤的。中央這個命令中指出：

> 近日來發現有的地方私設廣播電臺，播送違法的派別性的廣播節目，有的地方私設秘密電臺、無綫電報話機和報話網，擅自編造和使用密碼，進行秘密通訊和通話。必須嚴肅指出：這些事是違反黨紀國法、絕對不允許的。這種做法嚴重破壞了文化大革命，破壞了無産階級專政。它不但造成了無綫電波的傳播混亂，影響了中央和地方電臺正常廣播，而且嚴重地泄露了黨和國家機密，給黨和國家造成政治上的嚴重損失。其中有一些，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敵特分子搞的，必須引起我們高度警惕。
>
> 電臺、廣播電臺、報話機等，只能是在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批准後設立的黨、政、軍的宣傳通訊機關，只能反映無産階級專政的根本利益，決不允許用來爲某一個派別服務。

它必須嚴格遵守黨和國家的紀律和規定，决不允許出現無政府狀態。爲此，中央重申：一切私設的電臺、廣播電臺、報話機等，應自即日起立即無條件地全部撤除。嚴禁私自編造和使用密碼。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私設電臺、廣播電臺、報話機等。今後如再發現有私自設立電臺、廣播電臺、報話機，編造和使用密碼等事，當以國法論處，并由當地衛戍司令部、警備司令部、駐軍或其他軍事領導機關執行。

實際上，在這個“九二三”命令下達之前，我們已經隨着“九五”命令之後的停火交槍而停止了私設電臺。所以不會再有“今後如再發現……當以國法論處”的情況了。

“九二三”學習班辦在成都工學院裏面。管理人員全部是成都軍區派來的軍人。生活也基本上是軍事化。除了我們重慶兩派的一些人員外，還有四川省其他地區一些也參與過私設電臺的人員。

我在“九二三”學習班，對自己所知道的八一五派私設電臺的情況，與大家一起進行了認真的回憶，寫出了詳細交代。根據我留存的當年交代材料底稿，主要回憶了以下一些情況。

1967 年 7 月 7 號，周家瑜在他主持的革聯會上提出了要使用電臺進行聯絡的問題。大家一致同意。7 月 9 日，我根據這個決定，在原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樓上召開了備槍備彈會議。會上就決定要拿出電臺來使用了。

在 1967 年 7 月底、8 月初，革聯會作戰司令部爲了武鬥中通訊聯絡的方便，就架設了電臺。這方面的情況，就是我在前面已經寫到的，都在“九二三”學習班上作了詳細的交代。除此之外，我還交代了其他幾部電臺的情況——

師專臺。師專架設電臺，是從郵電局拿出的 55 型 15 瓦收發報機。是我根據周家瑜口頭指示，叫楊忠富回郵電局拿的。時間是 1967 年 8 月 3 號。8 月 1 號以前，駐在師專的湯少成（八一兵團野戰司令部司令，師專指揮部負責人）來革聯會作戰司令部，

看見了我們放起未用的電臺，向我提出要求在師專也架設電臺。我答應他以後再說。當時師專這個臺是因形勢變化而設的，以後逐漸成爲主臺，目的就是保證戰時通訊，瞭解情況，調動人力物力財力，指揮武鬥。當時主要負責的是湯少成，然後逐步轉爲朱遠容、陽增泰、唐忠明等。值機人是郵電八一五的楊忠富、何啓群、陳國安等。他們都是電報局專門吃這碗飯的人。從 8 月 3 號 24 時架臺起，一直到武鬥平息後，1967 年 9 月 20 號停臺，23 號撤臺，機器由楊忠富搬回原單位。

石坪橋臺。1967 年 8 月 3 號晚上，我同周家瑜、唐忠明、朱遠容從革聯會坐市委陳師傅開的一輛米黃色小轎車到師專，見電臺快架好。我們開會聽情況彙報後，周家瑜要我搞部電臺上前綫。因我們幾個都要上前綫，而原打算上前綫的電臺已經安在師專了，這正合湯少成的意，如果我堅持搬走會帶來麻煩。按當時形勢，師專設一部電臺也是應該的。我看下面有部中吉普，一瞭解是劉乾均從城裏載楊忠富他們來師專的。我就叫楊忠富再搞一部電臺安裝在中吉普車上作前綫機動使用。楊忠富滿口答應。8 月 4 號我同周家瑜、唐忠明、朱遠容在石坪橋指揮部開會，下午出去到工學院第一綫時，已見一輛裝有天綫的中吉普停在石坪橋指揮部外右手邊公路對面。我跑過去看了一下，是陳國安在那裏忙。我告訴他，我們上最前面去了。有情況通過石坪橋指揮部張純中派人聯繫。8 月 5 號，因我們這一派在工學院爭奪清水池武鬥失利後，電臺隨車開回師專，回師專後就把車撤了。我在生物大樓地下室睡覺時發現這機器就設在地下室裏。值機員是唐華燦和李培晏。是 55 型 15 瓦電臺，是從郵電局拿出來的。

江津臺。這個點的電臺，就是我們爲了找江津的長風廠搞機槍，而答應他們提出的要求向他們提供的。前面已經詳細講了，不再重複。

以上幾個點的電臺都是由我批准架設的。另外還有些是由司令部的參謀部唐忠明、朱遠容他們批准架設的。這些點的情況是：

嘉陵臺。機器就是原來石坪橋裝指揮車那部 55 型 15 瓦收發報機。是郵電局的。1967 年 8 月 27 日架設，9 月 20 日停機，22

號封存。操作人是市郵電局的向繼安。這些是我在“九二三”學習班才知道的。

1967 年 8 月 14 日我們把嘉陵廠拿下後，接着就在航鋒、潘家坪擺戰場。當時我們這一派的武器老套筒多，就是缺 79 彈。負責軍械的楊國民提出，嘉陵廠能不能生產 79 彈？當時我就去問湯少成。湯少成說生產沒有工裝，復裝可以想辦法。要回廠去找主要負責人蘭進先商量。楊國民、朱遠容、蔡明訓和我，坐劉乾均開的綠色小車到嘉陵廠（時間記不清了），在職工醫院會見蘭進先。蘭進先又派人去找孫壽彭副廠長來研究這個問題。蘭、孫曾帶領我們去轉廢料車間，在轉的路上，蘭進先提出要求設部電臺，他說，二鋼有電話綫，都設有電臺（接力機），我們的電話綫都打斷了，還沒有電臺。又要生產 79 彈，電話不通，怎樣聯繫呢？我當時答覆研究一下，想辦法解决這個問題。當時我們幾個人也認爲有必要。因爲 79 彈復裝生產問題一解决，就是一個很好的彈源基地。我曾把這件事告訴過楊忠富，但沒有實現。文攻武衛總司令部 8 月 25 號成立後，嘉陵廠在參謀部（唐忠明、朱遠容、湯大華）的直屬領導下才解决了這個問題。

華鎣山江華廠臺。這是一臺 55 型 15 瓦收發報機。是郵電八一五于 1967 年 7 月 30 號晚上從市郵電局翻墻偷出來交給北碚的。我們到江華廠去那次因在北碚沒拿到電臺，沒有架設成。後來成立了文攻武衛總司令部，通訊工作交給參謀部，唐忠明、朱遠容、湯大華管，另外還有兩個科長即楊忠富、張大群，管收發報和接力機。江華臺在參謀部直接領導下，于 8 月 30 日架設，9 月 23 號停臺和撤臺。操作人阮和勝、汪貴英，都是市郵電局的。

153 炮校臺。機器是炮校的。型號規格不瞭解。是參謀部去設的。操作人是郵電局的李培晏，架設時間是 1967 年 9 月 2 號，停臺是 9 月 20 號。

另外還有二鋼臺，但我在“九二三”學習班反復回憶，確實不瞭解二鋼臺是怎樣架設的。還是在學習班裏反復“梳辮子”（一條條理清有關事實）時，才聽其他人談起二鋼設有 55 型電臺。因爲從 1967 年 7 月 9 號决定打嘉陵廠起(實際是 8 月 12 號晚打響，

14 號結束）一直用的是 716 廠生產的接力機。以後我也很少到二鋼廠去，而去嘉陵廠的時間比較多。所以二鋼廠設此電臺，我腦子裏沒有什麼印象。同時也沒有人要求過我在二鋼廠設電臺。

北碚臺。這部 55 型電臺，是郵電八一五于 1967 年 7 月 30 號晚上從市局翻墻偷運到交際處，然後搬到革聯會作戰司令部，後由北碚郵電局（八一五派北碚捍紅總部的下屬組織）來領走的。機器來時我知道。走時不知道。聽說是解決郵電局內部業務使用。1968 年我在交際處才聽郵電八一五頭頭曾步勝給我講，在這個時期，即 1967 年 8 月某日，北碚內部機的操作人馮德芳還同師專通過話。

瀘州臺。瀘州電臺是瀘州紅聯站的瀘化兵團（後加入八一兵團，番號爲 6 團）自己的。我們在 1967 年 9 月去江津用電臺換機槍時，9 月 12 號中午楊忠富在飯堂吃飯，江津九七總部一個帶他去吃飯的工作人員介紹他認識了瀘化兵團的一個來人。後聽楊忠富講，瀘化兵團那個人把瀘州臺的呼號頻率告訴了他。他在 9 月 15 日左右，用師專臺收到了瀘州兩份電報，是瀘州同 421 部隊聯繫，楊忠富掃臺時收到的。這兩份電報我也看過，主要是告急，請求支持。我們沒有向他們發過報。

朝陽廠臺。這個臺是該廠產品試機用的八一型電臺。只有發報部分沒有收報部分。是用收音機代收訊機使用的。這個臺的架設是朝陽廠 2007 團團部于 1967 年 7 月 25 號以前開會決定搞的。指揮人是胡友年、李華權、姚國章。操作人是林金熔、顏笑竹。這個臺于 8 月 2 號、3 號同革聯會作戰司令部（國防工業政治部）試過機就再沒通了。他們的目的只是防止另一派襲擊時如果把電話綫割斷了好向外呼救，起護廠的作用。

長安廠臺。長安廠這個電臺是朝陽廠八一兵團頭頭姚國章同長安廠換二挺坦克機槍時換給長安八一兵團的，這部機器比較新，長安廠的報務員二人是由朝陽廠的林金熔、顏笑竹教會的。聽說長安廠同朝陽廠通過話。後來長安廠失守，八一兵團 20 團被打出來後，機器被另一派搶去了。1968 年某月林金熔才在警備區找到拿回廠。

關于 716 廠（無綫電廠）拿出的接力機，具體情況我不清楚。主要是參謀部唐忠明、朱遠容他們在統管和安排。具體負責是無綫電廠的張大群，操作人也是無綫電廠的職工。我所知道的點有：師專，無綫電廠，二鋼，421 軍事院校，重大，市公安局等。

我在師專指揮部期間（文攻武衛總司令部還沒有成立之前），守接力機的女值班員曾叫我接過兩次無綫電話，因對方談話不清楚，或是機器頻率未對正，聲音聽來很小，電話可能是石坪橋打過來的，對方是誰記不清了。內容是石坪橋告急，要求增援。

1967 年 9 月中旬，我進城參加輪船會議後，到革聯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工作人員所在地建設銀行，看見有兩臺步話機。我問張輝（長安廠八一兵團派出的工作人員），他說是段德昌、姜永榮他們考慮與長江電工廠保持聯繫，叫他到 421 部隊去搞來的。後來還回 421 部隊去了。

我在這些電臺使用中辦過些什麽事呢？我回憶是：

一、我向電臺負責人楊忠富抄寫過革聯會作戰司令部頭頭的編號，這些編號是：

段德昌——200 號，
蔡明訓——201 號，
楊大渝——202 號，
楊正中——203 號，
劉萬秋——204 號，
朱遠容——205 號，
葉臻榮——206 號，
陽增泰——207 號，
唐忠明——208 號，
周家瑜——209 號，
楊國民——210 號，
黃竹然——211 號……

我要楊忠富在收發報時一律用代號不用姓名。另外告訴他，因爲有人提出對劉萬秋有懷疑，對他的報要卡住。

二、1967 年 8 月 3 號，駐師專的湯少成向我提出要重機槍子彈，

我曾擬過一個電報稿，在師專交楊忠富發給革聯會段德昌、蔡明訓、楊國民，內容大概是：速送大花生米一批到師專。

三、1967 年 8 月 5 號，我同周家瑜在工業學院，周家瑜先收到一封由作戰司令部發來的電報，意思是：要周速到警司等首長接見。相隔不久,我也收到一封從師專湯少成發來的電報,意思是：花生米缺，城裏運不來，要我親自去。

四、1967 年 9 月上旬，文攻武衛總司令部參謀部叫我過去，看見湯少成從華鎣江華臺打來的報捷電報，說他們在小緬打了勝仗,當地農民來支援他們生活物資。唐忠明講,他已發回賀電去了。

五、1967 年 9 月 21 號，兩派達成停火協議，我曾起草電文交楊忠富發湯少成，電文大意是：兩派于 9 月 21 達成停火協議，令速撤回。同時我還叫把中央“九五”命令用電報發給他們。

六、1967 年 9 月 15 日左右，楊忠富掃臺收到瀘州發給 421 部隊的兩份電報，文攻武衛總司令部參謀部曾交給我看，內容大

意是談他們被王茂聚[1]、郭林川[2]武裝包圍，請求重慶方面火速支援等。因他們是同421部隊聯繫，421的人也沒同我們聯繫，我們沒管這件事，只作一般消息登記處理了。

七、1967年8月13日，我在二鋼爲攻打嘉陵廠，曾在無綫電廠提供的接力機上用無綫電話同駐師專的喬世成（湯少成手下

[1] 王茂聚，1916年生，山東莒南人。文革前爲中共宜賓地委副書記，曾與劉結挺、張西挺一起受到批判處理。文革中1966年底到北京告狀，1967年4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四川宜賓地區劉結挺等平反的通知》（中發〔67〕154號文件），稱“關于四川省宜賓地委劉結挺等同志的案件，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十分關心，并指示周恩來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找雙方有關人員來京，加以處理。”認定“受陷害的劉結挺、王茂聚、張西挺、郭林川、李良等是堅持黨的原則的好同志。”他們的案件是“李井泉一手製造的，經鄧小平、彭真、楊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顛倒了黑白。”隨後王被任命爲四川省宜賓地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8月19日中央軍委任命王爲宜賓軍分區第一政委。1968年4月宜賓地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任主任。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1969年11月5日至12月24日中央召開再次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主要批判劉結挺、張西挺的錯誤)。王在會上被康生嚴厲斥罵後不服，于11月21日在京西賓館住處自殺。1970年1月18日四川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中共成都軍區委員會發出《關于對王茂聚叛黨自殺的處理決定》，稱其“主持宜賓地區工作以來，打着‘紅旗’反紅旗，大耍資産階級政客手腕，上欺中央，下壓群衆，頑固推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綫，大搞資本主義復辟，幹了不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以是否擁護自己爲標準，劃分‘革’與‘保’、‘革命’與‘反革命’，長期挑動群衆鬥群衆，組織指揮大規模武鬥，武裝鎮壓和非法抓捕革命群衆。”等等。宣布開除其黨籍、軍籍，撤銷一切職務，進行徹底揭發批判清除其惡劣影響。

[2] 郭林川，原爲中共宜賓地委常委、組織部長，文革前與劉結挺、張西挺、王茂聚等一起受到批判處理。文革中1967年4月4日經毛澤東批准，由中共中央宣布與劉結挺、張西挺等一起平反，稱“受陷害的劉結挺、王茂聚、張西挺、郭林川、李良等是堅持黨的原則的好同志。”隨即被任命爲四川省宜賓地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1968年4月宜賓地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1969年底中共中央再次解決四川問題(主要批判劉結挺、張西挺的錯誤）的“一二·二五”批示後受到批判。1970年2月任中共宜賓地區革委會核心小組成員。7月經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領導小組批准，交中央學習班四川班批判，實際停止職務。

得力人員）通話，命令送“大花生米”到二鋼指揮部用。

八、在師專時期，1967 年 8 月下旬和 9 月上旬，我接和用無綫電廠的無綫電話次數較多，內容多是通報情況，瞭解各處動態，具體的已記不清了。

楊忠富他們使用 15 瓦收發報機的密碼，據楊忠富講是他同王書貴協商，把明碼電報的數字的位置錯開而來的。他說這是最簡單的辦法，內行一看很快就會識破。

我在 1969 年成都“九二三”學習班聽警備區首長講，他們部隊的監聽電臺把我們電臺的收發內容都全部收下來了。

我在學習班所寫交代，除了詳細回憶交代有關私設電臺的一系列情況外，還聯繫中央文件精神，對自己在文革武鬥中參與私設電臺的行爲作了上綱上綫的批判認識，認爲私設電臺就是違反黨紀國法，就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無産階級專政，這個性質是毛主席定的，我們是保衛毛主席、保衛毛澤東思想、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綫的革命造反派，就要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我們錯了就是錯了，就一定要承認錯誤并加以改正。但是我也說明，這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規模大，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在鬥爭中學習鬥爭，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喝幾口水，摔幾個跟頭，是難免的。摔倒了不可怕，在哪裏摔倒就在哪裏爬起來，繼續跟着毛主席幹革命。

在這個學習班裏呆了幾個月，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我們還到成都街上去舉行了慶祝游行。在歡慶“九大”的高潮中，學習班才宣告結束。

在學習班裏吃得好，又成天坐着不動，我對于要交代的問題又沒有什麽思想負擔，認爲應該如實交代，沒有感到多少精神壓力。進學習班時，我體重 104 斤，離開學習班時，我的體重增加到了 114 斤。回到廠裏，大家都說我長胖了。

到灌縣參加省革委學習班

從成都“九二三”學習班結束回到重慶，沒有幾個月，我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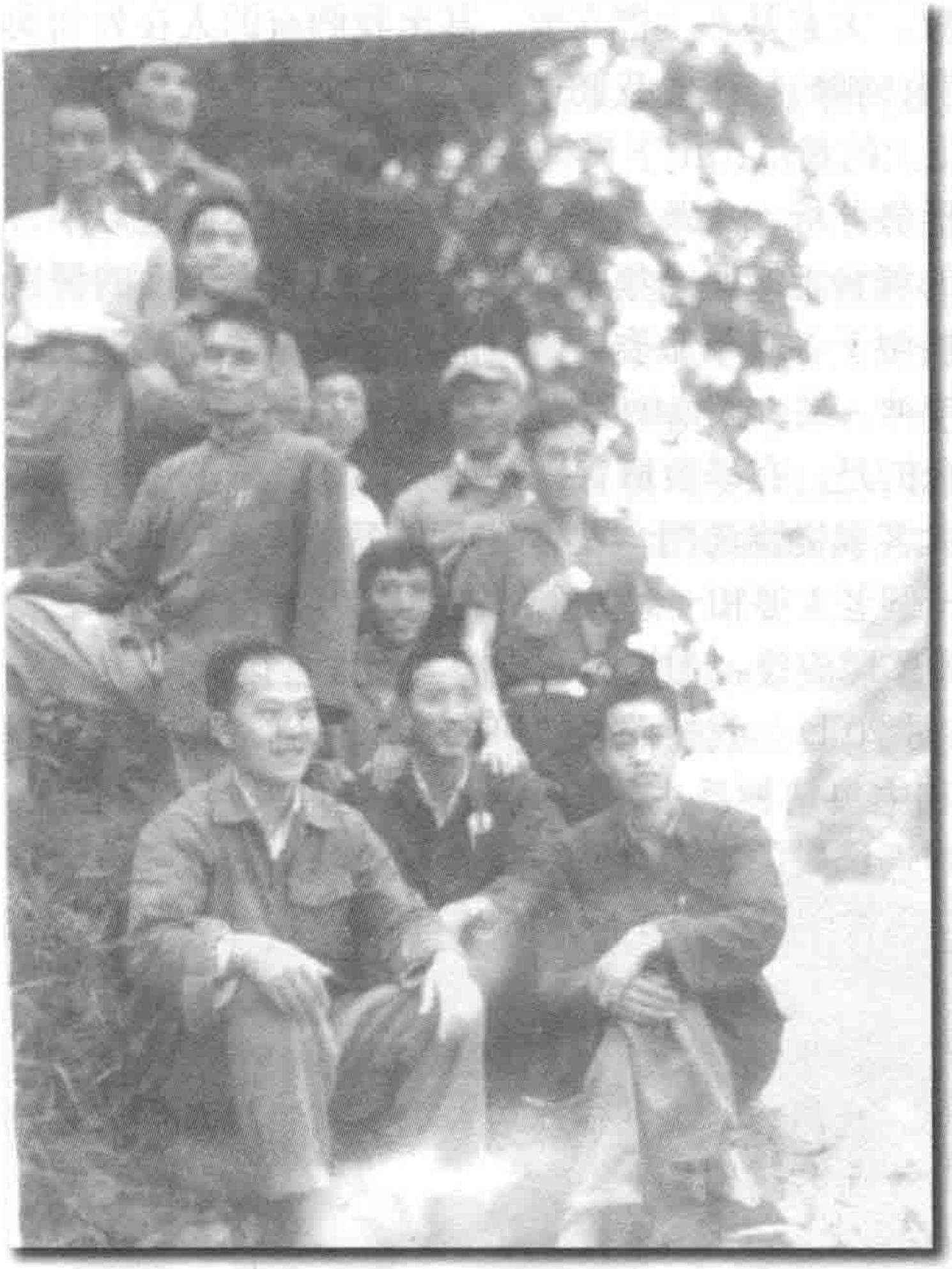
■ 1969 年參加灌縣水利學校四川省革委學習班的部分八一五派代表合影，前排右 1 陽增泰，右 2 韓榮華，右 3 韓定志，右 5 朱顯萬。

得到通知，再次離開重慶，參加四川省革委辦的又一個學習班。

1969 年 8 月 21 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在成都附近灌縣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舉行了開學典禮。學習班集中了全川各地的群衆組織頭頭，按地區分了成都營、重慶營、涪陵連、達縣連、江津連、溫江連、西昌連、鐵路連、萬縣連、綿陽連等。

因爲當時中共“九大”已經召開，新的中央委員會已經建立起來，所以在開學典禮上首長講話中强調：這次學習班是黨校性質的學習班，是黨領導的，黨員要以黨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在學習班裏的黨員要集中過黨的組織生活，學習班要成立臨時支部，增强無産階級黨性——這件事對我們來說顯得比較新鮮，因爲文化大革命以來，地方上和單位裏的黨的組織生活已經全面停頓，各單位的黨組織都不存在了。這可能是我們身邊的黨員第一次重新開始過組織生活。

被集中到學習班的都是各地各級革命委員會中的群衆組織代



■ 1969 年在灌縣省革委學習班期間八一兵團總部部分成員合影，前排左起陽增泰、謝武周、張順華，三排戴帽者周榮華。

表，群衆組織的頭頭。我當時想，我這個頭頭既不是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也不是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雖然還有人稱我“司令”，但我知道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光杆司令”。我可以說是“無官一身輕”。把我叫到這個學習班來做什麼？要我鬥私批修嗎？我在“九二三學習班”上已經鬥得差不多了，該交代的都交代完了，我來到這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學習，就當成是一次療養吧。經過這個學習班的“療養”，我的體重又增加到了 124 斤。

這次學習班，從省革委方面來看，確實也沒有認真安排，因

此顯得比較鬆散，大家基本上都在耍，甚至我們有的人在外面與當地人發生衝突，相約打架。我們也到青城山上去游玩，帶的一壺水不够喝，山上的黃瓜比山下貴得多，我們也不得不買來解渴。

從後來的形勢分析，省革委辦的這次學習班，不過是以學習的名義把各地的群衆組織頭頭集中到那裏，把他們與下面的群衆隔離開來，這樣便于各級革命委員會中的軍代表和領導幹部大力貫徹“九大”精神，減少人爲的阻力。

我印象較深的是，在學習班曾聽到傳來重慶發生的一件重大車禍，說一輛大客車從臨江門一號橋附近開下岩脚，把下面房子裏正在煮飯的一個老太婆和一家人全部壓死了[1]。當時在學習班裏的交通局幾個頭頭聽說後，匆忙趕回重慶去處理善後。

1969 年 11 月 20 日，我按照學習班的要求，以當時大力宣傳的毛主席語錄和中央精神爲主，加上一些已經說得爛熟的套話，在學習班做了走過場式的鬥私批修總結發言。我在這個發言中繼續檢討一年多以前被中央狠狠批評過的“打劉、張”的錯誤，說：

> 冷靜思想，狠鬥私字，客觀立場看是非，不鬥不知道，一鬥嚇一跳，我們的錯誤并不比別人小：我們打劉張，是劉鄧復辟，是方向路綫的錯誤。

這時，不光是我不知道，我們學習班的學員們誰也不知道，四川省革委的劉、張夫婦已經被中央决定拉下馬了。“打劉、張”已經不再是“劉鄧復辟”，而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决策了。

---

[1]1969 年 9 月 14 日下午 1 點左右，重慶市人交公司駕駛員黃祿德駕駛大型公共汽車載客 20 餘人，由市中區小什字行至臨江門北區乾路下坡轉彎處，衝上人行道後墜落公路崖下的一幢房內，共軋死壓死 10 人，重傷 1 人,輕傷 30 人。(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編《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8—1997.3)》，148—149 頁)

被安排參加1970年的中央學習班

1970年2月14日，朝陽廠軍代表吳代表、何代表和王松代表，廠革委會全體成員及部分職工，在廠門口熱烈歡送我們赴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的五位代表到沙區報到集中。五位代表是：八一五派代表陽增泰、李華權、胡友年，反到底派代表胡爲善、徐世安。因爲八一五派有三個代表，而反到底派却只有兩個，加上我在八一五派代表中又不是廠革委的成員，所以反到底派的胡爲善一直說“一碗水沒有端平”。

但是這個“一碗水沒有端平”的責任不在我。說起來也有點讓人奇怪，我這個山城一大派有影響的群衆組織頭頭，中央促進

■1970年在北京民族學院中央學習班時留影，前排左1楊大渝，左2江津李富華，右1陽增泰，後排左起歐正中、俞子文、李習玉、李華權、楊國民、謝武周。

大聯合、籌建革委會的學習班沒有我，中央召開的國防工業系統“八一五會議”也沒有我，這次却又點名要我去參加。顯然，這是在廠裏兩派各兩個名額之外，特別給我另加的一個名額。

出發之前，我們從各方面得到的小道消息已經知道，這次中央學習班主要是要清除劉結挺、張西挺的影響，對他們的錯誤展開大批判，這個形勢對八一五派非常有利。因爲八一五派曾經堅決打倒劉、張，而在一年多之前的中央“三一五指示”中，却遭到嚴厲批評，說我們打劉、張“就是爲李、廖翻案”，“就是劉、鄧復辟”。這兩頂帽子實在是够大了，當時這個批評傳達下來後，八一五派簡直抬不起頭，雖然心裏想不通，還不得不做檢查，以表示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是聽毛主席話的。但是這一次就大不一樣了。儘管歡送我們的人們和我們自己都說的是“要在學習班消除派性，搞好大聯合”之類的套話，但我心裏却想着，一定要堅持原則，决不拿原則做交易，大聯合當然是要講的，但是“要在鬥爭中求團結”。當然，劉、張倒臺了，反到底派會受到批評，但是我們八一五派也一定不能翹尾巴，要牢記“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道理，對方越受批評，我們越要高姿態，多做自我批評，這樣才能有利于團結，才能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否則就會犯錯誤。

當廠裏職工聽說我要到北京去學習的時候，紛紛都來找我帶買東西。當時許多東西在重慶都買不到，所以托我在北京買東西的人不少，我都在筆記本上一個個記下來，計有：

人造革皮帶，紗巾，風雪帽一頂，毛帽一頂，被面，

藍或灰色純毛綫（粗的）3 斤，綠或天藍、紅毛綫 3 斤，

打火石若干，打火機（一元以內），縫紉機針 14 號的 20 根，火熨斗一個，

的確良長袖襯衫，中式皮衣一件，絨衣一件，

37 碼半統女式膠靴，38 碼男凉鞋，女式布鞋，

袋裝水果糖 2 斤，白藥，笋節……

到沙坪壩住進重慶師專後，我們和其他單位的代表在那裏等待出發，等了兩天。

坐在去北京的火車上，我思緒萬千。北京，我們祖國的首都，我長這麼大了還從來沒有去過，是什麼樣子？這次我們能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嗎？聽說周總理在一次解決重慶問題的會上問起過“陽增泰來了沒有”，他老人家爲什麼問起我？是福還是禍？……管他是什麼，我這個從小拾糞長大的娃娃，今天能混到這個地步，上北京，在毛主席身邊學習，已經心滿意足了。我一定要在天安門前留影作個紀念。

到北京後，我們被汽車直接從火車站接到了空軍學院。

這次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于1970年2月22日開學，9月23日結束，有四川各地群衆組織頭頭、各級革命委員會成員、軍隊幹部共6000多人參加。可能算得上是文革中一個人數最多、時間最長的學習班了。

學習班按軍隊編制，編成班、排、連。我們朝陽電機廠的五個人，加上十三軍的軍代表，共六個人，編成一個班，軍代表是班長。

學習班開始安排我們到北京郊區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去勞動。在勞動休息時，我們發現了一個大石碑，從上邊的文字看，那裏埋的是袁世凱的七姨太。大概是在“破四舊”時已經砸破了，墓也打開了，亂糟糟的。我們看到好像伸了一支手出來。沙坪壩供電公司的一個學員膽子大，他拿根繩子去套着往外拉，拉出來一具乾尸，看樣子是個女尸，大家都說可能就是那個七姨太吧。

參加了農業勞動，學習班又安排我們參加在空軍學院挖防空洞。我們四川人能吃苦，一個個脫了衣服甩開膀子幹。學習班的負責人看了，都伸出大拇指誇獎我們“好小夥”。

開始那段時間，除了勞動就是學習毛主席著作。有一天，突然通知我們到大禮堂去聽學習班的小班學員做講用報告。小班是在我們去之前就開始了學習的各地一些主要頭頭。那天我們聽的是宜賓地區的一個學員，原宜賓地革委的辦事組組長張小賢作揭發批判劉、張的發言。

聽了小班學員的現身說法之後，學習班就進入了學習中央文件階段。我們學習了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央“一二·二五”

批示相關文件，中發〔69〕87、88號文件，中央首長“一二·二七”講話，反復學，反復討論，談認識，談收穫。

學習班的軍代表抓得很緊，要我們每個人都對照劉、張的問題檢查自己的錯誤，還必須一條條“梳辮子”。我們八一五派本來是反對劉、張的，這時要叫我們對照劉、張的問題檢查自己的錯誤，開始我還有點不理解，認爲自己反對劉、張是有功的嘛，怎麽還要檢查錯誤？後來通過學習，認識到在文革中自己還是犯了一些錯誤，雖然反對劉、張，但劉、張的有些錯誤思想自己也有，于是就想方設法進行對照，批判劉、張，檢查自己。這當然也是要動一點腦筋的。有時實在想不出該怎樣寫了，就看報紙上那些批判文章是怎樣上綱上綫的，也學着那樣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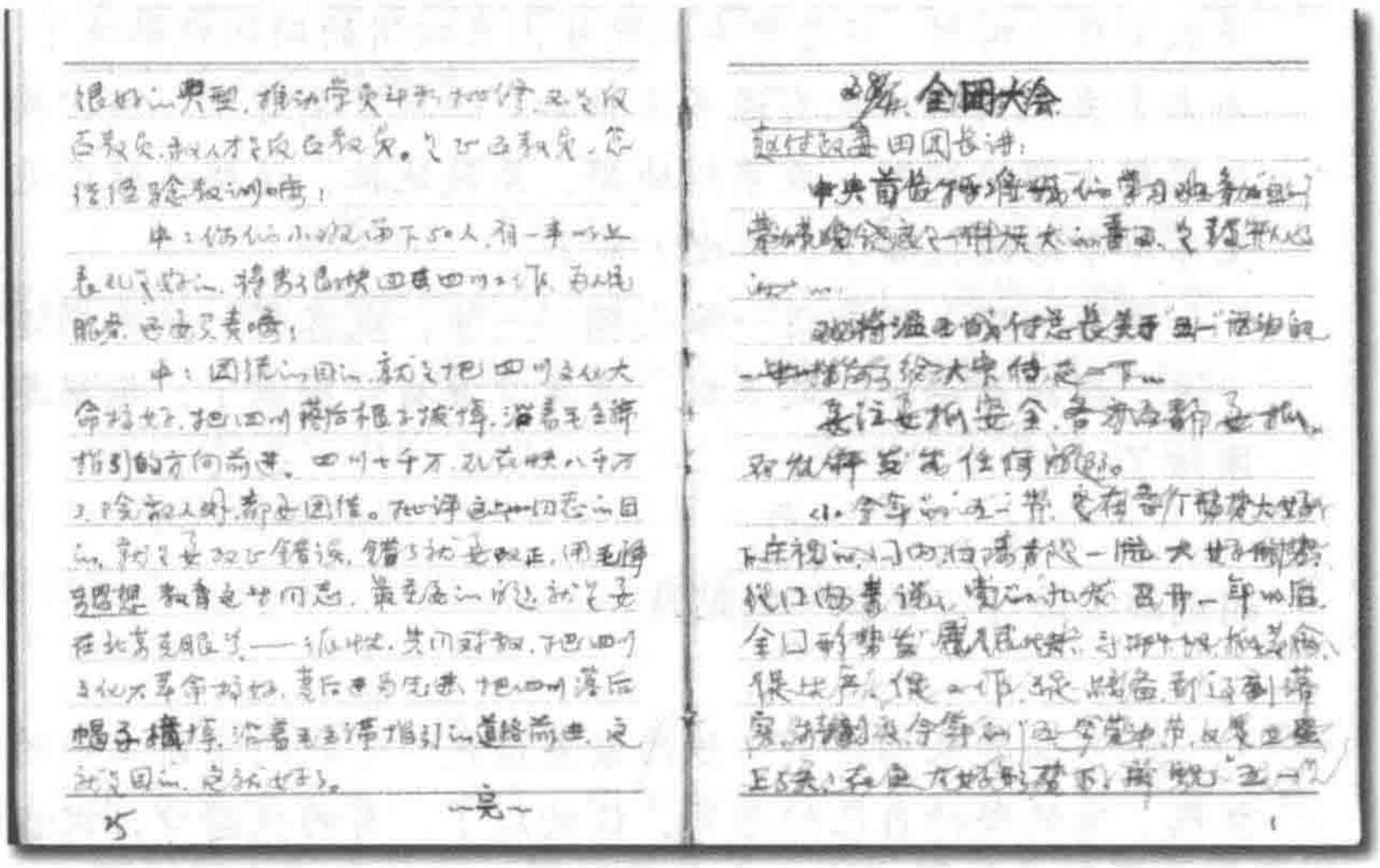
我就在這個時候學會了抽烟。

學習班的生活很好。我來學習班時體重是124斤，學習班結束時體重已經增加到145斤了。大家都說我長成一個“胖娃”了。

中央領導對四川班的指示

1970年4月9日，學習班的十三軍趙副政委傳達了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公室領導同志4月3日的指示，在我筆記裏記下的要點有：

> 四川班取得了一些成績和進步，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相信大多數人是聽毛主席的話的，但是有少數人氣焰囂張，有一部分人想較量一下，你說這樣，他說那樣，人數不多，但能量很大。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製造一些干擾，把步子攪亂，轉移目標捂蓋子。有的把劉、張的錯誤與張、梁的自我批評混淆起來，把矛頭對準張、梁；有的把劉、張的錯誤與部隊支左的錯誤混淆起來；更爲惡劣的是把批判劉、張的錯誤說成是爲李、廖翻案，這是與中央唱對臺戲。有的是派性，盲目維護小山頭利益。有的是自己就有嚴重的錯誤，有極少數有罪行，是極少數的壞人，他想捂蓋子，因爲他要利用劉、



■ 1970 年在中央學習班陽增泰筆記本一頁

張的錯誤起保護傘的作用。因此他一定要抵制。

這次來的都是頭頭，把四川的矛盾帶到這裏來了。四川的廣大群衆是好的，問題在領導，在這些頭頭身上。把這些頭頭的絕大多數解決了，四川的問題就好辦了。

中央對劉、張是一批，二保，三幫，四看，劉、張問題很嚴重，一定要揭深批透，不然四川今後不會太平，後遺症會很大。有人在厠所和房子裏寫標語“劉、張王郭好幹部”，爲叛黨分子王茂聚辯護，就是反中央，要在大會小會上講，你對毛主席的感情到哪裏去了？這樣就不是好人，這是在陰溝裏搞活動，不敢見陽光。

要在群衆中做工作，放手發動群衆，早揭發交代比晚揭發交代好，在毛主席身邊揭發交代比在家裏揭發交代好。自己交代出來比別人揭發出來好。揭發的過程就是提高的過程，總結經驗的過程。要把極左思潮批臭，把無政府主義批透臭。臭了，他就沒有一點市場了。回到四川也沒有市場了。興不起風，掀不起浪了。

揭發批判是爲了教育大家，也是教育劉、張本人，特別

是教育廣大群衆。不是中央搞幾條出來四川的問題就解決了。過去中央也對四川也有過多次結論，但就是要違抗。所以要從思想上解決問題。要系統地揭，系統地批，這樣他就向毛主席革命路綫投降了。就攻下來了。

還有一條：不能這一派去揭那一派，或者那一派去揭這一派，應該是兩派一起來揭，最後就沒有什麼派了，越揭越團結了。

趙副政委傳達後又談了幾點意見：

敢不敢起來揭發劉、張的嚴重錯誤，是我們當前工作的焦點。有的堅持自己的意見，這就錯了。有的找藉口，說我又不認識劉、張，我連省革委的大門朝哪邊開都不知道。有的說揭發靠別人，批判靠自己。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學習班的風氣還不正，有的人要揭發，他就打擊別人，自己不革命，還不讓別人革命。

揭不揭發劉、張，是四川的大局，是能不能把四川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有的人還要爭自己的正確，一爭就是半天，無非是爭自己的私利，把劉、張的錯誤扔在一邊，爭勝敗，爭輸贏。中央早就說了，兩派都敗，都輸了，還有什麼爭頭?

還有一些人，雖然反劉、張，但那是從派性出發，根本沒有把劉、張錯誤的實質認識清楚。反劉、張，自己也犯有劉、

張的錯誤，陳萬明和李木森[1]現在也結成一對紅了。哪天叫他們來給你們講講。

最後他要求各組回去討論，進行“三查”：查揭批劉、張的意義明確沒有，查態度端正沒有，查揭批的矛頭指向對不對。

4月19日下午，學習班又召開大會，熱烈歡呼中央首長4月15日親切接見四川班領導小組成員。趙副政委傳達了中央首長接見時聽取彙報後所作的重要指示（後來稱爲“四一五”指示）。我筆記本上記錄的中央首長指示的要點有：

學習班的成績很大，只有少數人有意見。形勢還不錯，大多數的同志是好的，比開學時好多了。學習班形勢很好，四川的形勢也很好，配合起來了。四川的老百姓聽說傳達中央指示，走幾百里路來聽，老太婆小脚都走來了。小孩子也來聽，眼睛看不到的也來聽。都說這幾年沒有真正聽到毛主席的聲音，現在聽到了，很高興。

形勢好，但是發展不平衡，綿陽問題也是軍隊問題。中央强調軍隊問題是關鍵。毛主席說地方問題在軍隊，軍隊問題在工作。軍隊在地方上要起模範作用。綿陽問題最近也解決了。“工革”也是革命群衆組織了，過去說是老保，辦了學習班，團結起來了，“老保”的帽子取消了。

整個四川形勢很好，學習班不要落在後邊。在毛主席身邊辦學習班，要當促進派，促進四川形勢發展。不要落在

[1] 李木森，1938年生，重慶人。文革爆發時爲國營江陵機器廠助理技術員，共青團員。文革中1966年底參加造反，1967年1月任軍工造反兵團勤務組成員。5月任軍工井岡山總部一號勤務員。6月任重慶工總司（重慶工人革命到底總司令部）一號勤務員。9月任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總勤務組一號勤務員。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制止武鬥小組副組長。1974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76年9月被市革委安排分管重慶市第二工業部（國防口）。文革結束後被清查、撤職，1986年2月被作爲“三種人”開除中共黨籍。後以高級工程師職稱幷享受勞模待遇退休。

四川後頭。有這個危險，搞不好要掉在後頭，辜負四川人民的希望。四川班本身團結搞不好，大聯合搞不好，落實“一二·二五”批示搞不好，四川班就拖了後腿了。

大家真正坐在一起，不要坐在本派一邊，要坐在毛主席革命路綫一邊，坐在以毛主席爲首、以林副主席爲副的黨中央一邊。不要以派性反派性，不要爭誰長誰短，兩派都有錯誤，都要作自我批評，過去兩派都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有什麼不服氣？有什麼尾巴可翹？

四川是中國的一個大省，七千萬人口，只多不少，是一個很重要的反修大後方，大三綫，要看到我們所處的地位，要看到四川在反帝反修中的地位、影響和作用。

毛主席號召“要準備打仗”，這個號召已經一年多時間了。林副主席提出要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我們在中央辦的學習班裏，先用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指示，檢查我們頭腦裏落實得怎麼樣了。一年多來，大三綫，國家的主要工業，重工業，很大一部分在四川。我們革命形勢搞不好，對戰爭準備有很大影響。用毛主席指示來對照，就可以看到我們爲什麼團結不好，對立情緒那麼大？是大多數人在這裏鬧，還是少數壞人在搞？我們相信大多數人是好的，但四川有一小撮階級敵人，煽陰風點鬼火，蒙蔽群衆，使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落實，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受到干擾。真正革命的同志，真正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的同志，在大敵當前，應該感到痛心。戰備受到影響，繼續下去，那就使敵人高興。

爲什麼沒有團結好？就是毛主席的指示沒有聽進去。四川一小撮階級敵人把水攪渾，受壞人蒙蔽，跟着犯了錯誤。我們有什麼仇？無仇無冤，都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要總結經驗教訓。我看有教訓總結，值得我們深思。

你們有少數人有抵觸情緒，這些人陷得深點，覺悟慢一點，大多數的人認識很好。作爲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要感到很對不起偉大領袖毛主席。再不按毛主席指示辦事，

繼續造成損失，就不應該了。

“九大”一週年有篇社論，要很好地學習，要緊跟。對毛主席指示，就是要緊跟，就是要照辦。緊跟就是方向、方法，緊跟就是勝利。不這樣做，個人就要犯錯誤，革命就會造成損失。

最近總理提出：大三綫第一，軍工第一。軍工，你們那裏擺了很多，不搞起來，對不起毛主席，就影響戰備。

將近六千人的學習班，都是四川群衆組織的大小頭頭，你們學習好了，對四川搞好革命生産，改變落後面貌，作用很大。這兩個月成績不小，要真正解決問題，任務還是很艱巨的。

爲什麼四川幾年來，毛澤東思想宣傳不下去？劉、張的錯誤，就使毛主席的指示傳不下去。有人說：劉、張垮了我也垮了。劉、張垮了，你不一定垮嘛！我們要以毛主席爲標準，怎麼以劉、張爲標準呢？劉、張反對李井泉是對的，中央平了反。但劉、張掌權以後就變了，有野心，封鎖毛主席的聲音、林副主席的指示，突出個人，你們四川搞了多少劉、張的電影、戲劇、小說、連環畫，建立劉、張爲代表的造反派的黨，不是以毛主席爲代表的黨，整黨不要共産黨領導，要造反派領導，整出個劉、張的黨。劉記黨，張記黨。

劉、張做了很多錯事，犯了很嚴重的錯誤。過去李井泉破壞三綫建設，劉、張也搞破壞。劉、張錯誤大，張、梁也有責任。你們一定要團結起來，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綫上，用八三四一部隊的三條原則來分清是非，用毛澤東思想爲武器，批判劉、張的錯誤，檢查自己的錯誤，

張國華、梁興初、李大章、謝家祥，都作了檢討嘛，劉、

張也作了檢討，鄭志士[1]也作了檢討，何雲峰[2]也作了檢討。都作了檢討。錯誤性質不一樣。錯誤嚴重是劉、張。張、梁、李也要負責，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對劉、張，中央還是一批二保三幫四看。要幫他們改正錯誤，中央并沒有講劉、張的錯誤比二月鎮反還大，也沒有講比李井泉還大，李、廖、任白戈是一小撮反革命，二月鎮反是反動的，劉、張的錯誤是革命陣營中的錯誤。怎麼能說批判劉、張的錯誤就是爲李、廖翻案，劉、鄧復辟[3]？劉少奇是反革命，大叛徒，李、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劉、張是內部問題嘛！對這些錯誤講話要批判。

中央對劉、張一批二保三幫四看。保，不是保他的錯誤。

---

[1] 鄭志士，1919 年生，山東博山人。1938 年 1 月參軍。同年 9 月加入中共。1955 年被授予大校軍銜。文革爆發時爲陸軍第五十軍第一副軍長（代行軍長職責），1967 年春奉調率五十軍赴四川“支左”，1968 年任成都軍區副參謀長。1969 年任五十軍政治委員。其領導的五十軍在成都地區支持造反派中保劉、張的八二六派。1971 年調任武漢軍區參謀長。文革結束後任武漢軍區顧問。1999 年 2 月 10 日在武漢逝世。

[2] 何雲峰，1922 生，四川平昌人。1933 年參加紅軍，參加了長征。1938 年加入中共。1964 年晋升爲少將軍銜。文革爆發時爲陸軍第十三軍副政委、軍黨委副書記。1968 年底十三軍從雲南移防重慶後任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 年 3 月升任十三軍政委、軍黨委書記，10 月任重慶市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12 月任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主任。1970 年 4 月增補爲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常委。5 月升任成都軍區副政委。1971 年 5 月任重建的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8 月任重建的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72 年 8 月兼任四川省革委政治部主任、黨委書記。1973 年 12 月被中央免去重慶市委第一書記職務。1975 年 10 月調回部隊工作。後任福州軍區副政治委員、顧問。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013 年 1 月 6 日在福建福州逝世。

[3] 在 1968 年 3 月 15 日以周恩來爲首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接見四川軍政領導人的講話（時稱“三一五指示”）中，康生說：“反劉、張就是給李、廖翻案。”周恩來接着說：“就是劉、鄧復辟。”在 1970 年以批判劉、張爲主要內容的中央學習班裏，一些人想不通，就故意抬出中央領導人兩年前在“三一五指示”中說過的話來發泄不滿。

幫他改正錯誤也是保嘛！現在劉、張還是省革委副主任，劉結挺還是軍區副政委，劉、張還是省革委核心小組成員，批判劉、張的錯誤也是保，幫助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按毛主席指示辦事，不是要批倒批臭。

劉、張的錯誤在他本人，下面不要責怪。錯誤在領導，不在群衆。頭頭要帶頭檢討，主動承擔責任，這就把群衆解放出來了。

四川有敵人，還不少。四川軍閥統治多少年，以後國民黨進去，反革命、叛徒，李廖死黨，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楊尚昆、羅瑞卿、鄧小平，都是四川的，他們都有影響。肅清他們的影響和流毒很重要。有敵人，是少數，他利用派性，保護他自己，他們就是要你搞派性，這樣他們就揪不出來，不要上當，不要上當，不要上當！我們的敵人就是帝修反，叛徒、特務、走資派，地富反壞右，階級敵人。派性使我們兩派鬧矛盾，叫敵人利用了。我們只能有一派，不能有兩派。兩派還不打內戰嗎？以派性反派性，永遠反不好。還是派性。兩派都有派性，都要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不要再分哪個派了。不要八二六，也不要紅成。中央文件規定了，說話，寫文章，不要再用紅成、八二六，以及類似的名稱了。

無論如何，在學習班要遵守紀律，不要和家裏通信。綿陽不是寫信回去了嗎？處理了幾個人嗎？家裏的事先不要去管，學習好了，回去好好工作。

領導小組要團結好，不要鬧矛盾。不同意見不能搞到群衆中去。領導小組不能有派性。傾向性就是派性。要傾向毛主席一邊。原紅成一派的就多做紅成的工作，原八一五的就多做八一五的工作，原兵團、八二六的就多做兵團、八二六的工作。

過去是對立面，現在是一對紅。這是很好的典型。推動學員鬥私批修，不是反面教員，敵人才是反面教員，是正面教員。總結經驗教訓嘛！

你們小班留下50人，有一半以上表現是好的。將來很

快回四川工作，爲人民服務，還要負責嘛！

四川七千萬人口，現在快八千萬了。除了敵人外，都要團結。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在北京克服資產階級派性，共同對敵，把四川文化大革命搞好，變後進爲先進，把四川落後帽子摘掉。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進。這就是目的。這樣就好了。

嚴格紀律規定中的“五一”慶祝活動

4 月 28 日，學習班召開大會，田團長向大家高聲宣布：中央首長批准我們全體參加“五一”勞動節的慶祝晚會，同偉大領袖毛主席一起歡度佳節！

大家一聽，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口號聲震動着禮堂的每個角落。接着，田團長傳達了溫玉成副總長有關“五一”慶祝活動的指示，以下是我筆記本上記下的內容：

要注意安全，各方面都要抓，不允許發生任何事故。

一、今年的“五一”節，是在國內國際一片大好形勢下慶祝的。國內國際都是大好形勢。從國內來說，黨的“九大”召開一年以後，全國形勢發展很快，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都得到落實，今年的“五一”勞動節，又是衛星上了天，全國清隊，打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不能麻痹。

二、會場的活動，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要把經過幾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這個新面貌表現出來。要體現出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體現出全國人民團結的氣氛，演出的文娛節目要體現戰備。

三、紀律要嚴明，要體現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體現出對偉大領袖毛主席非常熱愛。

四、這個會場要體現出對帝、修、反非常的仇恨。文娛

節目有些不要搖頭擺尾，要有雄赳赳的氣概。領導抓組織工作的方面，要有敵情觀念，有情況要沉着，不要亂，有空襲要聽指揮。

學習班總辦公室也規定了六條紀律：

一、要充分認識今年慶祝會“五一”的重大意義，高舉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大唱革命歌曲。備戰備荒爲人民。

二、參加人員要作好政治審查，按分配位置入場。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牢記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教導，有情況不要亂，聽大會指揮。

四、嚴禁帶危險物品入場。

五、文娛節目要體現毛澤東思想，不要搞危險動作。

六、有秩序退場。

另外還交代：

要學會跳三個舞：“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八作風歌”、“我們走在大路上”，空軍學院派人來教我們。

我們坐的位置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側面，靠近人民大會堂。如果有來爲我們演出的，要歡迎。去參加的人員要發通行證，供大小便時用。每個單位要“樹標兵”，維護我們的秩序。入場時有集體入場報到證。退場時要等群衆走完了再走。要求不准掉隊，注意安全保障，不出事故，不准搞小動作，大呼小叫，有了要作爲嚴重的政治事件處理。

到了“五一”那天，我們一早就焦急地等候着了。一直等到晚上，才開來了許多軍車接我們。我們各連被要求站成兩排，面對面，互相檢查身上有沒有違禁物品。檢查完後才能上車。

軍車把我們送到了天安門廣場。這時廣場上已經是華燈齊放，

人聲鼎沸，紅旗招展，歌聲此起彼伏，一片歡騰氣象，有的地方還在跳“忠字舞”。

我們在指定位置入座，眼睛都往天安門城樓上眺望。突然，城樓上聚光燈亮了，毛主席來了！全場歡騰起來，我們的領隊指揮我們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會兒，按照晚會的安排，夜空中綻放出一雜又一雜美麗的焰火，五顏六色，變幻着各種形態，讓人目不暇接。

我們最後回到住地時已經是午夜了。

鄧副司令員作動員

“五一”後，學習班趁熱打鐵，于 5 月 7 號由成都軍區鄧少東副司令員作了動員報告，動員大家對照劉、張的錯誤進行鬥私批修。在我筆記本上記錄的報告內容要點如下：

> 這個大會，是進一步貫徹毛主席親自指示照辦的“一二·二五”批示和中央首長講話，掀起大學習、大揭發、大批判的高潮的動員大會。
>
> 我們聽了總理的報告，瞭解到國內外大好形勢。四川的形勢也是越來越好。
>
> 五一節前後，很多同志結對子，由一對白變成一對紅。
>
> 四川省正在由上而下傳達中央文件，除了部分地區外，已全面向廣大工農群衆傳達。10 萬解放軍，15 萬幹部組成宣傳隊，深入各地，分別向工農群衆傳達。廣大群衆認識到，只要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
>
> 我們以南充專區某地區爲例，聽了傳達，群衆就在新華書店買了毛主席著作七千多套。大家認爲，省革委個別領導人由于沒有緊跟毛主席，犯了錯誤，我們也要吸取這個教訓。
>
> 重慶的周家瑜、黃廉，到群衆中去大講他們受資產階級派性毒害的苦，大講毛主席革命路綫的甜，受到廣大革命群衆歡迎。現在是兩個忙人了。

成都、溫江、重慶、南充等地，都在狠揭狠批劉、張的錯誤，交出派旗、派章和材料，互相爭擔責任，由一對仇變成一對紅了。大批的幹部解放了，全省解放的幹部占80%。很多老大難的單位問題解決了。石油系統聽了報告，很快建立了革委會。江津的132個單位，革委會進行了補臺[1]。永川有300多個單位是兩個革委會，兩個印章[2]，現在都合并成一個了。據統計，全省已補臺的單位革委會，占60%。

通過學習，大家都認識到派性掩護了階級敵人，敵人利用派性。

最近以來，鎮壓了大批現行反革命分子。鼓舞了群衆的鬥志。如成都、重慶，等挖出埋藏很深的階級敵人就有1000多人，貪污1000多元以上的，就有4300多人，貪污糧1000斤以上的，就有900多人。貪污布票100尺以上的，就有100多人。現在僅成都、重慶兩地，就有4萬多人主動交代自己的問題。

---

[1]196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于落實兩個布告解決四百多個“老大難”單位問題的情況報告》(中發[68]133號)中，上海市革委的報告裏提出：“對‘老大難’單位的革命委員會要采取積極慎重的態度，妥善處理。‘老大難’單位往往是一派掌權，因此，怎樣對待革命委員會，成爲兩派群衆爭論的焦點。我們采取的方針是‘補臺’，而不是‘拆臺’。”(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在此前後，中央領導人處理各地兩派紛爭問題時都强調對已經建立的革命委員會，即使發現是一派掌權，也不能推翻重建，不能拆臺，只能補臺。以致一些地方占優勢的一派群衆組織就搶先建立革命委員會造成既成事實。

[2] 永川縣時爲四川省江津專區專署駐地。1967年8月1日，成都軍區決定成立永川駐軍支左領導小組。11月23日，成都軍區（實際是當時因與張國華和劉、張有矛盾而長住重慶的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重慶駐軍又決定成立江津專區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從此永川縣城內出現兩個支左小組并存局面，各辦各的公，各支各的“左”，各愛各的民，兩派群衆組織也各擁各的軍。甚至兩個支左小組各批各的革命委員會，永川縣50個農村公社中就有30多個公社建立了兩個對立的革命委員會。

隆昌革委會33名成員，就有22名有問題。

人們的精神面貌也起了變化。過去劉、張拉一派打一派的錯誤路綫，把很多老工人打成老保。現在聽了傳達後，老工人連續上班32小時還不下班。有的社員冒雨出工，四川廣大農村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小春作物長得很好。溫江專區的同志保證今年闖過畝產1000斤關。

中央首長在4月15、16號給我們作了指示，指出我們學習班有落後于四川形勢的危險。我們在毛主席身邊學習，如果還落後了，就辜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長的希望。

中央首長的指示，是發動我們揭批劉、張的動員令。我們要掀起一個大學習、大揭發、大批判的高潮。

有人對中央首長指示各取所需，斷章取義，說什麼“四一五”指示是糾偏。這實際上是派性表演。在中央，在毛主席身邊學習兩個多月了，思想還是舊的。劉、張的毒中得太深了。有的還說中央首長批評了鄧少東一頓，不敢傳達。今天領導小組的同志都來了，可以問一下嘛。

我們“五一”和毛主席一起歡慶勞動節，很多同志精神上得到鼓舞，很多同志都在講用會上鬥私批修，姿態高，主動承擔責任，與不同觀點的同志搞好團結，新結的“一對紅”對子有307對。有的交代了自己藏在家裏的武器彈藥，有的還交代了自己殺人的罪行。這些都是好的，在中央身邊交代比回家交代好，自己交代比別人檢舉好。有的同志寫了檢舉揭發材料一萬多字。

但這個揭發才剛開始，并不是像個別同志說的過頭了。我們就是要按中央指示的步子走。我們學習班離中央首長的指示還差得很遠。我們要把中央指示落實到一個一個連、排、班，要把黨性提得高高的，派性批得臭臭的。在任何情況下不反復、動搖，這樣就學好了。

中央“四一五”指示和歷次指示是一致的。對劉、張錯誤的性質，中央“一二·二五”批示和“一二·二七”講話

都說得很清楚嘛。“四一五”指示是把學習中的一些活思想加以解決。“一二·二七”講話說了“野心家”、“獨立王國”，這個性質够嚴重的了，哪存在什麼降調子的問題！

一種認爲，劉、張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揭發批判；一種認爲，劉、張問題要批，就不是人民內部矛盾。這兩種認識都是錯誤的。我們揭批劉、張，一方面是幫助劉、張改正錯誤，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要使廣大的革命群衆受到教育。揭批劉、張的過程，就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過程，就是兩派團結的過程。不在一塊，很多問題不知道，大家在一塊揭，問題就清楚了嘛。

關于批判“二月逆流”問題。“二月逆流”的反動性，對上是不要黨的領導，對下是鎮壓群衆。批“二月逆流”要把矛頭對準。但在四川批“二月逆流”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是爲“反復舊”製造輿論。川報“二一一”文章就是最好的證明。一邊在反“二月逆流”，一邊又在不要黨，什麼造反派領導整黨，一邊批“二月逆流”，一邊又在挑動群衆鬥群衆，鎮壓革命群衆，把廣大老師傅打成老保，壞人活躍。你要清隊，他要反“二月逆流”。在四川，反“二月逆流”就是指向群衆，指向解放軍，指向革命幹部。

鬥私批修問題。一些人爲什麼不能很好揭批呢？就是私心雜念作怪，有的說那是矛頭對準群衆，什麼搞人人過關等等。還是唯我正確，無私可鬥。有的有這樣的消極看法：回去還不是挖泥巴……這種精神狀態是很不對頭的。就是私字的表現。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怎麼犯的嘛，你把它總結出來，以後就可以不犯了，這就是提高嘛。鬥私批修的過程貫穿整個學習過程，不是等到鬥私批修階段才鬥。

聽了動員後，我們下來都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人人表態：一定要認真學習中央指示精神，聯繫自己的實際進行鬥私批修。

聯繫武鬥問題批劉、張

1970年5月16日，我在中央學習班四川班重慶團的全團大會上作了鬥私批修發言，我的發言標題是“狠揭狠批個人野心家劉、張煽動群衆武鬥的滔天罪行”。

本來，對于劉、張，我們這一派是堅決要求打倒的，所以批判劉、張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思想壓力，但是學習班要求結合自己的錯誤來批判劉、張，就不得不把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一些錯誤，特別是武鬥方面的錯誤列舉出來，對照劉、張的那些議論進行“鬥私批修”。所以，我在發言中給自己扣上了一些大帽子：

> 我是山城原八一五派的一個主要頭頭之一，我先後當過革聯會常委，工業生產指揮部三人領導小組成員，革聯會作戰司令部司令，文攻武衛總司令部總司令，八一五工總部班長。
>
> 由于我的世界觀沒有得到很好改造，對毛主席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沒有真正解決，在我擔任這些派頭頭的過程中，唱劉、張的調子，學劉、張的樣子，走劉、張的步子，嚴重陷入了資產階級派性，搞武鬥，爭輸贏，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當敗家子，犯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錯誤。

按照學習班的要求，我在發言中說：

> 過去我們山城兩大派殺來殺去，使重慶的武鬥成爲全國之冠，到底我們兩派之間有什麼仇，又有什麼恨？憶舊社會，我們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思新社會的甜，我們都是在毛澤東思想撫育下成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及其四川代理人李、廖、任的反，我們都是風雨同舟的患難戰友，我們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是劉、張這兩個個人野心家，爲了在四

川建立劉家黨，劉家政府，劉家軍隊，劉氏一統天下的獨立王國，把我們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互相殘殺。現在我們明白了，上了劉、張的當，中了劉、張的毒，成了劉、張屠刀下的冤鬼，我們兩派都是劉、張的受害者。

在這個發言中，我按四個方面進行了檢查：

一、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綫，違背“紅十條”、“紅五條”的革命原則，犯了方向路綫的錯誤；

二、熱衷于武鬥，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當了敗家子；

三、插手專縣武鬥，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綫；

四、從劉、張和自己的錯誤中吸取的教訓和今後的努力方向。

我在檢討武鬥問題時，把對劉、張的批判聯繫起來，我說：

劉、張製造了“武鬥有理論”，“武鬥有功論”，“武鬥合法論”。我們聽進去了，接過來了。我們大搞武鬥，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辛辛苦苦製造出來的財富，被我們揮霍浪費，化爲灰燼，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正如中央首長“三一五”指示中講的“敗家子”，是的的確確的敗家子。

在這一時期內，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被完全轉移了，無産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完全遭到了破壞，成百上千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衆犧牲了，人民解放軍的指戰員也被打死打傷，全市的工業、商業、交通運輸都遭到嚴重破壞，特別是國防工業破壞最大，嚴重影響了援越物資及三綫建設。而黨內走資派劉、鄧、李、任及其一小撮同夥，則避開了革命群衆對他們的批判鬥爭，其中相當數量的人，在劉、張“唯觀點論”的網羅下，喬裝打扮成“革命幹部”，有些赤膊上陣，有些直接指揮，有些則居

于幕後，策劃于密室，表現于群衆，使武鬥一再急劇升級和反復。

總之，當時對發言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把自己臭罵一通，罵得越狠越好，不然過不了關。同時還要罵與自己有關的人，不管罪名是否確實，先把大帽子戴了再說。當時的說法叫做“亮私不怕醜，鬥私不怕痛”，“七鬥八鬥，把你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

我又從四個方面檢討了武鬥中的問題：

一、亂用職權，調動一派群衆去鎮壓另一派群衆；
二、革聯會“七七”會議和武鬥升級中所犯錯誤；
三、“八二五”會議帶來的更大錯誤；
四、私設電臺指揮武鬥的罪行。

正在學習高潮中，我們學習班突然通知搬到民族學院。

中央民族學院又是另一番景象，那裏果樹不少，有核桃，柿子，離食堂不遠還有個仙桃園。李華權去摘了核桃，我去摘了柿子。但柿子還是硬的，咬一口，澀得很。我摘了幾個柿子放在桌子抽屜裏，過了幾天等它變軟了再吃，味道還真不錯。李華權摘的核桃好吃倒是好吃，但他的手却變得黑黃黑黃的，洗也洗不乾淨。

我在中央學習班的一個“嚴重政治錯誤”

在中央學習班，我意外出了一件事：讀報讀錯了一句話，把“美帝必敗”讀成了“美帝必勝”。

1970 年 5 月 20 日，毛澤東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當時稱作“五二〇聲明”。那幾天裏，我們天天學習，談感想談體會，讀報也主要是反復讀這方面的社論和報道。時間長了，大家都感到有些疲乏了，但也沒人敢說，只是表現得不再那麼嚴肅認真了。

5 月 27 日，我們小組在學習中讀報時，就發生了幾起讀錯字

■ 1970 年中央學習班期間在天安門留影，前排左 1 楊大渝，左 2 俞子文，後排左 1 陽增泰，左 2 楊國民。

的事，而我幷沒有重視這個問題，輪到我讀報時，我先用很不標準的普通話讀，大家聽得發笑，我見他們笑，就不用這種半生不熟的普通話讀了，換成四川話讀，這樣讀起來也順口一些，快一些。但沒想到這一快就出了錯，把報紙上一篇文章中的“美帝必敗”讀成了“美帝必勝”。這一下可不得了，犯了嚴重政治錯誤。

我一讀出口就發現錯了，馬上認錯，幷且當場就受到了大家的批評，要我好好認識。反到底派的代表自然就更是抓住不放，上綱上綫，要對我進行嚴肅批判。我自己也知道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下來認真想了如何作好檢查的問題。

在 5 月 29 號的“天天讀”時間裏，我就向大家做了沉痛的檢查。我先念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有關有了錯誤要勇于改正的語錄，然後說：

“我今天藉‘天天讀’這個機會，向同志們再次檢查自己的錯誤，幷請同志們幫助和監督我改正錯誤。我所犯的讀報念錯文章的錯誤，看起來是讀報中的錯誤，實際上是我平時稀稀拉拉，華而不實的作風所造成的錯誤，我這種不老實，不認真，學習態度不嚴肅的問題，不是一個字念錯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什麼立場上的問題，當前全世界人民都在學習和貫徹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的莊嚴號召，掀起一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新高潮，在這種形勢下，我却把‘美帝必敗’念成了相反的意思，這是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這個錯誤對我來說是個沉痛的教訓，我再次向同志們認錯，再次向同志們作檢查，請同志們認真地批評我，幫助我。我一定要從這個錯誤中吸取深刻的教訓，今後決不隨便開玩笑，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去掉自己身上的壞作風，改造自己頭腦中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爲人民立新功。”

雖然有人還想藉此大做文章，但畢竟事情太小了，批判、檢討過後，也就算了結了。因爲當時的大方向畢竟是批劉、張。

吳法憲、邱會作接見學習班領導小組

這次中央學習班結束之前，1970 年 9 月 17 號之後的一天，學習班領導小組向大家傳達了中央首長吳法憲、邱會作在 9 月 17 號晚上對四川班領導小組所作的指示。當時我們幷不知道吳法憲和邱會作已經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回北京後還被要求繼續檢查交代問題。當時還只把他們當作是中央政治局的首長。

在我筆記本上記錄的吳法憲講話的要點有：

好久不見了。你們現在快要回去了。昨天晚上政治局開會，把四川班的情況向總理和中央常委彙報了一下，總理要我們三個人：會作、登奎和我，找你們領導小組見一個面，有些問題向你們傳達一下。登奎同志還在國務院開會，我和

會作先來。你們有什麼問題先談一談。

（當說到家裏準備歡迎時）家裏準備歡迎一下，鼓勵一下。到成都後，是不是省核心小組和軍區同志先見面講講話，沿途車站不要組織大規模的歡迎，可不要浪費人力呀！主要是回到本地區，本單位，彙報在毛主席身邊，在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黨中央所在地，學習七個月的成績。

（當彙報到江津學員李向陽翻墻出去到電報大樓無理取鬧時）江津這十個人，還有九個人，對這九個人，你們作些教育、爭取工作就對了。十個人能量很大，搞不好，回到江津給你鬧翻了，是不是派性很大。起干擾作用的，留下來再學習一下。留下再學習一下。十個人回去一鬧，頭頭一鬧，就給你鬧亂了。現在還有幾天時間，對這九個人能不能做些教育工作，把李向陽孤立起來，看能不能解決，你們好好考慮一下。不能解決就繼續留在北京學習。

四川班6000人在北京學習七個月了。昨天把你們的報告向政治局扼要地講了一下。總理和政治局常委的同志，要我們找你們說一說，中央對四川班很關心。

第一，要好好學習九屆二中全會公報，這次全會是個團結的大會。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講了話，全體同志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總結了九大以來的經驗，要繼續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項任務，提出四個方面的任務：一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提倡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二是繼續深入搞好鬥批改，搞好教育革命，貫徹一打三反的指示；三是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搞好戰備工作不要鬆勁；四是搞好整黨建黨工作，把黨整好，把組織整頓好，加强黨性，克服派性。克服多中心論。

憲法草案，按照中央通知的規定，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把意見集中起來，送到中央學習班然後上報。憲法草案不要郵寄，不要搞到外面去了，不准張貼，不准登報，公報上沒有提憲法，防止泄密。要認真討論，提出意見，送到

學習班辦公室。你們發了多少本，討論過後都要收回來。

第二個問題，留人問題。你們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學習任務。中央考慮到四川的局勢，同意你們23日以後開始回去。這裏面有些人思想問題沒有解決的，帶着派性回去會影響四川的大聯合，影響團結。你們討論一下，留在北京再學習一個時期，再學習一個時期沒有壞處嘛，學好了再回去。這是中央對你們的關心。留什麼人，你們討論一下。江津的十個人，回去給你起壞作用。要有利于四川局勢的穩定，搞好大聯合，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把大三綫搞得更好。你們再商量一下，打電話給四川省革委看怎麼樣。

第三，劉、張留北京學習，中央是同意的。你們繼續幫助他提高認識，有些問題不要急，有些思想問題急不得。留在北京就不干擾你們了嘛，就不能挂鈎了嘛。留在北京安心學習就好了。

第四，回去以後還要好好做工作，不是學習一下就一勞永逸了。要回去好好起作用，傳達毛主席的聲音，傳達黨中央的指示，按中央一二·二五批示，真正把四川搞好。毛主席說“四川很有希望”，不要辜負毛主席的希望，不要辜負林副主席的希望，在學習班提高了毛澤東思想水平，提高了階級鬥爭、路綫鬥爭和繼續革命的覺悟，增强了團結。回去後要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搞好四川的革命、生産、三綫建設，省革委要安排一下，在省裏怎麼做，下邊怎麼做，一方面要這些同志起好作用，宣傳毛澤東思想，同時也要給以幫助，給以支持，問題解決了，老揪老鬥不好，不要把矛頭指向群衆，要促進團結，促進聯合，要繼續批判劉、張，也要繼續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嘛。

第五，你們要求中央接見。中央已經接見了，在體育館，四月十六號，接見了二萬多人，總理講了話，康老講了話，黃總長講了話。現在沒有什麼新的問題講了。九屆二中全會公報上都講了。現在中央工作很多。就不接見了。你們回去向大家解釋一下。

第六，後進單位問題要繼續解決。用毛澤東思想解決問題。你們還有七個後進單位：江津，溫江，宜賓，永榮礦務局，萬縣市……要繼續幫助後進單位解決問題。

第七點，028[1] 的六個人，可以留在北京，交給我們空軍處理。

第八點，你們報告放兩天假，可以，但要做好思想工作。要有計劃，有組織地搞，不要上街出亂子，不要說得很好，臨走前出亂子就不好了。李向陽問題，你們寫了報告，等批了再說。他還有九個人，叫他給中央寫信嘛，怕什麼？中央也不會聽他的。不要一走就出問題。要有始有終。你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帶回去發揚起來。這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意見，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話可能多講了幾句，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接着，邱會作也簡單講了一下：

昨天吳副總長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彙報了，政治局委托法憲同志來向四川班領導傳達一下中央的決定，總理的指示。一個工作要抓緊。帶什麼東西回去呢？剛才法憲同志講了，要帶毛澤東思想，帶林副主席指示回去，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大家可能已經學了，要好好學一下，把毛主席的聲音，把林副主席指示帶回去。我們就有了共同的語言。這就是精神面貌。你們學習幾個月，是在毛主席身邊學習回去的。現在四川形勢很好，四川農業很好，工業也好了，成昆鐵路通車，四川變樣了。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領導下，一日千

[1] 指駐成都的空字 028 部隊，即解放軍第十三航空學校，1967 年 5 月改稱第四航空機務學校。此時已由中央軍委決定撤銷。該校群衆組織紅色造反總團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屬同一觀點，“二月鎮反”中曾遭鎮壓，1967 年 5 月“紅十條”下達後平反。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建立後，抽調了 028 紅總數十人擔任辦事機構工作人員。

里。你們不學習好，回去就對不上口了。不把思想好好統一統一，你們回去講什麼？建議大家好好討論討論，要有共同的語言，搞那麼幾條，回去都那麼講。向領導彙報，向同志們宣傳。你們批判劉、張，做得很好，成績很大。主要是學習了毛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抓住了批判劉、張。大家思想都提高了。從四川來的電報看，批判劉、張，好多地方形勢就變好了。那些不回去的人，你們要過細做思想工作。從大局作想。有的人晚點回去沒有關係。誰早誰晚回去，你們要慎重研究，向省革委請示一下。你們先回去一兩個人，電話上說不清楚，組織幾個人先回去彙報一下，再定下來。有些人思想還不通，還調皮搗蛋，回四川他又翻了，你們也不要低估了。中央允許你們留人，是留在這裏，還是留在成都學習，主動權在你們手裏了。劉、張不回去，這是中央決定的。留人還要留骨幹，還要留領導，領導他們學習。我就補充這兩點意見。

李向陽這樣的人，在北京學習班還敢做這樣的事，說明思想工作是很重要的。

家在北京的，可以回去看看。請假出去，可以組織起來集體帶出去。

吳法憲出去打了電話回來，又說：

登奎同志還在開會，講的內容電話裏給他說了。他同意。邱副總長的指示很重要。帶什麼東西回去，要帶毛澤東思想回去，高高興興地回去。6000人回去搞好了，要起很好的作用。留不留人的問題，總理還是爲你們着想，有困難，中央幫你們解決，有包袱，中央幫你們背。你們要領會這個意思。劉、張問題，要好好改造世界觀，中央還是一批二保三幫四看。

邱會作又說了幾句：

學習班是一支生力軍。回去會起很大作用，檢查好的。讓人家回去。檢查不好的，留下。人總是可以教育好的嘛。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他，改造他。

國慶節要到了。中央要求學習班的人員必須在國慶節前回去。學習班給我們放了三天假，放假之前，先把我們用車拉到政治學院外面，讓我們坐地鐵到前門，體會一下地鐵這個首都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成就。

三天假期中規定不准個人單獨行動，必須以小組爲單位一起外出活動。大家藉此機會分別去采購了一些家裏人托買的東西，本來我們想去故宮看看，看那過去的皇宮到底是什麽樣子。但故宮沒有開放，大門緊閉，只能從文化宮這邊隔着門縫看了一下，什麽新鮮東西也看不到，除了房子就是院壩。有什麽好看的?

王府井的商店裏確實物資豐富，什麽東西都有賣的。我除了采購廠裏人托我買的東西外，還給我妻子買了治血壓高頭昏的藥，買了 1 斤北京甜菜做的冰糖，看到有重慶人沒見過的圓茄子，我也買了一個帶回去讓家裏人看個新鮮。我還在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民間草藥單方驗方的書，以後有點什麽小病可以自己按驗方去抓藥。

在重慶大作“鬥私批修”宣講

回到重慶後，市革命委員會又組織了兩派的主要頭頭到八區三縣作“鬥私批修”巡迴講演。我也被安排參加了這一活動。

10 月 14 日，按照市革委的安排，我去爲重慶正在召開的三代會（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向全體代表作了一次發言，發言題目是：“從山城武鬥看劉、張挑動群衆鬥群衆、營造獨立王國的滔天罪行”，內容也就是在中央學習班的那些發言，稍作了一些修改。我首先作了這樣的自我介紹：

我叫陽增泰，是國營重慶朝陽電機廠的工人，是劉、張分裂群衆，挑動山城兩派群衆武鬥時，原 8·15 派的總司令。

在運動的中後期，我頑固的站在資產階級派性立場上，爲維護自己小山頭的利益，爭輸贏，爭正確，爭“左”派，圍繞着劉、張挑動群衆鬥群衆的指揮棒轉，大搞武鬥，壓了“反到底”的廣大群衆，背離了鬥爭大方向，“辛辛苦苦搞了兩年破壞”，犯了嚴重錯誤。偉大領袖毛主席叫我們到北京學習，又一次教育和挽救了我，使我獲得了新生。

接下來，我按照上邊定下的調子，“從原來八一五派怎樣上劉、張的當，大搞武鬥的事實，來憤怒控訴劉、張挑動群衆鬥群衆，在山城挑起武鬥的滔天罪行”。我講了三個部分——

（一）用一個“亂”字，把兩派群衆掀下武鬥的深淵

（二）鼓動一個“打”字，把群衆推上爲劉氏營造獨立王國的武鬥戰車

（三）劉、張用一個“權”字，鼓動兩派爭核心，把武鬥打下去

作爲“鬥私批修”的發言，當然必須把自己也聯繫進去臭罵一通，還得譴責自己背後的“黑手”，我們八一五派是堅決打劉、張的，當然不好說劉、張是我們背後的“黑手”，就只好按照在中央學習班時候的說法，把支持八一五派的重慶工業學院夏部長夏德科說成我背後的“黑手”，并按當時硬加在他頭上的帽子稱他爲“日僞小隊長”，另外還提到一個“黑手”是五冶的中層幹部胡胖子（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我在這個發言中說：

我們在武鬥升級過程中，受劉、張的挑動，指揮了8月12—14日攻打嘉陵廠的武鬥，8月17日又組織了有近萬人參加，電臺指揮的大型武鬥。……我們這個錯誤主張，得到兩個政曆不清的武鬥參謀夏××、胡××的大力贊賞，他們還積極獻策，親自觀察地形，繪製作戰地圖，擔任前綫指揮。當我們在攻打“航鋒”的時候，遭到潘家坪制高點的火

力封鎖，黑參謀日偽小隊長夏 ×× 提出："要打下'航鋒'，必須先打潘家坪。"煽動我們把武鬥打大。我們上了他們的當，同意由他當打"航鋒"的前綫指揮，由另一個黑參謀胡 ×× 帶走大部分武鬥人員，指揮攻打潘家坪，使用電臺指揮，出動坦克開路，用四聯高射機槍猛攻，打得很殘酷，雙方傷亡上千人。特別是在爆炸"航鋒"一座大樓的時候，樓上還有不少的人，聽說我們要炸大樓，就哭喊起來，向外呼救"不要炸樓"，但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日偽小隊長夏 ×× 仍然命令炸樓，我們的階級兄弟活活地被他殺害了，真是何等凶殘，罪該萬死！

其實，炸河運校（"航鋒"）大樓的情況我并不瞭解，都是按照中央學習班裏那些無限上綱的揭發批判發言來講的。說夏部長不顧有人呼救仍然命令炸樓，完全是不真實的編造。

我的這個發言裏歸納了"劉、張指揮、挑動兩派群衆武鬥在重慶造成的惡果是：

（1）干擾和破壞了毛主席的偉大部署；
（2）削弱和破壞了無産階級專政；
（3）破壞了工農業生産和祖國大後方的三綫建設。

其中我聯繫自己的錯誤時講到：

我們在劉、張的挑動和毒害下，就浪費了國家不少資財，單是 67 年 7 月 21 日就從長江廠提走 70 多萬發子彈，可供一個師的部隊使用一年。8 月上旬又從長安廠提走 12.7 高機 10 挺，67 年 9 月 13 日我們一次又在長風廠提走陸用重機槍五十挺，67 年 7 月下旬，我一次批條子，就從水運公司駁船上動用了七十五噸大米，運到沙坪壩師專和原團市委，供武鬥揮霍，這些大米可供五千人的工廠吃一個月，可以支援七、八個受災的國家。我們爲了武鬥時能識別標記，分清己方和

對方，動用了重紡的生產布匹，製作了五千套軍裝（武鬥服）。67年8、9月，我們又在二鋼廠、嘉陵廠、朝陽等廠，動用國產設備和材料，生產“815”式衝鋒槍，破壞了國防工業生產。并在全市範圍內，動用大量汽車，爲武鬥服務，影響和破壞了國家的運輸和生產任務的完成。

有的八一五派的朋友想不通，我們堅持打倒劉、張的，在劉、張被打倒以後應該是有功之臣，怎麽還要叫我們做檢討？我沒有想得那麽多，反正覺得自己參加搞武鬥就是錯了，應該檢討，還必須把劉、張聯繫到自己身上來檢討。我在這個發言中最後講到：

> 戳穿來看，劉、張所謂武鬥正義非正義也好，或是有理有功、無理有罪也好，都是以劉、張爲標準的，都是以是否有利于營造劉氏獨立王國爲標準的，是爲劉、張和階級敵人開脫罪責的。我們也講自己武鬥有理、有功，總是說自己是自衛，別人是進攻，一談武鬥，就談誰先打第一槍，實際上是按山頭的利益，接過劉、張的調子，來爲自己服務的，也是完全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劉、張“武鬥有理有功論”的翻版。讓劉、張反動的“武鬥有理有功論”得以傳播，攪亂了人們的思想，弄得敵我不分，階級兄弟之間互相厮殺，放走了真正的敵人。

我的這個“鬥私批修”報告，還按照市革委的安排，到八區三縣的一些地方去講了幾次。

第十章 隨時代大潮沉浮

無權無勢的大忙人

到八區三縣作鬥私批修報告結束後，我回到廠裏，又幹起了老本行：生產調試度。群衆組織撤銷後，因爲我沒有在任何一級革命委員會中擔任職務，所以不再有過去那樣多的社會活動，旁人看來，我似乎很清閑了。其實，那幾年，我又陷入了另一種忙碌當中。

這種忙碌，就是給文革中結識的朋友們幫忙。

武鬥平息後，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了，群衆組織撤銷了，各方面工作逐漸走上正軌。專縣的朋友來找我的，當然就不再是來要槍要彈要增援了，而是爲了解決一些生產或生活上的問題找我幫忙。

附近農村的、周邊專縣的這些朋友，都是我在文革中結識的造反派頭頭，他們有的人到了重慶，不去找周家瑜、袁金樑這些在革委會裏面“當官”的人，却喜歡來找我，好像是相信我這個無職無權的人更能爲他們說話。

江津縣革命委員會成立過後，他們想建一個氮肥廠，設備都是在重慶訂的，但是，當時各單位都派性嚴重，如果關係不好，即使有錢也不能及時提到貨和拿到相關資料。江津縣革委的副主任李富華就來找到我，請我幫忙疏通關係。

我聽了李富華介紹來意後，告訴他：我現在已經回廠上班，要遵守勞動紀律，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隨便到外面去跑。再說，我在省、市革委會都沒有職務，雖然過去是個派頭頭，但是現在而今眼目下，過去的下屬是不是還買我的賬，也很難說。

我想了想，對他說：“我不能跟你一起去跑，我給你寫個信

怎麽樣?”

他連說要得要得。

沒想到，我這個已經過氣的派頭頭寫的信還起了作用。老李拿去後，就把事情辦成了，順利提回了設備。

那幾年裏，還經常有人跑到我家裏來，要我幫忙解決知青問題,解決落實政策問題,解決這樣那樣的問題。特別是從1972年起，重慶許多單位到專縣去招工，招工指標很少，而盼望招工回城的知青多得很，如果沒有關係，要想被招回城裏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全社會已經是“走後門”拉關係成風了。一些朋友就想到了我與專縣的關係，一定要找我幫忙，幫他們解決在專縣落戶的知青的調工問題。上門找我幫這方面忙的人，幾乎要把門坎踩爛，有的甚至天不亮就來敲我家的門，弄得我全家不得安寧，既影響我家人的休息，也影響我的工作。但是當時知青問題是家家戶戶都面臨的頭等大事，哪個當家長的不爲之操碎了心呢？所以我也理解，能幫上忙的儘量幫忙。

有一次，我在廠門口碰到一個原重大八一五的學生，他是來找熊代富的（當時熊代富在我廠挂職鍛煉)。我跟這個重大學生寒暄了幾句就回家去吃中飯了。

沒想到，過了一會兒，這個重大學生找到我家裏來了。原來他沒有找到熊代富，就順便來向我訴說他想找人幫忙的事。他的女友，是一個中學生，正在長壽縣農村當知青，現在他想爭取把女友調回來。我聽說後，就說我來試試，因爲我跟長壽縣的八一五工分部頭頭方久祥關係很好，方久祥這時是長壽縣革委副主任，我想找到他可能起得到一點作用。我就替這個重大學生寫了封信，讓他拿着去找方久祥。

過了一段時間，我得知那個重大學生的女友調回來了。我爲此感到高興，總算幫人家辦成一件好事。

後來有一次碰到方久祥，我說起給那個重大學生幫忙調知青女友的事，方久祥告訴我，本來因爲那個知青女娃子家庭政審過不了關，很難調出來。是方久祥在政審上替那個女娃子想辦法糊弄過去了，才讓她順利招工回城的。

有位姓周的朋友，過去是做古玩生意的，他家的孩子在雲陽當知青。他通過我的“老挑”（連襟）認識了我，再三托我幫忙。我給雲陽原“11·27”的頭頭黃序松去信，經他溝通，解決了問題。事成之後,那位周老兄到我家來登門致謝,摸出十張“大團結”（當時最大面值的10元鈔票）塞給我。我馬上推回去拒絕了，正色說：“周大哥，你這樣就是門縫裏看人把我看扁了。我是因爲看你是我李大哥的朋友才幫這個忙的,不是來賺錢的。”我這一說，弄得他還十分尷尬，最後千恩萬謝地走了。

在那幾年裏，我曾利用文革中與專縣建立的關係，找過合川、榮昌、大足、江津、永川、巴縣、長壽、內江、雲陽、涪陵、彭水……等專縣的朋友幫忙解決知青調工問題，有的是我寫了信由知青家長自己去跑，有是我親自出馬陪着知青家長或親屬去跑。這樣經我幫忙溝通招回重慶工作的知青有好幾十人。我沒有收過他們一分錢。

難以割斷的派性感情

後來鬧“反復舊”的時候，社會上有很多人來廠裏找我，要我一起寫大字報，我都沒答應。袁金樑他們在解放碑貼大字報鼓吹“反復舊”，把我的名字寫上去了，我都不曉得。

1973年有一天,重慶東風造船廠革委會副主任李光才（八一五派代表）的妻子跑來找我，說李光才因在廠裏洗澡堂與對立派的一人發生口角衝突，那人衝到李光才家裏來找李糾纏，被李光才的兄弟聞訊趕來幫忙，衝突中失手把那人殺死了。李光才兄弟二人都被公安局抓了。她請我幫忙找公安局的兄弟夥疏通關係，爭取把李光才放出來。我就找了水運公司的楊國民、周學良等一起去找重慶市公安局的原八一五派頭頭，名字現在已經記不起了，只記得是一個胖子，我們在市中區一個冷飲店裏見面，談了此事。公安局的朋友說，這事不好辦，因爲廠裏對方那一派鬧得很凶，長航局公檢法也要求處理此案，現在提出放人肯定擱不平。只有等過一段時間，事態平息下來過後再說，相信是會公平處理的。

1974年2月，重慶市革委委員、交通局革委會副主任歐正中與戀人張志霞舉行婚禮，給我發來請帖，并請我爲他們主婚，還要我幫忙在重慶飯店幫他們訂席桌。我對幫這樣的忙當然是十分樂意的。酒席間，大家紛紛向我這個“在野”派頭頭敬酒，使我很是高興，似乎又找到了當頭頭的感覺。

1974年的一天，重慶市一商局原八一五派的李毅力、李一凡和造紙廠的黃樹成來找我，說到五金公司原八一五頭頭之一施世華，全家患病，施世華患了肺病，因單位上是反到底派占絕對優勢，他的治療受到刁難，經濟上很困難。他們要我幫忙找市委財貿部許德，要求他保證讓施世華住院治病，不能扣發工資，對他家屬治病也應按規定報銷，政治上不得施加壓力等等。

我對幫這樣的忙自然認爲是義不容辭的事，就帶着三十幾個人，一起到市委財貿部去找部長許德，并且把許德拉到市委一號樓去找魯大東。沒找到魯大東，大家就纏着許德，一定要他作出答覆。許德起初不知道我是誰，後來得知我就是當年八一兵團的陽增泰，八一五派的武鬥總司令後，態度就軟下來了。最後基本上得到了讓大家滿意的解決。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一些地方又開始出現大字報，我也寫了張大字報，批評現在有的幹部是“燒紅苕幹部”，一要吹，二要捧，三要拍。我拿農村吃燒紅苕來打比方，有過吃燒紅苕經驗的人都知道，從灶孔裏拿出燒熟的紅苕後，要捧在手上，一邊吹着使它降溫以免燙手，一邊拍掉上邊的柴火灰……因爲我這篇大字報說得形象生動，所以給大家很深的印象，此後一些職工就在批評某些幹部時用上了“燒紅苕幹部”這個名詞。

當時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每個單位都要建立一個批林批孔辦公室。我們廠裏也建立了這樣一個機構。我們八一五派的廠革委副主任李成章和廠革委委員胡友年提出，一定要把我安排進廠批林批孔辦公室，否則他們就不參加這方面工作。如果原八一五派的代表不參加這個辦公室工作，顯然這個運動就很難在廠裏正常開展下去。廠黨委經過反復研究後，決定同意我進入批林批孔辦公室，同時按兩派對待原則，也安排了原反到底派的老徐進入辦

公室。後來在一次批林批孔辦公室會議中，我和老徐吵起來，還發展到了打架。鬧得廠裏差點停產。

就在這次批林批孔運動剛剛開展後的 1974 年 4 月，朝陽廠裏還發生了一件事。我們得知一個原對立派的張某把他們那一派一個老師傅的女兒强奸了，那老兩口回老家去，把女兒托給他照顧，結果回來才曉得出了事。女兒的母親來找我們幫忙，我們幾個人商量後，先寫了順口溜大字報揭露這件事，後來廠領導有人告訴我們不要插手這事，說由保衛科去解決，而且這事不是强奸是通奸。但我們不聽，覺得一個未出嫁的姑娘怎麽會跟人通奸呢？反正要藉這個機會壓一下對立派，把他們搞臭，就采用文革初期的做法，把那個張某抓起來，挂上黑牌子在，廠裏批鬥後，押到車上去游街，在化龍橋游了一圈，我親自在車上向群衆宣講此人的犯罪事實，講得聲音都喊啞了。

這樣的事當然引起大批群衆圍觀，鬧得整個化龍橋地區都轟動了。廠裏對立派也不敢爲這樣的事出來說什麽，站在一旁看熱鬧。廠裏生産也因此陷于停産狀態。

廠黨委將情況報告到市委國防工辦，并根據國防工辦的意見貼出了通告，批評我們的做法干擾了批林批孔運動大方向，在批林批孔中脫離黨的領導另搞一套，嚴重影響了抓革命促生産和全廠職工的團結。

我看到這個通告後，仍然不服，又帶了些人到國防工辦去找夏鴻祥部長鬧，夏部長說："你有什麽意見來一個人就是了嘛，來這麽多人幹什麽？"

我說："人少了，我就進不了市委大院了。"

夏部長好言對我進行勸說，我根本不聽，并且聲稱："如果不處理張某，我們就要找人把這個强奸犯騙了！"

最後國防工辦爲了平息事態，與廠黨委研究後，請公安局來人把張某帶走拘押起來了，直到我調離後的第二年才把他放回廠。

“補臺”風波

1971 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後，曾經支持我們八一五派的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副政委謝家祥，被中央劃到林彪那條綫上去，變成批判對象了[1]。這些消息傳來後，我們原八一五派的一些人私下議論紛紛，擔心我們今後的日子不會好過了。一些人就暗中鼓動我，希望我能够爭取以“補臺”的名義進入省或市的革命委員會，讓原八一兵團的代表取得一個席位，在革委會裏好多一個人說話。

1972 年 12 月，我通過長安廠原在八一兵團總部工作的張輝（張明蜀）串聯了一些軍工企業的原八一兵團人員，在市中區枇杷山公園聚會，商量軍工系統的“補臺”問題。大家都認爲，我們八一兵團在重慶文革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群衆組織，但是在省、市革命委員會中却缺少代表，省革委常委中沒有我們的代表，進入市革委任常委的方文正又很快就被專政了，現在如果省、市革

[1]1972 年 7 月 11 日至 22 日，四川省委、成都軍區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四川省委、成都軍區黨委擴大會議總結提綱》上報中央。8 月 9 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聽取四川省委、成都軍區黨委負責人劉興元、李大章等的工作彙報。根據中央指示，四川省委、成都軍區黨委其他領導人嚴政、段君毅、謝正榮、段思英、魯大東、鄭志士、許夢俠、馬玉芳等人于 10 日赴京，會同劉興元、李大章，在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主持下，“經過集體討論，統一了思想認識”後，對《四川省委、成都軍區黨委擴大會議總結提綱》進行了修改。修改後的《總結提綱》稱：“梁興初、陳仁麒、謝家祥同志在黨內第十次路綫鬥爭中，站在了以林彪爲頭子的資産階級司令部一邊，上了林彪的賊船，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綫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四川‘批清’運動中發生的錯誤，主要是梁興初同志造成的。梁興初同志上了賊船，大搞‘以我劃綫’，用‘批清’轉移‘批陳’鬥爭的大方向”。8 月 16 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四川省委、成都軍區黨委擴大會議總結提綱（修改稿）》，并上報毛澤東。毛澤東批示“同意”。17 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72〕31 號文件發出中央批示。（詳見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産黨四川歷史大事記（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397—398 頁。

委會召開常委會，都沒有八一兵團的代表出席了。過去籌建省、市革委會時，就被重大和重鋼的頭頭們把持了八一五派的領導權，八一兵團受到排擠，現在要爭取把八一兵團的代表補進革委會去。大家都認爲陽增泰應該作爲八一兵團的代表“補臺”，商定由朝陽廠的胡友年負責起草一個報告，代表軍工系統的群衆意見，向省、市革委會反映。

這個報告寫好後，交給我看過。打印出來後上報給了四川省革委、成都軍區、重慶警備區、十三軍黨委、重慶市革委及原八一五派進入省、市革委會的主要代表。但是沒有得到理睬。

1973 年，重慶的軍工系統開始調人支援其他地區的三綫建設工廠，先是調貴州都匀、凱裏。我當時就有些心動，很想去。但是有朋友勸我不忙，說貴州那個地方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環境惡劣。

1974 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廠裏又動員支援川西方向的三綫建設工廠。第一批是到青神。我本想去，但聽說我們原來那個黨委書記孔祥國也要去，我就打消了去的念頭，因爲我從文革以來就和他是對立的，不願再在他的手下受夾磨。

1974 年 6 月上旬的一天，我到人交公司頭頭楊大渝家去找他玩，他妻子說楊大渝到省裏開省革委全委會[1]去了。

我回來後，想到省革委正在開全委會，何不趁此機會，請他們參加全委會的委員們在會上把我“補臺”的事情提出來?

我就去找了一些朋友，談了我的想法，得到他們的支持後，我邀請了一些朋友，有財貿的王紹川，橋梁工程處的李正富，城建局的劉伯超、敖翔，供電局的周學東，交通局的歐正中，郵電局的楊忠富等，到枇杷山公園喝茶，商定由李毅力起草一份電文，發給正在參加省革委全委會的楊大渝，并請他轉給周家瑜、陳萬明等，請他們在會上串聯原八一五派代表和一些專縣代表，提出我的“補臺”問題，電文內容大意是：我山城造反派有影響的頭

[1] 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于 1974 年 6 月 21 日至 27 日召開第八次全體會議，研究批林批孔有關問題。

頭陽增泰，因受梁、藍迫害，一直未能進入各級革委會，歷史證明陽沒有問題。山城革命群衆强烈要求解决陽的補臺問題。請在全委會上提出爲謝。在電文後署名的有王紹川、李毅力、施世華、周學東、劉伯超、敖翔、歐正中、楊忠富等。

電文中所說“受梁、藍迫害”，是因爲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成都軍區的梁興初和已經調到貴州的藍亦農相繼被中央認定爲上了“林彪賊船”的人，成了批判對象，把我未能進入省、市革委會的原因歸之于他們，這樣才好在政治上找到理由。

電文起草好後，由李正富交給郵電楊忠富發出。錢是李正富付的。我給錢給他，他堅决不要。

這時，我妻子蕭華勛再三催促我打報告調新廠，我通過瞭解新廠情况，也覺得不錯，便决定如果這次“補臺”不成，就堅决要求調新廠。

6月底，聽說參加省革委全委會的人都回來了。一天，我去問劉伯超見到楊大渝沒有，他說他去找了幾次都還沒有找到。我說你繼續找（他因患肝炎沒有上班，時間上比較自由）。

第二天晚上，我聽劉伯超說還沒找到楊大渝，便和他一起去找王紹川，王紹川他們原財貿八一五總部的印仁祥也是省革委委員。王紹川告訴我，他聽印仁祥回來說，有關我“補臺”的問題，在全委會上沒有得到解决。具體情况他也不清楚。

這時劉伯超搶着對王紹川說：“老陽要想調走！”

王紹川問：“調到哪裏去？”

我說：“到仁壽新廠去支援三綫。”

王紹川說：“那怎麽行呢？你是重慶有影響的人物，你怎麽能調走呢？”

我說：“補臺問題解决不了，我肯定要調走。”

王紹川說：“還是再想想辦法嘛。”

我們就研究，請楊大渝他們在給原八一五派代表傳達省革委全委會精神時，再提出這個問題來，讓大家幫忙呼籲一下。

6月28日中午，我又和王紹川、劉伯超一起到謝家灣建設廠職工貿易公司倉庫，去找到陳定富，他把我們請到他家裏。我們

談了來意後，他找人去把丁方富等幾個人找來，我們商定：分頭通知各系統的原八一五頭頭，于後天（星期天）到這裏來開會，會議內容一個是由楊大渝、印仁祥傳達省革委全委會精神，第二是商量提出解決我的“補臺”問題。會議地點由丁方富負責解決，中午吃飯由陳定富安排，楊大渝由劉伯超負責通知，印仁祥由王紹川負責通知，其他軍工系統的頭頭由我回去找胡瑞明通知，我回廠後又找了李正富，要他負責通知歐正中、周學東、申平、李鐵嘴等人，要大家互相串一下，準時到會。

第二天一早，化龍橋華村中學的宋君强老師（原八一五派化龍橋地區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到家裏來找到我，要我馬上跟他到江津去一趟。他說，昨晚他大哥來告訴他，市財貿校明天要到江津去招生，其中有一個是指定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額，去招生的人又是他大哥的親戚。宋老師一定要我同他一道去江津走一趟，幫他找些關係，爭取這一次把他大哥在那裏當知青的小孩調出來。

我說：“哎呀，不得行了，我已經定了要到謝家灣參加一個會。”我把情況給他講了。

他着急地說：“錯過了這個機會，我侄兒可能就調不出來了！”他又說：“他們開會商量你‘補臺’的問題，你在場，大家會認爲是你在要官當。你不在場，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可以暢所欲言。你在那裏，人家有不同意見還不好提，你不在，才談得出活思想。你不去還好些。”

聽了宋老師的話，我覺得也有道理。確實我也不是想要官當的人，想解決“補臺”，不過是想在政治上有個好的名份，帶一點恢復名譽的意思。

于是我就答應了宋老師的請求，跟他一起到江津去了一趟，幫忙找文革中一派的朋友關係“走後門”，解決他侄子的上調問題。這一去就是幾天。

從江津回來的第二天，我在辦公室碰到胡瑞明，他抱怨說：“你跑到哪裏去了？到處找你找不到。”

我把到江津去的情況簡單說了一下。他說：“快快去找胡友

年。”他拉上我去到胡友年辦公室。胡友年見面自然也把我抱怨了一通。他告訴我，那天開會，因我沒去，其他人說胡友年跟我是一個單位的，瞭解情況，便叫胡友年把有關要求給我“補臺”的事介紹了一下。我問：“那天到會有好多人？”

胡瑞明說：“多得很，辦了幾十桌，吃得好舒服呀！”

胡友年說，那天大家要他起草一個有關要求給我“補臺”的報告，由軍工系統各單位頭頭簽名，報給省、市革委會和朝陽廠革委會。他正在寫，寫好後要我先看一看，定稿後再去打印。

晚上，我到楊大渝家去找到他。他給我談了在省革委全委會的一些情況。他說，收到那份電報後，他給“三高”和陳萬明都看了，可是他們兩個常委不表態，倒是有的反到底派代表聽說此事後還表示很支持。我們自己一派的頭頭不積極，有什麼辦法？他建議我去找“三高”當面談一下，可能好辦些。我說到哪裏去找“三高”？他說“三高”經常都在唐忠明那裏打牌。

本來，我不大想找周家瑜，但爲了解決“補臺”問題，決定還是去找找他。于是，我同楊大渝約好一天晚上去到唐忠明家，結果沒有找到，唐忠明的妻子說不知道他們到哪裏去了。過後我又同原八一五工總部長壽分部的方久祥一起去周家瑜家裏，也沒找到他。我就不想再去找了。

胡友年把報告起草好後交我看，我覺得寫得很全面，沒提什麼修改意見。他就拿去打印了。于 1974 年 7 月 2 日，以“重慶軍工系統 296 廠、256 廠、456 廠、716 廠、289 廠、152 廠、907 廠、313 廠、4303 廠等革命群衆”[1] 的名義，給中共四川省委李大章、重慶市委魯大東、市委二部夏鴻祥和朝陽電機廠黨委寫了一個報告，提出要求“給在‘批清’中受害的陽增泰落實政策”。

他們這個報告中說我在“批清”中受害，顯然是找的一個藉口。

[1]296 廠即建設機床廠，256 廠即空氣壓縮機廠，456 廠即長安機器廠，716 廠即無綫電廠，152 廠即江陵機器廠，907 廠即朝陽電機廠，“313 廠”原文如此，應爲 313 信箱，即前衛儀錶廠，“4303 廠”原文如此（疑爲原件打印時有誤），應爲 3403 廠。

當年四川省在梁興初、謝家祥等人主持下搞的那個“批清”運動(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會)，主要是整的反到底派方面的人，特別是站在反到底派一邊或觀點傾向于反到底派的幹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成都軍區的主要負責人梁興初、陳仁麒、謝家祥被中央認定是“上了林彪的賊船”而倒臺了，在批判梁、陳、謝等人的時候，四川又進行了落實“批清”政策的工作。我在“批清”中其實幷未受到什麽打擊，但是想挽留我在重慶幷把我重新推進革命委員會裏去的朋友們，只好以落實“批清”政策爲藉口，想藉這個機會提出他們的要求。他們在報告中說：

> 衆所周知，陽增泰同志是聞名全川的無産階級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頭頭之一，在山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貢獻的，是立了功勛的。但是在籌建省、市革委會時，上了林彪賊船的藍亦農堅決阻止陽增泰進入革委會，氣勢洶洶對推選陽增泰的群衆代表們說：“你們要堅決推他，我有權不批准！”還以威脅的口氣說：“陽增泰要進入革委會，我這個政委不當了！”而且又進一步指示陽增泰所在的朝陽電機廠軍管會說：“不能讓陽增泰進入廠革委！”自此，在藍亦農推行的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影響下，歷次運動都把陽增泰列爲整的對象，清隊時說他是“武鬥總司令，是山城的壞頭頭”，一打三反時又繼續外查內調他的“罪行”整黨時廣大群衆推薦他爲入黨發展對象，廠軍管會又以“問題沒搞清楚”擱在一邊。梁、陳要陰謀大搞“批清”時，按照梁興初“好人不造反，造反無好人”的反動邏輯，要把“出身好，造反早”的作爲“五一六”清理的黑指示，祖宗三代是貧農，四清時是黨的培養對象的陽增泰同志，被列爲廠的重點清查對象，而且列了專案，待“材料”充分時就要下手。用心何其狠毒，流毒何等之深！
>
> 黨中央早在兩年多以前，就發出了〔72〕14號、31號文件，解決了四川問題，分清了我省兩個階級、兩條路綫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給林彪反黨集團在我省的代理人梁興初、

陳仁麒定下了鐵案，明確了我省清算林彪路綫，清算梁、陳嚴重方向路綫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的戰鬥任務。我省各級黨組織，各級革委會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朝陽廠黨委却至今沒有給陽增泰同志落實政策，個別領導人說：“雖然列了專案，但是沒有進學習班嘛！”對“批清”錯誤不認帳，分不清路綫是非。在這樣的情况下，陽增泰同志背着沉重的包袱，藉朝陽廠有支援新廠的機會，要求到四川仁壽的一個新廠工作，黨委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要求。這個消息傳出以來，激起了社會上的强烈反映，我們軍工系統的廣大群衆不得不提出我們的要求和看法：

一、這不是陽增泰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要不要執行中央〔72〕14號和31號文件的問題。

我們認爲，同林賊在四川的代理人梁、陳的鬥爭，就是同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組成部分，是兩個司令部在四川鬥爭的反映。對梁、陳的罪行揭不揭，對梁、陳的錯誤路綫批不批，肅不肅清其流毒，是在兩條路綫鬥爭中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態度問題。朝陽廠黨委至今日，不否認“批清”時整陽增泰同志的錯誤，不給陽增泰等一大批同志落實政策，是他們是非不清，對黨的工作不負責任的表現。我們希望省、市委領導責成朝陽廠黨委，認清梁、陳“批清”錯誤的嚴重性、危害性和惡果，堅决以行動糾正“批清”錯誤，不留尾巴，認真落實黨的政策。

二、對陽增泰同志的問題，就是對待重慶文化大革命怎樣認識的問題。

《人民日報》社論《再批“克己復禮”》中指出：“批判林彪的‘克己復禮’，聯繫現實的階級鬥爭、兩條路綫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揭發批判林彪及其死黨陰謀復辟的罪行，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因此，揭發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清查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活動，回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動思潮，就是批林批孔

的大方向。”爲了堅持這個大方向，對山城文化大革命中，一個上百萬人的群衆組織重要頭頭陽增泰的問題，必須有個明確的回答：他帶頭起來造劉少奇黑司令部的反，被打成反黨分子，是對還是不對？在十次路綫鬥爭中，由于不聽梁興初、藍亦農的話，受到他們的打擊迫害，是應該支持陽增泰的革命行動，還是至今穩起，默認梁、藍的反動路綫？對陽增泰同志所代表的百多萬革命群衆，到底怎麼看，他們積極參加山城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還是不好？我們認爲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應該用行動來回答。不聯繫正確對待陽增泰同志的問題，就很難說明是正確對待了山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抓住林賊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梁、陳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綫，反對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極右實質。

我們經過調查和瞭解，認爲陽增泰同志家庭出身好，本人歷史清白。自一九五五年進朝陽廠以來，工作一貫積極，多次受到領導的表揚，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不僅沒有問題，而且是對山城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好同志。打擊這樣一個同志，就是打擊一大片群衆，打擊和否定了山城文化大革命，從路綫上來看，這是什麼問題，不是很清楚嗎？

我們還要提請首長們注意，今年四月份，在批林批孔辦公室會議上，由于陽增泰同志堅持正義和黨的政策，被人拳打脚踢，一個廠黨委主要領導在場并不制止，公然讓打人者大罵陽增泰同志是“壞人”，叫嚷說：“老子打壞人，該打！”市委二部劉登寺和肖震全兩同志來廠調查，也認爲問題屬實。陽增泰同志又挨打受氣，但是不了了之，至今無人問津。如再不給陽增泰同志落實政策，顯然會造成更嚴重的惡果。

爲對黨和革命負責，爲把我市批林批孔引向深入，我們要求：

一、省、市委責成朝陽電機廠黨委認真地給陽增泰同志落實政策，對“批清”時迫害陽增泰同志的錯誤，按省委落實政策的標準，恢復名譽，安排適當工作，銷毀“批清”時

的材料，肅清梁、陳路綫的流毒。

二、我們要求將陽增泰同志補進省或市革委會。

王洪文同志在修改黨章報告中指出：“我們要按照毛主席關于無産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着重從工人、貧下中農選拔優秀分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陽增泰同志是從工人中提拔的調度員，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一個在全川有影響的積極分子，廣大群衆對他十分信任，堅决擁護他進省、市革委。因此，我們再次明確地代表軍工系統廣大群衆反映這一强烈要求，請省、市委審查爲盼。

打印好以後，胡友年交給我一些，我就在7月13號分別寄給了省革委李大章、市革委魯大東、市國防工辦夏鴻祥，以及軍工系統各大廠的原八一五頭頭：建設廠丁方富，長江電工廠蒲海豐，空壓廠姚安民，巴山儀錶廠王宗權，無綫電廠劉德富，嘉陵廠蘭進先，江陵廠李澤夫（幷請他轉一份給前衛廠“麻哥”李繼保），長安廠朱顯萬，望江廠羅文俊，3403廠馮國璉，平山機械廠蕭光啓，紅光廠關景全，朝陽廠則交給廠黨委段玉林、王登鵬和廠革委胡瑞明。另外，我還請胡瑞明到廠傳達室外面墻上張貼，看看我們廠裏有什麽反應。

報告寄出去了，也貼出去了，但是沒什麽反響。

幾經反復終于决心調走

1974年三季度，廠黨委又宣布四機部下達了支援四川仁壽630廠的任務。那個廠是在仁壽縣借田區回水公社那個地方的三綫廠（後劃歸成都雙流）。該廠處于仁壽、雙流、彭山三縣交界處的山裏，離黃龍溪不足2公里，離成都50公里。是由北京761廠包建的，廠名是國營成都電視設備廠，代號630廠。專門生産電視臺所用的設備和差轉機、軍用電視、工業電視、醫用電視等。

我妻子蕭華勛“旁觀者清”，認爲我那個“補臺”問題根本沒有希望，她很不願意看到我再陷入那些派性矛盾中去，一再建

議我調新廠，離開重慶這個是非之地。

我這時也想，我在重慶沒有當任何一級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已經不再是群衆組織頭頭，但是平時來找我的人仍然絡繹不絕，雖然有的幷不是屬于派性方面的事，但別人也會看成是我還在搞派性活動。而從現在的形勢來看，再搞派性活動已經不允許了，如果還不收手，今後會有什麽結果就很難說。當時還有人到專縣去，打着我的旗號去找關係辦知青調動、采購副食品、搞材料、搞配件等等，事後我才知道。這樣下去，萬一哪天捅出什麽漏子來，栽到我的頭上，怎麽說得清楚?

加上找我的人多了，客來客往，經濟上也受不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家裏一下子來了以申平爲首的十幾個客人，我請他們吃午飯。當時每人每月定量供應只有半斤猪肉，我家五口人，五張肉票兩斤半肉，我全部買回來，做了幾個菜，招待朋友們。大家在屋裏飲酒吃飯聊得熱鬧時，我那三個娃娃聞到肉香，口水長流，又不准他們進屋來，他們就在屋外窗子下面一齊呼口號：

“我們要吃‘嘎嘎’！”

四川人都把肉叫作“嘎嘎”。我的朋友們聽了，都笑道：“你這幾個娃兒還繼承了你的造反精神呢！”

不當家不知鹽米貴。我家人來人往這麽多，經濟上帶來的困難，我妻子蕭華勛比我更清楚。因此她竭力建議我調離。我想，也好，還是趁這個機會走了好。

聽說 630 廠來重慶動員支援三綫的人就住在我廠附近的紅岩公寓，妻子就陪同我去找了他們，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叫陳振華的女幹部。她十分熱情地給我們介紹了新廠的情况，歡迎我們去。我如實向她說，我是重慶一派群衆組織的頭頭，當過武鬥司令，沒有進入各級革委會，像我這樣的人你們要不要？她仍然說歡迎。

這樣，我就拿定了主意，回家就寫了請調報告，主動交到廠裏報了名。這次支持三綫建設的名額有 30 名，我得到批准。

我要調離重慶的消息馬上就傳到了社會上。我們這一派的許多人都不理解，都想挽留我。有的以爲我是沒有當到官才要走。我就勸他們，說我對當官幷沒有興趣，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再像前

幾年那樣搞了，你看鄧小平都出來了，本來是打倒對象的第二號走資派，他都出來了，以後肯定會有變化，同時，現在需要的是發展生產。

特別是幾個經常和我有來往的和我們廠的朋友更是爲我抱不平，因爲我曾經把郝子義處長給我談的情況給他們講過，他們認爲我太冤枉。他們竭力鼓動我要爭取落實政策，以“補臺”的名義進入省或市的革命委員會。有人提出，又像聲援施世華那樣鬧一下，到市委國防工辦去刷標語，有人甚至要去找紙墨，我說這樣不行，這樣一鬧，搞得不好，什麽結果也沒有，反而會影響了我支援三綫廠的事。但是又有朋友勸我說，這樣鬧一下，即使不能實現“補臺”的願望，至少也能讓上邊知道你不是孤立的，是有群衆擁護的，今後到了新廠也不敢小看你，不敢隨便整你。

經過他們一再勸說，我也有些心動了，覺得如果能爭取“補臺”，也算是在政治上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不然，難免不會讓人覺得：你這樣有名的造反派代表人物，怎麽在各級革命委員會裏都沒有安排一個位子？是不是真有什麽問題呀？

我不再反對了，幾個朋友就開始行動。一天上午，由劉伯超約了歐正中等一二十個人，拿上李毅力起草的標語，跑到市委國防工辦去刷了些“把陽增泰調離山城是鎮壓山城造反派的信號”之類標語，鬧了一陣，下午又跑到我們廠裏來。我帶他們去找廠領導，領導們正在開會，他們一去了，會也開不成了。他們直接就向廠領導提出：爲什麽要把陽增泰調走？廠領導回答是陽增泰本人自願報名的。他們說：這是陰謀，是要迫害山城造反派！陽增泰是山城響噹噹的革命造反派頭頭，要把他調走，我們造反派堅決不答應！……

總之七嘴八舌地糾纏了廠領導一陣。我不便留在那裏，讓人覺得是我在煽動群衆鬧事，只聽了幾句就走開了。

市委國防工辦爲此派了組織處長楊忠波到朝陽廠來，找了廠黨委瞭解情況，然後又找我個別談話，要我收回調離報告，不要走。

我說：“我又不是什麽革委會的委員，沒有工作上的影響，爲什麽不可以走？”

楊處長說："你是有影響的一派頭頭，這樣走，影響不好。"

我說："那既然你們覺得我不走好，爲什麽不解決我的'補臺'問題呢？"

楊處長說："這個問題，不是說解決就馬上可以解決的。你可以先在車間當中幹。"

我說："當幹部，我組織問題都沒有解決，怎麽好當？"

他說："這個問題你不要着急，組織上會考慮的。"

廠黨委段書記也找我談話，說你還是不走好。談到"補臺"問題，他說："這個問題適當時機會解決的。不過我個人認爲，派性補臺沒什麽意思，還是正式提幹更好，你可以先到機加車間當主任。"

我說："我的組織問題沒有解決，當幹部也不好工作呀！"

他說："今年之內就可以給你解決。"

隨後，崔廠長也找我談話，內容也是這些意思。

有一天，熊代富回到廠裏來（他是市革委副主任，在我們廠裏入了黨，提爲團市委書記，市委常委，經常帶市委工作組到一些"老大難"單位去做整頓工作），他也勸我不要走，他說，建院的沈志清，重大的黃順義，到外地過後都想回來。重慶畢竟老戰友多，有什麽事情大家還可以互相幫忙。

又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袁金樑，他也對我說："老熊跟你講了嗎？還是不要走，大家一起在重慶好好幹，繼續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

熊代富和袁金樑都是重慶市革委的副主任，都在市裏面當官，他們挽留我，但是却對我的"補臺"問題起不到什麽實際的作用。因此他們的話，對我沒有多大的影響。

我的事情很快就在廠裏傳開了。衆說紛紜，各種意見都有。我到底是走還是不走？搞得我自己也拿不主意了，思想鬥爭十分激烈。

一天，我們科的王培榮科長（黨支部書記），他妻子張安珍是我一起進廠的同班同學。他推心置腹對我說：

"你走好還是不走好？我看還是走好。你這些幫你鬧的派性

朋友，你應該比較瞭解。沒有出事則罷，一旦鬧出什麼事來，往你頭上一推，到時候你也跑不脫了。你如果到新廠，新廠正是用人之際，你拿出你以前的工作勁頭，好好學好好幹，組織問題也會很快解決的，提幹不提幹的事也好解決。如果你留下來不走，今後會發生什麼事就難說了。你那些派性朋友如果鬧出什麼事來，性質就不一樣了……”

王培榮科長這一席話，我聽進去了。

于是，我又跑去找到段書記、崔廠長，要求他們批准我調新廠。他們都不同意，說：“你留下來，有問題慢慢解決。”

我說：“你們不批准我走不行！”

爲了向他們表明我真正想走的決心，我把他們看文件用的眼鏡拿了，說：“你們要眼鏡，就拿批准我離廠的通知來取。”

顯然，他們是怕我不是真心要走，怕萬一批准我走又被說成是打擊迫害我，再惹出什麼麻煩。因此他們都不敢作這個決定。

最後經過幾番爭執，他們知道我是決心要調走了，就對我說，同意我調走，但是提出要求：在我走之前不要告訴我那些派朋友，以免再生事端。我作了保證。

這時我也想通了，決定對“補臺”不再抱希望了，就到新廠去開闢新天地吧。

在新廠開創新局面

1974 年 8 月 25 日，我們朝陽電機廠申請支援新廠得到批准的 30 個職工，在一天之內就辦好了離廠手續。

8 月 26 日，廠裏的朋友以李華權、胡瑞明爲首，在化龍橋合作餐廳包席爲我們餞行。

27 號動身進城後，我會到劉伯超等朋友，向他們辭行，他們一定要我多呆一天，他們要爲我餞行。于是，我只好留下來，他們在重慶飯店辦了兩桌，參加這次餞行的有劉伯超夫婦，宋君强夫婦，申平、蔡明釗、施世華、李一凡、張志華、譚發祥、陳季良、吳法先等，飯後大家還合影留念。

我們是 28 日晚上的火車，29 日到了成都。30 號就到了新廠。9 月 15 號正式上班。本來朝陽廠是通知我們 9 月 15 號到新廠報到的，我們提前到了。

我家被安排住到了三號樓二單元 17 號，兩室一廳，外加厨房一間。家裏用電和自來水都已經裝好，厨房燒天然氣，條件非常好。看到這樣的環境，我們高興得很，從此與燒蜂窩煤的日子告別了。

我們這個新廠區建在山溝裏，廠區中間還有一個元寶山，山上青槲樹、松樹成林，所有職工宿舍、食堂、托兒所、醫院、俱樂部、電影院、游泳池、子弟學校、汽車隊等都在山上，上下班有專用纜車接送。沿途風景不錯，氣候宜人，真是個好地方。

我被安排在廠生産處任調度組長，人稱“總調度”，分管生産調度，還要負責對外加工。我因爲長期在生産調度崗位上工作，到了新廠，很快就熟悉了生産調度環節，工作起來得心應手。每週由我主持召開一次生産調度會，到會的除了各車間生産調度員外，有時車間主任和廠領導也會來參加。有幾次開完調度會後，廠裏的總工程師張富民碰到我，就叫我：“小陽！”向我伸出大拇指，表示對我主持的調度會很滿意。

廠裏的生産綫都是我在抓。生産上哪裏需要突擊一下，哪裏出了啥子問題，應該怎樣解决，我都了如指掌。設備問題，工藝問題，加工問題，材料問題……我都清清楚楚，開會談問題，我就提出如何解决。

在新的環境裏，再沒有文革中造成的派性對立，也沒有其他社會事務的干擾，我工作得十分起勁，我想，還應該再爭取進步，爭取入黨。

我向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爲了表現對黨組織的忠誠老實，我還把當年由重慶市革委印發的我在八區三縣鬥私批修消滅派性大會上的發言材料交給了入黨介紹人李顯恕——我萬萬沒有想到，在後來的“揭批查”運動中，這成了我自己交出去被他們用來整我的重要材料。

時局動蕩引起思想動蕩

1974年底，我在新廠接到重慶長壽縣原八一五派工分部頭頭、縣革委副主任方久祥會同劉伯超夫婦的來信，告訴我，原來反到底派的頭頭汪友根被提爲省委書記了，聽說重慶市也要增補兩名副主任，大家就想到我，但我已經走了，大家對我離開重慶很有意見，不明白我爲什麽一定要走。

看了這封信，我心中又引起了一點波動。我想，我在重慶的時候，“補臺”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怎麽我才走兩三個月，情況就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當初五十四軍郝處長告訴我，他們曾經是想要我和汪友根一起作爲兩派對等代表安排爲四川省革委副主任的，現在汪友根提爲省委書記了，我却什麽也不是……想到這裏，心頭還是有些不服氣。

我就寫了封給原來一派中的頭頭們的信，因爲要發信的地方多，還找蠟紙刻印出來，于1975年1月初分別寄給重慶和江津、永川、大足、銅梁、合川、璧山、營山、江北、榮昌、涪陵、豐都、彭水、鄰水等一些專縣的原來一派中較熟悉的頭頭。有的信是我在1975年1月到重慶出差時寄出去的。信的主要內容是告訴大家，我已經于1974年8月底到仁壽縣103信箱支援三綫建設，在新的單位安定下來了。希望大家有機會到成都出差時，歡迎來我家玩。另外說到我雖然離開了重慶，但是沒有離開四川，如果能有機會補上臺，我還是可以再回重慶。信中還把方久祥來信的主要內容說了一下，希望大家在有機會時幫忙呼籲一下。

我寄出信的有關人員中，有原來認識的合川縣頭頭王治金、果瑞泉。我沒想到，信寄出不久，廠裏開的一次大會上，廠長宣讀了省委有關處理合川縣反革命分子王治金的文件，說王治金和

果瑞泉二人已經被逮捕法辦[1]。這使我十分吃驚。

1975年3月，我被廠裏派到貴州出差，因火車票不好買，就先到重慶再從重慶買票到貴州都勻。這次來回路經重慶時，我抽時間去找了楊大渝，向他打聽有沒有“補臺”方面的消息，他說現在省、市革委會開會根本就不再提“補臺”的事了。我問劉伯超，他則跟我說：“方久祥寫那封信，只是想要你回重慶來，并沒得啥子有關‘補臺’的內部消息。”

他們一封信搞得我心神不安，費心費力發出那麽多信，結果是給我開了一場大玩笑！

從此我就不再對“補臺”的事抱什麽希望，斷了這個念頭了。。

1975年底開始，毛澤東又發起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1976年春節過後，我因手受了傷，在家休息，從重慶朝陽廠來的一個出差同事來看我，給我帶來了原廠裏老朋友胡瑞明、舒斌的信，信中附上了周家瑜、黃廉、袁金樑等人最近印發的傳單，并在信中叮囑我：“但望你靜觀火色，不要輕舉妄動，前車之鑒，望考慮吧！”

周、黃等人的傳單，包括周家瑜1975年12月30日給四川省委的彙報，黃廉1975年12月28日致四川人民和重慶市委的公開信，袁金樑1976年1月8日向重慶市委書記魯大東請示幾個問題的公開信。都是油印傳單，內容大意是——

周家瑜的彙報信中說，1975年11月11日，魯大東、錢敏二書記通知他去，向他傳達省委1975年11號、12號文件，文件中說，最近不少幹部、群衆來信，對鄧興國、楊至誠、周家瑜、黃廉的資產階級派性反映很大，省委常委決定，要他們四人對自從十二個重點企業彙報會議以來所犯的資產階級派性錯誤于一週內作出書面檢查，上報省委。周家瑜認爲這是省、市委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打擊造反派，批派性運動就是右傾翻案風在四川的集中表現。

[1]1974年12月14日，中共四川省委批准逮捕合川反革命分子王治金，江津地區公安局逮捕王治金、果瑞泉。省、地委工作隊到合川協助縣委整頓組織，肅清王治金一夥的影響。王治金、果瑞泉于1977年被判處有期徒刑。

爲此，周家瑜向省委提出兩條建議：

一、收回省委 11、12 號文件，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停止對鄧、楊、周、黃及與他們有同樣遭遇的群衆的揭發批判，采取有效措施挽回影響；

二、召開省、市革委會全委會，學理論，評《水滸》，擺事實，通過辯論鞏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成果，粉碎右傾翻案風。

黃廉的公開信上有些內容跟周家瑜的一樣，也是對省委 1975 年的 11、12 號文件提出指責，另外他還說，華國鋒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當前要批資本主義，批修正主義，批驕傲自滿，批固步自封，而省委却以批派性來取代了中央提出的“四批”。作爲革委會“老中青”三結合中的群衆代表，沒有安排在機關工作，不給他們看文件，整頓機關作風時不讓群衆代表參加，還把他們挂起來批。派別是階級的一翼。批派性是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批林批孔的案，落實犯走資派錯誤的人的政策非常積極，而對在文化大革命中嗆了幾口水的人却揪住不放。批派性是假，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真。

袁金樑的信中說：周家瑜、黃廉現在真正消除派性聯合起來了，魯大東却感到恐懼，說周、黃是聯合起來向他奪權，難道魯大東要山城兩派繼續對立才好？市革委幾年不開常委會、全委會，大搞“老帥歸位，小兵回營”。四川大搞批派性運動，是右傾翻案風在四川的表現。另外，他說這次春節慰問團沒有周家瑜、黃廉參加，他公開聲明他也不參加。

我把傳單給幾位來探望我的本廠同事看了，他們都沒有誰表示贊同，都認爲這幾個人鬧不出什麽名堂，鬧什麽啊？還是星期天到山溝裏去釣魚好些，釣到了魚還可以改善生活。

4 月裏，廠供銷科龍師傅（也是朝陽廠調來支援的）回朝陽廠搬家，回來後，給我帶來朝陽廠胡瑞明、李華權于 4 月 2 號寫的信，信中說：

這次給你來信，主要是根據省委三月八日的擴大會上趙紫陽同志講：“前一段時間，在鄧小平對造反派一批二調的

錯誤路綫影響下，對一些造反派采取了調離的辦法。如本人願回單位，應做好工作，把他們調回。這些錯誤，責任在省委，不在成渝兩市委，不在下面同志的身上。”還談了一些具體問題。今天就給你抄這一段來。你看如何，請馬上回信，或有機會親自回渝一趟。因爲你是有影響的造反派。我們的看法，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你是完全可以回山城，回廠的。

我看了這信，對老朋友們的關心感到很感動，但是覺得再要回山城，回朝陽廠，已經沒有什麽意思了，一點也沒有動那個念頭。

我還沒有考慮好怎樣回復這封信，又收到了胡瑞明和嚴明鑒寫于4月10號的信，信中催促我說，有關被錯誤調離的造反派可以回原單位的正式文件已經下來了，廠革委段副主任已經拿給他們看了，并且問起老陽願不願意回朝陽廠，機會難得。他們希望我趕快作出決定爭取回朝陽廠。

這封信又在我思想上引起了一點小小的波動。如果真能回重慶去解決“補臺”問題，當然好，因爲我已經看到現在630廠實行的幹部路綫，是以北京來的幹部爲主，寶鷄來的幹部爲輔，而重慶朝陽廠來的幹部則不受重用，我這樣還沒有提幹的人自然就更難得到重用了。但我還是對再回重慶不想作什麽考慮，如果回重慶去繼續當調度員，那有什麽意思？還不如就在這裏。

考慮到朝陽廠老朋友們的好心，我還是回了一封信，信上先說了剛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中央決定讓鄧小平下臺，形勢有利于造反派，我們一定要緊跟中央。然後我說，我在630廠現在處得很好，廠領導對我的工作和表現是有好感的，這裏的生活條件也不錯。如果段副主任要我回朝陽廠，是否能解決我的組織問題？是否考慮給我什麽幹部職務？這方面請老胡以群衆的名義幫忙打聽一下，也可以以群衆的名義提出呼籲。

其實我在那時候已經沒有考慮再回朝陽廠了，私下有一個想法，就是如果重慶朝陽廠那邊提出要調我回去，會讓這邊630廠覺得我是有影響的，能起到一個促使他們重視我的作用。

後來在“揭、批、查”運動中，我都如實交代了這些情況，

并把自己的動機分析上綱爲“權迷心竅，總想當官”，“私心變貪心，貪心變野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徹底改造的充分暴露”。

1976 年 7 月，設計所的管伍打電話給我，我因爲下車間去了，沒接到，電話就打到我妻子上班的部門去了。中午我回家，妻子告訴我，說管伍來電話，說成都楊志誠打電話找你，說是重慶方面來了人，要你到成都去，明天在沙河電影院去，在門口等你。

楊志誠是成都 970 廠工人，紅成派的工人組織紅衛東成都部隊負責人，省革委副主任，我不認識他。我離開重慶的時候，申平曾經建議我到成都後可找楊志誠聯繫。不過我一直沒有跟他聯繫。我們設計所的管伍跟楊志誠原來是一個廠的同事。這次的電話，我也沒有考慮去，并且把這個情況向副廠長楊挺作了彙報。過後有一天，我跟原來在重慶一個廠、一起調來 630 廠的譚發祥師傅說起這事，譚發祥說：“你不去是對的。過去你在重慶吃派性的虧還少了嗎？”

大概兩三天後，我又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電報，說重慶的省革委委員到成都來落實政策，包括落實你的政策，望接到電報後速到省交通局去找楊國民。我看了電報也沒有去，也向楊挺作了彙報，把電報交給他，表示我不會去，完全擺脫過去的派性糾纏，一心幹工作。楊挺說你這樣處理很好，好好幹。

到了 1976 年 8 月 7 號，那是個星期六，那天下午廠黨委在變壓器車間開會。我在辦公室還沒下班，忽然看到一輛嘎斯車停到門前，一會兒，我的大兒子陽星跑進來對我說：“楊伯伯他們來了！”

我問：“哪個楊伯伯？”

這時就傳來歐正中的聲音：“認不到了嗎？你在這山上躲起好安逸喲！”

我趕緊迎上去，歐正中身後跟着楊國民、周培興，我忙請他們進來坐下休息，給他們倒茶，周培興說：“你這裏還清閑嘛，外面熱鬧得很呢！”

楊國民說：“喝啥子茶喲，跟我們到成都去！”

歐正中把我叫到辦公室外面，對我說："申平也來了，在成都，一定要請你去見一見。"

我不大想去，只想就在這裏聽他們講一下有關情況，但歐正中說："馬上跟我們車子走。到了成都，老戰友幾年不見了，去見一下都不行嗎？"

這樣一說，我就不好再推脫了，只好去向華科長請假。華科長作不了主，又去找楊挺請示，回來對我說楊挺同意了。這時我又接到楊挺打給我的電話，他提醒我去會會朋友可以，但注意不要再搞派性活動。我向他保證決不會再搞的，請他放心。

車子開出來後，順路我請他們幾位先到我家裏看了看，說就在家裏吃了晚飯再走，他們都說不吃了，申平他們還在成都等着呢。我就找妻子要了些錢和兩斤糧票帶在身上，跟他們上了車。

到了成都新南門外，我請他們簡單吃了頓稀飯。然後車子開到了省交通局招待所，申平和重慶搬裝公司的劉曉東等人在那裏，他們連同開車的司機一共來了八個人。這時天已經黑下來了，申平提出要我和歐正中跟他一起去楊志誠家，聽楊志誠講講當前鬥爭形勢。我想到臨走前楊挺專門給我打的招呼，就推辭了，說不去。申平就和歐正中去請楊志誠過來。但他們去楊志誠家沒有找到人。

在招待所，他們幾個人七嘴八舌，講了目前"批鄧"運動中重慶的情況。原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後，周家瑜和黃廉就异常活躍起來了，他們藉市委召開廳局級領導幹部學習有關中央文件"轉彎子"的會議，煽動了一部分幹部在會上造反，要求將會議繼續擴大，要市委就1975年底"批派性"對他們進行過的批判向他們作檢查。當時市委已經安排了周家瑜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黃廉任市計委副主任，但是他們不滿足，意思是要當市委書記。他們想把會議擴大的目的，就是想鼓動更多的人來支持他們，給市委施加壓力。最後市委的"轉彎子"會議開不下去，魯大東自己跑到成都來向省委書記趙紫陽作彙報來了，周家瑜和黃廉就找市委交際處要了車，把參加廳局級幹部會的人一起拉到成都來，向省委施加壓力，想通過趙紫陽來壓魯大東。

申平還告訴我，說周家瑜、黃廉現在自己也搞了會外秘書班

子，周家瑜的秘書班子有周學東、李毅力等，黃廉的秘書班子的人他們不認識，因爲不是一派的。現在要想見他們都很困難。在他們沒有得勢的時候，周家瑜還找申平他們商量一起寫文章，現在得勢了，要想去見他都見不到了，必須先通過他的秘書班子批准。申平他們這次到成都來，想找周家瑜瞭解一下有關情況，根本就見不到他的人。他們沒辦法，只好把車開到峨眉山去玩了一趟回來。

申平問起我在廠的情況，我說還不錯。他問我組織問題解決沒有，我說還沒有，不過廠領導已經表態要解決。他說，對，就是要爭取解決入黨問題，并且對歐正中他們說：

“老陽在這個廠裏處得好，不要再叫他回重慶了。”

從受表揚變成受清查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倒臺，一個新時期開始了。

在揭批“四人幫”的初期，我還沒什麼問題，當時自己還慶幸離開了重慶，不然在重慶陷在原來的派性圈子裏，肯定會有麻煩。在 630 廠，因爲是新廠，沒有文革中形成的派性矛盾，1976 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也沒有出現什麼找領導鬧事的情況，因此相對來說還算風平浪靜。

1977 年初四川省開始揭批“四人幫”、清查“幫派體系”的“第一戰役”時，全廠生產總結，副廠長楊挺一定要我來寫，我寫好後，他略作修改，就叫我在全廠大會上代表廠部作總結發言。廠黨委書記張西風也找我談話，表揚我的工作，說省國防工辦會議上表揚了我，說我是抵制“四人幫”的，還說要培養我當生產副廠長……

我受寵若驚，一心一意撲在工作上，不分白天黑夜認真努力幹，滿腔熱情要爲實現祖國的“四化”而獻身。

揭批“四人幫”的“第二戰役”中，黨支部書記楊總還跟我坐在一條長凳上，共同揭批“四人幫”。

對“四人幫”在各地“幫派骨幹”開展的“揭、批、查”運動，風聲越來越緊，1977 年 10 月底，四川展開了“揭、批、查”

運動的“第三戰役”。據說有哪個中央領導在成都132廠視察時，說了一句“造反派頭頭都不是好人”。這一下，從清查“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到“幫派骨幹”，逐步升級、擴大成了清查所有的造反派頭頭。我這個當年重慶市造反派的大頭頭，這時就日子難過了。因爲630廠是新建廠，文革前期群衆造反運動時還沒有這個廠，廠建立起來時全國的造反派群衆組織都已經撤銷，所以廠裏不存在造反派組織的活動。要清查造反派頭頭，只能從各地調來廠裏的人當中查檔案，看其在文革造反中有什麼表現，我當然就成了一個最大的目標。

于是，從1977年10月底開始，我被列爲全廠重點“揭、批、查”對象，被要求停職檢查，寫出交代。

我在630廠自然是沒什麼可交代的問題，廠運動辦就要我把十年前在重慶搞武鬥等情況詳細寫出來。我就把在1970年中央學習班上和後來在重慶八區三縣所做的“鬥私批修”檢查發言稿找出來，重新抄好交給了運動辦，然後又按運動辦提出的他們認爲不够清楚的問題（其實那些問題都是與本廠毫無關係的）一條條進行說明，重新回憶寫出來。我當時想，630廠的領導都是從北京來的，他們對四川、重慶文革前期群衆造反運動的情況不瞭解，我寫出來讓他們有個詳細瞭解是應該的。這是我的責任。

但是，我發現不管我怎樣老實交代，都不能滿足運動辦的“說清楚”的要求，而且好像還讓自己越陷越深，越來越難以解脫。

1977年10月27日上午，廠運動辦公室李顯恕（她是我的入黨介紹人）通知我，到鑄模車間去把一些問題“說清楚”。本來，當時要“說清楚”的是那些捲入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被認定是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我根本不存在那些問題，但是因爲人們知道我這個原重慶造反派的大頭頭，所以也趁機把我弄來“說清楚”。此前我已經看到鑄模車間寫出的大字報，對我提出了幾個問題，其實都是些平時生產工作上的問題，但他們在大字報中上綱上綫，甚至質問我安排的生產計劃“是不是‘四人幫’的計劃”。這樣的問題真讓人哭笑不得。本來我向廠運動辦提出，因爲他們車間提出的問題都是計劃工作方面的問題，最好是運動

辦和計調科派人跟我一起去，但是運動辦的人告訴我：你要相信群衆相信黨，如實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既不放大也不縮小。

于是我就去到鑄模車間，對一些有關問題作了說明。對于那種指責我的計劃是“四人幫”的計劃這樣的無理問題，我也沒有辯解，我的回答是：我當一個調度組長，我們的任務是組織實施計劃，爲完成國家計劃在工作中起紐帶作用。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過錯誤的人。你要說這是“四人幫”的計劃，我也不敢反對，否則又是“問題不分大小，關鍵在于態度”。不過我還是要說明一下：計劃不是我陽增泰個人制定的，我們廠的年計劃，是張總擬初稿，廠黨委開會研究通過，上報四機部。四機部批示下來，作爲國家對我廠考核的計劃。我把廠裏如何一步步落實安排計劃的程序大致講了一下，目的是讓大家清楚這不是我陽增泰一個人搞的陰謀。

在當時“揭、批、查”運動高潮中，人們都按以往政治運動中形成的習慣，總是要儘量捕風捉影尋找“敵人”，牽强附會分析上綱。有人甚至追查我和一個從成都分到廠裏來的小青年小曾的關係，因爲小曾曾經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的一個小頭頭，所以一些人就認爲我和他有什麼派性關係，要我交代跟小曾說了些什麼，聽小曾傳了些什麼等等，本來這都是很無聊的事，但是在那樣的形勢下，我也不得不耐心地作了解釋。

我的態度應該說是很好的了。可是，搞運動的領導們一直宣揚的“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于態度”的政策却對我不起作用了，到我這裏變成了“問題不在大小，也不在態度，關鍵在于上邊想不想、需不需要整你”。

我在全廠做了檢查，接受了批判，還不行。1977 年 11 月下旬，廠運動辦李顯恕又要求我把文革中搞武鬥的罪行和“四人幫”的反黨陰謀聯繫起來寫成詳細的批判材料，向全廠作個檢查。

這個“升級”的要求就使我想不通了。我想，這樣一聯繫，我的那些活動不就成了“四人幫”反黨陰謀的組成部分了嗎？我不就成了“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骨幹或者爪牙了嗎？我這樣不是只有死路一條了嗎？

當時我還沒有想到，在文革武鬥那個階段，根本就還不存在什麼“四人幫”。

正當我思想上產生抵觸情緒的時候，廠裏又批准我請假到郫縣去爲岳父辦喪事，准了我五天假。回來後，12 月 3 日，廠運動辦的同事又對我進行了熱心幫助，開導我正確對待運動，這又讓我覺得廠裏幷不是要對我進行升級處理，只是要讓我對過去的錯誤聯繫批判“四人幫”進行更深刻的認識。我可能錯怪了運動辦的同志。

于是，1977 年 12 月 5 日，我寫了一份《接受教育思想彙報》，我寫道：“路不鏟不平，事不幹不成，人不勸不善，鐘不打不鳴。同志們七鬥八鬥，把我從迷途中鬥轉回來，提高認識，思想開竅，放下包袱，精神愉快，接受教育，繼續前進。我衷心感謝同志們對我的幫助。”我還寫道：運動辦“不是要給我升級以武鬥定性，而是要我通過武鬥受害去批判‘四人幫’和‘四人幫’的親信劉張，加深對自己所犯錯誤的認識，去改正錯誤。不是把我往‘四人幫’的泥坑裏推，而是把我拉出‘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幫助我同‘四人幫’的幫派體系決裂，轉變立場，回到華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

可是，不管我怎樣“正確對待”，還是逃不掉挨整的命運。

牢獄之灾

1978 年春節前，鄧小平回四川視察，在這期間，他直接過問了四川省揭批“四人幫”的工作，明確强調：幫派骨幹都應該抓起來。

在 630 廠這樣的單位，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幫派骨幹”，但是中國的政治運動一搞就都是“一刀切”，按比例攤派，沒有也得有，矮子裏面選高子，我當然就跑不脫了。廠運動辦公室突然宣布我停職反省，幷把我關進了單身宿舍六號樓最底層一個陰暗的房間裏，同我關在一起的還有廠職工醫院的馬醫生，但他幷非政治問題，他的罪名是“流氓”。房門口有民兵 24 小時輪班持槍看守，上厠所也有人押着去。家屬送飯來也要檢查看裏邊有沒有

夾帶。

我的入黨介紹人李顯恕，這時成了運動辦整我的關鍵人物。她把我交給她的在重慶八區三縣鬥私批修消滅派性大會上的發言材料拿出來，當成我的重要罪狀，要我逐條交代。

我被押到機加車間、鑄造車間輪番批鬥。在機加車間的批鬥會上，廠黨委書記張西風和機加車間支部書記孔祥偉都說“上了我的當”，我心想，我又沒有錢送他們吃喝玩樂，我又不是姑娘家可以拿女色來誘騙他們，他們上我什麼當?

以主管生產的副廠長楊挺爲首的運動辦，一方面組織專案人員，內查外調，一方面對我反復逼供，規定時間要我寫出書面交代，寫了又問，問了又寫，32 開的辦公用簽紙，快寫完一寸厚了，也不能過關。因爲我寫的內容始終不能達到他們想把我打成“現行反革命”的要求。

1978 年 10 月 13 日，廠運動辦召開全廠職工大會，我和其他幾個人被押到臺上批鬥，我已經被批鬥多次了，并不感到有什麼不得了。可是突然聽到宣布：

“開除陽增泰出工會組織，開除陽增泰的廠籍，交成都公安機關逮捕！”

這時就有人上來給我戴上了手銬，我馬上就被押上早已安排好的車，送到了成都寧夏街的市大監，進行“關押審查”。

我在成都市大監關押審查了兩年零兩個月零兩天。

剛關進市大監的人，都稱“人犯”，只有判了刑的人，才叫“犯人”。

我這個“人犯”，是第一次進班房。心中自然忐忑不安，想起《水滸傳》上邊講過的：凡是新來的配軍，先打一百殺威棍，有錢進貢的可以免遭此灾。另外又聽人們講過不少獄中規矩：新犯人要在高壓水龍頭下“洗淋浴”，要睡馬桶邊，獄中有許多監規，違反一條就要上“緊銬”，或者用細麻繩打濕後五花大綁并弄到烈日下暴曬。放風時洗衣服，如果到時間沒有洗完，管教幹事看到了，會把臉盆給你扔了，拿剪刀把你衣服剪成一綹綹的襟襟。放風時走路擋了管教幹事的道，會被一脚踹翻在地，還要被臭罵一頓……

各種說法不一而足。我就帶着對陌生環境的畏懼心理走進了成都的市大監。

在市大監裏，我接觸到的實際情況，與外邊傳說的不完全一樣。新來人犯的頭一頓飯，確實是要被老犯們搶去吃了。新來人犯睡馬桶邊也是事實。不過其他許多傳說都是不實在的。

獄中的伙食標準，每天是 2、3、3 兩，飯很軟，稍微加點水一攪就成了稀飯，一般都吃不飽。每週打一次“牙祭”，吃回鍋肉，吃了很容易拉肚子。進來的人犯都希望早點判刑，好吃到飽飯。

人犯進了市大監，要經公安局預審處提審，落實案情，然後把材料報給檢察院起訴，再由法院判刑。判刑後轉押勞改局執行，人犯就成了犯人。

我的案子是由預審處一位姓鄔的幹事辦理。他第一次提審我時，我很激動，對他說：“就算我犯了案，也是好幾年前在重慶的事，爲什麼重慶公安局不抓我，你們成都公安局要抓我？”

他說：“我們成都公安局怎麼知道 630 廠有個陽增泰？是你們廠裏報的嘛！”

我說：“請問鄔幹事，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陽增泰搞起來的嗎？是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毛主席他老人家發動群衆搞起來的。1957 年，黨中央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大鳴大放，有什麼話都可以講，一不打棍子，二不戴帽子，三不穿小鞋。結果呢？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工人被打成壞分子。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又是這樣？我又沒有犯任何刑事案。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早在 1970 年北京的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裏就解決了。之後我支援國家三綫建設，一心一意抓革命促生産，我犯了哪條法？爲什麼要逮捕我？今天是講法制的時代了，這算什麼案？”

鄔幹事耐心聽我發泄了一通，心平氣和地說：“就算是關押審查吧。你對反右運動的認識很好。文化大革命當然不是你陽增泰搞起來的，你是參與者，但你還是一派很有影響的頭頭，對你的問題，我們一定會負責任地查清楚。”

鄔幹事就按我們廠裏報的材料，逐條提問，并要我寫成文字材料上交。這樣經過幾次反復提審後，鄔幹事又到重慶去外調……

我被“泡”在牢裏了

監獄裏每天有15分鐘的放風時間，有一天放風時，我碰見了我們同一個廠的老師傅吳明中，他是工模具車間操作進口銑床的師傅。一次在操作過程中，銑床的一根皮帶斷了。本來這是自然損耗,但廠裏硬給他戴了頂“破壞瑞士進口的高檔設備”的“現行反革命”帽子,上報成都公安局把他逮捕了。啥叫“現行反革命”?按照當時的解釋，也應該是有組織、有綱領地進行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才叫現行反革命，機床斷了一根皮帶，能顛覆國家政權嗎?真是天大的笑話。但是在那個年代，這類事情却可以由有權的人說了算，說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吳師傅被冤枉關了好多年，最後還是由法院結案宣判無罪。回到廠，補發了工資。但人被關這麼多年，身心所蒙受的傷害，家庭所遭到的損失，誰能補償?

市大監六行道有個人犯,罪名是“黑包工”,他是組織農民（那時叫人民公社社員）進城來修房子,層層都有手續的,審查了三年,落實不了罪名，最後就給他定了個重婚罪，判他三年徒刑。但他家屬不同意這個判決，說他父輩是兩房人，各房給他配了個婆娘，那是解放前的事了，那時候并沒有《婚姻法》。他那兩房的後人都表示，不管怎麼判，都不離婚。

1979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已故的大哥陽增明用麻袋裝了一袋蛇回來，放在厨房的方桌上。我正在灶面前燒火煮飯，突然一條蛇鑽出麻袋，把頭高高揚起向着我。我是屬鼠的，蛇是要吃鼠的，這一下可把我嚇壞了，我母親（已于1961年病故）見了，趕緊叫我大哥快把麻袋拿開……

我驚醒過來，把這個夢講給同牢的人聽。他們說：“你娃活了！”

我說：“我又沒死，怎麼叫‘活了’？”

他們告訴我，被關押的人犯，凡是夢見蛇的，十有八九都會放出去，這就是“活了”。

我不以爲然，認爲這是迷信。誰不知道，成都大監，“風都吹得進來，雷都打不出去”。

說來也巧，過了不久，8月中旬的一天，負責我這案子的鄔幹事提審我，實際上是通知我作好準備，只等廠裏來車子接我就釋放我回廠去。

我一聽這個消息，心裏好高興，暗想：莫非我那個夢真的應驗了？

于是，我每天早上起來，就把鋪蓋捲打好，等着回廠。誰知，左等右等，等了一個星期都沒有消息。我想肯定又出問題了，走不了啦。我就不再打鋪蓋捲了。

有一天。管教羅幹事問我：“陽增泰，你是不是把你們廠的領導得罪了，他們不想來接你回去？”

我說：“沒有啊，我們廠是北京761廠包建的，廠領導都是從761廠調來的人，我是重慶來支援三綫建設的，和他們沒得啥子歷史恩怨，沒有發生過任何矛盾。”

羅幹事說：“那他們爲什麽不來接你回廠呢？”

我說：“他們把我開除了的嘛！”

從此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鄔幹事來提審我了，也沒有任何人通知我要等到什麽時候。我就主動打報告要求判刑。但報告遞上去了也沒有任何回音。

我就這樣被“泡”在成都市大監裏了。

在我被關押期間，管教幹事換了好幾個，對我都還是比較關心的。一個管教幹事負責三個舍房的管教工作。管教羅幹事指定我當舍房的人犯組長。每次放風，羅幹事都叫我去開關舍房門，有一次，他還把我叫出來，幫他打磨一把七星寶劍。我看那把寶劍太銹了，就找他要細砂紙、大小油石和機油，他都拿來了。我經過幾天精心研磨，把這把七星寶劍打磨得亮錚錚的，羅幹事非常滿意。

新關進來的死刑犯人，都要戴脚鐐手銬，而且手銬往往還要把手銬在背後，叫戴“背銬”。凡有這種情況，羅幹事都要囑咐我，一日三餐，可以叫舍房的人喂他吃，他若有什麽要交代的，要我

幫他記錄寫下來，另外，羅幹事還要我注意他們的言行，防止自殺，如果他們說了什麼話，要暗中記下來上報。

從 1979 年到 1980 年，我在舍房裏看管過好幾個死刑犯人。其中一個是殺人犯，我看他進來後神情不安，睡覺也不安生，就很注意防止他自殺。他發現了，對我說：“老陽，你放心，我不會自殺。一個人命中注定挨槍死，就只會挨槍，死，用刀殺是殺不死的。”我說：“那不一定吧？”他說：“你不信？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就給我講了他的事。

原來，他是成都鋼管廠的一個工人，娶了個老婆，但他老婆變了心，跟別的人好上了。他很痛苦，再三勸他老婆回頭，他老婆就是不回頭，要跟他分手。他一氣之下，把他老婆約到外面去了結。在一個無人的地方，他給他老婆下最後通牒：你要不回頭，我今天就把你殺了！他老婆也橫了心，回答他：你就是把我殺了，我也不跟你好！于是他一氣之下就把老婆殺了。然後他就自殺，用那刀在自己身上戳了幾十刀，其中一刀還戳在心窩子上。結果公安局發現他還有氣，把他送到醫院救活了。原來他自認爲戳在心窩子上的那一刀是戳在胃把把上了。

他給我講了他的故事後說：“你看，我命中注定不是挨刀死，是挨槍死。”

我把這些都記錄下來交給了羅幹事。

還有一個人犯，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的大學生，成都某單位的工程師。他進來後，一直不承認犯罪，多次提審都沒有進展。羅幹事就交代我設法打破僵局。于是，我就慢慢同他接近，主動給他講我的案情，講重慶的武鬥。時間長了，他看我是重慶的派頭頭，與成都這邊沒有多少關係，對他不構成威脅，也就失去了戒心，終于有一天他給我講了他的案情：他兒子是個傻的，別人介紹交了個女朋友，他就把兒子的這個女朋友奸污了，但他兒子是傻的，那女子却幷不傻，聲稱要告發他，爲了不讓事情泄漏出去，他又把那女子殺了，還叫兒子背出去埋了。只要兒子不說出去，誰都不會知道。所以提審多次，公安局都沒有證據，無法定罪。

我雖然是個武鬥頭頭，別人說起來是“殺人無數，血流成河”，其實我對殺人這樣的事是很反感的。特別是像他這種人，爲了個人私慾，連自己兒子的女朋友、未過門的媳婦都要强奸，强奸後還要把人家殺害，實在是爲人所不齒的禽獸不如的東西。我對他沒有絲毫同情，把他所講的都暗中記下來，交給了羅幹事。公安局就對他兒子進行了突破，找到了埋尸的地方，把罪證搜齊了。有一天，他被提審回來，戴上了脚鐐手銬，我知道他已經被定成死罪了。那無辜受害的女子也可以瞑目了。

1980 年中秋節，所長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說我表現很好，幫政府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特獎勵我一條毛巾，并請我吃了十個月餅。這可能是我有生以來吃月餅最多的一次。

權大還是法大?

一直到 1980 年 12 月 16 日，我才解脫了牢獄之灾。

我爲什麽會被“泡”在成都市大監這麽久？後來我才知道了內情。

1981 年春節後，我妻子蕭華勛陪我到市工人醫院去看病，正好碰到鄔幹事也在看病。我們像老朋友相見一樣，十分親熱，無話不談。他告訴了我以下的情況：

1979 年 8 月，他和 630 廠保衛科的張元勝一起到重慶去作結案調查時，重慶市公安局的局長親自接待了他們，局長說，重慶在文化大革命中發生刑事案件 500 多起，這些案子都與陽增泰本人無關。并明確說：“我們保證他沒有問題。”老鄔就給張元勝說：我回去向市局黨委彙報，準備放人，你回去向你們廠黨委彙報，準備接人。

老鄔說，不曉得你們廠裏那位同志回去是怎麽彙報的。廠裏就是不同意我們放人，還跟我們爭吵得很厲害。他們還寫了報告材料，用了文革小報那樣的說法，說什麽陽增泰在重慶指揮武鬥，血流成河……他們還把材料報給了成都市委某書記，這位書記是 630 廠領導的老戰友，好朋友，他就指示下來要求判刑。公安局

本來想堅持放人，如果廠裏不接人，就打算以“法大還是權大”爲題把這件案子拿出去見報。但是有了某書記的批示，公安局就頂不住了，只好于 1980 年 6 月 24 日把案子轉到了成都市檢察院。檢察院一看材料，就認爲這個案子不能判刑。但是有市委書記的批示在那裏壓着，他們也不好辦，就拖下來了。鄔幹事的工作也被調動了，調他到成都九眼橋蓮花村派出所去了。

聽了老鄔說的，我才明白了，原來我們廠裏的領導們明知把我抓錯了，也不想糾正，怕把我接回去了他們沒面子。他們心目中只有權，沒有法。

直到 1980 年底，因爲上級主管領導的變動，形勢才發生了變化，成都市檢察院抓住時機，作出了對我的免予起訴判決，于 12 月 16 日，兩位檢察院幹事楊國榮、榮剛，在成都市公安局看守所提訊室,向我宣讀了〔80〕市檢字第 020 號《免予起訴決定書》，然後由公安局將我釋放回廠。檢察院的人還忠告我：回去不要再鬧了，不當幹部當工人也可以，你們廠的人左得可愛，他們以爲權就是法。

公安局派車把我送到 630 廠交通站，九眼橋紅旗旅館。我是乘下午的交通車回廠的。

無人理睬的申訴

回家後，我重新拿出檢察院給我的《免予起訴決定書》，仔細研究了一下，發現其中有些提法很不符合事實，沒有嚴格按照“以事實爲依據”的法律原則辦事。雖然檢察院的人好心忠告過我“不要再鬧了”，但是我覺得還是應該本着依法辦事的精神，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的：“對于免予起訴的決定，被告人如果不服，可以在七日內向人民檢察申訴。”

于是，我在回家後的第三天，12 月 19 號，就寫了《申訴書》，主要內容是：

一、你院認定“被告陽增泰，爲了擴充武鬥實力，于1967年7月21日夜，聚集武鬥人員二百多名，乘駁船三艘，至長江電工廠後門靠岸，親自指揮武鬥人員衝進該廠倉庫區，以暴力捆綁守庫民兵，冒用建設機床廠提單，强行搶走7.62步槍試槍彈七十二萬發”問題，與事實有根本性的出入。其事實是，提貨單不是冒充的，是真實的。當時建設機床廠的經辦人是姚永年，長江電工廠的經辦人是羅良才，我調集二百多人是受當時建設廠的負責人周榮華、姚永年的委托，幫忙解决運輸和搬運問題。我們不是用暴力去强行搶走四百箱半自動步槍試槍彈，因爲提貨和供貨都是有計劃的，有正式合法手續的。用船提貨不是在後門停靠，而是在庫房發貨的正道碼頭。當時根本無人衝，而是按倉庫管理員開門指貨後，有秩序搬上船的。所以我們根本不是搶。那兩個民兵當時一無袖套，二無武器，毫無標志證明他們是民兵。當時我們根本沒有捆綁他倆，只是由港口兵團的小申派了四個人把他兩個守住，不准亂說亂動，主要是不讓他們與在廠不掌權又反軍、反公檢法的那夥無政府主義者通風報信，造成不應有的悲劇。這是我當時的真實思想動機。目的是真正的提貨，决不是搶，對長江電工廠毫無損失，而且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供貨方和提貨方都是該單位的掌權者。因此你院對此問題的認定與“以事實爲根據”的法律原則是有根本性的出入的。

二、你院認定：“7月24日晚，被告聚集武鬥人員四百多人，親自指揮攻打工業學校，造成雙方傷亡的嚴重後果。”這種單方面的把打工業校的後果歸于我個人頭上，是不辨菽麥，不求其解的結論。我于1980年12月15日上午向貴院交出的《關于我所知道周家瑜的犯罪材料》中，更爲詳細地交代了關于工業校的武鬥情節和責任問題，你院應該一切從實際出發，作出恰如其分的結論。這樣對改造一個人，挽救一個人,就更有說服力。關于工業校武鬥,我只負前半截責任，我是自動終止犯罪，我沒有造成嚴重後果。而造成嚴重後果的是周家瑜和重大301部隊（專業武鬥隊）。對于工業校武

鬥出現的各個情節的證明人，我已在給你院的材料中詳細提供，請能再次覆核爲盼。

三、你院認定：“8月初，被告又親自策劃決定劫持停放嘉陵江邊駁船上的國家大米十五萬斤，發給本派武鬥人員食用”問題，也有較大出入。首先我不承認我有任何劫持的動機和行爲，因爲我批條子動用75噸大米，因爲我當時是重慶市革聯會常委會常委，分管國防工業委員會，我又是工業生產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當時建設機床廠、江陵機器廠、望江機器廠、長安機器廠、嘉陵機器廠等單位的一派群衆被劉張武裝起來的另一派用暴力趕到社會上，雲集在團市委、市委、警備區、渝辦、重大、師專、建築工程學院等地，沙坪壩一帶，拖兒帶女，啼饑號寒。當時他們找到我反映苦衷，要求革聯會給碗飯吃。于是我在1967年6月某日打電話給市委一號樓，接電話的是藍亦農的秘書楊學祥，我把問題向他彙報後請示如何解決，他要我不要放電話，意思是他去請示領導後再回答，一會兒楊學祥告訴我：我們這裏，警備區，都是一樣，來逃難的人很多，一天只能吃兩頓稀飯，市裏無法解決，還是你們自己想一點辦法吧。我當時覺得楊學祥的這個答覆，不是他個人的意見，是領導的意圖，因此才敢大膽批條子動用剛運到的75噸大米給群衆吃。并非是專門給本派的武鬥人員食用。我打電話時還有朝陽電機廠的舒斌、胡瑞明在場耳聞目睹。那個楊學祥一定還在世上，是可以找他調查作證的。

四、你院認定：“被告在後勤會上決定，從重慶棉紡二廠和印染廠盜用國家棉布十三萬八千尺，給專業武鬥隊製作武鬥服五千套（發出一千多套後,被警備區制止交庫）”問題，決不是我一個人在什麼後勤會上決定的，而是周家瑜會同我在重慶師專會議室召開的重慶革聯會文攻武衛總司令部成立後抓些什麼工作的會議上共同決定的。所用棉布是紡織兵團蔣懷紀、劉武陽、馮開華自動提供的，不是我陽增泰派人去盜的。正當在縫製過程，經過警備區首長白斌教育，我們也

提高了認識，馬上自動終止，并將打好和沒打好的以及如數收回已發的武鬥服全部上交市革籌，不是交庫。當時經辦人是黃竹然、馮開華等。當時這個問題在市革委有關部門也是有據可查的。任何私人沒有分得過一件。

五、你院認定："1974年以來，當'四人幫'積極篡黨奪權時，被告陽增泰曾參與幫派活動，并于1976年4月14日寫信唆使別人爲其'重返山城'進行串聯，妄圖回重慶'納新'、'提幹'、'補臺'" 問題，我當時給別人回信（胡瑞明等），是根據當時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的講話和省委文件規定，純屬通信者雙方受極左路綫影響而說的一些錯話，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和後果。這是思想認識問題，不應作爲犯罪問題處理。

我在申訴書的最後，還直言不諱地說：

你院〔80〕市檢字第020號《免予起訴决定書》對我的犯罪事實的認定，雖然是"對被告陽增泰免予起訴"，但實際上這個處理是問心有愧的，是法律部門不按黨的政策進行獨立辦案，而是深受個別人"長官意志"的壓迫或影響，把我的問題還是處理偏重的，我內心是不服的。因爲我的問題，就是按你院所列舉的事實，也不是什麼原告人指控的新東西，而是我在十年前就已經覺悟，自動終止犯罪活動，在1970年北京中央舉辦的、周總理親自抓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裏作了公開檢查，曾得到學習班當局的肯定和表揚，回重慶後，又在魯大東書記主持的重慶市委領導下，我除了在全市三代會上檢查外，又按市委的要求，到市屬八區三縣作檢查，而且市委還把我的檢查鉛印成册，發到市屬區、縣、機關、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部隊和學校。總之，我認爲這都是已經處理過、檢查過并且作過結論的問題，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章第九條中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爲，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爲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

本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三條中的規定：免予起訴的被告對判決不服提出申訴後，“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復查決定，通知被告人，同時抄送公安機關。”但是我的申訴書交上去後，根本就沒有人理睬。

後來我瞭解到，當年我們這類“文革犯”，凡是對判決不服提出申訴的，真正得到復查改判的極少極少，不是馬上給你一個“維持原判”的決定，就是根本不理睬你。

我瞭解到這樣的情況後，當然也就不再去白費那個勁了。

評職稱與“一刀切”退休

我回廠後，兩年零兩個月的工資，一分錢也沒有補發給我，幹部也不讓我當了，叫我當工人。我說那就讓我回機加車間當鉗工吧，也不行，要我在管道工、下料工裏面選一樣。我說：你們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由你們安排好了。

第二天，通知我到成品庫房當庫管工。

成品庫房裏堆放的是發往全國各地的成品。原來那個庫管工老趙師傅，人稱“趙迷糊”。我去接手時，居然沒有一個賬本，我接手後，建立了進出賬本，詳細記錄產品數量、型號、重量、收發貨時間等，經辦人必須簽字，借出產品必須經處長簽字批准，再編號進賬，誰來檢查都一目了然，抓不到任何漏洞。

趙師傅是個共產黨員。我接管成品庫房後，他被調去搞銷售去了。我跟他成了好朋友。他告訴我：我被抓走後，基建科一個老肖被嚇壞了，因爲廠裏也在逼他承認搞基建包工中有問題，硬要他承認有貪污。他被逼供折磨得不想活了，用菜刀砍自己的生殖器，鮮血流了一地，幸好發現得早，經醫院搶救，命保住了，但生殖功能損傷了，成了“太監”。

我問廠裏馬醫生到底是怎麼回事？老趙說，也是廠裏亂整，說馬醫生在檢查病時侮辱婦女，人家女方根本不承認。找不出任何證據，最後那頂“流氓”的帽子沒法給馬醫生戴上。

我在成品庫幹了兩年，又被調到物資處當下料工，但不是具

體做下料的工作，而是按生產計劃、工藝文件，專門負責開下料單。

又幹了兩年後，我又被調作物資處的物資計采組組長，兼物資調度員。我在任期間，扭轉了物資處在廠調度會上每次當被告的局面，變被動爲主動，各產品的備料進度清清楚楚，報得出項目進度的百分比和缺料情況及如何解決的措施。再也聽不到各車間叫喊物資不到位的抱怨聲了。

滑稽的是，廠裏讓我當了工人，却又通知我參加評職稱。

1987 年，全廠生產管理人員要解決技術職稱問題。我也被通知到成都工業職稱改革學習班參加學習。物資處去的有副處長、采購員等好幾個人。

我在學習中，把老師講課後出的問答題全部整理出來，複印給我們物資處去的幾個學員，供大家復習用。我告訴大家，最好能背誦下來，到考試的時候才能考得好。

1988 年 6 月 10 日，我得到准考證 311394 號，在成都陝西街小學參加了職稱統考。結果，我是物資處去的幾個人中考得最好的一個。

不過我只被評了個助理經濟師的職稱。而考試不及格的副處長還得了個經濟師職稱。

我有了技術職稱，幹的又是物資管理工作，應該算一般幹部了吧？其實不然。1993年9月市裏下了個文件，要我們一部分人“一刀切”退休，廠人事處以工人身份辦理了我的退休手續。我退休證上的保障號是 306710。

儘管遇到這樣那樣的不順遂，我也想得開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大風大浪的磨煉，經歷過牢獄之灾的錘打，對生活中的這些小坡小坎我已經能够坦然對待了。人生就是這樣。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錯了，我們還說啥子呢？當時我們都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毛主席指示我照辦”的忠實追隨者，所有的人都被動員起來，連當娃娃的紅小兵都動員起來，一呼百應，下面砸派也好，八一五也好，都聽上頭的，哪個曉得被上面利用了？後來才曉得有啥子林彪集團，江青集團。

我的三個小孩，老大和老二高中畢業後被我夫婦所在的成都

電視設備廠（630 廠）招收進廠工作。老三畢業于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分配到廣州開發區工作。由于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好，我現在是兒孫滿堂，兩個孫兒一個外孫女都已經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我們老兩口在家安度晚年。

最後說點題外的話

如果讀者讀了我的回憶錄，就會知道我這個人喜歡直來直去，實話實說。我這個性格，可能和我的姓氏有些關係。

我姓陽。這個姓,在《百家姓》上沒有。那上邊的“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只有“木”旁的“楊”,而“阝”旁的“陽”，只在複姓“歐陽”裏才有，但那不是“陽”姓。

查找資料，瞭解到我們這個陽姓的來源較爲複雜，其中影響較大的一支，出自周朝王室之後，由王室成員的重新分封而來。

相傳周朝建國以後，數傳至景王時，封少子于陽樊（今河南濟源皮城），後遇周亂，這支居住陽樊的景王支裔出奔于燕（今河南衛輝）。爲標明自己的身份而以陽爲姓。成爲較早的一支陽姓。

再查東周時，有一個附庸國名陽（今山東青州東南），與齊國爲鄰。周惠王時，陽國被齊國吞幷，齊人也遷入陽國境內居住。亡國後的陽國人，爲與齊人區分，便以國名陽爲姓氏。

相傳夏禹後代中，也有一些人以陽爲姓。

春秋時，魯國季孫氏的家臣中有一人名陽虎，因封邑在陽關（今山東泰安南），所以以陽爲姓，其後代也就姓陽。

同樣，當時的晉國太傅陽處父，被封于陽（今山西太谷東陽城），子孫也以陽爲姓……

得姓以後，陽姓各支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幷且形成了玉田（今屬河北）等郡望，出現當代以湖南、廣西、四川、江西等省爲中心的分布格局。

那麽，我們這一陽姓族人又屬于哪一支後裔呢？因沒有見到記載，誰也說不清楚。

據我的么爺陽昌沛和父親陽吉廷（顏生）講，我陽氏祖宗原

是湖廣[1]麻城人，因清朝前期，四川遭遇連年戰亂（其中最爲人們所知的是“張獻忠屠川”）和天灾，造成四川人口銳減，由當時的政府主導進行了人口大遷徙，歷史上稱爲“湖廣填四川”，我們陽氏祖宗即被移民來四川郫縣石家橋、嚴家橋一帶定居。所以陽氏宗族的祖墳在嚴家橋。

我們陽氏老祖宗訂了十六個字“光天化日，永大和昌，顔增師茂，道精雲華”作爲宗族的排行，傳世至今（2014 年）已有十三代了（大房可能還不止）。

這十六字的排行，仔細琢磨起來也有些意思。

“光天化日”，可以理解爲警示後人，不論幹什麽，都要光明正大，人在做，天在看。要像太陽那樣，把溫暖送人間，當好太陽的傳人。

“永大和昌”，永，永恒，永久，源遠流長；大，廣大無邊，大公無私，大智大勇，大有作爲；和，四時之道，相安諧調，和衷共濟，和睦共處，性命和則生，人物和則親，人天和則靈；昌，繁榮昌盛，興旺發達。

“顔增師茂”，顔，和顔悦色，笑逐顔開；增，增長知識，增强體質，爲國增光，爲族增輝；師，師法古今完人，三人行必有我師，前事不忘後世之師；茂，茂密，茂盛，民間常用祝福語有“財源茂盛達三江”。

“道精雲華”，道，康莊大道，任重道遠；精，精細，精心，業精于勤；雲，雲蒸霞蔚，雲程萬里；華，光華，精華，升華，春華秋實。

從這十六字排行算下來，我是我們陽氏這一支族裔的第十代子孫。退休後閑來無事，對我們家族的姓氏來歷、排行意義，作

[1] 湖廣，原指元代所設“湖廣行省”，轄境相當今湖北長江以北的小部分、以南的大部分，湖南全省，廣西全區，廣東電白、茂名以西和貴州除北盤江流域以外的地區。明代湖廣行省分爲廣東、廣西、湖廣三個布政司（省）。這時的“湖廣布政司”轄今湖北、湖南之地。清代將湖廣分爲湖北、湖南兩省。習稱“湖廣”。

一些瞭解和探討，也寄托着對陽氏後代的勉勵與希望。

風雨過去，雲開日朗，我們兒孫的生活中不會再遇到我們當年那樣的浩劫與苦難。這是最讓人高興的。

2013 年 7 月 19 日至 11 月初稿
2014 年 1 月 1 日第一次修訂完成
2014 年 5 月 29 日第二次修訂完成

整理後記

何　蜀

在重慶的文化大革命前期，陽增泰這個名字說得上是“大名鼎鼎”，然而令人不解的却是，他這樣一個在造反、奪權和大規模武鬥中大名鼎鼎的群衆組織領袖人物，重慶大武鬥中八一五派的主要指揮者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勝利”、建立“新生紅色政權”的時候，他的名字却消失了，不見于任何一級革命委員會。這是當時重慶兩派中的許多人都弄不明白的一個謎。我在瞭解和研究重慶文革歷史的時候，也一直想弄清這個謎。聽到的傳聞是：當年在重慶支左幷且明顯支持八一五派的五十四軍領導人，擔心陽增泰在武鬥中有什麽會被追究的問題，不願讓他進入革命委員會後遭到清洗而使八一五派失去一個代表名額，因此在籌備組建革命委員會時就不讓八一五派提陽增泰的名。但是，問題真是這樣嗎?

由于陽增泰在文革中期就已淡出公衆的視野，後期又調離了重慶，許多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對他文革中的情況也就更難于弄清楚了。

雖然文革研究一時還屬于“禁區”，但是對文革研究有興趣的人，希望還原歷史真相的人，還是不少。通過重慶搞文革研究的朋友曾鍾、韓平藻的努力，終于打聽到了陽增泰在成都的下落，幷且與他取得了聯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韓平藻第一次去拜訪他時，他就拿出了當年寫的一些交代材料底稿。據我所知，像他那樣的當年風雲人物，能够完好地保存下當年材料的極少，即使保存下來了，也决不會輕易示人。而這一細節，正表現出了陽增

泰直率、坦誠的性格特點和做事有條理、有收存的技術型人物的生活習慣。

我曾給重慶原反到底派的主要負責人李木森整理過回憶錄《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第一版），現在又給重慶原八一五派的武鬥“總司令”陽增泰整理回憶錄。在逐漸加深的接觸瞭解中，發現他們二人有好些共同點：

他們都是國防工廠的基層技術幹部，都具有中專文化程度，是當時青年工人中有文化的新一代；

他們在文革中成爲工人群衆組織的領袖人物，以後又成了重慶這樣的大城市中一大派群衆組織的武鬥指揮者，他們被推上文革潮頭，都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原因，可以說是“歷史的誤會”；

他們從本質上來說，是搞技術而不是搞政治的人，既無政治家的野心，也無政客的機心。他們對政治問題，都不善于、不熱衷去作深入的思考。在文革中，他們都是跟着時代潮流，按照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按照從小所接受的那套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在積極行動，認真實幹。在文革後，他們也沒有對那段歷史進行更深入的反思。在回憶往事的時候，他們往往是“技術性”地講述，力求把事情的來龍去脉講清楚，而很少去作抽象的政治性的分析評述，不因政治形勢的變化而對歷史事實作不同的剪裁、編造。或許也正因爲如此，他們都能够暢所欲言，毫不隱晦、毫無掩飾地講述自己那些今天看來十分荒唐的言行，真實地袒露自己當時的思想，而不像有些仍然把自己視爲政治領袖的文革人物那樣講起往事來遮遮掩掩文過飾非；

他們都因爲文革中的造反經歷而受到不應有的懲罰（李木森被開除中共黨籍，撤銷職務；陽增泰被關進監獄審查，免予起訴後仍從幹部貶爲工人），但他們幷不因此而一味怨天尤人，抱殘守缺，甚至夢想“再來一次文革”，而是踏踏實實地靠自己的努力爲社會作貢獻，同時也實現自身價值，家庭和睦，子女成才，贏得晚年的安定與幸福。

因此，能够認識這樣的文革風雲人物幷爲之整理回憶錄，從

而瞭解到更多真實生動的基層文革歷史，我感到十分幸運，也十分愉快。

開始整理這個回憶錄之前，陽增泰就提供了他保存了幾十年的原始手稿資料，包括——

1968 年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清理階級隊伍”中追查武鬥問題時寫的《朝陽電機廠兩派的由來》、《關于 1967 年 7 月 25 日山城八一五派同反到底派在市工業學校武鬥前後情況的彙報》、《關于 1967 年 8 月 14 日山城八一五派同反到底派在嘉陵廠武鬥前後情況的彙報》、《關于北碚會議和合川會議情況的彙報》、《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若干情況的彙報》等；

1969 年在成都軍區“九二三”學習班寫的《關于私設電臺的坦白檢查交代》，在灌縣水利學校四川省革委學習班的總結發言稿；

1970 年在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發言稿《在重慶市劉張如何分裂革命隊伍破壞革命大聯合》、《在中央學習班全團大會上鬥私批修發言稿》、《劉張分裂革命群衆的鐵證》；，在中央學習班寫的交代材料《革聯會“六九”黑會和意圖》、《揭發周家瑜以我爲標準的錯誤》，在中央學習班的筆記，在中央學習班的發言及學習班結束後回重慶在三代會和八區三縣所做的鬥私批修發言稿《從山城武鬥看劉張挑動群衆鬥群衆營造獨立王國的滔天罪行》；

1977 年“揭批查”運動中寫給廠運動辦公室的《關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參與重慶兩派武鬥的交代》、《對調離重慶前爭取補臺問題的活動交代》、《關于來往信件及傳單問題的交代》、《支援三綫離渝後的派性活動交代》、《有關幫派活動的交代》、《對運動辦負責人提問的書面回答交代》；

1980 年 12 月 19 日寫給成都市檢察院的《申訴書》……

這些原始資料保留了許多珍貴的史實細節，特別是與重慶一些重大武鬥事件有關的具體時間、地點，八一五派的武鬥指揮機構組成情況及決策經過、參與人員、武器來源等等，其中有許多是當事人在幾十年之後已經很難記憶清楚的。當然，僅有這些資料還是遠遠不够的，這些資料提供了一些重要記錄和綫索，可以

啓發一些記憶，而更多具體的細節和一些來龍去脉前因後果，都還得經過更認真的回憶、訪談和查證資料。對原始資料中沒有涉及到的歷史階段，陽增泰自己又加寫了若干篇章，從文革前的經歷到文革中一些具體情况的回憶。我在整理中還不斷提出一些問題，對一些細節提出追問或質疑，他也都作了認真的回憶與解釋。對一些他確實回憶不起或確實不瞭解的情况，我酌情根據查閱史料所得加上了註釋說明。

這個回憶錄的初稿整理好以後，我傳到陽增泰子女的郵箱，他們打印出來後，他認真進行了審讀修訂。2014 年春節，陽增泰夫婦重返重慶故地，在走親訪友中，他夫婦二人專程來到我家，送來了他的修訂稿。我還請來了文革中重慶反到底派的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兩位當年重慶大武鬥中“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當年在各自的派別裏指揮武鬥，把對方當成“國民黨”來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相互却只知其人，從未見過面（李木森參加過兩派停火談判，陽增泰沒有參加過；李木森進入了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擔任副主任，陽增泰沒有進入任何一級革命委員會）。在我家裏，這是他們“內戰”結束幾十年後第一次見面，也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至今還是一個爭議極大的問題，但是，即使那些認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人，也沒有誰能理直氣壯地肯定文革中的武鬥，特別是像重慶當年兩大派這樣真槍實彈的大規模武鬥即“全面內戰”。因此，許多當年武鬥的參與者特別是決策指揮者都回避甚至否認那段曾經親歷的歷史，從這方面來看，陽增泰的這個回憶錄就成爲不可多得的親歷者回憶史料，爲研究文革特別是文革中的大規模武鬥（全面內戰）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我在爲李木森的回憶錄《親歷重慶大武鬥》所寫的後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始終覺得，對李木森這樣的當年風雲人物來說，最有價值的，是他們親歷過的那段歷史，而不是他們對那段歷史的思考和認識。只要他們能把那段歷史如實寫下來，就是對後人最好的交待。至于對那段歷史的思考和認識，盡可以交給其他人

或後人去完成。當然，若能同時對歷史有足够的反思更好，這必然有助于更真實、更深刻地記叙那段歷史。但是，在許多當事人都還不願開口,不願正視那段歷史的時候,我們能苛求于他們嗎?”

我的這個認識，也同樣適用于陽增泰的這部回憶錄。

2014 年 5 月 29 日于重慶風江閣

附　錄

中共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意見

中發［67］159號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四同志關于重慶市問題的看法和意見。

第一，重慶市各革命組織應當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指向重慶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在軍隊內，在群衆中，對劉，鄧，李，任等人的罪惡進行充分的揭露和徹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開宣布撤銷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和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撤銷任白戈兼任的重慶軍分區第一政委的職務。

第二，應當實事求是地估計和對待重慶警備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錯誤。應該看到，他們在這些工作中，是有顯著成績的。他們支持的是革命群衆組織。他們的缺點錯誤在于，在二、三月間，沒有完全頂住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變成“鎮反運動”的方向、路綫錯誤，在處理持有不同意見的革命群衆組織的關係問題上，錯誤地支持了一方，壓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門錯捕革命群衆，把一批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他們已經開始認真地糾正自己的缺點錯誤。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由當地駐軍副政治委員藍亦農同志，副軍長白斌同志，重慶市軍分區司令員唐興盛同志等負責組織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藍亦農同志爲組長，白斌同志爲副組長。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應當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見的各主要革命群衆組織的負責人及其他適當的負責人參加。

中央同意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迅速建立工、農業生産領導班子。

第四，對被錯誤宣布爲“非法組織”或“反動組織”的革命群衆組織要平反，對錯捕的革命群衆和革命群衆組織負責人要釋放，并恢復名譽。各個革命群衆組織都要進行整風，加强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進行自我批評，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雙方的爭論應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進行解决，不准武鬥，不准打、砸、搶、抄、抓。對煽動武鬥的壞人，必須追究。

第五，要熱烈響應毛主席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要堅决執行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和十條命令。要堅决執行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决定。要牢記毛主席提出的三個相信和三個依靠，堅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衆，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在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的指引下，進一步加强軍民團結，加强各個革命群衆組織之間的團結，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實現革命的“三結合”，徹底粉碎資産階級反動路綫，完成鬥、批、改的偉大任務，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駐軍首長在重大八一五形勢辯論會上的講話

（1967年5月20日上午在重慶大學風雨操場）

白斌副軍長講話：

同學們，我們是來聽你們的辯論的，是來向你們學習的。同時向大家彙報在北京解決重慶問題的情況。今天，除了謝政委沒有來以外，其餘的都來了。今天我成了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的戰士，感到光榮。

中央文革，中央首長，中央軍委文革，對重慶問題非常關心。對重慶問題在專案處理中，要三方代表到北京去。中央首長聽取了三方的彙報，周總理和康老作了重要指示。情況是這樣的：十號到北京去後，十一日向全軍文革作了彙報，并整理了書面材料，交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在十三日，周總理、陳伯達、康生、蕭華、楊代總長、汪東興、王力等中央首長接見了我們。十三號是解決重慶問題的第一次會議，周總理講，先讓受壓制的代表發言。反革聯派有六個人（註：油印傳單上寫的是“七個人”）發言，我們有三個人發言。因我們處于掌權地位。周總理和康老作了指示，警司謝政委表了態。我們去北京，中央首長接見了三次。同時也向全軍文革彙報，長達三小時。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來解決重慶問題。

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這五條意見，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看了和批准的（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可以作證，開大會以前，周總理、康老、楊代總長、王力等同志先接見了我們軍隊的同志。接見時剛坐下，周總理來了，周總理的秘書拿了《五條》來，說毛主席看了，批了。周總理交給康老，說毛主席看了，批准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要堅決擁護。

下面講《五條》和周總理、康老講話的精神實質。這是個人

看法，如果不對，請批評。

第一點，回答了三個月來雙方爭論的焦點。周總理和康老作了肯定的回答：五十四軍支持的是左派，不是保守派。按周總理的話來講，五十四軍是支左，不是支持保守派，奪權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們支左是對的。我們支持的是對的。我們支持的是誰呢？是山城的左派，是八一五派。警司不是黑司令部，山城的八一五派支持革聯會是對的。山城的革聯派爲革聯會大喊大叫是對的。

第二點，革聯會是一月革命的產物，不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產物。革聯會是有群衆基礎的，有 400 多個革命組織，多少人我不太清楚，起碼有一百萬人以上。掌權派是真正革命左派，掌權派組織負責人絕大多數是好的。同時我們駐渝部隊有一百多個科、團以上幹部參加了革聯會各委員會的工作。周總理說，山城的革命派比較成熟了，不需要軍管了。革聯會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們想這一點，你們比我們瞭解的東西更多，更清楚。

重大八一五戰鬥團不是李井泉的御用工具，是左派。我們過去支持，今後一如既往的支持。康老接見時說，你們（指五十四軍）支持八一五派沒有錯，八一五是左派。問題是你們支持了一部分，壓制了另一部分。這是對我們的批評。我們堅決誠懇的接受批評。（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重大八一五永遠忠于毛主席！）

周總理和康老對重大八一五也有一些批評，說明了首長對八一五的信任、器重、愛護，是對我們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們要正確的對待首長的批評，借東風，把首長的批評作爲我們前進的力量。（全場高呼：打倒劉鄧陶，保衛毛主席！山城八一五永遠忠于毛主席！）

第二點，《五條》，周總理、康老指出了我們的缺點和錯誤。我們應虛心地接受批評，改正錯誤。

抓人過多，沒有完全頂住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變成鎮反運動的錯誤。可抓可不抓的抓了，還有的完全抓錯了。對不同觀點群衆組織的處理，我們犯了錯誤。如對西師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後字二四二紅總，本應耐心幫助他們克服缺點錯誤，說服不够，壓服多了些，實際上也沒有壓服。

我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教訓是沉痛的。首長的批評主要是批評我們。你們沒有錯。

第三點，《五條》中沒有提革聯會，周總理要避開革聯會問題。我理解，字面上沒有革聯會，實質上是有革聯會的。因爲我們五十四軍支左是支持的革聯會一派。我們支持的是革聯會。希望大家對《五條》要領會它的精神實質。避開革聯會是有利于團結。把革聯會作爲存在與否是不對的。我們革聯派讓一點，是高風格，高姿態。籌備小組的成立，革聯會是向上了。我們要熱烈祝賀五條，堅決貫徹執行五條。

我們八一五派是革命的，要做模範，作表率。周總理、中央首長對你們抱有很大希望，山城八一五派對重大八一五派也抱有很大希望。我講一個電話記錄。昨天晚上十二點以後，三中抗大兵團打電話給我們，按電話記錄上說，他們一面打電話一面哭，心情很沉痛，說希望我們給重大八一五作一些工作，重大八一五是重慶八一五的旗手，這個紅旗不能倒。我們三中抗大兵團看着他們。說我們思想雖然不通，但五條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我們就要堅決貫徹。（全場高呼：向三中抗大兵團小將學習！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毛主席萬歲！）我們向中央文革彙報時，準備把這個電話記錄附上。這是中學生將了大學生的軍。這個軍將得好。三娘教子，子教三娘。爲什麽中學生不能教育大學生呢？山城八一五戰士稱你們重大八一五是火車頭、旗手。希望重大八一五成爲山城的模範，也希望重慶作爲四川的模範。我們希望你們成爲執行政策的模範，團結的模範，停止內戰，停止爭吵，停止武鬥。凡是不利于團結的話都不要說，不利于兩派團結的事都不要做，支革派和反革派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康老問周家喻敢不敢作產業軍的工作，周家喻回答：“敢。”周總理問周家喻敢不敢作西師八三一的工作，周家喻回答：“敢。”我們不要打內戰了。我們要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四川的李井泉，重慶的任白戈。我們要作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把重慶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們部隊今後還是支持你們，也希望你們支持

我們。

最後讓我們共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耿志剛參謀長講話：

同學們，在這裏我首先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身體非常健康，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的首長們身體非常健康。毛主席對重慶問題有四、五次批示。中央首長對重慶問題，大大小小會議，接見，調查情況好多次。現在重慶問題中央已經作了決定，毛主席批准了這個決定。這個決定好得很！非常英明。開始在決定下來以前，我也是想不通。因有人說警備司令部是黑司令部，警司不是支持的左派，革聯會是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的產物，重大八一五是叛徒，是李井泉的御用工具。這些人說的這幾點我想不通。但是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五條意見下來後，我想通了。爲什麼？因爲決定上指出警司支左是正確的。（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肯定革聯會是奪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奪權掌權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央首長的肯定我想通了。堅決擁護，萬分擁護！

同志們，我們對中央首長的批評完全接受，堅決改正。錯誤在哪裏呢？在警備司令部沒有完全頂住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把文化大革命變成鎮反運動的錯誤。在各革命群衆組織關係上支持了一方，壓制了另一方，支持了楊崗的鎮反，錯捕了人。我們堅決改正。

八一五派的同志們，中央對你們也有批評，我好有什麼說什麼，八一五最大的缺點是驕傲，不自我批評，不接受別人的批評。我相信會接受批評的。克服缺點，幾個月來有了進步。再則，是中央首長接見時，對軍隊，八一五派，都作了充分的評價，八一五派說："這回中央首長把我們批評慘了。"首長接見了兩次，周總理對重大八一五的批評是親切的關懷，像長輩教育子女。（全場高呼：山城八一五派永遠忠于毛主席！毛主席萬歲！）舉個例來說，周總理、康老在講話中說："周家喻這個問題你來答一答，

中央講的五種學習是什麼?”周家喻答不上來。臉紅了。革聯派的笑了，反革聯派的也笑了。康老說：“你們也不要笑，你們也答不出來，你們只知道打內戰，就是不好好學習。”周總理問八一五的沈志清同志：“你們搞過軍訓的，你們學習得怎麼樣?”沈志清回答：“先是學習的，後來打內戰去了。”中央首長和大家都笑起來了。這好,這好,說的是老實話。康老對重大八一五的說：“你們敢闖，敢作，敢不敢作產業軍的工作?”周家喻說：敢。周總理說：“人家說你們和稀泥。”周家喻說：不怕。周家喻說：“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周總理說：“對。”康老又說：“你敢不敢對西師八三一作工作?”周家喻說：敢。周總理講：“不光是對重大八一五講，對你們（反革聯派）也適合。”吳慶舉說：對。周總理說：“吳慶舉你是重大八一五負責內務的。”說明中央首長對重大八一五是關心的，是瞭解的。

周總理講了，雙方都有缺點錯誤。周總理講了：“重大八一五掌了權，缺點錯誤大，雙方都受害。軍隊和地方發生問題，軍隊負責。新幹部、老幹部發生問題，老幹部負責。你們是老造反派，你們要負責，你們要主動工作，主動認錯。”

首長們在大會上,再三教導我們,一定要禁止武鬥,不能武鬥,誰搞武鬥，誰就錯誤。决不能武鬥。

現在讓我們共同學習毛主席語錄：“他們必須是能够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幷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個黨員，每一種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和行動，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爲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

我過去是支持革聯會的。中央五條下來，我堅决支持。山城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也應該堅决執行。想得通想不通都要執行。讓我們高呼：

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藍亦農副政委講話：

同學們，軍分區唐司令員，我們五十四軍的白副軍長、耿參謀長，向你們作了彙報。我沒有去北京，沒有更多的話可講。我是來向革命小將學習的。學習學習再學習。（全場高呼：向解放軍學習！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也是來接受教育的。聽取群衆的意見，在今後的工作中少犯錯誤。過去我們是堅決支持革聯會的。今後我們怎麽辦呢？過去堅決支持你們，今後我們堅決相信你們，堅決依靠你們，我們不相信你們，又去相信誰呢？有人開玩笑說，你小心不要成爲光杆司令。當然，如果不相信你們，不依靠你們，就可能成爲光杆司令！所以，我們堅決的相信你們，依靠你們。

同學們說，有很多問題想不通。可以有幾個想不通，幾十個想不通，幾百個想不通，上百上千個想不通。但同學們只要抓住一個問題，就一通百通。要瞭解這五條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哪個司令部來的？這五條是從毛主席這個司令部來的，而且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看了，批示了的，肯定了這一點，就能千通萬通了。昨天晚上，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團部的負責人來警司，問我們：這五條能不能打包票，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的？我們所有的負責同志參加了，一致打包票：這是事實。別的不要想的太多了。

我給大家講個故事，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在 1962 年，中印邊界反擊戰時，打印度鬼子，仗打得很好，武器繳了很多。總政來電，要把繳獲武器送回印方。我接到電報想不通，因爲古今中外都沒有過這樣的事。這是敵我矛盾，我們的戰爭是正義的，他們是非正義的。我們是被侵略的，他們是侵略者。繳了他們的械，還要把武器交回去。想不通。我是作政治工作的，很發愁。這時馬上來了一個電報，說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很高興，就把這句話傳下去，全體指戰員沒有說二話，大家議論這是爲什麽？說不出道理，但是只曉得毛主席說的是對的。當時連我們也講不出一句話。就因爲毛主席這一句話，搞了兩天三夜，因爲喜馬拉雅山 5000 多公尺，武器丟得滿山都是。把它收拾起來擦好，最後開了一個清單，叫印度鬼子來收。我們走了以後，非常通。什麽道理？毛主席的

指示，偉大英明，毛主席站得高看得遠。1962年自衛反擊作戰後，印度鬼子不敢調皮。他們的破飛機、破大炮、破武器彈藥，我們看不起，我們繳了又交給他們。看看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什麽樣子。所以這幾年他比較老實了。這件事開始想不通，毛主席一個指示，就想通了。

有的同志認爲革聯會沒有寫上去，想不通。我們要向前看。大會辯論中有位同志講得好：“古人詩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看問題要看得遠，看一千里。革聯會過渡到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是更上一層樓。

還有的同志不太通：五條批評誰多，誰嚴。批評了五十四軍，警司，我們怎麽看？我們去北京前，只想得一句話：“支左沒錯”。見了五條之後，出乎于我們預料之外，說我們支左是顯著的成績。我們不敢當。這是山城四百萬人民、革聯會、八一五派的成績。對五十四軍有批評，是我們有缺點，有錯誤。中央首長的批評是對我們的愛護。

我們堅決響應周總理的號召，山城革命造反派要當表率，當模範，這個表率，這個模範，誰來當？同志們，就是你們八一五派來當。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掌握鬥爭大方向，其次要制止內戰，加强團結。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産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何况重慶只是有不同意見的兩派，爲什麽不能聯合起來？我們要有這個氣魄，八一五派是左派，是真正的左派，要起表率、模範作用，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澤東思想紅旗高舉，高舉，再高舉！我代表全體指戰員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

毛主席萬歲！（全場起立高呼：毛主席萬歲！）

最後由韋軍長指揮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會勝利閉幕。

1967年5月21日

原載革聯委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師專紅衛兵總部

八一五戰鬥團主辦《八一五烽火》第十四期，1967 年 6 月 4 日出版。藍、白講話見第四版，耿講話見第二版。另據重大八一五戰鬥團韶山紅旗戰鬥隊印發、首都衛士戰鬥隊再翻印油印傳單的不同記錄增訂。原件中藍副政委均印作“兰付政委”，錄入時改正。漁歌子錄入。

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五十軍、五十四軍領導時的講話

（根據張國華同志傳達記錄稿）

時間：3 月 15 日 20 時至 16 日零時 30 分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被接見的有：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謝家祥、曲競濟、韋統泰、藍亦農、孫洪道等同志。同時，李大章同志也參加了。李大章同志是中央決定他參加的。

總理：你們最巧，今天我們有工夫、你們就來了，你們在黨委會上的發言都印出來了，有七份。五十軍去年的報告，看了，印象深些。

現在是江蘇、浙江。安徽、湖南、遼寧、陝西、寧夏、新疆，有八個省三月底可以成立革命委員會了。就看你們的了，你們落後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當然這是句古話，不能這麼說。剩下後四個省了，四川、雲南、福建、廣西。（張國華：西藏也聯合了。）還有西藏，也快了。

要把矛頭對準最大走資派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及其頑固追隨者黃新廷、郭林祥，集中對準主要敵人就統一了，派性就少了，共同性就多了。要解決問題，還是按紅十條辦，破題還是破在這上頭。

重慶去年把李井泉搞去，不給反到底鬥，反到底紮了三個草人，鬥了後把他燒了，“紙船明燭照天燒。”爲什麼不給他們鬥，這是大方向問題，我是聽主席說的。主席看的比我們多，是主席看小報，看了給我們講的。主席許多小報都看了。重慶八一五的

《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塗，還有什麼《嘉陵江上烟雲滚滚》，主席都看了。

你們革命委員會三月份搞不起來，四月份總會搞起來，一推動就解决了。

江青：你們是遠方來客，你們那個地方，對我來說很遙遠。解放後我跟總理去過一次，是治牙。四川七千萬人口，是天府之國，就是不要變成了獨立王國，如果變成獨立王國，群衆不允許就是了。各個地方都不能允許。七千萬人口，是個大國，在歐洲就了不起了。

李大章同志怎樣，能站出來嗎？（姚文元：意見很多，各種各樣的意見。）一揭發，二檢查嘛！就可以站出來。

總理：李大章同志檢討我還沒有看，今天晚上看。太長了，縮短一些，不要太長。張體學的檢討不長，檢討的深刻，群衆就滿意了，是個標兵。檢討不在長，要深透。張體學同王任重的關係那麼深，他都站出來了。要到群衆中去。

學習班(指四川班)領導小組解决沒有？（吳法憲：沒有解决。）沒有解决就給他們講，中央開了會了，解决了。

江青：我認識你（指李大章）是一九三二年還是一九三三年？（李大章：一九三二年底。）主要是觸及自己靈魂，揭發，群衆是會原諒你的。（總理：主要揭發李井泉、廖志高。）還可以揭發劉少奇，北方局你是知道的。（李大章：那時沒有見過劉少奇。）還有鄧小平、楊尚昆、彭德懷，他們都是北方局的嘛！楊尚昆不是黨員。（康生：假黨員不少，羅瑞卿都不是黨員，是他自己講的。）在太原是否同劉少奇在一起？（李大章：沒有。）

姚文元：四川小報真多，全國之冠。每個專縣幾派都有目己的報紙。

總理：重慶反到底有多少種報紙？（韋：三十多種報紙。）

江青：每天文件很多，沒有辦法看完。

總理：文件多得不得了，你們不來還沒有時間看你們的文件。

康生：精力顧不過來，一下子拉美（剛接見了智利代表），一下子就回到四川。

伯達：你們那裏熱鬧。((張國華：武鬥厲害，現在主要是幾個專縣，雅安武鬥也很凶。)

江青：那個地方還厲害？地方很大，人口不多。(張國華：成都也打仗，是學生多。）小莆年嘛，愛玩槍。

康生：寶成路通車怎麼樣？

總理：不大好，最近略陽很亂，成都機務段還有問題。

伯達：重慶打炮？（韋：是雙管的高射炮。）

總理：雙管高射炮都打了？是最新的，全國要裝備。

江青：敗家子，不管怎樣是敗家子。不過打一打也好，練習練習。(康生：可以改進技術。）打一陣子好點了吧？（韋：重慶武鬥有一百多幢樓房被打壞。）打毀了，留下來展覽，至少留幢把子，讓後代看看，像北京八一小學一樣，打得稀碎。

總理：開會了，你們講吧！

(張國華彙報四川情況。當談到群衆和領導的心情迫切要求成立革命委員會時。)

江青：是啊！沒有這個心情，你們就成獨立王國了。你們開打也很好，武打全國出名了。

(當彙報到軍工廠造反派頭頭工人少，知識分子多時。)

江青：血統產業工人少，有地富反壞右子女混進去了。還是發動群衆不深入，群衆發動起來了，他們就會起作用了。

楊尚昆是惡霸地主，他的家屬沒有好的。

伯達：要發動群衆起來抓壞人示衆。

江青：李、廖你們鬥了沒有？（張國華：鬥了。）真正鬥了嗎？(張：鬥了。）他的地主老婆鬥了沒有？（張：也鬥了一下，在機關鬥的。)

(當彙報到做產業軍工作時。)

總理：產業軍你們解決的好。

江青：(指梁）你的精神面貌比去年好。你去年在重慶對反到底講話我們都看了，說壞人有百分之三十，講過了，不策略。(梁：沒有講，是他們搞的。)(蘭：是講猛虎團的一個小組織。)你的講話，總的是好的，比例那麼大，縮小一點，就好了。

伯達：保守組織垮了，就鑽到較好的革命群衆組織裏面，把好組織也搞垮。臭的組織垮了，鑽到好的組織搞壞事，把你的名譽也搞臭，要臭一齊臭。革命群衆組織不要去擴大勢力，擴大勢力就糟糕了。跨行業的組織壞人容易鑽進去。還是按照主席“三七”指示搞，歸口大聯合。

（當彙報到楊超在蘇州反省院出來時。）

總理：蘇州反省院出來的，當然是自首。

江青：當然是自首的。（張國華：楊超自稱是研究哲學的。）

江青：是右派黑格爾。

康生：去年把楊超搞來，他態度壞得很，讓他講話他不講。

江青：弄個廖井丹來，他也是個呀呀烏。

康生：黑手很多，就是沒有抓出來。

江青：任白戈是大托派的弟弟，是國防文學的幹將，和羅瑞卿關係不清。

（當彙報到李井泉派劉文珍坐鎮重慶時。）

江青：劉文珍這個人很壞。

（當彙報到二月鎮反抓了八萬多到十萬多人時。）

江青：真能抓，逮捕了十萬多人，是否李井泉的陰魂不散，揭蓋子才行。李井泉這個人殘暴得很，我接到一封信，爲了保護這個人，怕信丟了，不敢把信留下，把它燒了。李井泉要殺人滅口，很殘暴。抓十萬人，搞死了多少？（張國華：死的不多，有搞殘廢的。）

總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以前我知道，一開始就雜一些，衝勁很大（張國華：鑽進去了一些壞人）。

國民黨在四川留下的人很多，有劉文輝、楊森、宋希濂、羅廣文、胡宗南，還有王陵基、蔣介石等軍閥的人，情況複雜，舊社會渣滓多。

江青：因爲一個劇叫我調查，華鎣山我做了調查，碰見鬼，根本沒有這麼回事，羅廣斌是羅廣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們根本不理他。華鎣山游擊隊，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蘭：×××支持萬縣的翻案風。）這個老頭不甘心寂寞的。肖華的老

婆是他的侄女，她妖精得很，還搞塗脂抹粉，還要畫眉。

（當彙報到社會關係的簡況，有七星黨、三老會〔老紅軍、老幹部、老地下黨員〕、自由民主黨時，）

總理、江青：反動得很，要堅決鎮壓。當然要區別對待。組織要解散，核心成員一定要專政。

（當彙報到亂的問題時。）

江青：亂，好得很，都跳出來了。你們看亂得够不够？重慶恐怕亂得差不多了。

（當彙報到四川工作進展遲緩時。）

江青：四川太大了。

總理：是大國。

江青：你們認爲形勢怎樣？（張國華：我們認爲形勢是好的。）你們認識統一就好，把李井泉一夥人揪出來，就好得很。

總理：軍隊統一是主要的。

康生：甘渭漢還參加了會？（指軍區黨委常委擴大會）他的話很壞的。（張國華：甘態度不好。）他在會上檢討了沒有？

張國華：我們剛到四川，第二天就被圍攻，我們說才到幾天，有什麽錯誤。

康生：你們的“錯誤”就是你們去了。

張國華：有人認爲批甘、韋超過了黃、郭。

總理：是兩回事嘛！黃、郭還是要批判嘛！

（當彙報到對二月“鎮反”有分歧時，）

總理：二月“鎮反”根本是錯誤的。

（當彙報到十條爭論大，主要是二條、五條時。）

康生：二條、五條有沒有毛病？

總理：（總理拿出了十條當場念了二條、五條）沒有，我又重看了二條、五條。

康生：要修改二條、五條，這不是替二月鎮反翻案嗎？

（當彙報到有人講十條過時了時。）

江青：十條過時，就讓李井泉再出來嘛！你們覺得過時了沒有？（張國華：我認爲沒有過時。）你們退後半步，就站不住了，

說十條過時了，就是爲李井泉翻案的。

你們七千萬人的大省，才來一千人學習（指我們的學習班），太小氣了，笑話，來七千人嘛！折中來四千也行。

說十條過時，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風。

總理：十條貫徹不够，你們沒有把鬥爭矛頭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貫徹不够，沒有把握住這個主要鬥爭方向，你們在黨委會上的發言都沒有講。

你們在黨委會上的發言，都沒有把握大方向。反劉、張的材料，很多都是從李井泉那裏搞來的，實際上是替李井泉翻案。（曲：有的組織在鬥李井泉的會上，鬥劉、張。）在鬥爭李井泉的大會上鬥劉、張，軍隊有人參加嗎？（曲：軍隊沒人參加，不讓他鬥他不聽。）就不能讓他鬥。（張國華：有人還問（說）總理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對劉、張的表態，是在什麼前提下講的？）這有什麼意義！什麼前提呀？紅十條嘛！就是紅十條。有人對我的表態有懷疑，有什麼懷疑的。（張國華：記得總理還說，再打劉、張要通報全國。）是的，是在主席那裏講的。十條爲五十四軍說了幾句好話，是否有點翹尾巴了。（蘭：五條下達後，沒有壓過反到底，主要是感情上有問題。）對反到底不僅是感情的問題。

江青：你們四川出了那麼多的大報紙，（指群衆組織的報）革籌小組是中央批准的，而且是經過了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們就讓人家那樣搞。劉、張和我沒親，攀不上。（姚文元：這次是第二次見面。）那麼大的報，你們不管，主席連小報都看。三個簡玉霞，是主席在小報上看的。你們領導是有不同看法的，是毫不顧大局的看法。革籌小組是中央批准的，四川大報很多，人家占領了輿論陣地，是壓倒優勢，你們不管。

我今天放一炮，你們兩位（指張、梁）是中央派的，一個從廣東去的，一個從西藏去的。劉、張是中央平反的。你們是一起從這裏回四川的，應該抱得緊。張、梁是軍隊的，更應該主動。我這樣講，不能說劉、張沒有缺點，劉、張也有缺點錯誤。要顧全大局。四川已經亂得差不多了。不顧全大局的人，什麼事情也辦不好。你們要搞大聯合，先從你們革籌小組大聯合，不然你們

就大聯合不了。都是人民解放軍嘛，應該顧全大局，有什麼問題解決不了！你們在十條面前，退半步，你們自己也呆不住，不要說完成主席給你們的使命了。十個手指伸出來不一樣齊嘛！馬列主義水平也不一樣高，但是你們總是整體嘛！只有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求大同，存小异，要顧全大局。剛才聽了兩個多小時，全是客觀報道，多少要有點傾向性嘛！

總理：他是瞭解情況的，有點吞吞吐吐（指張國華）。我問的那句話，就是要你直說，你要敢講。你那發言是滑稽的，你對重慶兩派的說法是矛盾的。八一五是響應紅成在成都打劉、張的，你說他比反到底錯誤少，你的發言是有偏向的，沒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講話。你在中印邊界主席交給你的任務，你的决心那麽大，爲什麽這次你沒有那麽大的决心。十條對五十四軍稱贊了，五十四軍有點翹尾巴。對八一五偏聽，所以八一五響應紅成打倒劉、張的口號，沒有站在全域，五十軍去年十二月的電報是好的。五十四軍在重慶的態度有問題，助長了紅成打倒劉、張的氣焰。張、梁、劉、張是不可分的，是十條上肯定的。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綫上。（指梁）你在重慶對反到底的講話，敢耶麽批評，沒有講八一五。給八一五那樣講就好了。（梁興初：給八一五講了。）我沒有看到。

江青：革籌小組去了沒有十天，就打倒劉、張，就分裂了，試問你們革籌怎麽領導工作！分了派，不是毛澤東思想革命派。七千萬人的地方，委托給你們，你們值得深思。我們對李大章同志的問題說了好久了，現在還沒有讓他站出來。（指李大章）你要保持政治上的青春。六十幾了？（李大章：六十八了。）六十八不算老。

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正因爲張、梁是軍隊的，是老紅軍，責任更重。

總理：你們那裏有的是批判對象，李、廖同夥，劉、鄧同夥很多，都在那裏。

江青：我和劉、張無私交。不能是口頭上擁護十條，具體就不通了。如果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貫徹十條，那問題就解决了。

如果你們也認爲十條過時了，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

總理：如果鬥爭矛頭對準劉、鄧、賀、李、廖及其一小撮同夥，那就把思想統一起來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你們開了五十多天的會，沒有把這個問題突出。如果突出了，問題就解決了。

江青：你們說複雜，北京派性複雜不複雜？你們不要看得太嚴重。不提路綫鬥爭，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姚文元：我看了紅成的一個大報，把李井泉過去搞劉、張的材料完全翻過來了，說李井泉對劉、張如何好，公開替李井泉說話，替李井泉塗脂抹粉，要批判。

謝富治：沒有批駁，它就有市場。

總理：你們在成都要像梁興初同志在重慶對反到底的講話那樣，尖銳的批評紅成對劉、張的問題，問題就解決了。劉、張對八二六多講，張、梁對紅成多講，大家講話，口徑一致，就能在主席革命路綫上團結起來了。你們要對準大方向，把鬥爭矛頭對準劉、鄧、李、廖、黃、郭。

姚文元：你們把劉、張問題明確了，問題就解決了。

江青：目前在全國右傾翻案是主要危險。我就不相信你們那裏沒有右傾翻案風。他們對二月逆流翻案，我們對北京學生就炮轟他一陣。（姚文元：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是一起的。）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勝利。王光美是大特務，是美國特務，劉少奇是大叛徒，四次叛變，我們有確鑿的證據。要看到這個勝利，就不會再說糟得很啦。我看好得很，特別重慶打得稀爛，陣綫就比較清楚丁，好得很。（張國華：重慶有的群衆組織打倒劉、張，軍隊也有，現在還要打倒我。）點透了，打倒劉，張，還是要打倒你們。要敢于講話，王、關問題就是我們端出來的，（姚：就是江青同志端出來的。）他們藉王、關攻我們，把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個個的端，我們敢站出來講話。

康生：四川問題不能解決，主要是方向有問題。打倒劉、張，你們講一句是給李井泉翻案就行了嘛！

江青：你們不能光講派性，不講路綫鬥爭。你們是中央派去的，

要維護主席的革命路綫。

康生：你們五十多天的會，越扯越複雜。

江青：我們今天炮轟你們，明天你們可以炮轟我們，我總不是兩面派，你從我整個發言看看，我不是反軍隊的。你們是否堅定地維護黨中央、主席、林副主席，這個問題要講清楚。不清楚，任何人都要覆滅在群衆運動鬥爭的洪流中（吳法憲：江青同志批評的對，是對我們的最大愛護）。中央文革出了個別壞人，不等于中央文革出了問題，中央過去的決定，都是代表中央的，不是哪個人搞的。你們（指張、梁）是主席、林副主席點了將的，特別要你們去四川的。你們是否堅決維護主席的革命路綫?

康生：反劉、張就是給李、廖翻案。

總理：就是劉、鄧復辟。

江青：你們不提路綫鬥爭，老在那裏講派性，我就有派性，無産階級革命派同資産階級是敵對的兩大派。

你們對學生怕得要死，不讓工人左右局勢，又不去深入到工人中去做工作。大工廠不聯合，這裏面一定有壞蛋。

謝富治：特別是軍工。

吳法憲：劉結挺同志當學習班領導組長，還通不過，是怪事。

總理：不執行中央的指示，就是反中央，在四川就是站在李、廖一邊，在全國就是站在劉、鄧一邊。今天就講到這裏，學習兩天，明天就到學習班去講，問他們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李、廖走，劉、鄧走。

江青：（指張、梁）你們要好好想想，不站在主席革命路綫上，嘴軟，腿軟怎麽行。對一派軟，對另一派就不軟，怕什麽，頂多是捅一刀子，一顆子彈。你們把鬥爭鋒芒對準敵人，群衆是不難說通的。

總理：你們四個到學習班去講，都站出來一起表態。

吳法憲：我們軍隊同志首先要尊重劉、張，劉結挺是軍區副政委嘛!

江青：你們革籌小組幾個月了?（張國華：九個多月了。）老天爺啊，你們革籌小組九個月了還沒有擴大。（張國華：擴大

了幾個。）今天炮轟你們，不對的話，明天你們炮轟我們。（總理：你們七個人明天一齊去表態。）軍隊更好說話嘛！你們是軍人嘛！

謝富治：江青同志講的話，是對軍隊的最大關懷和支持。

吳法憲：江青同志的話，是極重要的指示，是爲了四川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江青：（指張、梁）你們兩個人有風格，去四川時還敢下車，沒有坐直升飛機。

總理：五十四軍去年風格不錯！就是回去翹尾巴了，不僅思想感情沒轉過來，立場也沒有轉過來。

吳法憲：批評是對你們的最大關懷，最大支持。

伯達：對李、廖及其同夥，必須充分揭露。（張西挺：有人講要李井泉,不要劉結挺）說要李井泉,不要劉結挺是反革命口號。

江青：我聽了兩小時，我今天轟你們，明天你們轟我，你們兩個（指張、梁）是主席點的將，說了半天，相當曖昧，兩類矛盾區分不了。（伯達：你們沒有高姿態。）李大章的問題不知說了多少次了，到現在站不出來。李大章同志，我爲了接濟你，一天吃兩個燒餅。要保持革命的晚節。到延安後，劉少奇迫害我，矛頭是對準主席的。

康生：你們有決心嗎?

江青：怎麽樣，今天對你們兩個的批評，心裏不舒服嗎？不舒服我還要轟。（張、梁：很舒服，很好,）如果說感情深厚，我對軍隊是最有感情的。劉、張同志，對這個問題，也好好地想想。

四川了不得了，有一個女同志參加工作就是好（指張西挺同志），還要搞點女將，不要搞大男子主義。××（指某革命委員會沒有女同志參加）封建死了，連資本主義都不如。

你們工人工作做的不深入，軍工廠多，黑手多，只要深入，工人發動起來了，就好了。

對學生要嚴格，學校是資産階級教育制度（過去）。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改造他們。

總理：教育、批評、聯合。用毛澤東思想教育,然後批評、聯合。

江青：你們小小司令部，都不能捏到一起，那麽四川七千萬

人怎麼辦!

康生：部隊同志在學習班有多少人？（劉結挺：有三百多人。）軍分區、武裝部也有吧？（答：有）

江青：李井泉的老婆搞起來了沒有？還有廖志高的老婆，很壞。

（當張國華說到蔡文彬情況時。）

謝富治：讓蔡文彬來。

伯達：坐飛機來。

總理：你們對紅成、八一五像對反到底那樣批評就好了。八一五前年把李井泉弄到重慶，不讓鬥爭，保護起來。這次八一五又把李井泉弄到重慶去（蘭：是市革籌）。反到底得不到機會鬥，不然他們爲什麼反映這麼强烈。市革籌處理是不公正的，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綫上。

江青：我們在群衆面前，是整整齊齊的，缺一個我們都等着。

康生：把兩類矛盾分清了，就清楚了。

江青：氣度要大些，無産階級革命派嘛！

康生：紅成藉鬥爭李井泉爲名，實際鬥劉、張，顛倒敵我，是不能允許的。

江青：怎麼樣，心裏不舒服嗎？

姚文元：江青同志是最愛護解放軍的，她是站在軍隊自己革命立場上提出問題的。

江青：還要有一種風格，把問題擺開，提到桌面上，不要在背後嘀咕。

總理：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嘛！好吧，你們回去先學習兩天。

（原印發的這個講話，與此件有不符之處，均以此件爲准）

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

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政工組、
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部隊政治部　　翻印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

中央首長接見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全體學員的講話

時間：1968 年 5 月 28 日晚 8.45 — 10.50，

地點：人民大會堂。

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吳法憲、黃永勝、汪東興、葉群等中央首長接見了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李大章等。

（當首長們到主席臺時，全場起立歡呼：毛主席萬歲！）

總理：坐下。

江青：請同志們坐下。（衆：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向同志們學習！向同志們致敬！

現在請康生同志宣讀中央批示。

康生：同志們，現在我宣讀中央的批示。文件上有紅字，寫着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筆批示：照辦。

（衆熱烈歡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念文件全文（略）

江青：現在請總理給我們講話。（衆：向總理學習！向總理致敬！）

總理：向同志們學習！向同志們致敬！！

同志們，問你們好！大家剛才聽到康生同志念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示的中央批示，也是林副主席參加批示的。

現在，我首先應該慶賀和預祝你們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衆呼口號）

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正如中央批示上所說的，這個勝利來之不易。是你們在座的各方面的代表，革命群衆組織的代表，軍隊代表共同努力取得的。這個勝利怎麼取得的？這是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勝利，是你們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偉大勝利。這首先應歸功于偉大領袖毛主席，應歸功于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衆熱烈歡呼：毛主席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勝利萬歲！）我們應該說是四川七千萬軍民努力取得的偉大勝利。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四川是中國最大的省，有七千萬人口，占全國的十分之一。你們今天成立革命委員會，雖然晚一些，是經過多次較量，與反革命較量得來的，是有偉大意義的，正如中央批示講是來之不易的。我們從前年就接見有你們的代表，有的代表反復來過多次。紅成中間有反復，走了彎路。有一次，我們有錯誤。去年七月紅成有很多人要到北京來談一談，我們只請來了少數人。我們偉大領袖批評我們有點失策，應該來，後來來了 500 多人，來少了，講了，回去後沒有傳達，有反復。人若多來一些，就廣，就深，就理解得快一些。少數人歪曲中央負責同志講話。人來少了是教訓。二萬多人，聽起來多，比起前年一千三百萬紅衛兵又算得了多少？！（總理笑了，衆活躍，歡笑）四川這麼大，七千萬人，各種思潮總是要表現。四川是大後方，有很多好的方面，廣大群衆是好的，有人民解放軍保護你們，是好的，革命幹部要站出來了。但是，總有一小撮階級敵人不甘心失敗，不但是走資派，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封建性多一點，四川封建性强一些。雖然經過了土改，但是地富反壞右、封建殘渣、反動會道門、哥老會、袍哥都有，抗戰蔣介石又進去了，把很多反動派帶去了。國民黨軍、警、憲兵、特務、黨團骨幹沒有跑得了。四川是最後解放的之一，蔣介石還想在重慶負隅頑抗，最後才坐飛機跑的嘛！有的就跑不掉囉。有的是有意識部署在各個方面的，在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躲在峨眉山，搞了一些企業，在經濟系統安插了一些人，而且抗戰時英、美、日本還培養了不少的特務，改頭換面留下來。總之，舊社會遺留

下來的渣滓很多，重慶特別多。

解放後，在西綫主持的，現在看來，很多都是走資派的頭目，各方面都是鄧小平、賀龍、彭德懷、彭、羅、陸、楊，三綫建設還有薄一波，組織建設還有安子文，這些人都到那裏去過。還有李井泉、羅瑞卿，特別是主持西南的李井泉，這個反動的三反分子，搞了個獨立王國，在黨內（團內）埋藏了很多叛徒、特務。在這樣一個環境，無産階級革命派起來造他們的反，就要受到干擾，就要牽連到李、廖、任、黃，你們與他們進行了堅决的鬥爭，直到去年把他們推翻。但是，他們用各種隱蔽的方式，兩面派的欺騙方法，通過他們的黨羽作破壞工作，去年，軍內的少數幾個人，把革命運動壓下去，後來有了十條、五條和中央一系列指示，也還有反復，是兩派革命群衆組織對立，本來兩派革命群衆組織都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都要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但是後面有黑手，壞人在挑撥，意見不一，使人民內部的爭論難于解决，還搞武鬥，把鬥爭矛頭指錯了，不是指向敵人，把人民內部矛盾發展成爲敵我矛盾似的，這些都是由于沒有認清階級鬥爭形勢，這與領導有關。

這次來到北京學習時間很長，收穫很大，到底把矛頭指向誰？就是要指向暗藏的敵人、叛徒、特務、走資派，分清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任務明確了，哪一方犯錯誤都進行自我批評，然後是軍隊。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統一起來了，然後又再向群衆作自我批評，這樣就使原來對立很凶的緩和了，不作敵我矛盾看了，兩派能坐在一起談問題，這是很大的收穫。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和革籌小組的軍隊負責同志二次座談，即 3 · 15，4 · 27 的二次座談，你們知道了嗎？（衆：知道了。）對他們有幫助，有推動。在這個時候就把界限劃清，矛頭不是指向革籌的幾個人了嘛，不是指向革命群衆組織了嘛！更不是指向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無産階級司令部，不是指向人民解放軍，不是指向新生的紅色政權，而是指向走資派、叛徒、特務、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這才是真正的方向。這是 3 · 15、4 · 27 以後才解决的，從三、四、五三個月學習中可以看得出，兩派能坐在一起談問題，最嚴重的

重慶，兩派對立那麽凶，現在能坐在一起商量，一道搞革命委員會了，提出了重慶到省革命委員會的名單，還有兩名副主任沒有解決，如果不走，在這裏解決不是更好嗎？這是很大的進步，對此，我們向你們祝賀（口號）。在這當中，一針見血的，就是江青同志在三月十五日指出的，把矛頭指向劉結挺、張西挺同志，就是爲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翻案。這句話最尖銳了，一句話就使你們猛然醒悟了，是不是這樣？（衆：是）所以解決問題，常常說很多話都不解決，一、二句最尖銳的話就解決了，你們要記住，要常常想到江青同志講的這句話。重慶的兩名副主任委員還未解決，（註：指省革委會副主任委員）我覺得這還是一件遺憾的事，革命委員會成員 270 名，常委 55 名，主任張國華，副主任 18 名，還留有一些機動，重慶兩名副主任委員沒有推出來，既然常委都推出來了，爲什麽兩名副主任推不出來，總還有一些問題，要與家中商量是可以的，是允許的，在討論時，不要爭席位，爭名額，有爭名額時，要想到共同對敵，有這種精神就好解決了。當常委，副主任都是爲人民服務，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有時工作做不好還感到難過，現在留一部分機動，這樣充裕一點。我們是同意的。你們在最近選出來，即使省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還有很多專縣還沒有成立，還未大聯合，有的地方還搞武鬥，兩派革命群衆組織要說服，要做工作，要推動他們，紅成、重慶“8·15”和專縣野戰兵團脫離關係，這很好。要進一步推動他們，說服他們，不要去打內訌，要回去抓革命促生産，不僅自己要搞好，還要幫助他們搞好革命委員會。你們要愛護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無産階級司令部，這是第一個問題，祝賀你們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就講這幾句。

第二個問題，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務繁重，要深入開展革命的大批判，因爲過去對劉、鄧及其在西南的代理人李井泉聯合批判不够，流毒很深，還未肅清，你們不是要解放大西南嗎？這個口號現在才實現，貴州開了個頭，還不够，四川處于首位，一定要四川起來，四川在西南影響很大。要把他們批深批透，鬥倒鬥臭。這是你們的責任，兩派要聯合批判。同時，還要聯合起

來清理階級隊伍，把最壞的人揪出來，當然要區別對待，最近我們印了江青同志的二個講話。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五日給文藝界座談的講話，……主席批示的某個印刷廠清理階級隊伍的材料，還有公檢法清理階級隊伍的材料，這點在四川很重要，中央是寫在第一條的，希望你們兩派要聯合，深入地把階級敵人清理出來，只有這樣你們才能心明眼亮，四川這個大後方才能鞏固。

第三個問題，四川革命群衆組織，一開始都是跨行業搞起來的，成都是這樣。成都兩大派，“8·26”、“兵團”、“紅成”，過去戰鬥在一起，與李井泉作鬥爭，流血在一起嘛！一月奪權後發生分歧，分開了，去年夏天談，秋天談都沒有解決，現在才解決了。不要斤斤計較過去誰錯的多，誰錯的少，對得多一點的不要去壓對方，壓是壓不倒的，因爲他代表一部分群衆的想法，只有各自多作自我批評，你多學了一些毛澤東思想，更符合毛澤東思想一些，就要作思想工作。要聯合搞大批判，不允許跨行業的組織，你抓一坨，我抓一坨，容易對立，再加上壞人挑撥，就打起來了。現在省革籌有報告，中央批示了，就要按批示辦，各派組織都應按系統、行業、班級實現革命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成都搞得好的要帶頭嘛！“8·26”、“兵團”、“紅成”等組織要帶頭。你們現在都參加了革命委員會。進入了臨時權力機構，是代表四川七千萬軍民的，不是屬于哪一派，要講派是無産階級革命派，思想是毛澤東思想，路綫是毛主席革命路綫，不管哪一個組織，都有缺點錯誤，要聯合起來，才能體現三個“忠”字，在組織上聯合要努力。不要把資産階級派性、小團體主義、山頭主義帶到革命委員會來。現在不是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風嗎？首先要在革命委員會委員、常委中體現出來。希望成都無産階級革命派作出榜樣，影響專縣，推動重慶。重慶是個大城市，是個很重要的工業城市，（口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圭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位同志口號對呀！讀毛主席的書，做毛主席的好戰士，要在實際中體現出來。委員問題，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認爲是比較好的，婦女的名額增加了，仍然還不滿意，比別的省

比例高了。常委 55 名，留三名機動，現在報了 50 名，兵團又加上一名，婦女成員有 9 名，接近五分之一，還有五名還可以補，不算壞，但不完全滿意。爲什麼這樣强調此事，因爲鬧革命時，我親自見到你們有很多女將，還有打傷的，鬥爭很英勇，現在看名單就沒有了，不知是什麼原因？鬧革命有她們，掌權時就不要她們了，這還不是大男子主義？是不是四舊？（衆：是。）我很支持江青同志的意見，打天下有她們，坐天下沒有她們。（呼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致敬！）舊意識應不應該打破呀？（衆：應該）向江青同志學習，江青同志就是林副主席之下，學習毛澤東思想最好的學生，我看現在在座學習的女同志就很少，這個舊習慣不易打破，在勞動人民中，婦女作用很大，重慶的同志知道，在工廠中，就是在國防工廠中，婦女也是很多的。我在四川呆過，四川的婦女是很勤勞的。

第四個問題，擁軍愛民要作得好一些，前年是黃、郭的問題，去年初在支左中犯錯誤，很快糾正了，那是黃、郭的事，下面也鑽進了少數壞人，還有起義的，什麼起義的，就是包圍了繳了槍沒有得到改造，但是總的比其他單位少得多，總的是好的。我們的軍隊是毛主席親自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戰無不勝的，舉世無雙的，（呼口號：向解放軍學習！）是，應該向解放軍學習，前年林副主席就提出來了。解放軍保衛了你們，保衛了企業，保衛了礦山，保衛了鐵路，有很多挨了打，換了罵，你們應該愛護他們，解放軍有很大功績。擁軍愛民是雙方面的，革命群衆組織要擁軍。現在寶成鐵路還常常不通，我們給他們說了，你們造走資派的反，你們現在兩派自己打就不對了。寶成鐵路很重要，到株洲，到雲南邊境，到緬甸、越南，到湛江，寶成綫一斷，兩方面受影響，不僅影響到國內，還影響到國際，要尊重中央指示。堅決執行二六命令，這是兩方面的問題。最近，四川還有人到陝西去，因爲小事爭執打起來火車中斷了。現在革命委員會來領導，一元化了，就更好商量。

最後，你們報告中講了，中央批示也講了，四川是祖國的大後方，生産，特別是國防生産影響很大，四川革委會成立了、三

綫建設，渡口還好，其他有的停頓了，有的兩派還搞武鬥，以前道理未講清，領導有責任，軍管會有些錯誤，加上有壞人破壞，現在革命委員會成立了，三綫建設，對國防影響很大，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你們學習了許多文件，帶回去還要學，學通了革命道理，思想通了，相信大家，生產很快就能促上去。特別是重慶、成都、德陽。同志們，回去要起模範帶頭作用，行不行？（衆：行！總理帶頭鼓掌，）是呀！現在的生產，不論是工業、國防、交通運輸、三綫建設，四川都有很重要的戰略地位。四川革委會成立，我們感到很興奮，在這樣的人民大會堂開這個慶祝大會，預祝你們勝利，你們把這把火帶回去，把階級敵人揪出來，在各地搞大聯合，抓革命促生產，這些希望都在在座同志們身上。（衆呼口號，略。）

江青：現在請康生同志講話。

康老：問同志們好！（衆：向康老學習！向康老致敬！）向同志們學習！向同志們致敬！一個七千萬人口的大省，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這是一件大事，是經過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取得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偉大勝利，是劉、鄧修正主義路綫的徹底失敗（口號）。我完全同意總理的講話。

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不僅對我國有影響，對世界革命都有一定的影響，前幾天蘇修看到東北的遼寧成立了革委會，說四川是中國最大的省，還沒有成立革委會，還在搞武鬥。現在讓蘇修看一看，四川人民是怎樣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綫的（衆呼口號）。四川革命委員會成立，不僅對中國赫魯曉夫是個打擊，對世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也是一個粉碎性的打擊。

四川革委會的成立，是革命小將、廣大革命群衆艱苦奮鬥的結果。他們跟劉、鄧、彭、賀、彭、羅、陸、楊、李井泉經過了反復的鬥爭，他們在鬥爭中英勇奮戰，把這些人徹底打垮，在人民解放軍支持下，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應當向革命小將學習！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學習！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學習！（衆呼口號。）

又一次證明，正如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的，要相信和依

靠群衆，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從四川革命委員會的成立證明了偉大領袖毛主席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預言。

我參加中央解決各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會議，像這樣盛大的會議還是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也還是第一次。這大概是四川人多，七千萬，人多是好條件。人多不用毛澤東思想挂帥就成了武鬥的人多了（衆笑），人多用毛澤東思想挂帥，就是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衆呼口號），七千萬人民同毛澤東思想相結合，這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證無産階級專政不變顏色，反對修正主義的强大力量。事實證明，毛澤東思想完全可以和人民結合，是不是？（衆：是。呼口號）。同志們可以學習的東西很多，剛才總理講了，同志們學了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綫要帶回去，點四川的火，奪取四川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這一點，我們相信你們，并預祝你們成功。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震動世界的，是史無前例的，由于沒有經驗，革命小將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可能犯錯誤，犯了錯誤不要緊，關鍵在于改，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這一點，從四川成立革命委員會證明。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

四川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林副主席是非常關心的，中央文革、總理、伯達、江青都是非常關心，多次解決四川問題，最後經過同志們的努力，實現了今天的結果。

同志們要特別注意毛主席的批示，照辦。照辦不照辦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標準問題。忠不忠不是口頭上講，而是要看實際行動。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劉、鄧、陶，彭、羅、陸、楊搞了反革命兩面手法，革命小將起來了，打倒了這些反革命兩面派。同時，我們的革命群衆、革命小將不要受他們兩面派的影響，要時時警惕，時時檢查，看言行是否一致，不要口是心非，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要時時檢查一下是不是符合主席思想。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不容易，寫文章容易，實踐不容易。同志們要注意，毛主席講文鬥，不要武鬥，有些人口裏喊不要武鬥，下面又踢一脚，

這就是言行不一致，是資產階級政客手法，是反革命特務手法，劉、鄧、彭、羅、陸、楊，也用兩面手法，這是他們一貫的手法，我們反對劉、鄧、李井泉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我們要揭露他們這種兩面手法，我們不能搞兩面手法，玩兩面手段沒有好結果，必然葬送自己。

我們學習毛澤東思想，言行是不是一致，所學和所用的是不是一致，理論和實踐是不是一致，可以檢查一下，有沒有不一致的，不一致的就要改正。要言行一致，學用一致，理論與實踐一致，始終一致。開始很好，後來就不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了兩年後的現在，要奪取全面的勝利，要檢查一下，是不是始終一致。我們看到，在北京有些學校開始很好，現在犯了錯誤，走到邪路上去了，很不容易改過來。我們一樣，要保持晚節，我七十了，革命四、五十年了，是不是驕傲了，放鬆了，不學習毛澤東思想就不行，靠老本就不行，吃老本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改正，要始終一致。你們兩大派革命群衆組織，在順利的情況下要檢查，在受到挫折時也要檢查，在走正確路綫時要言行一致。我們在反對劉、鄧路綫，反對彭、羅、陸、楊、李井泉、薄一波時，要懂得他們這一套，要堅決反對他們的反革命兩面手法。楊、余、傅是典型的兩面派，還有王、關、戚。

希望你們進一步與階級敵人作鬥爭，清理階級隊伍，把叛徒、特務、走資派揪出來，識別他們的反革命兩面手法。

毛主席指示條條照辦，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七千萬人的四川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總理：現在請江青同志講話。（衆呼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們好！向祖國的大後方，四川的革命群衆、革命小將、革命同志們學習致敬！

剛才總理．康老的講話我同意。剛才康老講，今天有五、六千人在首都人民大禮堂，開這樣盛大的會，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呼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向革命群衆學習！致敬！我們歡迎從遙遠的祖國的大後方來的同志們，同時預祝四

川革命委員會的誕生。

我講一下國際國內形勢。目前國際上正處于革命大風暴的浪潮中，這個浪潮席捲全世界。從去年冬季開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反動統治的國家，開始了財政危機，去年底英鎊開始貶值，今年一月美元貶值，從而引起經濟基礎動搖、崩潰，這是主要原因。所以出現了此起彼伏的抗暴運動，例如四月美國黑人的抗暴運動，五月三日的法國學生運動，五月十三日開始的法國工人和學生結合的罷工運動。目前在法國已有一千多萬人參加，還有西德，西班牙，席捲全世界，這是空前的。因爲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嚴重的危機，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所以起來反抗。但是，另外一個原因，應該說的，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以道義上的聲援。所以，國際上是一片大好形勢。我不知道同志們看報沒有？（衆：看了。）這是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不僅對我這樣的人，在記憶中沒有看過這樣的革命高潮，就是革命前輩也沒有看到過。這種形勢，反過來也是對我們道義上的支持。（衆呼口號。）

國內形勢也是一片大好，全國 29 個省市，四川省第 24 名，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有人說，這與你們四川這個四字有關係，（江青同志、總理等笑，衆笑。）現在剩下五個省也都到北京等待解決問題，個別的因爲偶然的原因，出現反復。儘管我們沒有在“五一”前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但是現在是 24 個了，特別是四川七千萬人，是個大省，相當二個、三個省，在世界上還算一個大國（江青同志笑了，衆笑了）形勢大好，雖然有些地方出現武鬥，有的還厲害，出現反復，這是支流，不是主流，正如康老講的，儘管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錯誤不是主流，是支流，成績是主流。四川怎麼樣？形勢也是大好的，因爲你們打的很久了，現在有的地方還打一點，但是不關緊要。不久前還打的厲害，但現在你們幾千人能坐在大會堂開會，商量問題，這是不是形勢大好嘛！你們以前打內戰打得要命，現在坐下來，搞大聯合，三結合，這是大好形勢。

另外，我講一講革命委員會的問題。成立革命委員會是一件

大事，因爲革命委員會是革命群衆參加的，黨政軍一元化的領導班子，這就說明了政權的性質。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委員，按270名分配，革命群衆組織代表占63%，這個比例是了不起的，世界上沒有的（衆呼口號）。軍隊代表36名，占15%。人民解放軍是工農子弟兵，出身絕大多數是工人、貧下中農，這個15%與革命群衆挂鈎比例就更大了。革命幹部50名，占22%，這個比例也不小。當然，四川這樣一個大省，工業的比重大，應該有更多的幹部站出來工作，你們要幫助他們站出來，只要不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都要與人爲善，幫助他們站出來。

因此，這個革命委員會的性質是有充分的革命群衆基礎，有着人民解放軍作堅强柱石，又有革命幹部作重要組成部分的。這種領導形式是很好的，是革命群衆創造出來的。因此，革命群衆，革命小將，人民解放軍，革命幹部都要很好愛護革命委員會，對新生事物要幫助她發展鞏固，她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和毛病，但是應該看到這是新生的黨政軍一元化的政權。剛才總理、康老講了，說得到就要辦得到。我們必須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批示照辦。重要的是發展和鞏固就要誕生的革命委員會(衆呼口號)。

總理：請伯達同志講話。

伯達：我完全同意總理、康生、江青同志剛才的講話。（衆呼口號：向伯達同志學習！向伯達同志致敬！伯達同志擺手：這是錯誤的，這是錯誤的。）

請同志們特別注意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批示的“照辦”兩個字，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四川七千萬人民的最大關懷，最大鼓舞。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同志們,應該按毛主席的批示去辦，去努力，這是一個很好的考驗。現在我不想多說了。需要提出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一段話加以强調,（伯達同志念：“中央希望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繼續建立革命委員會”。）今天我想講這段話。

按系統，按行業，按班級實現革命大聯合，是毛主席去年春天就提出的。通過一年的實踐,現在看,這是多麽正確,事實證明,按毛主席指示辦，就能發展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一些跨行業的

組織，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起了作用，後來就出現偏差。因爲是跨行業的組織，相互不瞭解，不認識，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少數壞人、走資派容易混入。極少數的壞人在跨行業的組織裏面搞挑撥離間，因此，我們建議同志們好好考慮這個問題，執行毛主席的指示。當然也要逐步的來，自然而然的來，不要急躁，不要衝動，要戒驕戒躁。首先大家要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很好的鬥私批修，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江青同志曾經說，不要忽視婦女，這是有理論根據的，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婦女沒有得到徹底解放，無産階級也不能得到徹底解放。請同志們經常注意江青同志提出的問題（口號略）。

總理：同志們，現在結束。（衆呼口號略。）

總理指揮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後，總理說江青同志建議唱“國際歌”，總理又指揮大家唱“國際歌”。

（根據記錄整理，僅供參考，以正式文件爲准。）

重慶八一五赴京學習代表整理

工總部一輕
山城八一五印刷工人戰鬥團總團翻印
一九六八年五月

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委、成都軍區赴京學習班全體同志的重要講話

【中共中央于1969年11月5日至12月27日在北京召開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歷時長達53天。12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對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都軍區黨委《關于解決四川當前若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經毛澤東批示“照辦”後以中發〔69〕87號文件發出（時稱“一二·二五”批示）。這是這次會議結束時的講話。】

時間：1969年12月27日20時25分至28日0時10分

地點：京西賓館會議室

出席接見的中央首長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黃永勝、姚文元、李先念、謝富治、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

周恩來：同志們，今天是你們在北京全體同志的最後一次會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留在京的，凡能到的同志都請來了。江青同志、富治、文元同志，他們有別的安排了，還是把他們請來見見你們。這是最後一次會議了嘛。但他們還有別的事，好不好？歡迎他們退場！（熱烈鼓掌，歡送江青、謝富治、姚文元退場。）

你們的報告，就是四川省革委、成都軍區黨委《關于四川當前若干問題的報告》，你們經過多次討論了，由核心領導小組負責同志起草，你們各小組討論了兩三次，一直到前天還討論，最近又根據你們要修改的意見，又采納一些，最後定稿，凡是你們提出的意見都吸收了。根據你們的報告，我們政治局討論了多次，又修改了兩次。最後請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批准了，是12月25日23時批准的：“照辦”。

我現沒有帶本子講，你們不要記錄，免得你們回去各取所需，各記所傳。所以你們也不需要記錄，一定要記，記幾個字就够了。我反正照本本解釋。免得你們回去各取所需，各執一詞。最大的就是這兩年，這三四個月的經驗教訓。就是這一條。你們這次也真正吃苦了。

反正你們這派講的，他必然攻你。他講以後，你又攻他。攻來攻去，攻得大家都有派性。好啊，現在需要回到黨性上來了，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上來了。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指示辦事了。所以，我們現在也不想離開本本，照本宣科好一點。我先讀批示，批示并不長，很短，一段一段地講。

（讀批示第一段）

第一個報告，我們打算隨同批示一直發到你們四川省的縣、團級，與縣相當的機關，然後再由你們口頭傳達到下層，基層。第二個報告，《關于加速四川地區三綫建設的請示報告》，因爲機密性比較多，只發到地、師一級，因爲這個任務只傳達給地，不需要普遍傳，所以這兩個報告，中央表示同意。最重要的還是這句話：是你們“堅决貫徹執行”。你們自己寫的報告，通過的報告，你們要負責執行。你們總不能說是中央强加給你們的嘛，是不是强加你們的？（熱烈鼓掌）啊，沒有嘛，那就希望你們貫徹執行。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爲了迅速解决四川的問題，加强三綫建設和落實戰備，中央决定……”這是一個帽子。你們要迅速解决四川問題，不能再緩了。我們要迎接七十年代了——還有四天。三綫建設也已經耽誤兩年多了。現在要趕上去，還要落實戰備。全國都在搞動員備戰。九大以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要準備打仗”，開會談了的，一直到現在，已經九個月了。無論如何不能再推遲了。一個三綫建設，一個備戰工作，非常緊迫。首先解决四川問題。你革命抓不好，那三綫建設、備戰工作就說不上了。首先還是解决你們四川的革命問題，所以中央决定先從組織上解决，組織上就是表示我們要加强領導。第一個就是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黨的一元化領導，統一黨、政、軍的工作。所以要

把核心小組明確規定，就是要把黨在四川省的權力機構——四川省革命委員會裏頭，成立一個核心領導小組，就是黨的領導，領導全川黨、政、軍、群的工作。這回擴大了。過去人比較少，現在擴大到十五名。這裏頭軍隊同志占很大數目，有十一位，當然囉，把劉結挺同志也算在解放軍裏頭，他自己說犯有錯誤，但還是解放軍。應該要求自己嚴嘛。那麼，不是解放軍有四位了：李大章同志、徐馳同志、張西挺同志，還有魯大東同志。因爲黨的領導必須加强。也必須要久經考驗的，即使有的犯了嚴重錯誤的，但還允許他在集體裏面改嘛。毛主席說了嘛，九大政治局裏也有犯有嚴重錯誤的嘛。他們願意改，還是吸收在裏頭嘛。這個比例當然占少了，緊跟毛主席走的占多數了。那麼同樣的，四川省應該把解放軍成份增加，這個問題我們在軍隊同志會上講了。現在也對你們講。四川今後的工作，要迅速得到解決。主要的是依靠解放軍，這是橋梁。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把毛主席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九大的新中央的指示，傳達到廣大群衆中去，使群衆更好地掌握毛澤東思想，使群衆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起來，把四川工作，從革命到生産、到戰備、到工作都促上來。都需要通過解放軍的努力。所以在成份上有調整，解放軍的比例要擴大，增加。當然也要依靠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在常委會的內部，就包含得廣了。包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貢獻而又犯了錯誤的青年人，也要吸收他們，教育他們。青年人犯了錯誤又願意改，當然要依靠，不僅在工作中，還要在勞動中，鍛煉、改造自己。但是擔任核心領導不行。這樣的組織才更合乎要求。

（讀批示第二條）

“中央決定……”這一段是增補或免掉的。增補的就是謝家祥同志，大家都知道的。謝正榮同志是大軍區副司令員、省軍區司令員。補他們兩位爲革委副主任。增補胡炳雲（大軍區副司令員）、胡繼成（大軍區副司令員）、余潛（省軍區政委）、何雲峰（十三軍政委）四人爲省革委常委，然後再補鄧經偉（省軍區副政委）、顧永武（十三軍軍長）爲省革委委員。

另外，免掉的兩位，王陰均【女，成都軍區總醫院司藥，“八二六”派軍區總醫院紅色造反者總團負責人，四川省革委會常委】已確定復員了，免去常委。梁善計犯有嚴重錯誤，也不適合作委員了。免去他們的常委和委員。藍亦農【原五十四軍政委】同志已經轉到昆明軍區去了，擔任副政委，做了昆明市革委會主任，現又轉到貴州省，代理核心小組長，處理貴州工作。貴州工作有很大進步，新的領導去了，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部隊。我們這樣做，“春雷”又響了。“西南的春雷”嘛。開始響了，後來打悶了。現在春雷又響了。韋統泰同志，五十四軍軍長，現在已調外省去了。

（讀批示第三條）

“由梁興初、張國華、謝家祥、王誠漢、胡繼成、王東保、謝正榮、段思英、茹夫一等九人組成成都軍區支左領導小組……”原來軍區【支左領導小組】是有的。以後，成立省革籌小組以後，就把支左小組取消了。轉到政工組、辦事組底下來管了。經驗證明這是把部隊“三支”、“兩軍”工作削弱了。劉結挺把軍區“紅總”、“千鈞棒”拿出來支左，其他的就成爲“老保”了。并在這個帶有派性機構的領導下，使軍隊也陷入派性。現在糾正了。“三支”、“兩軍”工作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還是要回到由軍區來管。這個支左領導小組，要加强“三支”、“兩軍”工作。軍隊本來是一個整體，不能分裂。從井岡山以來，毛主席一聲號令下，就奔赴前綫。我們的傳統就是這樣。現在回到軍區來管。因爲分工關係，由梁興初同志負主要責任。

（讀批示第四條）

“由張國華、梁興初、李大章、徐馳【文革前爲冶金部副部長、渡口市委第一書記，1968 年後爲渡口市革委會主任】、胡炳雲、胡繼成、茹夫一【成都軍區參謀長】、唐興盛（省軍區副司令員）、何輝燕【1969 年 6 月成立的鐵道兵西南指揮部司令員】、李安華【應爲李華安，成都軍區後勤部副部長】、蔣崇璟【文革前爲西南局國防工辦主任兼四川省委第二工業部部長，時爲四川省革委會常委、生産指揮組副組長】、魯大東、顧秀【1969 年 8 月前爲鐵道

兵第五師副師長，時爲鐵五師師長，渡口市革委會副主任】、錢敏【文革前爲西南三綫建委副主任】、丁釗【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政委】、丁先國【總後勤部重慶辦事處主任】、冀紹凱（五機部政治部主任）等 17 人，組成四川省三綫建設領導小組……”四川三綫建設剛才說了，耽擱很大了。當然不是什麽工作都耽擱了。有些進展還是好的。但受干擾較大。請十七位同志管這個事，張國華同志負責。李大章同志剛才講了，我們把顧秀同志請來，哪位是顧秀同志？見見面！（顧秀站起來）現在這樣稱贊你們，你們不要翹尾巴。你參加這次會議，要把成昆鐵路修好。何輝燕同志，你們明年七一以前能通車嗎？（何輝燕：能。）明年七一通車，這是最緊迫的了。因爲要通車，我們就要統一指揮。要把凉山、西昌、雅安統一起來，成立領導小組。把那個地方劃爲一片。由鐵道兵指揮部統一指揮。當然鐵工局的同志也參加，統一領導。

以下就是中央的希望了，（讀批示最後部分）“中央希望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這一段是中央的希望。因爲你們的報告中十一條措施裏都有了。所以中央批示不再重複。我們在這裏不再多說了。但是集中起來，就是你們過去對主席偉大思想、偉大紅旗舉得不高，對毛主席在九大前和九大會上提出的“準備打仗”，“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號召響應不力。甚至于丟在腦後。你們打內戰了，結果沒有準備打仗，而是武鬥。因此也就不能團結起來，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站在一起，“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九大以後半年多了，已過去很久了，我們中心的意見就是要你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狠抓對敵鬥爭。從你們的報告也好，你們發言也好，直到最後檢討也好，在對敵方面都不够强調。這次分組討論才認識到這個問題。就是要狠抓階級鬥爭嘛！四川地勢遠離國外，但內地敵情複雜，內部的敵人，九種壞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這些壞人多得很。特別是你們說的腦子裏毛主席思想少，眼睛裏沒有敵人，這裏所以我們提出首先要狠抓對敵鬥爭，狠抓鬥、批、改。你們批得不好嘛！你們沒有狠批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李井泉，前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廖【廖志高，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任【任白戈，前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重慶市市長】之流，批他們嘛！要把仇恨集中在他們身上嘛！只能在這個基礎上清理階級隊伍，然後整黨。當然首先搞好革命大聯合和三結合，狠抓鬥、批、改。按主席提出的程序來進行。一直搞到下放。要狠抓戰備動員，雖然四川離外國遠，但是現在戰爭是立體的。無論前方後方都會遭到敵人襲擊的。不能因爲遠，就可以鬆懈。正因爲如此，就要狠抓三綫建設，建成真正的祖國的戰備基地之一。具體工作很多，要按九大政治報告要求，你們把三綫建設搞得更好，把四川報告的落實無產階級政策和戰備工作，迅速把大三綫、工農業生產促上去，這是你們第二個報告中都有了的。由你們三綫建設領導小組回去研究貫徹，好好認真討論體會。分別動員群衆進行。說到而且要做到。特別要改變四川農業落後的面貌。集中地說就是這個問題。

（讀批示的結束語）

偉大領袖毛主席講過："四川很有希望。"但是你們辜負了這個希望。時間又過去這麽久，現在我們又把主席這個話拿出來說，而且得到毛主席批示"照辦"。你們總要達到毛主席這個希望吧?

衆：要！（熱烈鼓掌）

周恩來：回去要行動了。重複地來說，相信四川廣大軍民，人民解放軍，廣大群衆，首先是無產階級工人、農民、解放軍和真正向工農兵學習的知識分子，他們是願意在毛主席的光輝思想照耀下，要把四川建設成祖國可靠的戰備基地。

（對陳伯達）伯達同志，鼓勵他們幾句！

陳伯達：過去我講過一些話，大家又聽不懂。不用再講了。祝大家勝利地團結起來，取得新的勝利。經過這次解決，毛主席的口號可能在四川得到很好的實現。聽得懂吧?

衆：懂！（熱烈鼓掌）

周恩來：你們的報告比較長了。我只是打算回答幾個問題。因爲你們對自己的報告有點爭論。你們的報告，首先是講了這次

開會，這次開會應該是說確切點，比以前好多了，比別的省在九大到中央來開會，比起來說，你們這次會是好的。另外你們從絕大多數，從領導同志起，正像你們所說的提高了覺悟，增强了黨性，揭發了錯誤，各自作了自我批評，既弄清了思想，又增强了團結。我們認爲，這個估價，是合乎這次開會的事實的。不應把這個估價掉了。發展的過程嘛，這是你們估價對的。當然，揭發錯誤，自己揭和別人揭，有深有淺。這個不要緊，開了端，總會要前進吧。各自多作自我批評。他們幾個領導同志，大多數的檢討，又坦率又深刻。但總是開了端，開了頭。除了極少數人還沒有通,前進了一步又後退了兩步。有的還有抵觸情緒。這個是少數。絕大多數都作了自我批評。這個精神比別次會議不同。你們估計過去工作是有成績的。比如說奪走資派的權，這總是偉大的成績呀！這總是廣大軍民和群衆搞起來的。特別是在革委會成立以後，廣大革命群衆，革命幹部，特別是人民解放軍的大力支持，工作是有成績的，這個估價還應該是一分爲二，不要覺得四川是漆黑一團了，那是不好的。灰溜溜的，那個不對。應該是朝氣蓬勃的，錯了就改嘛。你總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把走資派在四川最大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這一小撮打倒了嘛！奪了他們的權嘛！各單位也有。其中執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還沒有改悔的走資派，把他們靠邊站了。然後等他們承認了錯誤，改正了錯誤，然後再結合，解放他們。那你算是作了這件事，總是有成績嘛！以後還搞了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嘛！但是搞這個成績，跟九大全國形勢的發展，和當前的工作要求來看，四川是落後了。在這樣說來是落後了。而落後的責任，原因不在于群衆，在于省革委的領導，把這個問題顛倒過來，不責備下面，責備上面。

我這裏還要說，我們也檢查一下中央是不是對你們過問得太少了？是少了點。這件事情，我們看經過，我們有錯誤，要承認這個責任。沒有抓緊就是了。但是在革籌小組成立前後，我們還是抓了一段時間，造反派來北京，反對李井泉一小撮走資派的革命群衆上北京請願，我們還是不斷接見的，也平反了。劉、張他們過去，李井泉壓他們，是錯誤的，也把這個案子推翻了【1967

年4月1日至3日，周恩來和康生主持召開了中央解決宜賓問題的會議。4日發出《中共中央關于四川宜賓地區劉結挺等平反的通知》（中發〈67〉154號文件），稱“關于四川省宜賓地委劉結挺等同志的案件，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十分關心，并指示周恩來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找雙方有關人員來京，加以處理。”認定劉結挺、張西挺等是“堅持黨的原則的好同志”，他們的案件是“李井泉一手製造的，經鄧小平、彭真、楊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顛倒了黑白……”】。解決了四川問題,成立了革籌小組，革籌小組回去，你們不請示報告，也不按中央規定的重慶問題的五條、四川問題十條辦事，開始有個報告，我們沒有批。那麽後頭呢，就是武鬥繼續發展了。情況不明了，你們的報告來得少了。當然還是找你們來談囉。可四川本身呢？給中央的報告實在是數目太少了。這三四個月，一直到你們來了前後那一次，十一月十九日，我們停止一些地方報紙以後的電報，總共的報告一共有五十二份。這些報告中央看幾次，這是有根據的。但是我們大的環節我們還是抓一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承擔責任。不把一切責任都推到四川省革委的領導身上。那麽中央承擔了責任，替省革委承擔責任，以後省革委的責任就大了。所以他們作了五條檢討。在檢討中間，對五條檢討有自覺的，有還不够的。我們覺得這樣子是可以的了。

五條檢討第一條，我們把問題集中了，把頭緒搞清楚，最主要的，是說我們犯了以下嚴重錯誤，什麽嚴重錯誤呢？以下分五個問題了。一個是我們主要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是一個總題目，總的一句是最重要的，是省革委主要領導沒有按毛主席指示辦事。沒有認真學習，傳達執行。還有時忘記了，例如“紅十條”，雙方都爭，真正“紅十條”核心的東西就沒有去執行。

第二條是沒有正確對待群衆，違反了一九六七年十月發布的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這是在一九六七年夏不久就發布了的，而且是在九月《紅旗》雜誌上，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的。姚文元的文章，當時就論述了工人階級內部不應該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沒有必要嘛！應該聯合起來嘛！都是革

命群衆組織嘛！這話是毛主席在六、七月間說的，在九月就把它用毛主席指示發下來了。在社論上就講了。可是那個時候，你們成立革籌小組不久，如果說七月王力到重慶、成都，特別是在成都講了八次話，所有出來時間有八天，干擾了你們，現在他們是不好的人，但是那時候有謝富治講的話，也講得對嘛！他是傳達中央的聲音，并且很快《人民日報》社論就提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講話。爲什麽不注意這個呢？爲什麽不把兩派看成是革命群衆呢？這一點在“紅十條”上說得清清楚楚的，都是革命群衆嘛！爲什麽不把他們很好地聯合起來呢？所以這個不能說中央沒有指示。但是這裏頭，我們特別說了一條，就是省革委自始至終個別領導人，就是他們自己寫的，錯誤的以擁護或反對自己爲標準。劃分“革”與“保”，劃分“‘紅十條’派”，“反‘紅十條’派”。這個當然指的劉、張了。其他人也有的同意他們這個意見。但是，他們是拿這個作標準的。這個不僅他，王茂聚【宜賓地區革委會主任，宜賓軍分區政委，四川省革委會常委。于這次會議期間11月21日在京西賓館住處自殺】在“武裝支瀘”的那個時候說的，“武裝支瀘”還早一點嘛。所以他們這個是最大的錯誤。把群衆搞成兩派長期對立。有人說“二月鎮反”時有“保”的，那個時候過去了嘛！“二月鎮反”到我們五月“紅十條”中央批示的時候，問題已經解決了嘛。如果不是王茂聚在那個地方“武裝支瀘”鬧得那麽凶，形勢也不會那麽緊張嘛！當然，那時候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看得清楚。現在我們查出來，王茂聚同郭林川【宜賓地區革委會副主任。曾與劉結挺、張西挺、王茂聚一起于1967年4月由中共中央平反，時稱“劉、張、王、郭”】在“武裝支瀘”的前綫打給省革籌小組的那個電報，壞透了，那完全是誣衊，亂說。郭林川，是不是那樣？

郭林川：是。

周恩來：你講的還記得記不得？

郭林川：記得。

周恩來：你說了這個事情沒有？

郭林川：說了。

邱會作：今天晚上是郭林川最乾脆的一次。

周恩來：是啊，我是專門查了的。你要不說，我就把全部文件都帶到這個地方，我今天是下了功夫的。五十四軍作了一件好事，就是把王茂聚、郭林川這個事告訴中央。就這麼“武裝支瀘”，他們打的那個電報是壞透了！這不是講韋杰【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因1967年“二月鎮反”問題被中央以“犯了方向、路綫錯誤”批判】，特別是甘渭漢【成都軍區第四政委，因1967年“二月鎮反”問題被中央以“犯了方向、路綫錯誤”批判】鎮壓革命群衆那個事情也解決了嗎？是講的革籌小組以後的事。這個當然要承擔責任嘛！這個報告是革委會寫的，革委會也只能管革籌小組以後的事，革籌小組以前的東西，甘渭漢以前的事他不管，不負這個責任。所以他這個檢討是對的。這個時候，再分“革”與“保”，那就錯了，是不對的。應該爭取産業軍廣大群衆嘛！這是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那個講話中有嘛！

第三，檢討的是違背了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發動了全省性的所謂“反復舊”。這個事情不用解釋了，四個文件都在一起了。你們把整黨座談紀要提在前面來了，他們提了許多錯誤作法。因爲整黨是應該的，整黨方針是中央的，就是他們的作法是錯誤的。那麼，既然這四個文件都批判了，那當然都不能承認的了。有的同志還擔心，你說他是個錯誤做法，他說他那個方針還是對的。整黨方針是對的，錯的是他“反復舊”是錯的。這四個文件當然站不住脚，如果哪個還爭辯，錯的嘛，還爭什麼？這一點要說清楚。

第四，是革委個別領導人，這個當然是指劉、張，沒有點名。我們覺得這個決議上不要點名，你們看山東文件也沒有點王效禹的名，貴州沒有點李再含的名，山西沒有點劉格平、張日清的名，他們犯了錯誤，還是讓他們改正嘛！所以他這回有了檢討。還給他改正的機會。我們主張不點名。但是性質很嚴重了。頭一個是頭腦膨脹，居功驕傲，爭權奪位。這是不是個人野心家？就是個人野心家嘛！不必寫上個名字，那個等一等再寫。何必急呢？如果改了，這個就不寫了。有人說還要加個“飛揚跋扈”，那個是

形容詞。要爭權奪位，這不是個人野心家嗎？第二個是利用職權，搞宗派主義，拉攏一些人，排斥一些人，還不是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以我爲核心，操縱辦事機構，安插親信，這不是“獨立王國”嗎？突出個人，獨斷專橫，突出個人，利用一切文化工具，爲個人樹碑立傳。這還不是給自己樹碑立傳？這不是爲個人造輿論嗎？所以這個性質够了。我們現在希望他們二位，他們自己承認要改，還有“四看”嘛！這都是毛主席的話，批呀，保呀，幫呀，看呀，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了。這些都是主席的話。而且還有些領導同志，從張國華同志起，沒有幫助他們，幫助不够，跟他們鬥爭不力，例如剛才說的，王茂聚的那個電報壞透了，沒有對他們進行幫助，批判不够，郭林川又偏向他，支持他，站在他們一起嘛！一直到九大以後，感覺到“反復舊”不行了，他才糾正，但糾正得不力，所以還有嘛，馮德華【前成都空字 028 部隊（解放軍第十三航空學校，1967 年 5 月改稱第四航空機務學校，此時已由軍委決定撤銷）紅色造反總團負責人】這些人，他就可以不聽指示了嘛，爲什麼呢？在四川就是劉、張說話算數，別人說話不聽，連張國華說話也不行。張國華同志也無可奈何。

首先你們革委會要負責任，首先是張國華同志，別的同志對他們不注意，沒有批判，所以他們就更加肆無忌憚了。所以集體要負責任，所以倡導集體生活，黨的民主集中制，黨的一元化領導，各地都應該如此。這裏也要說王茂聚這個人至死不改了，并以死來威脅，這種人自絕于黨，自絕于群衆，這種人不能當黨員，要開除黨籍。特別是剛才說的那封電報，王茂聚、郭林川兩年多就那麼個態度，所以他挑動、武裝群衆鬥群衆，那次省革籌小組也沒有把“紅聯站”估計對，說他們都是保守的，上層不能承認，群衆可以承認。這樣就給王茂聚一個藉口。就是他那武裝打死群衆的藉口。我說這是犯罪的。省革籌小組制止他，他不聽，找他來也不承認錯誤，你們對他無可奈何，這就放縱他了。這個放縱，首先是劉、張袒護了他。那麼這個張國華、梁興初同志，首先張國華同志。以後還有很多了。三次“武裝支瀘”，是三次嘛！所以這樣情形，這樣的班子，以前是革籌小組，以後是革委，再縮

小就是核心領導小組。

就像王茂聚的死，那他就“自作孽，不可活”了。但是他爲什麼放縱到這個程度？就是領導對他的事不負責任，放縱了他，從今以後省革委核心領導小組，可是要抓緊。全黨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這樣的組織原則。

第五是强調領導核心不團結。這個是說的很清楚了。這五條檢討說的很清楚了。不一定寫什麼性質了，不一定要寫什麼了。

以後的十一條措施，本來是十條，現在我們把辦學習班改成第十一條，單獨成一條。不然你們又來個“前紅十條”、“後紅十條”，是吧？又要混淆，又要吵架。橫順吵架。總之我們連數字都給斟酌了，才改成十一條。這個十一條需要解釋的就解釋。不每條都解釋。

第一條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毛主席指示，認真學習中央指示，領導班子帶頭學，帶頭用，自覺鬥私、批修。這是最主要的。這次會議要逐步傳達到群衆中去，統一步調，要鬥私批修。這回回去要傳達，首先在內部由小到大，逐步擴大範圍，傳達到縣，然後由縣往下傳。要有一個統一口徑嘛！如不帶頭活學活用，帶頭鬥私批修，那怎麼能搞得好呢？各傳其所傳，各取所需就不行。所以第一條還是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按毛主席指示辦事。就拿這一條來考驗。四川的黨，四川的人民解放軍，四川的革命幹部、群衆組織頭頭，拿這個來考驗，拿毛澤東思想尺度來衡量，特別是頭頭要帶頭活學活用。

第二條就是加强黨的領導。“五統一”【指當時中央提出的“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加强組織紀律性，比較重要。都說了，不多說了。要反對“多中心即無中心論”。

第三條，關于鞏固和發展革命的大聯合，解釋幾句。有人問四川兩派群衆組織到底是哪兩派？報告說得很清楚：“各地區有廣大群衆參加的現有兩派，都是革命的群衆組織……”不講老遠的，老遠的不存在，産業軍已垮了，你不能再復活起來。但對産業軍群衆要尊重，不能說過去站錯過隊的就不能改了。他們不論

參加兵團、八二六或紅成哪一派革命群衆組織都要歡迎。這兩派組織都要承認他參加革命群衆組織。你們一來，我們就批判“老保只能守寡不能改嫁”是個反動透頂的話囉！在革命隊伍中聽到這個話都要噁心！怎麼能說這個話？說這樣的話，好像那個抗日戰爭時期在四川，封建家庭女兒講戀愛，父母發覺了就把她逼死一樣。這在行動上是犯罪，革命隊伍中有這個思想就是和老地主說的一樣！（這時康生講司馬相如的故事，批判“老保只能守寡不能改嫁”的思想。）而且女同志也有說這個話的。江海雲【女，四川大學學生，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團負責人，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你有沒有說這個話？

江海雲：沒有。

周恩來：咳，你沒有說過。剛才康老講的你知道嗎？

江海雲：知道，講的司馬相如。

周恩來：這是講的兩千多年的事。四川封建得很，兩千多年後還出這種事，現在還在說“只能守寡不能改嫁”。改嫁，那時都承認了，是好事嘛！產業軍的群衆不管參加哪一派，都要歡迎他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幹部、領導還允許改嘛，改正錯誤還結合嘛！你看山東譚啓龍同志還選入候補中委，現在改得更好了，何況年青人。現在派性很多，也不外乎兩派，不管是哪一派，不是甲方就是乙方，要造成這個形勢，現在有兩大派就聯合起來，都是革命群衆組織，現在還有什麼不承認呢？但是以後就不能再搞了。今後重拉山頭就錯了。從今以後再拉山頭就不對了。不許拉隊伍，不許另立山頭。（傳達人說：中央一九七〇年10號文件規定，凡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成立的組織一律不予承認。）講重一點，今後一律不准用派性名義發表講話、文件，進行一切活動。應該消除掉。應不應該？

衆：應該！

（周恩來問蔡文彬【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學生，紅衛兵成都部隊負責人，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江海雲還搞不搞派性。蔡、江答：不搞了。）

周恩來：你們當着中央說的，不搞了。你們兩個答應不搞了，

就有希望了。不要怕罵你們“修”了、“右”了，從毛主席身邊回來還“修”了、“右”了？有批示爲證。但是彭家治【四川石油局 32111 英雄鑽井隊副隊長，石油工業部五好標兵，保劉、張一派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負責人，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同志你那個派性就未丟掉。

彭家治：改了。

周恩來：我們提議你還要遲回去幾天。不一定改了。你那個石油搞亂了。大慶投資 ×× 億元，石油基本自給，生産了 ×× 萬噸，四川花了 ×× 億元，投資大呀！現在僅僅搞了點煤氣【註：應爲天然氣。】那麽少，起勁地花錢，浪費那麽多，霸占汽車運槍搞武鬥，兩派都是如此。王存友【四川石油局 32111 英雄鑽井隊成員，石油工業部五好標兵，反劉、張一派四川石油工人革命籌備委員會負責人】解決沒有？

王存友：解決了。

周恩來：解決了？我很擔心你們兩個敗家子的。×× 億，聽一聽吧！我剛才說花在勘察上，浪費了很大數字。你們不感到痛心嗎？精神能變物質，你們變到哪兒去了呢？你們搞武鬥，搞資産階級派性，這個派性要消滅乾乾淨淨！今後不准重拉隊伍，用各自的牌子發表講話。要徹底消除派性。四川要後來居上，要痛下决心。有人問三代會了，三代會，成立革委會的不要搞，已成立革委會搞了的，還能不要嗎？未搞大聯合的暫不成立。沒有成立三代會的也暫不成立。已成立的不能搞垂直領導。讓他開一開會還是許可的。三代會不能淩駕于革委會之上。不允許了。還有什麽“文攻武衛指揮部”、“群衆專政指揮部”……山東這個問題搞得很嚴重。貴州都改了。你們這個地方就不能允許了。

第四條，你們講了革委會只能補臺，不能拆臺，更不能推倒重來。兩個革委會的聯合起來。革委會要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搞好組織革命化。不要再籠統地說依靠造反派。那個造反派，有的初期是革命造反派，後來弄得有派性了，不是革命造反派了，變成了資産階級派性，怎麽還能依靠呢？依靠那個怎麽能行呢？那就成了依靠一派壓一派。這是要徹底改

正的。依靠造反派是個別“以我爲核心”的人提出的。

第五條，關于武鬥問題。現在武鬥尚未完全停止，你們的措施中提到要堅決執行中央“七二三”、“八二八”布告、命令，要反對一切武鬥，在解放軍支持下，徹底收繳一切武器，統統上交解放軍。解放軍首先要保證統一，武器散在個人手裏，有的壞人掌握了，不知哪一天捅你一槍，搶汽車，把零件拿去補他的汽車，進行破壞。四川運輸很緊張，鹽巴也吃不上，就是運輸工具嘛！四川省承認，六九年給四川汽車零件是最多的，但用于配件的最少。都走私了,走了後門,吞掉了。不能再允許！必須把武鬥停止，古蘭還在武鬥，還有些地方在準備武鬥。你們開會的同志要把武鬥停止下來。認真執行“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

第六條，講幹部政策。落實毛主席的無産階級政策，主要落實幹部政策。認真作好解放幹部的工作很重要。你們所提的，很重要的。四川那麽大的一個省，工作這麽多，範圍這麽廣，你們解放軍應當要負責任。“三支”、“兩軍”，群衆聯合起來。但總得要有一定數量的幹部來做組織工作，軍隊一下子作領導工作，總會有困難，經驗不够，所以主席指出了三結合，要有革命幹部，要有解放軍，革命群衆的代表，首先要依靠解放軍，但革命幹部也要有一些，才好把工作推動起來。光靠老的不行，必須老、中、青結合起來，兩個三結合嘛！

第七條，要堅決相信和依靠解放軍。實際上在這次報告中强調了。要認清解放軍是無産階級專政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柱，要積極地幫助解放軍作好戰備和“三支”、“兩軍”工作，很好地學習解放軍。這個問題，現在在四川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所以，這次開會請了大軍區後勤部、參謀部、政治部，省軍區、軍分區，還有人武部同志參加，還有鐵道兵師、特種兵師也參加了。152位同志參加這個會，是半數以上。我們給他們單獨開了會。也開了小組會。首先要求解放軍團結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不能再有二心，有隔閡。要嚴于責己，寬以待人。大家團結起來，還分什麽你我呢？都是一個解放軍，一個統帥。在毛主席的統率下的人民解放軍，其實是一個，不能分家。首先解放軍要先搞好。

所以這次參加會議的同志回去要起骨幹作用。公開地說把四川問題解決好，首先要依靠解放軍從上到下，一級一級地傳達，要說服教育指戰員團結一致，做到一條心。這樣四川就有希望了。要堅持三條原則，做到“一碗水端平”。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你擁護毛主席的就支持，違背毛主席思想的就幫助，反對的就鬥爭他。不管哪個方面。

第八條，關于鬥、批、改，特別是清理階級隊伍，在這上頭大家覺得一定把九種人都列舉出來，我們覺得上面已經說清楚了，“不要包庇相同觀點的壞人”。特務、內奸、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還有國民黨殘渣餘孽……“壞人”就代表了。有人說，不一定九種，還有十種，反正都包括了。還有反革命，都應清理出來。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辦事。在這個基礎上整黨建黨，吐故納新。各吐對方的“故”，各納各的“新”，都是派性，那不行。

（第九條）宣傳工作上要統一，這回要徹底的統一，不能像過去了。《四川日報》要徹底改組，派得力幹部進去，再不能各唱各的歌，各吹各的號了。就是要在中央報告、批示、方針指導下，首先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按毛澤東思想辦事。

（第十條）戰備工作，大軍區已到北京開會，三綫建設有報告，軍工生產在報告中也有了，不多說了。

最後一條，要辦學習班。四川要辦，到中央來辦。辦學習班的目的，就是給你們工作上加强，不是減弱。有些同志現在表現得還不那麽好，留下來繼續學習一下，學好了，再回去。給你們創造學習的機會。

因爲大小會還不可能作細緻的教育工作，有的同志一時思想不通，不通就學一學再回去嘛！總是相信在毛主席身邊絕大多數可以教育好，我們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辦事，所以這條應該成爲獨立的一條。成爲四川省革委報告的最後一條。要重視這個工作，把這個任務擔當起來。幫助四川促進。

這是關于報告的問題。

關于三綫建設的報告不多說了。這是你們範圍內的工作了。

三綫建設就搞了兩三年，當然也不是所有都落後，還要一分爲二，有好的，但不好的多，要快馬加鞭趕上去，迎接七十年代。四川三綫建設艱巨，要首先把四川的革命搞好。

五項檢討，十一條措施，中央批准了。按照這個執行，四川會改觀的。在軍隊的會上，我曾說，萬象更新嘛！新年快到了，七十年代開始了，你們要萬象更新。貴州春雷再響了嘛！你們四川可以萬象更新，一定會萬象更新。真正按批示、報告、文件好好學習，傳達執行，通過實踐證明你們是真正瞭解了錯誤，改正了錯誤，按毛澤東思想辦事，這樣四川一定會後來居上，萬象更新。祝你們勝利！（熱烈鼓掌）

請康老鼓勵他們幾句。萬象更新嘛，你們講的嘛！

康生：文化革命初期，我們接觸四川同志比較少。最近接觸得比較多了。但不是都認識了，總是熟悉了一些面孔，熟了一些，思想又熟了一些。你們革命的思想，好的思想也熟悉了。壞的思想，不好的思想也熟悉了。你們要回去了，咱們要離別了，離別總要講幾句好話嘛！這次離別相當長，一離別就是七十年代了。六十年代不再見面了。再見面就是七十年代了。我和部隊同志講了，你們回去迎接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是偉大的七十年代，毛澤東思想將在全中國、全世界得到更大的勝利，祝同志們回去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過去說過萬象更新這句話，有些想像嘛！好像一萬件事情都要更新，沒頭沒腦的，誰曉得從哪裏搞起呢？萬象有個基本的一象，特別要更新的基本的一條，就是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是一切一切的關鍵。過去有的同志學習得不好，犯錯誤。經過這次會議，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身邊，聽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聲音，應當有所進步吧？應該有個更新的條件吧？這不是復舊了吧？因爲“反復舊”嘛，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講的，什麽叫“反復舊”：“反復舊必復舊。反復舊就是復舊。”那麽，你們既然批判了這個“反復舊”，現在不是要去復舊了，而是要去更新了。還是首先在思想上的更新。在這方面，我利用這個機會講一講，我是相信毛

主席的這句話："四川很有希望。"通過這次會議更新，開始了一個很好的開端，那的的確確證明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四川很有希望"，當然這個希望是要依靠你們二百五十多個同志，你們每個同志要成爲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員，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辦事，真正按十一條中央批示辦事。真正做到，就可以消除落後，就可以使四川有希望，就可以把毛主席的希望變成現實了。祝同志們工作勝利，藉此機會，給同志們拜年！拜個早年嘛！（熱烈鼓掌）總理叫我講話，沒有什麼講了，重複幾句老話。

記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不知哪個省已成立革委會，毛主席批示"照辦"（記得是批雲南的六條時）。我當時曾經就"照辦"二字發揮了一下。也許在座同志有的聽到了。這是初期的事嘛。因爲你們大家反落後，現在我覺得四川還可以用一下。你們看這個文件有一行紅字，不要輕視這一行紅字，要好好想一想，毛主席講了："照辦"，在毛主席批的兩個紅字面前，你們怎麼想的呢？一個是照，照什麼東西呢？就是照毛澤東思想，照中央的指示，照你們省革委、成都軍區報告的十一條，應當用這個去照。那麼單照照行不行？還要去照一個辦。這個辦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想想你們過去啦，主席已批示了"照辦"的那個"五二八"批示【指1968年中央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委會的批示】，你們照的怎麼樣呢？辦的怎麼樣呢？你們想一想，現在又批了一個"照辦"了，你們采取什麼辦法呢？是不是還是過去那個辦法去"照辦"呢？還是按現在毛主席批的這個"照辦"真正去"照辦"呢？

三年實踐中，執行毛主席批示"照辦"兩個字中間，我們體會到有這麼一種情況，也包括四川在內，有的地區，有的同志，有的群衆組織，是既照又辦了，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批示，中央的批示，集體的報告，既照又辦了。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林副主席的指示，根據中央的方針，真正地把毛主席的思想，把中央的指示、方針、政策，落實到各個方面去。這樣的情況，在全國就更多了。我想，四川在這方面也不是沒有的。我們不是完全否定四川，你們也有照辦的，你們報告中也講了，奪了走資派的權，你們的工作上也有成績嘛！既照也辦了。這是一種情況。另外一種

情況，就是一個時期沒有照，或者沒有完全照，辦是辦了，沒有辦好。但是在領導，在群衆幫助下，改正了錯誤，批評了自己的缺點，聽毛主席的話，聽林副主席的話，按主席思想辦事了。四川是有的。首先是我們人民解放軍，在甘渭漢、韋杰、葉劍英錯誤下面[1]，開始犯了錯誤，如五十四軍，以後經過中央糾正了。就很快改了。文件上也講了，四川省革委會成立後，廣大的指戰員作了不少的工作。中央批了：在各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績。雖然人民解放軍初期犯了錯誤，以後很快改了。在中央處理四川問題批示後，在“三支”、“兩軍”工作中，人民解放軍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指示、方針、政策，人民解放軍既照又辦了。當然在辦的中間也有錯誤的。不大平衡嘛！但是，應當肯定他們的成績。不能說四川的群衆、革命幹部、特別是軍隊沒有照，也沒有辦，這就是說，在照辦中，有的是一個時期沒有照辦，以後經過自我批評，改正缺點錯誤，基本上又照了，又辦了，全國這樣情況就很多了。那麼還有一種情況，照是照了，講也講了，講得很多了，在會議上、文件上也講了，報紙上也講了，但是照而不辦，辦也沒辦好。那是講空話了，中央的指示就不能落實，成爲一紙空文了。沒有研究，也沒有照辦。你們自己也說照，照也是各有各的照法，有真照的，也有假照的。你們那裏不是有個“紅十條派”嗎？自稱“紅十條派”，他也照了，就是照對自己有利的那一點,幷沒有全照。只講別人來照,我是呱呱叫。有的照了，但是辦是相反的辦，是照而不辦。這是第三種情況。

第四種是辦而不照。他相當努力挑動武鬥，辛辛苦苦地相當努力地在那裏辦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許多工作，可是照的什麼呢？辦的什麼呢？照他的思想，照他的宗派主義，個人主義，照他的想法，照他的那個東西辦事。我們遇到四川很多事情都是這個樣子。不請示，也不報告，中央文件他不研究，辦事就按你

[1] 指 1967 年 2 月經葉劍英批發了《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六’戰鬥團的信》之後，主持成都軍區工作的甘渭漢、韋杰開始了鎮壓造反派的“二月鎮反”。

的那個想法去辦事。這個辦事當然是錯誤的，與毛主席的“照辦”完全相反的。

下面還有一種，更壞了，是少數，也不照，也不辦了。所以我們希望這件事，同志們要慎重，很嚴肅對待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批示，看起來是兩個字，這包含着思想、政策，也包含着各種工作的落實。照就是要照毛澤東思想挂帥，辦就是要各項政策落實。所以，這一點希望同志們仔細地研究一下，把這個過去對待中央文件，你們說了“紅十條”、“五二八”仔細研究，對照對照，不要忘記過去那些錯誤。

還有哪，同志們，你們要回去了，可能今天晚上走，也可能明天走。希望同志們想一想，回去怎麽辦？提出這個題目，對每個同志都是個考驗。是什麽考驗呢？是一個共産黨員的考驗，是黨性的考驗，是真正擁護、忠于毛主席，還是假的。是真對四川七千萬人民負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負責，對人民負責，是爲人民服務，還是假的。到底是不是革命的，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産黨員，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在這裏一個多月了，那還好辦就是了。有錯誤時中央可以馬上幫助，回去後就要真正地辦事啊！要協助千百萬人民辦事，要認真工作了。尤其從中央開會回去，一舉一動對下面影響很大。你們要想想，我們與軍隊同志講了，要有信心，四川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搞好。要相信四川落後這個情况一定會改變。一定會趕上去，後來居上嘛！

這次會議開始是稀稀拉拉的，那個自我批評是敷衍了事的，後來大家覺悟的時候，就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評，總理講了，比其他來北京開會的地方好，比過去好。這也算是居上了，應該有這個信心。這個信心不是空的，而是建築在黨的基礎上，建築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有了一個解决四川問題的武器嘛！有的同志幾個月的學習，自我批評，階級覺悟提高了嘛！四川廣大人民群衆是好的，領導上有了自我批評，只要有這個核心，就能改變四川的落後面貌。

第二個方面，你們要設想到會遇到很多困難，多設想一些好，想得過頭一點也沒有關係，這只有好處的。毛主席在七大時

講，黨要遇到困難，十幾種困難。講什麼呢？抗日戰爭一定要勝利，但有困難，有可能敵人來一架飛機，一下把中央同志統統炸死，一個特務用一個炸彈來，一下子把中央同志炸光了。當然這個困難現在不會有的。主席還設想過三年災害，赤地千里，根本一點糧都沒有。這樣的困難都想到了。所以在有信心的基礎上，要看到困難這方面，就需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決執行中央批示文件。什麼樣的困難你要分析一下。

這個會我參加一下，絕大部分同志是好的。包括犯錯誤的同志在內，尤其是我們的人民解放軍，你們知道了，根據總理提議，我們專門找軍隊幹部開了一個會，把問題說清楚了。四川之所以有希望，最主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軍。贊成也好，不贊成也好，這是中央既定的方針。當然，依靠人民解放軍，也不是說不依靠群衆和革命幹部，但是人民解放軍是經過考驗的，各地方都是這樣的。絕大多數同志，軍隊也好，革命幹部也好，群衆也好，群衆組織頭頭也好，我們接觸過四川青年同志，他們很多可愛的，很可以教育的，很可以培養的，可惜的是有個時期在劉、張同志錯誤的影響下，省革委個別同志未很好幫助，把一些同志帶到邪路上去了。但是真正經過幫助能改的，我想到這些同志很可愛的。

這個會議反映了一些情況，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一點苗頭了，回到四川會感到……（不清）還是有個別的同志思想沒有通。基本上思想感情與劉、張的錯誤（不是劉、張個人），沒有完全分開。所以不管他主觀上如何，客觀上對劉、張錯誤加以解釋的，加以袒護的，討論報告時，個別同志這種觀點有流露，就是講彭家治同志。你那個講話，我們注意，記錄可能不完全，但這種思想一定會有的，回去後還會遇到的。不止一個人帶有這種思想的，彭家治同志是一個。

我認識康致中【建工部第一工程局革委會副主任】同志（康致中站起來）你的思想未通。雖然是同姓，你也姓康，我也姓康，五百年前是一家。你頂着一個工人階級的招牌，完全用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思想來腐蝕工人。你是這麼的，你是一個工人，你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這不是我才講的，我是開始接觸你就講了。思

想上還通囉！你是一個教員，國民黨師範學校畢業，作過小學教員，我們也是同行了。我也作過小學教員。

還有一個袁正蓉【女，四川醫學院學生，紅衛兵成都部隊“新總部”負責人，四川省革委會常委】同志，一個醫生，畢業了嗎？

袁正蓉：沒有。

康生：是內科的，外科的？

袁正蓉：綜合。

康生：會開刀嗎？

袁正蓉：不會。

康生：我很注意醫生，我是有病的。請你給我看一下，我是不怕死的。你是六〇年畢業生嗎？也有好處。我原來也想作個醫生，幸好未作，不然就會分到醫院去了。有的同志思想并未完全通，一定會有的。覺悟有快點的，有慢點的，要耐心做工作。回去會遇到有人，有一小部分人，還會保劉、張，會保劉、張的錯誤，與你們不對頭。遇到怎麼辦？耐心做工作。因此不要給人家戴大帽子。實際上他不是真正保劉、張，他是保自己就是了。所以劉、張同志你自己要覺悟。我看一個簡報上說，彭家治說，劉、張錯誤已在這裏檢查了嘛，爲什麼還寫在文件上呢？還寫上“革”與“保”、“紅十條派”與“反紅十條派”呢？那些問題是群衆中涌現出來的嘛！怎麼能說這些呢？是毛主席平反的，是“紅十條”肯定的嘛。彭家治說的就是要保劉、張。他是要保的。那好，保一個時候也好嘛！實際上是保自己就是了。

周恩來：說這話時劉結挺在座，聽到這話一聲不吭。這就不對了。劉結挺同志呀，你們聽到這樣的話要立即表態，對不符合實際的要立即站起來反對，馬上頂回去。你是三十多年的黨員了。

康生：劉結挺、張西挺同志，總理這個講話很重要。你們要時刻注意的。這是表現共産黨的一個黨性問題。講的時候應該立即站起來反駁。這些東西，也不能心口不一。那也不行。彭家治講這個話并不是保你們兩個人，人家是保他自己。他是幫你們的倒忙。是害你們。要這樣認識這個問題。遇到這個東西，這個人就要打我劉結挺了，是打倒你們兩個人的方法。當然主觀上不一

定是這樣。客觀上是這樣回事。同志們，尤其是解放軍要準備。有少數人不理解，會遇到干擾。不贊成不要生氣，不要着急，不要戴大帽子。要耐心做工作，幫助他認識，剛才總理講了，有幾個同志留在這裏，思想不通的留這兒，有人會這樣想：丟了官了，丟了人了，見不到老婆孩子了。好像奇耻大辱。這樣想，完全錯了。留下是愛護他，不使他走到絕路，是要教育他，挽救他，幫助他改正錯誤，按毛主席教導，犯了錯誤一看二幫，允許犯錯誤，但犯了一定要改。允許改正嘛！

對待錯誤，尤其是反對毛主席的錯誤，反對中央的錯誤，離開中央的方針、九大的方針的錯誤，必須從思想上嚴肅地對待，嚴肅地鬥爭，前個時期，中央對你的錯誤是相當嚴肅的，張國華同志，你在四川遇到這個錯誤，你不是沒有看到，你是看到的。你就不是嚴肅的態度，不是無産階級共産黨員的態度，總是有點個人打算，怕得罪人，怕鬥爭，怕字當頭，怕人家鬥你，怕丟官。不要怕嘛！怕得罪人。遇到錯誤一定不能調和嘛！還有另外的同志，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但是這一條，還有另一條，犯錯誤的同志，要允許人家犯錯誤，也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幫助人家改正錯誤，絕不一棒子打死。所以這一方面會遇到個別地方少數的這樣問題，江海雲同志，你是川大的，你們要改變那個情況就有相當困難，最近我看了新華社報道，有個記者沒有署名啊，姚希林、×××、×××，從成都寫來一個報告，講川大這個老大難單位。這個記者很挖苦就是了。

周恩來：江海雲，你是否聽過遲群同志的報告？

江海雲：聽過。

康生：蒯大富不見得比你不好，響噹噹的司令，都到內蒙勞動鍛煉去了。青年人改了就好。那人報告川大有個“32111 部隊”……

吳法憲：講講那個“32111”：每天三頓飯，兩頓覺，一場球，一盤棋，一本書——看壞小說，看黃色小說。你們四川還下象棋呀！

康生：這就是“32111”。這個事，記者是比較清楚的。你聽

了清華大學的介紹，還認爲不行，蒯大富不比你差，比你江海雲響噹噹的呀！現在人家還願意改，你們學校要改變這種情況，真正用毛澤東思想解決不難，要有信心。碰到這樣的單位也不要說“老大難”了，只要領導上面明確了，這些事是可以解決的。這種老大難單位也要信心足，每個地區也會遇到這種情況。另外一種情況，周家喻【重慶大學學生，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及紅衛兵重慶警備區負責人。四川省革委會常委】同志，八一五工作有什麽困難吧?

周家喻：有困難，我們要很好承認，改正錯誤。

康生：這個會，你八一五重慶的問題講得少，紅成的問題講得少，總之要一分爲二。重慶市革委會辦公室與劉、張辦公室差不多，你們人多些了。省革委辦公室要整頓，你們那裏也要整頓。你承認就好了。成都市偏向兵團、八二六多一點。重慶、成都辦事機構一千五百多人，起不到作用。承認重慶好，總之要一分爲二看問題。并要首先看到自己的缺點、問題。成都的辦事機構要徹底改組，事情就是這樣了。

總之要一分爲二地看問題。按毛主席教導一分爲二地看問題。總要首先看到自己的錯誤問題，這是一方面，就是保劉、張，實際上就是保自己。要看到這方面，會遇到一些困難囉。那麽還要看到另一方面，從我們會議中看到，也有另一方面，就是覺得對劉、張的批評不够味道。這一方面，下去也會遇到的。我們真正是受過錯誤害處的地方，個別同志講得更尖銳的，尤其是剛才看到總理念到核心小組還有劉、張，那就不滿意了。實際上這種思想也是不符合主席思想。這種思想實際上也是這樣子，他們不是真正說劉、張，不是真正對劉、張問題講的，他是表示他的正確，也是響噹噹的，呱呱叫的，他就忘掉了主席講的，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要一棍子打死，總是要教育，要幫助，要看嘍！這樣，這兩方面，比如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它就會妨礙團結，影響團結，妨礙十一條往下貫徹。當然，不會不遇到問題，遇到問題要耐心地做工作，拿主席思想，拿中央方針做工作，不要怕困難，不要怕引起攻擊。我不是講了，貴州省有個工廠經常打起來，你是“陳獨秀”，“康

老三”，而且另立山頭。貴州那個徐永章是犯錯誤的，回去檢查了，改了。他到貴陽鐵廠去，一個××不但罵了，而且打了。

周恩來：打了還簽了字，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康生：那個“二不”還是需要。地方同志也是需要。要學解放軍。不管怎樣，只要姿態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高舉毛主席的批示“照辦”和你們的報告十一條，一切困難都可以解決的。而且我覺得，只要我們堅持這個方針，并不是抽象的那麽困難，也并不是還要過個七十年代。絕不是那樣子。所以，我看，革命，生産，工作，戰備也好，在這個七十年代的第一季度中間，一定會有大的起色。四川會出現一個新的面貌。總理不是講了嗎？一個紅彤彤的大後方，改爲紅彤彤的戰略基地，實現毛主席的希望，一定會落實，林副主席講，四川問題不解決，他不放心。我相信同志們的工作作下去，一定能讓毛主席、林副主席放心，這方面我要預祝你們新年勝利，祝同志們身體健康！

周恩來：請黃永勝同志講幾句。

黃永勝：同志們，我沒有什麽話說。剛才總理、伯達、康老給同志們作了指示。六十年代剩下幾天了，七十年代將要到來了。今天中央同志歡迎你們過元旦。中國有句古話叫“送舊迎新”，你們回去過後要有一個新的思想，要把舊思想抛掉。要把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那些東西統統抛掉，要有一個新的思想，一切按毛主席思想去辦，去指導我們的行動。四川之所以搞得比較落後，就是因爲沒有按照毛主席思想辦事。而是按你們的思想辦事。所以我們在迎接七十年代到來，我們應該有一個新的思想，就要有一個新的姿態，就是一個革命的姿態，一個戰鬥的姿態，一個團結的姿態，一個嚴于律己的姿態，去搞好四川的工作。也要有一個新的作風，這就是要有一個戰鬥的作風，要有一個緊張的新作風，一切應該從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我們“要準備打仗”的要求，又要從林副主席指示“要用戰備的觀點去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就是要有一個戰鬥的作風，去抓革命，促生産，促戰備。總之我們偉大的七十年代的到來，在各方面都應該出現一個新的氣象，出現一個

新的面貌，我祝同志們在新的一年，一九七〇年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實現無產階級政治，按照主席思想，主席的革命路綫，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在各條戰綫上取得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新的更大勝利，在新的崗位上，新的工作中立新功！（熱烈鼓掌）

周恩來：吳法憲同志他還有幾件事，他還要講幾點，開始還有邱會作同志、紀登奎同志、李德生同志，他們過問得勤，一開始他們就過問了。他們最清楚，每天都在過問四川的情況。我補充一下。

大家對報告上有這一段話，就是幹部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所有群衆代表都不能脫離生產，其中青年知識分子要下放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就是說參加革委會的群衆組織頭頭的。他本來未脫產，但是現在參加省、地、縣和送到工廠當了革委會成員後，就離開他的業務，脫離生產了，就做官當老爺，不勞動了，這怎麽行呢？我們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走資派，挖修正主義根子，同時去掉官僚主義。脫離勞動是修正主義溫床，高高在上就脫離了群衆，不要脫離生產勞動，不要脫離實際，要經常下去。過去在下面生產是好好的嘛！有群衆代表性嘛！當委員就能把群衆的思想動態反映到革委會來。這就是生動的局面。這是一種朝氣蓬勃的氣氛。如果蹲在機關裏開會，那不是死氣沉沉了嗎？所以革委會要有群衆代表參加，一定要有新鮮空氣進來，一定要有基層代表委員，你們的任務就是要改造我們的領導機構。革委會是新的機構，爲什麽都跑到上面來了？就不下去了？要能上能下嘛！你們看到中央推薦的一個典型，就是上海市的王秀珍同志嘛！是個工人群衆代表，上海市革委會的領導成員，九大後她是中央委員。回到上海，回到工廠裏勞動，那就很好嘛！她給中央一封信，也反映了活思想，三年很少勞動了，開始勞動不習慣，腰痛，腿酸，搞一會兒就習慣了。回到勞動中去很不容易呀！群衆看到是他們的人，才說知心話，意見就反映到革委會來了。你們討論好像有這樣一個活思想，好像是“造反一場空”，這完全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思想，是“造反做官論”，“勞動鍍金論”，

勞動了就要當官，不對，這就是“修”了嘛！你們要鬥私批修。所以從工廠、公社基層單位來的，應該一邊當委員，一邊還要勞動，要像王秀珍、呂玉蘭那樣才好。按主席思想辦事，培養新的無產階級作風，小將們應該回去勞動，青年人更應該勞動鍛煉，一邊勞動，一邊當代表，總是在下面時間多，開會時間少，才合理。

康生：就是聶元梓也參加五七幹校去了，她還是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譚厚蘭也下去勞動去了。

周恩來：北京那個中學紅衛兵的頭頭，下去勞動一年多了。但是還是北京市革委委員嘛，到北京來還是要參加會議，但不一定每次都參加了。不要總在上面蹲着。到下面去蹲一蹲也好啊！

康生：希望你們把四川搞得紅彤彤的。

周恩來：戰備搞好，三綫建設搞好，我們希望去看你們，是你們來見我們哪，還是我們去看你們好？我們希望去看你們，最好每個地方都像一些兄弟省份搞得那麼好，革命、生產都搞得好。七十年代應該如此，元旦有個社論，主要是鼓動大家往前進，我們有七億人口，偉大的時代，偉大的黨，偉大的人民，偉大的軍隊，我們搞好了是一個大震動。有個資產階級作家，韓素英，她是一個女的，到中國來參觀了一些地方，就說勞動在毛澤東的中國是光榮的，不是懲罰。

康生：蘇修就是把勞動看成是懲罰。

周恩來：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認識到勞動是光榮的了。

康生：張國華、梁興初同志，你們核心小組也好，常委也好，都要注意啊！我們的經驗，不管哪個省，凡是有這個問題的，就是學生根本不下放，蹲在機關裏。四川也好，新疆也好，內蒙也好。這點你們革委會沒有堅持中央的指示，你說人家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你們自己就自由主義嘛！所以就出了一個“32111 部隊”，這是兩種思想、兩種世界觀的大事。

周恩來：十一條措施中明確規定了辦事機構主要是解放軍，和原來的革命幹部來抓。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是否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大事。

吳法憲：我們四川這個會，從十一月五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前後後除省軍區領導同志外，到現在已經是五十二天了。這個會議是逐步擴大的，由各軍分區、師的同志參加，後來又增加了一些軍隊、地方的同志。開了這麼長，今晚這個會議就結束了，閉幕了。中央常委，政治局的同志，只有葉群、汪東興同志有事外，其他同志都來了。總理、伯達、康生同志都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個人完全擁護。希望你們按主席指示辦事。會議開得這麼長。剛才總理、康生講了，這個會開得比較好，我們按照毛主席思想、指示、方針、路綫、方法進行的。特別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主持下進行的。你們原來寫的報告，中央首長作了很多很重要的指示，總理看了以後，提了許多重要意見，也的確向你們提了很多意見。也是因爲大家努力，覺悟了，所以開得比較好。這次會議，總理、康老下的功夫很大，大小會都參加了。伯達同志寫文章、寫書很忙，剛才的指示非常重要。

康生：你們需要學習吳法憲、紀登奎同志，我們不是評功擺好。特別是紀登奎同志作了大量工作，對革委會個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還有邱會作同志。

吳法憲：中央首長作了很多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聲音。這個會開得好，是在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指示，中央直接領導下開好的。一切勝利都是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取得的。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林副主席在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講：中國革命幾十年來，實踐證明，凡是執行毛主席指示，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綫辦事，我們革命事業就勝利，就發展，就前進。但是毛主席思想受到干擾時，我們的革命事業就受挫折，受損失，碰釘子。這次會議開得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回去怎麼辦：是個大問題。能按中央指示、報告辦事，按總理、伯達、康生、永勝同志的指示去做，真正能够勝利。如果違背這些指示，還要受挫折，碰釘子，犯錯誤的。關鍵就在這裏。

周恩來：主要靠你們照毛主席的批示“照辦”就是勝利。這兩個字有兩個關鍵問題，照，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才能照；要辦，必須徹底把宗派主義、派性去掉才行。不然怎麼辦?

越辦越壞。這是要高舉偉大紅旗。

吳法憲：我向同志們作兩條檢討。一條是，這個會在總理領導下，我作點具體工作，但作得不够，另一條是，我們有個學校在成都，十三航校，代號叫028，現在叫第四機校，初期對四川文化大革命作了點工作，以後錯誤越來越大，給四川幫了倒忙，幹了許多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做了很多錯事，陷在派性裏拔不出來。這次揭開了蓋子，批評了他們了。我向同志們檢討，希望轉達給四川同志，希望028同志，再不要插手地方文化大革命，沒有給你們支左任務。你們要按毛主席教導，搞好本單位鬥、批、改。要向本校同志作檢討，向駐軍作檢討，承認錯誤。

對這次會議的傳達，提幾點意見：

一、按照文件精神傳達，完全按中央規定辦事，傳達步子穩點，方法要細，不要一下子鋪到社會上去，那樣可能搞亂，可能出現反復。對四川文化大革命不利。按省革委、成都軍區的安排辦。到會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個人回去一下子鋪出來了。引起群衆混亂。敵人知道乘機煽風點火，乘機破壞。執行這個報告、批示，敵人藏不住，揪出來，不然他們會乘機破壞。一定要提高覺悟，不能私人傳達。我請示總理，除了今晚上講話以外，以前首長的講話都收回來。按黨性辦事。收不收起來，是個考驗。帶走傳出去各取所需，一搞出來，搞到小報上去，油印，石印，鉛印也有，將來很不好。各取所需，派性利用，敵人也要利用。很危險，要收回來。同志們顧全大局，再發生這種事情，要追查責任。按黨的紀律，軍隊紀律，追查責任。爲使會議順利傳達，不發生反復，動蕩，不被動，更有利于團結，搞好傳達，搞好四川文化大革命要注意的。

二、就是八一五、紅成同志，或傾向八一五、紅成的革命幹部、軍隊幹部，無論如何不能翹尾巴，受批評少一點，翹尾巴一定會犯錯誤。八一五不要翹尾巴。我給××同志提了很多意見，不是你一個的問題，不能利用劉、張錯誤壓兵團、八二六的群衆，劉、張自己檢討應承擔責任，錯誤在劉、張身上，不在群衆。如不注意這一點，下一次犯錯誤就要輪到你們八一五、紅成了。那

麼反過來，兵團觀點的同志，不要再袒護劉、張的錯誤，過去幫了倒忙，現在再幫就不行了。康老講是袒護自己，自己垮臺。也爲劉、張垮臺製造條件。要按總理、伯達、康老的講話，積極幫助劉、張糾正錯誤，才真正是從政治上愛護他們。真正按毛澤東思想辦事。

三、對省革委領導同志，要允許幹部犯錯誤，允許幹部改正錯誤，不要犯錯誤就了不起，一犯錯誤就大搞特搞，這不好。要幫助糾正錯誤，只能按文件、大會講的，不能超過這個以外去添油加醋，那就脫離批示、報告的軌道了。一切宣傳工作，按報告、批示、首長講話爲準則，不要自己再搞提綱，夾雜很多東西，那樣要犯錯誤。離開這個以外是不允許的。回答群衆的問題，只能按文件、報告，許多問題要按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以九大文件、黨章回答問題。才能真正幫助他們改正錯誤。迅速改變四川落後面貌。有的提出要發動群衆批判他們的錯誤，我們認爲是不適宜的。不妥當的。只能由他們自己作自我批評，自我批評到一定的綫，不能超出範圍，搞得太早，面太寬，不好。不能發動群衆來批判揭發。大量的材料够多了，好幾十條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要讓他們繼續工作，他們表態了，圍繞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周圍，我們要支持他們，維護他們的威信，使他們好工作。

四、回去以後，一定要言行一致，一定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不能再搞兩面派了，群衆組織名字不用了。規定了堅决照辦。回去以後不要不統一口徑，找到你們各人說各人的，五花八門那不好，要統一口徑，堅定不移地貫徹批示、報告，貫徹今晚中央常委同志的講話。一定要注意，要以無産階級精神、黨性保證，軍隊要保證。

五、就是要一些同志留下來，繼續讓你們學習一個短時間，提高一下，把思想搞通，這是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保護你們，回去搞不好，群衆要發生問題。要揪要鬧，那就不好辦了。你們自己的話，群衆的話，對主席忠不忠，要看行動，回去要搞好，四川問題要使毛主席放心，林副主席放心，黨中央放心。要使全國人民對大後方放心。要使解放軍放心。一定要實

現你們的諾言。

這次會，二百五十多個同志，落實這個會的關鍵在你們，會開完了，空軍派飛機送你們回去，乘毛澤東思想東風，把四川工作搞上去！

陳伯達：……

康生：×××同志要求回單位，你也暫時不回去，我們幫助你一下，坦率告訴你，你怕把你留下來，趕快聲明。你總是有點滑頭。

周恩來：我們不說假話，是要把你留下來，可沒有壞處。是要回去的，留下來的，不要那麼緊張。劉、張回去，犯錯誤也算代表人物嘛！領導小組都回去。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們跟着犯錯誤，怎麼不叫你們回去？你們在小範圍內影響大，希望你們萬象更新。我在幫助你，自己開了小差，那就更要犯錯誤。反正王茂聚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真是不知耻，我們把他開除了。再不能走他們那條路，拿他們作反面鏡子，“自作孽，不可活”，不能學。

康生：×××同志，你聽中央的話沒有錯，我們不會害你的。

周恩來：這是主席思想，新的九大政治局，就證明了嘛！犯了錯誤改正的都選上了，也不是都選上，你現在還是革委會副主任嘛！現在二十七日了，絕大多數六九年送你們回去過新年，留下的好好學習，過年再回去。

（大家歡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說明：根據兩份當時傳達原件（一爲手抄件，一爲油印件）綜合整理。圓括號中的文字是原件上有的。爲便于局外人理解，略加了一點註釋在方括號中。

原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0年第三版。

責任編輯：蕭　風
封面設計：胡　冬

ISBN 978-988-13680-3-4
定價：HK$ 70 元